

《世界是部金融史（中国卷）之贫富之刀》

第1章 此朝无钱胜有钱

（周朝）

在历史的长焦镜头中，金钱永远可以代表利益，所谓“民心”不过是给大部分人一个公平赚钱的机会，这才是一个社会最大的道德；在绚丽多姿的历史长卷中，金钱又永远不可能成为主角，它只是财富的一个符号，对与错，只在用钱的人。

恩惠能换来忠诚吗

好了，从西周说起吧。

西周是一个混沌世界，不要说金银，就是青铜产量也不大。没有金银的世界，什么才是钱呢？

“既见君子，赐我百朋”

——诗经

其中的“朋”指代贝壳，与很多国家和民族一样，贝壳是中国的第一代货币，后来，用青铜铸成的贝壳也被用作货币。对统治者来说，贝壳远远担负不起驾驭天下的责任，西周的王朝要以一种什么方式统治国家呢？

大部分人对西周的了解来自《封神榜》，也就是武王伐纣。实际上，周武王姬发统治的时间很短（既克商，两年，王崩），姬发根本来不及建立统治国家的框架。姬发死后，其弟姬旦，也就是周公即位（篡位）。这位孔子常常梦里神交的先贤才是西周制度真正的奠基者，在他这里，解决了如何统治天下的问题。

姬旦选择了当时最有效、最简单的统治方式——封建：为确保对国家的统治，姬旦共封七十一国，其中，姬姓五十三国，封国在地方替代周王管理属国。

封建、封建，封而建之。周王给下属或者子弟封地，让这些人永远效忠王室。在没钱的时代这也是一种交易，我们姑且将之称为“恩惠换忠诚”。

封建制下，无数实力相近的封臣，任何一个都没有动力背叛周王，更无法对抗整个部族。这种情形颇类似于经济学中的完全竞争假设：无数同质的生产者（邦国太小，而且很多）、在一个充分信息的市场（封建君主都是亲戚，知根知底）上出售同一种产品（简单的军事和经济支持），于是，价格可以在瞬时达到均衡（稳定的统治）。

这种恩惠能换来对君王的忠诚吗？

答：不能。

同样可以用现代经济学的观点进行解释，王室对封臣的恩惠存在边际递减效用：王室封赏越多，封臣对忠于王室会越来越不感兴趣。

楼主：天圆地方的困惑 时间：2021-10-16 00:57:12

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人不会被统治，一个没有统治者的世界才真的可怕。重要的是，作为统治者的“王”，有着什么样的“德”。

西周初年出土的青铜器铭文中，清楚地告诉了我们周武王、周公信奉的“王德”：敬天、保民。

在这里，“王”只是一个普通的凡人，“王”之上还有“天”，所有凡人都必须有所敬畏。天命面前统治者必须修明德行，如果失德，即使已有天命，亦会被上天所抛弃。这是亘古不变的真理：此前、此中、此后，无论多么辉煌的文化、多么骁勇的铁骑，一旦统治者失德者，帝国最终都将沦丧。

王之贵，贵在有尊严、责任、勇气和自律，历代周王农耕稼穡必须亲力亲为；战场上马当先的也不是命运悲惨的奴隶，而是头顶桂冠的“王”，数代周王都在与异族犬戎的征战中喋血沙场。

王者必须去竞争，不竞争何以为王？

竞争又必须有风度，宁可承担养虎为患的后果也不能失去品行。与后世“斩草要除根”的理念不一致，周武王灭商之后，桀纣的儿子武庚被封在商朝国都朝歌为王，国号“邶”。即使是商纣王这个亡国之君，明知周文王可能是商朝的最大祸根，照样要依约放虎归山。武王灭商与后来的秦灭六国是两种截然不同的逻辑：秦灭六国，杀尽王子王孙；牧野之战，纣王眼见兵败，身着白玉衣，走向了鹿台自焚。在很大程度上，殷商军事、经济实力还都存在，纣王自尽，只是以一种体面的方式承认了自己的失败。

现在，看着满大街广告，不管是什么破烂都敢自吹“帝王奢华、至尊享受”，我真感觉可笑、可悲、可怜。

这些无知、无良广告所谓的“王”如果单纯指豪宅、香车、美女……，那么我只能说：这只是一种形式主义的臆想，与真正的“王”毫不沾边，字里行间流露的只有肤浅、粗糙、低劣和恶俗。

这些广告如同后世的封建王朝，每一个皇帝都可以自标有“王德”，但是，我坚信只有西周统治者才真正相信天命悠悠！因为，在那个刚刚逃离蒙昧的年代，所有人都是坚信自己的命运被上天掌握，王朝的命运同样如此。

权力没有任何制约的西周，“王德”是封建统治者最后的底线这种“王德”对天命的畏惧延续了周王朝近千年的生命，此后，无论春秋五霸如何强盛，都只能挟天子以令诸侯，再强的诸侯都必须获得王室认可。这一点，颇类似于西欧或者日本王位千年一系，绝不能是“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的强盗逻辑。

很遗憾，“王德”对人的约束不能用经济学理论解释，这一点颇类似于今天的“行为经济学”——明明知道捐赠对自己不利，还是有人心系天下。“王德”为一个社会提供了最基本的生存保证，如果每一个人都从心底里信服“王德”，那么，就不会有人想去打破这个规则，每一个人的生存也就有了最后底线。

凡是试图打破这个底线的举动，都是全社会不允许的。

周公之后，西周终于到达了“成康之治”的巅峰，四十余年没有案件审理，人们生活在这片和睦之中（刑错四十余年不用，……，民和睦，颂声兴）。

丕显成康，上帝是皇；自彼成康，奄有四方。

楼主：天圆地方的困惑 时间：2021-10-16 00:57:12

谁毁掉了西周

西周王朝灭亡之后的两千多年里，人们不断思索：诚如孔子所言，西周是一个政治清明、道德高尚、制度合理的王朝，这个朝代甚至连钱都没有，为何这样的王朝也会在历史长河中湮灭？

答：如果没有外敌，那么西周王室很有可能成为千年一系的中华帝王，中华的历史可能完全改写。遗憾的是，历史不容假设，周王朝的西部有一个强大的异族——犬戎，这个民族的存在使得西周依靠王德维持统治的愿望注定要落空。

西周与犬戎的边界在今天“常武-彬县”一线，距离西周王畿镐京只有 120 公里，

而西周王室军事主力东八师(成周八师)却驻扎在东都洛邑,用来防止商人反叛。更可怕的是,犬戎一次能派出至少数百辆战车与周人作战,文明水平、经济实力与西周根本不相上下。

了解西周灭亡的原因又绝非易事,西周大部分原始史料来自于出土青铜器的铭文,青铜器的作用是用来祭祀祖先,让古人在祭祀的时候刻上自己的糗事,可能性是很小的。至于《史记》甚至更晚的一些二手资料,只要稍加分析就知道太不靠谱了。

《史记》首先将西周灭亡归咎于周厉王。在《史记》的描述中,周厉王是一个贪婪的人,他骄奢淫逸,还不准别人说他坏话。人们在路上都不敢说话,在道路上互相对视以表达自己对周厉王的不满(防民之口,胜于防川,……,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

真的是这样吗?

成康之治后,依次有昭、穆、共、懿、孝、夷、厉七代周王,西周衰败自昭王始。成康之治,周朝还对犬戎处于攻势,但到周昭王就完全不是一回事了,周昭王本人死于征伐犬戎的路途上,王畿镐京的主力军队西六师也丧失殆尽;周穆王时期,犬戎已经从被动防守转为主动进攻。

一旦西周对犬戎从攻势改为守势,王室也就难以维持在诸侯中的权威。

为防止犬戎西犯,周穆王开始不断违背原则加强对西部诸侯的封赏。“恩惠换忠诚”本来就没有确定标准,赐予西部诸侯的土地又只能从王室渭河流域土地分割,赏赐的土地越多,后续赏赐的可能性就越小、王室自身经济基础也就越差。从青铜铭文来看,周穆王为取悦西部诸侯采取行为已经超乎西周初年想象:册封之礼,祭祀所用牛羊大约是西周初年的 10-15 倍;西部诸侯的王妃也远远超出了应该的数量。

楼主:天圆地方的困惑 时间:2021-10-16 00:57:12

我们同样无法通过青铜铭文估计王室这种行为造成了多少恶果,不过我们可以进行一些比较。周公或成康时代,王室的赏赐都是成片的土地,这时赏赐被称为“土”;到了周穆王时期,青铜铭文中只记载王室赏赐小片土地,被称为“田”。现存出土文物中有一件“大克鼎”,大克鼎记载了厉王前期的一次赏赐,赏赐给诸侯 7 块“田”,而且都在边缘地带。

实际情况是,周穆王时代王室实力早就一蹶不振了,王室已经拿不出像样的封土了,周穆王只能提高对西部诸侯的特殊礼遇。在重礼的西周,这既是对其他封臣的不公平,也是自己败坏王德。

于是《诗经》记录下另一个恶果:既然王室带头打破规矩,其他人还有什么不能做呢?君臣无义(乱之又生,君子信谗)、父子不亲(天之生我,我辰安在)、夫妻无情(将安将乐,弃予如遗)、兄弟无序(终鲜兄弟,维予与女)、朋友无信(朋友已偈,不媚以黏)……

父子、夫妻、兄弟、朋友,都是人生最应该珍视的情谊,一个人如果连自己的兄弟、朋友,甚至父母、夫妻都不放在眼里,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如果每个人都如此,这又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

如果一个社会人们只信金钱,如何能指望君王、诸侯甚至普通人可以“明德”、可以“保民”?

司马迁大骂周厉王,原因还在于周厉王推行了“专利”制度。其实,西周铭文甚

至后世典籍始终都没说清楚究竟周厉王的“专利”是个什么东西，只是说他“专山林川泽之利”。周厉王很可能把诸侯的“山林川泽”收归国有（自己所有），凡是在山上砍柴的、打猎的都要向王室缴纳税收。看起来，周厉王敛财是确定无疑的，所以，司马迁认为此人是一个暴君。

不是周厉王贪婪，实在是王室太穷了。

周厉王前期，封臣势力已经超越了王室，多次有封臣击溃犬戎的记录，而王室军事主力成周八师却在战场上屡屡溃败。现存西周文物中著名的“多友鼎”，反复提到一位叫“武公”的诸侯力挽狂澜，派出自己的战车解救被围困的王师。

周厉王的命令只能下达给武公，武公再指挥部将作战；胜利后，周厉王的赏赐也只能给武公。也就是说，周厉王自己不可能指挥军队击溃犬戎。

万乘之国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

所以，周厉王要推行专利。我劝各位在大骂周厉王之前先看看专利究竟盘剥了谁，究竟是谁在山林川泽里砍柴、打猎。

按《礼制·王制》记载，西周山川林泽本来是公共土地，任何人都可以在其中砍柴、打猎；后来，随着封王势力增强，他们封死了普通人进山的道路，把山川林泽视为自己的禁脔。所谓周厉王推行“专利”，就是任用荣夷公从封王手里收缴山川林泽，或者占用山川林泽的封王必须定期向王室纳税。“专利”不过是周厉王为挽救日益衰亡的王室而在诸侯的碗中分一杯羹，如果王室真的建立了一个强有力的王权，最后被赶出京畿的就不是周厉王了。

在异族入侵压力威逼下，西周王室被迫培育了强势诸侯，一旦诸侯之间力量失去平衡，“王德”便失去了自身的魅力。

西周王室失去了财富、失去了王德，也很快会失去江山。

司马迁提到的第二个西周亡国之君是周幽王，附带给周幽王编排了一个“烽火戏诸侯”的罪名。

《史记》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周幽王经常无故点燃烽火，诸侯闻讯而来的时候，却没有发现王朝面临军事威胁；原来，周幽王有一个妃子叫做褒姒，每当褒姒见到城下疲于奔命的诸侯，就会笑得很欢乐；后来，犬戎真的对周朝发动进攻，周幽王点燃烽火的时候，再也没有诸侯赶来勤王。

现在，我们来分析一下“烽火戏诸侯”故事（大概由于破绽太多，以至于今天正史研究将这个故事直接列为传说）。

《史记》之前《国语》和《吕氏春秋》对褒姒的故事都有记载，最初的原型则是《诗经》里的几句无关紧要的诗词。

《国语》的版本最不可信：褒姒是邪神转世，与纣王的妲己一样，她来到世间就是为了惩罚西周王朝失德，她在人间的帮手叫做“虢石父”，两人狼狈为奸败坏西周政务。至于《吕氏春秋》情节与《国语》类似，只是故事更为简单，而且提到一句：周幽王为了取悦褒姒，经常亲自为她击鼓（幽王欲褒姒之笑也，因子击鼓）。

太史公司马迁真牛，愣是把《吕氏春秋》里的“击鼓”改为“烽火”。

这样做，不是太史公粗心，而是古代史学家们必须为西周找到一个灭亡的理由。否则，西周又怎么可能成为顶礼膜拜的典范？

只有展示出“妖女祸国”这样一个古老的传说，西周王朝在历史上的声望与其耻辱的结局才能调和，史学家才能继续把西周供奉在神坛之上。周幽王不是灭亡西周的终极杀手，一个绵延数百年的王朝，不会因为某一个人振兴，更不可能因为

某一个人衰败。指责“妖女误国”，不过是历代史家标榜自己学说的一种障眼法。

《竹书纪年》、《国语》和西周末年青铜铭文确实提到了很多女人，一群漂亮的女人，她们或依附于权贵、或围绕在诸侯周围，也许其中有一个人就叫褒姒。对世界来说，年轻漂亮的女人也是一种稀缺资源，如果这种稀缺资源如果紧密团结在封建统治者周围，那么，对一个社会就绝非幸事。她们叫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些漂亮女人以年轻美貌作为资本跻身统治阶层，而身居高位者从她们那里获得了愉悦。

这是一种怎样的愉悦？

放弃了祖先、放弃了“王德”、甚至放弃了天下，一旦这种风气成为时尚，乱世之相必生（乱匪降自天，降自妇人）。

现在，我为大家还原这段历史。

楼主：天圆地方的困惑 时间：2021-10-16 00:57:12

周幽王的王后叫做“申后”，来自于西部另一个强势诸侯——申国。按西周宗法制度，申后的儿子“宜臼”是嫡长子，也是法定的王位继承人。《竹书纪年》还记载了一个周幽王的王妃，也许就是传说中的褒姒，她的儿子叫做“伯服”，按宗法制度，伯服没有可能成为周王。

我的判断是，一旦宜臼成为周王，周王室就可能完全落入西部诸侯控制。周幽王不糊涂，他知道这件事的后果。

周幽王时代的铭文还记载有一个权倾天下的诸侯，这个人在周宣王时代就被册封为“皇父”，周幽王时代被加封为“太师尹氏”，当权四十多年，能号令诸侯。周幽王五年，犬戎再度入侵西周王畿镐京，正是这位皇父率领诸侯击溃了犬戎。

此时，周幽王却已经穷的叮当响，再没有可能再用“恩惠”来换皇父的“忠诚”。

既然赏无可赏，干脆就罚吧。

公元前 777 年，皇父被周幽王赶出王畿镐京。之后，周幽王获得了暂时的胜利，废黜了来自西部诸侯国的王后，并立褒姒之子伯服为王位继承人。

这是一个短暂的胜利，却是西周灭亡的开始。

周幽王之所以能驱逐皇父，不是因为实力，而是因为周王的位置，这个位置代表着道德制高点。一旦整个社会不再信奉道德，那么道德制高点的号召力便下降为零，剩余的就要靠实力说话。

失去“王德”的社会，人们只会臣服于强人，只有利益才是真正的信仰。也就是说，这个时候的西周几乎是一种丛林社会，只有赤裸裸的暴力才能制约这些诸侯了。对诸侯来说，周幽王不过就是一个名号，没一起喝过酒、没一起拼过命，凭什么要听你的命令？

无疑，周幽王也看到了这一点。

将皇父赶出镐京的同年，周幽王在太室山与东部诸侯结盟，希望依靠东部诸侯对抗西部诸侯。东部诸侯以殷商移民为主，曾经是西周王室防范的主要敌人。此时，周王室很可能已经到了众叛亲离的地步，放下周王的架子，把自己与东部诸侯摆在了同一起跑线上。

实力做主的时代，皇父、申后也不会忍受失败，778 年，申后的父亲与皇父同时起兵讨伐周幽王，要求立宜臼为王位继承人，更可恨的是这两位诸侯请来了宿敌犬戎作为帮衬，进攻周京畿。

周幽王根本没有真正的实力，重建的成周八师在皇父、犬戎联军面前一触即溃，稍作抵抗镐京便陷落，东部诸侯并未出兵相救。

公元前 771 年，周幽王在镐京附近的骊宫被杀，西周亡。

楼主：天圆地方的困惑 时间：2021-10-16 00:57:12

管仲的刀

周幽王死后，周平王为了躲避犬戎东迁至东都洛邑，中国开始了春秋时代。无论春秋诸侯多么强盛，都要举起周王室大旗，所以，春秋在中国历史上也被称为“东周”。

真正的强国，震慑敌国的不只是万乘之师，而是无法超越的经济实力。强国经济之强，必然源自国内公平的经济环境，能为国民提供一个自由创造的空间。即使弱国拒绝承认强国的地位，甚至试图与强国平起平坐，却永远无法拒绝强国对本土的经济渗透。

真正的强国，其货币体系同样无法超越。

无论弱国多么不情愿，强国货币一定会流进你的地盘。在古代，一种曾经广泛流通的货币，又必然有大量文物存世，春秋货币则主要包括布币、刀币和蚁鼻钱三个体系。在中国史籍中经常提到“春秋五霸”，不过“春秋五霸”有很多种版本。顺着本书的逻辑，我们可以断定，真正的春秋强国是齐国（刀币）、晋国（布币）和越国（蚁鼻钱），分别对应着齐桓公、晋文公和越王勾践。

从时间顺序来讲，齐桓公是第一代春秋霸主。不过，从齐桓公的所作所为，我实在看不出这是一位中兴之主，说他是一个花花公子倒是更可信些。齐桓公这辈子就作对了一件事，任命管仲为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谋也！

管仲出身贫寒，史籍给出的记载是“城阴之狗盗也”。管仲年轻时的生平，我只知道他做过小买卖、当过兵，还做过几次小吏。管仲似乎又是真正的“狗盗”，做生意的时候是黑心商贩、从军的时候当逃兵、当小吏的时候被罢免……。这个“狗盗”又与别的“狗盗”不同，当小贩的时候，他认识了鲍叔牙、隰朋等一批志向高远的朋友（实际上也是小商贩），也深刻领会到一个普通百姓谋生的艰难。管仲得到的第一个机会是辅佐公子纠，一位被质押在鲁国的齐国王子；而他的朋友鲍叔牙则辅佐公子小白，也就是后来的齐桓公。齐襄公死后，公子小白在齐国境内、是主场，公子纠却居住于齐国、是客场。

于是，公子小白变为齐王。

公子纠当然气不过，就向鲁国借兵跟公子小白打了一仗。鲁国看到公子小白已经即位，就杀了公子纠，并把管仲交给了齐国。此后，便是那些著名的故事：鲍叔牙举荐管仲替代自己为相，齐桓公与管仲君臣相伴，缔造了第一代春秋霸主。

真实的世界，远比故事残酷。没有国君知臣子的佳话，只有一个超级强势的宰相和一个白痴国君。

齐桓公与管仲的第一次对话，就尽显二百五本色。

齐桓公：要怎样做，才能保住我现在滋润的小日子呢？（社稷可定乎）

管仲：纷纷乱世，必须成为诸侯霸主才能保住自己（君霸王，社稷定；君不霸王，社稷不定）；

齐桓公：我没有这样雄心壮志，只要求过好自己的小日子（吾不敢至于此其大也，定社稷而已）；

面对这样的回答，管仲的反应很强烈，居然以死相逼：我没有为公子纠殉节，是为了辅佐一代英主成就霸业，如果没有这样的机会，宁愿赴死；（臣之不死纠也，为欲定社稷也，社稷不定，臣禄齐国之政而不死纠也，臣不敢）

楼主：天圆地方的困惑 时间：2021-10-16 00:57:12

说完，管仲就甩手而去，快走到门口的时候才获得了齐桓公的挽留（乃走出，至门，公召管仲）。不过，齐桓公的答复仍旧很勉强：你不要这样，先干着看看（勿

己，其勉乎）。

齐桓公最后的答复，大家可以理解为领导画圈，事情究竟办不办、何时办，压根连个谱都没有。

接下来的对话，才是齐桓公最关心的内容。

齐桓公：我有三个坏毛病，还能执掌国政吗？

第一个坏毛病，狩猎成瘾，无论白天黑夜想去的时候就去，只要去了就一定要得到很多猎物才肯回来；结果：耽误公务（为了娱乐，不顾身体，也不顾国事）。

第二个坏毛病，酗酒，不分白天黑夜地喝酒、连续喝，而且，一定要喝醉；结果：耽误公务（别说国君，就是一个乡镇干部天天烂醉如泥，也一定不称职）。

第三个坏毛病，喜欢美女，只要这个女人漂亮，不分长辈、晚辈，远近亲疏，我都要拿来娱乐；结果：耽误公务（您还真有脸说）。

齐桓很诚实，后来他的所作所为也证明了这一切的真实性。仅女人一项，就弄了七百多，天天在后宫从事某种娱乐。

管仲的回答很有自信：只要你今天任命了我，你自管取享乐，我来替你治理天下！

管仲拜相，面对的却不是一个清平世界。

齐桓公在高、国两姓贵族支持下登上王位，这两姓是齐国的世袭贵族，也是周王室的上卿。面对这样一个君王，两姓贵族对国政的掣肘可想而知。不过，管仲最后还是统一了政令，一步步将齐国送上春秋霸主的位置。

回顾管仲的治国策略，可以将之缩略为三步。

第一步，与国内贵族妥协，取得至高无上的权威，独秉乾坤。

如同当年的周王室，齐桓公主要经济来源是贵族供奉，包括供养王室生活、军需，等等。尽管地位很高，高、国两姓也有自己的痛苦，要参与朝政就得为王室掏钱，很心痛。

管仲上台后的第一个策略就是免除了高、国两家对王室的供奉，王室支出源自全体国民收税。

从古至今，很多史籍、很多人把高、国两姓作为反动势力代表抨击，认为管仲改革不彻底，没有打到旧贵族，是这位伟人的一大败笔。

反动势力之所以被称为反动势力，不是因为反动，而是因为有势力。既然有势力，又怎么可能被你革掉？打倒旧势力，又想兵不血刃，那是不可能的。改革的真谛就在于对立双方的妥协，妥协不是投降，是在损失最小的情况下寻找前进的路径。只有支付给旧势力一部分利益，双方才有可能互相让步。在管仲倡导的改革中，高、国两姓确实得到了实惠，另一方面，也失去了王室支撑者的政治地位。

多年的底层生活，管仲在庙堂之高亦知江湖之苦，他要做的是“治国之道，必先富民”。因为，“天下之所生，生于劳身”。这句话，可以用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来解释：劳动力才是价值的最终创造者！

所以，管仲告诉我们，关于财富，强国、弱国最大的区别是强国的钱都在黎民百姓手里，弱国的钱却在国王的钱箱子里（王者藏于民，霸者藏于大夫，残国亡家藏于篋）。这一点，颇类似于穷人和富人的区别，穷国只想抢老百姓的钱，富国却在想着如果让百姓赚钱。

“富民”其实很简单，只要不滥用民力，创造一个轻徭薄役的环境，让人民自己去创造财富就足够了。

齐国自耕农的主要负担是徭役，征发劳力耕种王室农田。具体效果如何，可以参见生产队、人民公社时期。管仲免除了自耕农的徭役，并将王田分给自耕农，这

在很大程度上带有“均田”的性质。其他废除的还有关税、商品税、人头税，……，十年后，齐国“冠带衣而履天下”。

管仲断了贵族供奉，又轻徭薄役，还要维持齐桓公奢华的生活、称霸诸侯，那里来的钱？答案见第二步。

第二步，铸币，调度天下财富。

齐国的铸币叫做“齐刀”，原型是齐国的捕鱼工具，齐桓公之前就有刀币流通。管仲所造的刀币叫做“造邦刀”，重量比当时民间刀币重五分之一，故民间刀币也称“小刀”。造邦刀刀缘圆润、文字整齐，是中国乃至世界货币史上的第一个标杆，它向世人昭示：官方货币代表着国家信誉，精美的足值货币不仅是国家蒸蒸日上的象征，也是人民生活的基本保障，故曰“造邦”。

造邦刀替代市场上流通的小刀，颇有调控市场的意思。为保证齐国农民不至于流向其他诸侯，管仲在春荒、夏荒的时候向农民低价出售粮食，并规定可以用旧的小刀购买；至于造邦刀发放，则是在每年秋收的时候以高价购买农民手中的粮食。管仲铸币还是没捞到什么油水，齐桓公就财源之事询问管仲。

齐桓公：是否可以提高房地产税；

管仲：如此，等于拆人家房子。

之后，齐桓公又列举了房产税、山林税、牲畜税、人头税等等，管仲的回答都是“不行”。只要是增加税收就一定会带来副作用，而且解决收入的办法根本就不能是税收。

齐桓公：那么，我靠什么发财呢？

管仲：官山海。

“官山海”就是管仲捞钱的办法，也是“盐铁专卖”的雏形，说白了，就是由王室垄断山泽之利。管仲选择了利润最大的山（铁矿）和海（食盐）。当时，普通人要生存下去，除粮食外，盐、铁都是必不可少的物品，齐国靠海多山，盐铁自然是主要产业。经管仲测算，如果垄断食盐销售，每斤食盐增加一钱，相当于人头税提高一倍。

这事以前周厉王也干过，他不过让个把上山砍树的贵族缴税就搞得鸡飞狗跳，最后连自己也被赶出王畿镐京。

能行吗？

行不行，看谁来办，也要看怎么办。

管仲手腕很高明，做法也比较温和，没有和民众直接对抗。王室只是垄断食盐和铁器销售，生产环节仍旧留给原有的盐商和铁商，没有彻底断掉这些人财路。这种“官办民营”的并未过多侵蚀私商利益，王室获得的收入也远高于税收。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封建统治者给予人民利益的时候，一定要显示出来；夺取人们利益的时候，千万不能暴露，所谓“见予之形，不见夺之理”。

楼主：天圆地方的困惑 时间：2021-10-16 00:57:12

第三步，管仲亮出了锋利的齐刀。

管仲的刀，砍向了诸侯国的粮食生产，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三十六计中的“衡山之谋”。所谓“衡山之谋”，是指春秋时期齐国征服衡山国的货币战争。

衡山国盛产兵器，衡山利剑，天下无双。管仲早就在谋划征服衡山国，不过，要想以武力攻打衡山国，肯定要费一番功夫。

替代性做法是，管仲在起兵前一年就派人到衡山国高价收购兵器；十个月后，燕、代、秦等国都跟着到衡山国收购兵器，可谓天下争购。看到赚钱的情况，衡山国

君告诉宰相：“天下各国都争购我国兵器，可使价钱提高二十倍以上”，衡山国百姓于是纷纷放弃农业转而打铁。

一年后，齐国派人到赵国购运粮食，赵国粮价每石十五钱，齐国却按每石五十钱收购。包括衡山国在内的诸国都运粮卖给齐国，就在各国为发财欢呼的时候，齐国突然封闭关卡、停止收购粮食和衡山国兵器。

在夏收前，对衡山国出兵。

此时，衡山国已经无粮可用，兵器也差不多卖光了，又不能在别国买到粮食，在经济和军事两个战场上败的精光，只得奉国降齐。

“衡山之谋”说穿了其实很简单，以高价诱使敌方放弃本业，追求某种产业的畸形利润，最终造成敌人经济瘫痪。

在任何时代，一种商品价格暴涨都会带来巨额利润。这种利润高的让人炫目，除非这种利润来自于国内垄断性技术，那是一定会出事情的。高利润会吸引相当一批人冲进去，而且，这批人往往还是能率先看到商机的精英。等到一个国家几乎全民干一件事情的时候，暴利就要终结了。

道理很简单，不可能让所有的人都赚钱。

借着锋利的齐刀，管仲终击溃了所有的对手。五年中，管仲先后用这种方法收拾了鲁、代、吕等很多诸侯，屡试不爽。不是诸侯太愚蠢，而是在利润驱使下，国家每个人都已经疯狂，国君就算看清楚齐国的阴谋，又怎么可能对抗？

齐桓公十五年，齐、鲁、宋、陈、郑“同盟于幽”，周惠王册封“赐齐侯命”，齐国春秋霸主地位正式确立。

然而，管仲的悲剧从上台第一天起就已经注定。

管仲是一个有远见、有能力的政治家，他主宰下的齐国是典型的强人政治。强人政治，需要强人有政局操控能力、高尚的道德情操和敏锐的洞察力，能以一人之力协调邦国运转。强人确实可以改变一个邦国的命运，但缺点也很明显：一旦失去这个强人，国家立刻会陷入窘境。

强人一般会为自己寻找一个合适的继承人，问题是，管仲不是国王。

管仲为齐国鞠躬尽瘁的时候，齐桓公在享受他的三大恨。除了七百多个女人，顺便还宠幸了一个著名的厨师——易牙。易牙是一个优秀的厨师，鲁菜的创始人，据说味觉系统相当发达，能品尝出淄水和泔水的区别。

这位优秀厨师还有着很高尚的理想，他想取代管仲成为相国。中国古代并不缺乏厨师、宦官、轿夫成为宰相的故事，一般来说，这些人都是奸臣的代表，比如，易牙、魏忠贤、和珅。不是这些职业的问题，而是这些人不该选择政治。他们接近最高权力核心，也看到了权力的巨大利益，却丝毫不懂权力的危害。毕竟，危害是对百姓的，利益却是自己的。这位厨师易牙最著名的事迹就是，为做菜的时候杀掉了自己的儿子，就是为了让齐桓公品尝人肉。

病榻之上，齐桓公询问管仲谁能继承相位。管仲却没有推荐任何人，只是答道：知臣莫若君。

管仲死后三年，易牙人修筑围墙将齐桓公困死宫阙（饿死）。此后，齐桓公的六个儿子互相攻击，先后都成为齐国国君，又被后来者击溃。

在日复一日的争斗中，齐国最终一蹶不振，再没能复霸。

楼主：天圆地方的困惑 时间：2021-10-16 00:57:12

齐国之后的霸主是晋国，唯一有实力挑战晋国的是楚国。此后，晋、楚经历了近百年的争霸，两国内部也各自发生了很多内乱。前 579 年，晋、楚约定彼此不再

以兵戎相见，而是要“同心怜诸侯”。这就是春秋史上著名的“弭兵之约”，此后四十多年晋、楚再无战争。

尽管如此，晋国却没有停止小动作，大力扶持楚的属国吴国，送给吴国兵器、送给吴国战车（教吴乘车、教之战陈），最重要的是唆使吴国背叛楚国（教之叛楚）。前514年，吴国公子光派刺客刺杀了吴王僚，成为吴国封君，这位公子光还有一个名字——吴王阖闾。

据史书记载，阖闾是东周“王者之道”的光辉代表，他吃饭从不超过两个菜、车马没有任何修饰、宫殿看起来颇像贫苦人家的茅厕……

真的是这样吗？

楼主：天圆地方的困惑 时间：2021-10-16 00:57:12

阖闾生平有一次非常重要的谈话，主题是讨论晋国六卿究竟谁能取代晋国宗族。

《封神演义》里确实有一句“天命有常，唯有德者居之”，不过，这是后世作者不自觉流露出的齷齪想法，与真实的东周毫无关系。当时，诸卿客取代宗族是一件根本不可能为世人接受的事情，也是极端有悖“王德”的事情。

阖闾确实非常节俭，他的目标却不是体恤万民，而是要万民经历比这更残酷的人生。在《三国演义》里经常有“发倾国之兵”之说，意思就是动员全国所有的兵力、物力去打一场战争（赢不赢不知道）。阖闾发动的却是“全国之民”，吴国之内，只要是个人，十四岁以上、五十以下要全部从军，更狠的是，作战不利要罪及家属。一个小小的吴国，国人不过数十万，居然有数万军队，动辄“万人以为方阵”、“为带甲三万”……

相信大家都知道，阖闾有一位著名的大将叫孙武，他有一个著名的治军理念叫做“赏善始战”，从字面来看是说给前方勇士重赏。实际上，这只是后世兵家的阐释，阖闾和孙武从来都没这么想，他们跟金庸《侠客行》里的“赏善罚恶使”一样，向来只有“罚恶”、从来没有“赏善”。

孙武把后宫三百位佳丽分为两个纵队，由阖闾两位宠姬做统帅，娇媚的宫女要穿上铠甲、拿起利剑和盾牌（被甲、操剑盾而立）。

然后，孙武要求两拨宫女以刀剑互殴。

楼主：天圆地方的困惑 时间：2021-10-16 00:57:12

宫女的主要职责是侍奉国王起居，偶尔搞搞军训确实也能愉悦身心。果然，这些宫女在训练场上嬉笑不止，把这当成了一场游戏——这本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孙武很生气，要处斩两位宫女领头——阖闾的爱姬。尽管阖闾也想阻止孙武这种无聊的做法，孙武却说“治军的决定权在将军，即使国王的命令也可以不听”（将法在军，君虽有令，臣不受之），还是把两个临时任命的妃子处斩了。果然，广大吴国人民在严格的军事训练（恐吓）下，后宫弱女也可以成为“赴水火犹无誉”的战士。

能把后宫弱女训练成恐怖分子，这是一种怎样的残酷？

严峻的刑罚对国人有着极强的威慑力，一旦作战不勇猛，甚至没有战功都会累及家人。那么，不需要任何奖励，所有人都被绑架到阖闾的战车上，只能前进、不敢后退。在恐惧与虚伪之间，阖闾打败了自己的盟国——越国，并提出一条非常离谱的和谈条件：若越国想保持诸侯封位，勾践必须以国王之尊来吴国当奴隶——典型无知而又无耻的暴发户！

楼主：天圆地方的困惑 时间：2021-10-16 00:57:12

为保家国不灭，越王勾践还真的来到吴国当奴隶。而且，他身边始终陪伴着一个人——范蠡：白天，范蠡替勾践做较重的活；夜晚，二人共宿石屋，商量如何

见机行事。

在范蠡开导下，三年来无论阖闾如何作践勾践，这位曾经的越王都毫无脾气（无愠怒，面无恨色）。最著名的事例，就是范蠡教勾践在阖闾生病期间去品尝粪便——阖闾的粪便。“勾践品洩”的壮举终于感动了吴王，阖闾认为勾践非常忠信。于是，勾践、范蠡终于得归故国。

归国后，范蠡毫无争议的成为越国第一谋臣。吴国的经历让范蠡明白了一个道理：让广大越国人民饿着肚子去跟吴国征战是不可能的，要想富国强民，必须“左道右术，去末取实”。道与术，就是规律，富国强兵只能按规律一步一步来，认识规律、服从规律，绝不可急于求成（人事必将与天地相参，然后乃可以成功）；所谓实，确实很实在，就是粮食；所谓末，确实很虚无，就是勾践个人享乐。在范蠡不遗余力的忽悠下，勾践回国后每天早晨起来都要像神经病一样质问自己一句：你难道忘记在吴国的耻辱吗？（汝忘会稽之耻邪）。然后，携夫人及全体贵族下田耕作，所有百姓不吃肉、不穿彩衣，与黎庶同劳动、共甘苦（“百姓”与“群黎”相对，是王室贵族统称，所以，普通人千万不要误以为自己是“百姓”）关于这段历史，很多人说越王勾践励精图治，最后，三千越甲可吞吴！

这事儿，不对。

楼主：天圆地方的困惑 时间：2021-10-16 00:57:12

越王勾践回国之后，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就是铸钱，后世把这种钱称为“蚁鼻钱”。

“蚁鼻钱”呈椭圆形，也被称为“鬼脸钱”，从考古证据来看，“蚁鼻钱”以晋国布币为基准（当忻布），大约一枚布币比十枚蚁鼻钱稍微轻一些。

范蠡则借助大量的蚁鼻钱搞活了对外贸易，生意范围那是相当广（南则楚、西则晋、北则齐），业务项目更是几乎囊括了一切赚钱的生意。唯独对吴国，只做一种生意——以“蚁鼻钱”高价收购粮食。

公元前 472 年，吴国正好赶上旱灾，最后国人连稻田里的野生大闸蟹都吃光了。这时候，越国仍旧表现了“信诚守道”的精神——为吴国提供军需粮食。

勾践对此非常反感，对范蠡说“我和你一起谋划反击吴国，你总说时机不成熟。现在，又反过来资助吴国粮食，究竟什么时候才可以出兵呢？”

范蠡答：“天灾与人事必须相配合，我们的粮食并不能维持吴国战斗力，倒是吴国自身的力量至今仍未消耗干净，他们如果做垂死挣扎，我们未必能胜”。

上天没有让范蠡久等，就在为吴国提供粮食的当年九月，阖闾再次不顾国内饥荒率兵奔赴黄池与楚国决战。当时，吴国军队粮食供应几乎全靠越国。

没有粮食、防备空虚，如何能抵抗越国三千兵马？其实，真正进攻吴国的并不是三千越国勇士，而是范蠡前期如流水般花掉的“蚁鼻钱”。

这一次，范蠡率兵攻入吴国都城姑苏，并在海上断掉了阖闾后路，阖闾兵败自刎。

最后，说一下范蠡的结局。

人们经常鄙夷“共患难，不可共富贵”。现在，我告诉大家，共患难是因为穷哥们之间根本就没有利益，也就谈不上什么叛变；不可共富贵，实在是因为没有什么人不会选择背叛，暂时没有背叛是因为筹码还不够大。

这一点，范蠡和勾践都心知肚明。

灭吴当年，范蠡向勾践递上了自己的辞呈：臣子只要见到君王受辱就是死罪，能在吴国陪伴您受辱，是想能有机会为您报仇；今大仇已报，恳请勾践杀了自己。勾践的回应似乎很够意思：你必须和我一起共坐江山，否则，我就杀了你（孤将与子分国而有之，不然，将加诛于子）！

一问一答其实范蠡只有一个命运：被处死。

范蠡当然不希望自己被处死，在命令下达之前他就从海上跑路了（乘舟浮海以行，经不反），顺便还总结了一下逃跑的原因：高鸟已散，良弓将藏；狡兔已尽，良犬就烹……。更不幸的是，后世有很多人看不开，这句名言也就无数次得到了验证。

出逃后的范蠡却有了另一番天地，他干起了自己的老本行——经商，也赚了很多钱。司马迁在《史记·越世家》这样记述了范蠡的结局，他成为家产数以千万计的富翁（居无几何，致产数千万），最后老死于陶地。范蠡死后，被奉为“治生之祖”，并成为道教里的财神（关羽是山寨版的财神）。据说，十六两秤的发明者就是范蠡，撑杆上有“福”、“寿”、“禄”三星，缺一两损“福”、缺二两损“禄”、缺三两就损“寿”了。

对缺乏商业道德的人来说，这真是一个绝妙的诅咒。

楼主：天圆地方的困惑 时间：2021-10-16 00:57:12

小结：国家的金融精神

问：周王室重要吗？

答：重要，相当、特别以及极其重要。

金庸先生在小说中安排了“华山论剑”，领袖武林的少林、武当均与这场武林盛会无缘。我猜想，金庸先生之所以这样选择，是因为“中华”之“华”就是“华山”之“华”。华山之能有以如此的江湖地位，完全是因为周朝的地理位置：西都在镐京、东都在洛邑，西都、东都之间的中心点就是华山，“华山”之“华”也就成为后世千万中国人的代名词。

周王室最重要的历史时期是西周，只有 274 年，辉煌与荣耀似乎转瞬即逝，这一瞬间却始终照耀着整个中华民族。

天下者人人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

——姜子牙《六韬》

天下既为人人所共有，天下之利权亦当为人人所共有。分封诸侯，血亲是一种自然的标准，是人类懵懂时最直接的标准，也是当时最公平的标志。秉承这种最为原始的公平，不但周王室的天下分封给了诸侯，诸侯的天下也分封给了宗族。这是一种维系人性与理性的统治模式，即使在周王室衰微后，东周霸主无论多么强盛也必须获得王室，任何背叛王室的行为都被认为人神共愤。

当然，我必须告诉大家，这种方式有着致命的弱点：王室一旦孱弱，必然会有诸侯挑战王室权威，周史已经明确证明了这一点。

应该说，秦帝国是周王朝疆域的直接继承者，嬴政也看到了周王室统治方式的弱点。秦帝国似乎汲取了周朝教训，用封建官僚替代了宗族分封。

大秦帝国最大的弱点就在于违背了周王朝的“王德”精神：试图追求权力永久的统一，天下者，变成帝王一人之天下。在秦嬴政缔造的这个刚性权力链条中，一旦源头崩裂，再无任何人能帮助帝国走出险境。因为，除了利益已经再没有任何理由让任何人再把自己和封建统治者联系在一起了。

最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嬴政、商鞅等人将帝国所有的权力都集中到了咸阳，一旦中心被毁灭，整个帝国体系便随之坍塌。仅仅十五年，秦帝国就在一场内战中瞬间坍塌，发动这场战争的既非外族、也非官僚，而是被统治的对象——农民。

嬴政统一封建权力的做法失败了，但巨大的利益诱惑又激励了后来封建统治者。此后，历朝历代都试图寻求一种有效的统治方式、一种灵活的折衷方案：既要形成严格、有效率的封建集权，又要实现封建统治者对子民的人性的道德。

坦率的讲，这是一个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只要追求封建集权，人性统治就必然是一个谎言。抢劫者可以暂时披上伪善的面纱，却难以掩饰对天下之利的贪婪。当然，有人可以反驳，周王朝只是奴隶社会，一个奴隶制社会怎么可能超越整个中国古代文明？周王朝生产力确实相当低下，只是，经济只是一个社会发展的相对指标，以封建王朝的生产力评判几千年前的西周简直就是一个天大的笑话。但凡真正的盛世，必然也是文化极盛的时期。传承中国数千年的《六书》全部出自西周，此后，历朝历代只能在西周残迹里寻找自己对这个世界的思索。与后世丰富多彩的金融货币现象相比，西周的金融表现形式确实非常简单，但却最适宜诠释金融的本质：诚信。

楼主：天圆地方的困惑 时间：2021-10-16 00:57:12

虽然王室衰落，诸侯仍旧秉承“夏禹、商汤、周公”三代缔造的社会梦想：无论是君对民、还是霸主对诸侯，都要有信义。这时候，天还是蓝的、水还是清的、骗子是不可以当卿客的、无德无能的君主也是会被干掉的……

此后，无论是中国古代的封建王朝覆灭，还是今天西方引发的全球金融海啸，都是因为远离了“诚信”。

毋庸置疑，孔子是整个周文明的集大成者。这位后世的“万世师表”为我们完整阐释了那个时代的财富精神：获取财富的途径必须是道德，义利并重才是财富的结晶，更是金融乃至任何一个时代经济秩序的根基。

我记得小时候看过一本书，简要回顾了孔子的一生。

孔子早年游历齐国，后在自己故乡鲁国成为相国，有感于国君鲁定公好色荒政，前497年愤然离开鲁国，开始了周历列国的传奇人生。十四年后，孔子终于结束了艰辛的游说生涯，拖着六十八岁的残弱之躯回到了乡梓之地。漫长的流窜过程中，孔子有过成为王师的荣耀，也有饥寒交迫的困顿，甚至有拘禁受困的耻辱、险些被杀掉的风险。

我记得这本书的原因，不是因为它记述了孔子生平，而是因为它对孔子大加挞伐，骂孔子鄙视财富，要求人们安贫乐道。这本书的谩骂曾经让我对孔子着实很有意见，按照这本书的逻辑，似乎就是孔子搞的我们穷了好几千年，只要没有孔子我们在战国时代就该进入资本主义时代了。

真的是这样吗？

孔子曾大声疾呼“罕言利”，所谓“罕言利”是“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是对缺德世人的指责。所谓“安贫乐道”是“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是奉劝世人尊重规律，绝不能急功近利。

今天，除了孔子，我们还可以瞻仰那个时代的商人，子贡、范蠡、弦高、邓拓……，那一个不是“富而好仁”、又有那一个不是“见利思义”？他们对财富、对金钱、对名利，何尝有暴发户式的浅薄？

道德价值当然高于物质利益，一个人、一个社会，如果失去了道德的价值，眼中只剩余金钱，那就是一个赤裸裸的丛林社会，所有的掠夺都会没有底线。这个时候，没有人能摆脱利益的诱惑，整个社会除了钱，已经没有其他任何东西有价值了。

孔子临终慨叹，天下无道久矣！此中风流，今天，我们真的懂吗？

楼主：天圆地方的困惑 时间：2021-10-16 00:57:12

第2章 秦始皇统一了货币吗

（秦朝）

利出一孔：商鞅功罪

经过春秋诸霸数百年纷争，战国时代，中原大地只剩下七家强势诸侯：齐、楚、燕、韩、赵、魏、秦。这七家诸侯都是见过大世面的，大家都在积攒人品，拼命招揽居民。

战国时代什么最重要？

答：人才！

土地有的是，有人就能在土地上耕种、就能产出粮食。

积攒人品、招揽居民的方法，就是变法。魏国李悝、赵国的公仲连、楚国的吴起、韩国的申不害、齐国的邹忌……，七家诸侯都使出浑身解数鼓励别人的国民迁徙到自己的土地上——只有这样才能产出更多粮食，才能在战争的时候有兵源。

一个人的出现改变了这一切，现在我们叫他商鞅。

商鞅（约前 390 —前 338）原名卫鞅，生于卫国，所以姓“卫”，又称公孙鞅。后来，卫鞅在秦国被封于商地，才称商鞅。

年轻时，卫鞅托身于魏国大臣公叔痤，公叔痤知道商鞅身负大才，当然，也知道他是一个无耻之徒。

公叔痤临终前，魏惠王来探望他。

公叔痤在病榻上对魏惠王说，“卫鞅虽然年轻，但此人身负奇才，恳请大王拜卫鞅为相，魏国霸业必成”。

对魏惠王来说，虽然也认识卫鞅，这却是一个很陌生的名字。而且，在魏惠王眼里，卫鞅实在太年轻了，怎么看都不像一个相才。

于是，魏惠王只是吭了一声（嘿然），并未作答。

见此，公叔痤又说，“如果大王您不肯重用卫鞅，那么，臣恳请大王一定要杀掉他，这个人决不能为他国所用”。

魏惠王走后，公叔痤突然良心发现，念在多年追随之情他把卫鞅叫到床前，告诉卫鞅与魏惠王的谈话。最后，公叔痤摆摆手，让卫鞅赶紧逃走。

此时，卫鞅表现出了自己的智慧：“魏惠王既然没有启用我，他也就不知道我的才华；不知道我的才华，又怎么可能真的杀掉我呢？”

公叔痤看着面前的卫鞅，留下了自己最后的遗言：“如果有一天你带兵打进魏国，希望你能念在我对你的收留之情，为魏国宗庙留下后嗣”。

面对阖然而逝的公叔痤，卫鞅踏上了自己的旅程：天下知我者绝非公叔痤者一人，我注定是一个枭雄，我一定能成就一番霸业。

楼主：天圆地方的困惑 时间：2021-10-16 00:57:12

卫鞅选择的目标是秦国；在这里，卫鞅变成了商鞅。时值秦孝公当政，商鞅通过朋友先后三见秦孝公，论述了三个不同命题。

第一次见到秦孝公，商鞅大谈应如何效仿尧舜禹，建立一个人间天堂，所谓“帝道”；结果，秦孝公睡着了。

第二次见到秦孝公，商鞅大谈如何仿效春秋霸主辅佐周王室，所谓“王道”；结果，虽然秦孝公不悦，仍旧认为可以跟商鞅继续谈下去。

第三次见到秦孝公，商鞅独辟蹊径开始谈论如何在战国独自称霸，所谓“霸道”；结果，秦孝公不知不觉把椅子搬到商鞅面前。

此后，便是秦孝公重用商鞅，也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商鞅变法”，有人将之总结为四个字——“重农抑商”。

武侠小说里有一种功夫，武林高手在决战中会耗尽全身气血，向对手发出致命一击，代价是牺牲自己生命。当然，一般来说，这种武功都是邪派武功。鉴于这种武功实在是损人不利己，即使邪派教主也不敢轻易使用。

商鞅变法，就是这种邪派武功。

一般贪官也就是贪污很多钱、一般贪婪的皇帝也就是把税赋提高到国人无法忍受的地步。商鞅和秦孝公要的，是天下之利，天下之利只能归秦孝公一人所有。此后，秦国爆发所有力量，不但消灭了六国，也耗尽了自己的钱财、锦帛、粮食，宗庙社稷终至不保……

我们先解释“抑商”。

战国时期，国人已经分为士、农、工、商四类。“商人”的本事在于身上有钱财，喜欢四处流窜、最不听话。

所以，必须抑商，所谓抑商也就三条。

第一，秦国不能出现粮食贸易。粮食是战国时代最重要的物资，禁绝了粮食贸易也就基本禁绝了商业。这么做当然是有深意的，因为，如果秦人买不到粮食也就只能自己去种地，种地的人最实在。

第二，加重商税，重到任何贸易品种都无利可图。

第三，降低商人地位。战国七雄，只有在秦国，商人才与赘婿并列成为最低等的国人。一旦有徭役、战争，商人总是最先被征发。秦国军规明文规定，不必怜惜商人及其子孙的生命，无论什么脏活、累活、危险活都要派商人去干。比如，攻城的时候去城墙上拆转头……。商鞅之前，秦国的都城栎邑是全国性商业中心，北通犬戎，东连三晋（北却戎毡，东通三晋），与中原大梁、洛阳、淮阳、定陶等地齐名；商鞅之后，秦地几无贸易。

没有贸易，当然也就没有货币。

货币是一枚一枚的铜钱，分散在国人手中，秦孝公如何能贪天下之利？只有禁绝货币，才能把所有利益都归于国王，国王才能更有势力（利出一孔者，其国无敌）。否则，如果有两个人跟国王分钱，那国王就只能得到一半财富；如果有十个人来跟国王分钱，那国王干脆不要混了（利出二孔者，国利半；利出十空者，其国不守）。真的让货币分散在天下人手中，那可是有无数个钱眼，秦孝公干脆不要活了。

楼主：天圆地方的困惑 时间：2021-10-16 00:57:12

第一条方法，叫做“户籍”。

以前，诸侯通过宗族控制国人；现在，商鞅设立了郡县统治农户。县郡长官由秦王亲自任免，县内民户、土地由县令掌握。

国人从商鞅手里拿到的是自己原来宗族的土地：拿到了土地、废黜了宗族。从此，中国农人第一次以“户”为单位直接面对统治者。顺便说一句，商鞅的税收也按农户收取。首先，根据对农户进行详尽的调查，计算出每亩土地粮谷产量；然后，按一定税率征收田税。至于税率，高到了相当离谱的地步，一年田税要足秦王十年用度。

之所以商鞅敢如此放心大胆的盘剥，是因为控制单一的农户比控制强大的宗族容易许多。毕竟宗族力量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对抗王室，而被拆分为一个个家庭却没有任何能力对抗封建集权。

至于农人，毫无血缘关系的五家被编成一“伍”。谁敢反抗，五个农户全体受罚，一般情况下会全被诛杀。即使有人跑出了家乡，只要在秦国境内，没有良民证的人难免不被抓获。没有良民证的结果就是被杀掉。

第二条方法，灭绝文化。

商鞅认为，笨的人好管理（民愚则易治也）。《诗经》、《尚书》是周朝文化的代表，

如果国人以《诗》、《书》中的道理去蛊惑人心，有一个人，就能让上千人不再以耕战求富贵；如果信奉《诗》、《书》的人当了县官，就会有一个县的人不再尊敬国君；如果天下人都信奉《诗》、《书》的道理，势必有人结党于下、议论政令，秦孝公的国将不再是秦孝公的国……

国人只需要知道在战争中多杀几个人、多分几亩土地就行了，至于文化，那是一定要废黜的。商鞅变法，就是有人偶敢提到《诗》、《书》，杀无赦；有人敢以《诗》、《书》里的道理讥讽国政，灭族！

什么诚信、贞廉、仁义、非兵、羞战，统统地都是垃圾，都应该进入垃圾堆……

楼主：天圆地方的困惑 时间：2021-10-16 00:57:12

第三条方法，罚，不是罚钱，是罚命。

禁绝了《诗》、《书》，商鞅拿出了自己的一套办法，就是所谓的“法家”。首先，请注意，是“法家”绝不是“法治”。商鞅是这样解释“法”的：君王嘴里说出来的话就是法律，目的就是管住所有人（法者，君之所独制也，以胜其民）。

至于如何管住大家，商鞅提出了更不要脸的方法——任力不任德。所谓“任力”，说白了就是重罚，罚款单位是一条人命。看一看商鞅制定的刑罚就知道有多变态：凌迟、汤镬、剥皮、腰斩、五马分尸……，顺便说一句，“诛九族”这个罪名就是商鞅发明的。

商鞅治下，不是错误的错误也会遭重刑，比如，拉着草木灰，洒在地上的人都会被割掉鼻子（大家可以理解为乱扔垃圾，因为商鞅认为，这种行为可能会引起路人不满，进而双方打架斗殴，后面我们会介绍为何秦人如此彪悍）。

我看，法家不叫“法家”，应该改名叫“罚家”。

三皇五帝夏商周，混到商鞅这里，彻底抛弃了“民惟邦本”的治国思想，撕下了所有伪善的面纱，开始采用赤裸裸的非道德手段达到功利性目的。

只有这样，才能威吓秦人；只有这样，秦王才能贪天下之利！

楼主：天圆地方的困惑 时间：2021-10-16 00:57:12

“重农”、“抑商”、“户籍”、“愚民”、“罚家”……，商鞅确实在统治期间禁绝了货币。遗憾的是，提升了军队战斗力、弱化了国人民智，然而，商鞅却没有挡住粮价一飞千里。精壮的劳动力都跑到战场上砍脑袋去了，当然，也有若干精壮的和不精壮的劳动力被人家砍了脑袋。

无论是砍人脑袋还是脑袋被砍，都会最大程度减少国内劳动力，都会使粮食产量下降。本来商人还可以贩运点粮食。现在，没有商人，何来粮食？

断绝了内外两种途径，秦国就断绝了粮食，也就难怪粮价始终上涨了。秦孝公死前，秦国的粮价已经飞涨到一千六百钱一石，如果按秦半两标准重量和魏国布币的重量比例计算，秦国粮价已经高出魏国几乎六十倍左右。

这样的粮价下，秦国不出事才怪。

为平息民愤，秦孝公的继任者秦惠公找到了一个完美的替罪羊——商鞅，他上台后亲自抓的第一件大事就是下令逮捕商鞅。

商鞅逃出了秦朝都城，回到了自己的封地——商，也是秦国最后一块没有实行郡县制的土地。在这里，商鞅起兵对抗秦惠公，最终，兵败被处以车裂之刑。

楼主：天圆地方的困惑 时间：2021-10-16 00:57:12

第一个为农民服务的“末业”是金融。

商鞅禁绝了秦半两（秦国原来的货币），吕不韦发行了自己的货币，这种货币叫“文信钱”。更为重要的是，吕不韦不仅自己铸币，也允许民间铸造货币，只不

过重量要比照“文信钱”。

吕不韦有了钱，就去三晋地区购买粮食，并设立了“太平仓”。简单的说，“太平仓”就是现在的“财政部+中央银行+农业部”：“太平仓”负责官方铸币，也监督民间铸币质量；在丰收之年，小农可以将自己的粮食卖给“太平仓”，价格那是相当厚道；在歉收之年，小农又可以在“太平仓”借到粮食，利息那是相当便宜。

第二个为农民服务的行业是商业。

吕不韦自己就是商人，他知道，贸易是人们互通有无、维持生活的正常手段，禁绝粮食贸易、对贸易抽重税是非常愚蠢的行为。虽然吕不韦仍旧把商业列为末业，但是，“本末”并不矛盾，士、农、工、商各有所长，不能偏废。

在秦国，商人总算过上了好日子，没有税收（请注意，不是低税收，是压根就没有税收）、没有劳役、赚钱后还可以用钱买官……

第三个为农民服务的行业是文化业。

粗鄙的国民是国君的耻辱（败莫大于愚），国内是一帮连《诗》、《书》都不懂的蠢人，出门见了诸侯都不好意思跟人家打招呼。

吕不韦认为：愚民，国人不用脑子思考，既能盲从于国君，当然也很容易被征服。

统一中国，除了有发达的经济，还要有发达的文化；要想文化产业发达，第一要务就是废弃本身就特别愚蠢的愚民政策。

振兴文化，也要统一思想，毕竟诸子百家有优劣之分。与后世杀人放火的焚书坑儒不一样，吕不韦统一思想的方法是集百家之长，诸家可以在秦国都城咸阳公开辩论，他自己也经常与门人辩论。最后，吕不韦成为“杂家”的集大成者，通过“假人之长”来“以补之短”。“杂家”继承了儒家天下为公的思想，强调“民”的独立性，“民”绝不是“王”的“群氓”，治国必先“德政”、“仁义”、“爱民”；“杂家”又有黄老道家的清静，有道君王必需“虚静以待”，不能以个人的喜好左右臣下，更不能以个人标准断定忠奸。

一句话：天下非一人之天下，天下之天下也！

——《吕氏春秋》抄袭姜子牙《六韬》

楼主：天圆地方的困惑 时间：2021-10-16 00:57:12

第四个为农民服务的行业是公务员。

吕不韦提出了与商鞅截然不同的理论，官府不能与农人对立，农人不是、也永远不可能成为任统治者奴役的牛马。大家不是吓大的，商鞅那些“车裂”、“诛九族”的劳什子，总有一天会反噬国君（亡国之主，多以多威使其民）。秦庄襄王即位后第一年，秦国就大赦天下，放掉了前朝因乱扔垃圾等小罪名抓来的很多“罪人”。吕不韦下令王室编纂了中国农学史上的四篇开篇之作，《上农》、《任地》、《辩土》和《审时》，还完善了一部新历法《月历》，记载了每个月农民应该完成的农活。各郡县官长最主要的职责，就是向农人宣讲耕田经验，根据每个月气候变化和农作物生长情况，提醒农民安排农业生产。

顺便说一句，中国第一代大型农田水利工程——都江堰、郑国渠，都是吕不韦主持修建的。都江堰将蜀地岷江分为内江、外江两渠，内江之水用来灌溉，外江用来泄洪。内江之水惠及三百多万亩农田，自此，成都平原成为天府之国，不再有水旱灾之惧，直到今天我们仍在使用吕不韦的这些水利工程。

举国郡县官僚成为农人的服务员，在秦国，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楼主：天圆地方的困惑 时间：2021-10-16 00:57:12

有了金融、商业、文化和为农民服务的公务员，吕不韦开始了自己对六国的征伐。与商鞅强盗般硬抢不一样，开战之前吕不韦总要找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忽悠国人，让大家认为自己的战争是正义的。吕不韦告诉国人，六国国君任意妄为、荼毒天下，所以，秦国要救六国于水火之中。秦国之兵是“义兵”，诛暴君、抚慰苦难中的六国，就不一样了。这样，敌国国人见了秦国的“义兵”，就像孝子见亲爹。秦兵所致之地，不虐五谷、不掘坟墓、不伐树木、不焚房屋……，据说这样的军纪能取信于敌国之人。

——前 249 年，东周王室合纵山东六国灭秦，吕不韦率兵攻灭东周，建立秦国的“东郡”。延续八百年的周室“天下共主”灭于秦人之手，秦国取得了统一天下的口实。

——前 248 年，信陵君合纵韩、魏、赵、燕、魏五国攻秦。在吕不韦主持下，魏王中秦国反间计，信陵君被迫隐退，破五国合纵。

——前 242 年，韩、魏、赵、卫、楚五国合纵攻秦，吕不韦率兵出函谷关，灭卫、迫楚国迁都。自此，山东诸国中有实力对抗秦国之兵的只剩下最远的一个齐国，齐国恰恰还中了秦的远交近攻之计，统一六国只是时间问题。

吕不韦信奉的思想，不允许他擅自篡位称王。否则，在子楚去世、嬴政又未成年的时候，吕不韦有无数次机会废黜这位未来的秦始皇。

嬴政终究会长大，而且，嬴政与子楚不一样。子楚，一辈子大部分时间都在赵国坐冷板凳，既无治国谋略、也无称霸宇内的雄心。嬴政是一个年仅弱冠的国王，一旦手里有了至高无上的权力，凡人就会立刻变成神。

按秦国的风俗，男子二十二岁要行成人礼，即“加冠”。如果成人男子是国王，“加冠”之后就要成为真正的统治者。现在，在嬴政通向封建集权的路上，秦国的权相、自己的仲父——吕不韦，成了最大的绊脚石……

吕不韦意识到这一切，在生死存亡的时候，他出了两个昏招。

第一个昏招，为加强对王室控制，吕不韦把大阴人“嫪毐”献给了嬴政的母亲。这位当年吕不韦送给子楚的美女，一定属于胸大无脑型选手，不但与嫪毐私通生下两个儿子，居然想让他们私生子取代嬴政成为秦王。

第二个昏招，嬴政 21 岁那一年，也就是亲政前一年，吕不韦抛出了《吕氏春秋》，并在城门悬赏，说能改动一字者，赏千金。结果，没有人能改动《吕氏春秋》一个字。从内容和文字角度讲，《吕氏春秋》远没达到尽善尽美的地步，无人能增损一字，显然是摄于吕不韦的权势。

吕不韦悬赏千金求一字，当然不是为了炫耀自己学术成就。吕不韦想借机告诉嬴政，自己的治国政策无可更改。

此情此景，嬴政怎能不知道，又焉能不下决心除掉吕不韦？

吕不韦以自己的权势向秦王嬴政的权势宣战，他的敌人却是天下权力欲最旺盛的人。这是一场注定的失败，倡导仁义、分封、无为的杂家，怎么可能在权势上战胜封建集权的法家？

更不靠谱的事终于发生了。

嬴政亲政后第一年，那位“大阴人”嫪毐就不自量力发动叛乱，带着几千门客就去诛杀嬴政。叛乱当天就被剿灭，嫪毐被诛三族。

追究起来，嫪毐是吕不韦献给太后的。

结果，吕不韦罢相。

吕不韦罢相后，建议吕不韦复出的人络绎不绝，去看望吕不韦的高官、贵戚、士人络绎不绝，据说在吕府附近造成了严重的堵车——马车。

嫪毐只有几千门客就敢拉杆子造反，吕不韦可是为相十三年，无论军队还是各个衙门都人熟、地熟，更何况吕不韦在洛阳还有十余万户的封地。造起反来，声势俨然要比嫪毐强很多。

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

放逐吕不韦后一年，嬴政赐书吕不韦：你对秦国有什么功劳，居然能在河南有十万户封地？你跟我有什么亲戚吗，居然当了我的干爹？还是把你发配去蜀地吧。

（君何功于秦？秦封君河南，食十万户。君何亲于秦？号称仲父。其与家属徙处蜀）

在流放的路上，吕不韦饮鸩自杀。吕不韦，挥金而起、饮鸩而亡，终于死在倒卖权力这门最赚钱的生意上。

楼主：天圆地方的困惑 时间：2021-10-16 00:57:12

只是，当时李斯在嬴政的支持下占了上风。针对淳于越的建议，李斯代表秦嬴政展开了反击：

——李斯上“焚书议”：凡非博士之职藏诸子百家著作，杀无赦，大臣不得议论皇帝是非、子女不得议论父亲之过……。焚书令的目标，并不是只打击儒家，而是要复活商鞅的“愚民”政策，消灭诸子百家。焚书令致使大量典籍失传，后来，项羽又在秦宫一把火烧掉了官藏典籍，害的后世研究先秦历史只能靠刨死人棺材里的竹简。

——第二年有方士告诉嬴政，他刚愎自用、专任狱吏、刑杀为威……，总之，这路货色已经惹怒了神仙，得不到长生不老药。几十年如一日追求长生不老的秦始皇，花了无数钱、费了无数心血，最终这些方士不是拿钱出海跑路，就是回来痛骂自己得不到神仙赏识。嬴政突然意识到自己被忽悠了，一怒之下坑杀了四百多个江湖骗子。在秦代，观星占卜的骗子都是识文断字的“专家”，其中就包括一批儒生。

谁也没有想到周青臣与淳于越的辩论，居然惹出来一个“焚书坑儒”，秦嬴政借机最终确定了帝国体制：统一了六国、建立了绝对服从一人的封建官僚、毁了天下诗书、坑杀了方士、杜绝了所有言路。更重要的是，嬴政从此不再信任长生不老，来世纯净的彼岸就此变成今生肮脏的此岸。既然没有来世，今生就要抓紧享乐，一旦作恶没了底线，嬴政就开始幻想主宰尘世的一切，当然也包括货币。

楼主：天圆地方的困惑 时间：2021-10-16 00:57:12

统一六国后，嬴政宣布，只有黄金、秦半两（秦国货币）才是货币，敢用六国货币者，罚戍边。所谓戍边，大多是去长城背砖头——几乎等同于死罪……

货币统一本来是经济发展的必经之路，但是，如果把封建帝王的意志强加于上，就未必能取得好的效果。嬴政应该知道，只有统一货币才能形成强势中央集权，否则，像吕不韦那样，大家都能铸币，堂堂“始皇帝”如何能拥有天下财富？

大家可能注意到，嬴政宣布了两种货币：黄金和铜。

货币的取材在货币理论中被称为“本位”，随着经济总量增加，货币本位价值会由低到高，正常顺序是：铜、银、金。两种币材同时流通也不是没有，应该是贵金属为主币、贱金属为辅币。

金、铜并行，金属于贵金属、铜则属于贱金属，黄金应该是主币、铜币则是辅币，理论上应该是“金本位”。

要知道，秦朝生产力绝无可能演进金本位的地步，此时金、铜并行本身就是很不

正常的事情。而且，汉代之后，黄金马上就退出流通领域，无论汉代货币如何演变，货币本位始终只是铜钱。

暂时放下铜钱，先来看一看究竟谁在用黄金？

秦朝官方黄金单位是饼，分为大小两种饼，大的 250 克，小的也有 16 克，纯度那是相当的高。就是一块小金饼的价值，放到今天也能将就着过年了，如果换算到秦朝的购买力，绝对是价值连城。

既然是官定货币，就一定有发行途径，秦朝金饼最主要的发行途径是嬴政对臣下的赏赐。对待自己的下属，嬴政那是相当大方，赏赐黄金动辄以车计算。

对皇帝来说，赏赐臣下黄金比分封更为合理。毕竟封臣土地每增长一分，君主土地就会减少一分，最终皇帝只能靠“王德”维系“封君-封臣”平衡，绝不可能为所欲为。

赏赐臣下黄金，却完全是另外一个逻辑。

封建官僚不再是封臣，而是由皇帝任命的郡县长官，或者帮助皇帝处理政务的三公九卿。封建官僚的财富来源于俸禄、赏赐或者贿赂，只要不是独立的封地，他的一切就都在帝王掌握之中，财富也就不会再培养独立的人格。

权力都只对来源负责，这是一个亘古不变的真理。

嬴政追求的是绝对封建集权，也就不容得任何人有反对意见，无论他的决定多么离谱、多么荒唐、要耗费多少别人的生命和金钱。只有完全屈服于嬴政的人，才可能得到嬴政的信任，才可能成为封建官僚，才可能得到这些黄金。

这明显是一个逆淘汰机制，所有试图保留独立人格的人，都不会得到黄金，都会被排除在这个体制之外。

楼主：天圆地方的困惑 时间：2021-10-16 00:57:12

这样的人留在嬴政身边，只能等死。

——秦国第一大猛将王翦，自知秦王嬴政决不能容人掌握兵权，在统一六国后归隐。当门客问起的时候，王翦只能悲哀的告诉他们，这是为了保住自己的性命……

——秦国第一谋士尉缭，早就看出嬴政“长目、豹声、少恩而虎狼心”。嬴政确立了统一的局势后，尉缭就悄悄消失在茫茫人海……

拿到这些金饼的，又是谁呢？

秦相李斯——著名的“仓中老鼠”，就是获得金饼最多的人之一。李斯年轻的时候看到两种老鼠，厕所里的老鼠浑身肮脏还吃不饱，粮仓里的老鼠吃的脑满肠肥还不用住粪坑。于是，李斯感叹，每个人的命运不同，完全是因为每个人所处的位置不同。

于是，李斯找到了相国这个能拿到嬴政赏赐黄金的好位置。

秦朝三公九卿、三十六郡，又有哪一个不是围绕在嬴政身畔的仓中老鼠？

然后，我们再来看看，是谁在用铜钱？

答：这个世界上从来就没有什么秦半两，至于说秦始皇统一货币，只是梦呓般的意淫。当代考古结论证明，秦半两的出土区域只限于秦地，其他诸侯国从有过出土记录。令人惊讶的是，即使在秦地，出土的秦半几乎每一枚都与其他钱不一样。嬴政明明颁布了秦半两的统一标准：重 12 铢（约合 8-10 克）。彭信威先生在传世之作《中国货币史》中对此有点睛之笔，“现存的秦半两，按重量来说，超过标准量的有、没达到标准量的也有，也不能断定这些钱是官炉铸造的。实际上，秦王朝还没有完全掌握铸造货币的大权”。

没有秦半两，大秦帝国又以何为货币呢？

答：布币。

所谓“布币”不是三晋的空手布，而是“布做的货币”，就一块小小的破布，不知那天遇水就发臭了。

这种破布是怎么到每一个普通人手中呢？

答：统一六国之前，所有的秦人都被拉去战场上砍人头了，统一六国后大秦帝国全国人民都在啃砖头。

布币，就是秦人啃砖头得到的薪酬。

楼主：天圆地方的困惑 时间：2021-10-16 00:57:12

——嬴政的宫殿，不但空前，而且绝后。秦宫绝非今天北京紫禁城可比，也不止一个宫殿，仅都城咸阳附近嬴政就修了二百七十座皇宫，这还不包括“矗不知几千万落”的阿房宫。对于宫中的万名美女，嬴政不仅注重容貌、更注重素质，他把诸侯妻女全部拉进自己的皇宫，煞费苦心地将她们装扮成“幼妙宠丽”，他自己则“纵酒后宫”。清晨美人的梳妆镜，如同天上莹莹的明星；渭水上的片片油渍，是从美人们脸上洗下来的脂粉；空中弥漫的香雾，是美人们在衣服上熏兰椒（明星莹莹，开妆镜也；渭流涨腻，弃脂水也；烟雾横斜，焚椒兰也）……

——嬴政的皇陵，不但空前，而且绝后。以冢土推算，这个陵墓至少要动用 50 万人力，才能在嬴政死前把整个秦始皇陵修完。更可恨的是，嬴政死后，将所有工匠，连同没有子嗣的美人全部坑杀，无数条生命都成了他的殉葬品。据说地下以水银为江海、以夜明珠为星辰、以流沙围住整个陵墓，内置弓弩，但凡敢偷窥这位始皇帝陵墓者，死无葬身之地。中国历史上有很多皇帝，很多帝王的陵墓都被盗墓贼挖空了，唯独这个名震江湖的秦始皇陵，无人敢拂其纓……

——嬴政的万里长城，不但空前，而且绝后。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在甘肃曾经爬过一次野长城，从天水出发开车两个小时，然后徒步两个小时，终于到达目的地。在没有任何机械的时代，要在荒山野岭修补一道绵延几千里的破墙，这得是多大的工程？

即使大秦帝国的普通人承认布币是一种货币，人们也没有机会把这些布币带回家奉养妻儿老母，绝大多数劳力都死在了工地上。传说中有个孟姜女，现实中又何止千万个万喜良……

嬴政在位期间，每年服劳役的人都在 200 万人以上，有数年的劳役征发超过了 300 万人。新中国史学泰斗范文澜先生曾经做过估计，秦统一后中国有 2000 万人口，除去 50% 的女性，再除去 18 岁以下、50 岁以上的男性和士兵，基本上每个适龄男性都嬴政弄去啃砖头去了，连个外贸尾单都没剩下……

何况老弱妇孺也未能幸免，这么多工程，虽然劳力是免费的、材料是抢来的（强征），嬴政手下那帮封建官僚要吃喝拉撒，劳力也要吃饭的——这绝不是一个小数。秦朝农人的田赋、人头税约是战国时代六国的二十倍，徭役约为战国时代六国三十倍；六国贵族则更惨，被嬴政悉数迁徙到都城咸阳附近，天下富户亡尽……

于是，我们在史籍中看到了如下词汇：僵尸千里、流血倾亩、百姓力竭、百姓靡蔽，孤寡老幼不能相养、道死者相望……

六国时代，国人尚可逃亡，只要爱劳动，到哪里一样都有饭吃。现在，天下一统，逃离土地就是死罪。让你走，你不走，或者走的慢了点，也是死罪：被征发服劳役的人如果迟到一天，就会被处死。

嬴政弄死你的法子很多——腰斩、枭首、弃市、戮尸、车裂、坑、石桀、戮死、凿颠、抽筋、釜烹，死刑就有 12 种……

嬴政喜欢奢华，天下人也都顾念自己的家庭。结果却是，宫殿里的柱子多于田里

的农夫、宫殿里的木梁多于织布机上的女工，天下之人敢怒而不敢言。天下之财，奈何取的时候连最后一分财富也拿走，用的时候又像泥沙一样不知珍惜？（秦爱纷奢，人亦念其家。使负栋之柱，多于南亩之农夫；架梁之椽，多于机上之工女。使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奈何取之尽锱铢，用之如泥沙）

可以吗？

不可以吗？

楼主：天圆地方的困惑 时间：2021-10-16 00:57:12

秦朝小结：血族的衰亡

战国之前，中原大地根本就没有私有制。人们的社会关系是“封君-封臣”，大家一起耕种土地、一起娱乐、一起生活……，除了成为奴隶的战俘，世界上并没有剥削。

战国之前，我们祖先最主要的农具仍然是木棍和石器，耕牛也是在春秋战国交界时才成为农业畜力。当然，春秋时代也有青铜，只不过青铜农具的作用是放在祭坛上供人顶礼膜拜，不是真正去田地里耕作。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春秋时代，无论齐国的刀币、晋国的布币还是楚国的蚁鼻钱，币材都是青铜。要知道，几十钱就可以买到一石粮食，您这几种粮食还想拿着青铜家伙。

今天，有人见农民拿黄金做锄头的吗？

木质和石质工具无法支撑一个家庭对抗自然，以家族为单位生存是必然的选择。在集体生存模式下，家族得以延续才是最幸福的事情，所以，在海外学者先秦史研究中，西周、春秋也被称作“血族时代”。

血族时代，一宗、一姓、一族连生存都困难，包括国王在内大家都不可能有过多特殊待遇。王对百姓要讲“王德”、讲“仁义”；百姓对国王，要讲“信义”、讲“忠恕”。

无钱的西周，“信”、“忠”才是血族时代的幸福观。所谓“信”是对普通人而言，人们不能食言而肥、不能互相欺诈，如果一个人可以欺骗他的同类，当然也可以欺骗上天。基于上天惩罚的恐惧，“信”才成为最基本行为准则，这种不为今人所理解的“一言九鼎”其实是当时的常态。至于“忠”，不是大家要向谁效忠，而是家族之长要忠于家族、国家之君要忠于国人（上思利民，忠也）。

所以，周王室虽然孱弱、虽然经常被诸侯戏弄、虽然根本就没有金钱，除了粗鄙的野蛮人——秦国，没有那个诸侯敢对王室动武。

战国是一个高山为谷、深谷为陵的时代，魏国率先发明了鼓风炉，铁器成为制造农具的主要材料。铁器的出现，使得人们以家庭为单位生存。正是这个原因才有各诸侯变法——变家族生产为家庭生产。战国末期，中国终于出现了土地私有制，《史记》记载，长平之战的主角赵括的老爹赵奢曾去自己的农地上视察耕种，此后，便是商鞅变法“废井田、开阡陌”，把公田分给敢于砍别人脑袋的人。

本来，人类生产单位从家族走向家庭是一个进步，离开家族的束缚，单一的人才能有更多作为，嬴政的做法却完全让事情变了味道。

有钱的秦朝，只有秦始皇才有幸福：荼毒天下之肝脑、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

统一六国后，嬴政只活了十年（前 220-前 210 年），十年五次出巡，每次出巡时间平均一年。高兴的时候，就赏赐沿途百姓一点“布币”；不高兴的时候，就杀人全家，巡幸到赵国故都邯郸的时候，嬴政将幼年时代难为过他的人全部坑杀。每次出巡，嬴政必立石刻昭彰自己的功绩，现所有石刻均已被毁，唯有三十二篇文本存于《史记》，无一不昭示这个独夫民贼妄图唯我独尊。

六合之内，皇帝之土。东到大海，西涉流沙。南及北户，北过大夏。人迹所至，莫不臣服。秦德昭昭，秦威烈烈。恩德所至，泽及牛马。

——琅琊石刻（秦相李斯）

楼主：天圆地方的困惑 时间：2021-10-16 00:57:12

司马迁对这些奉承到肉麻的石刻给出了一个简练而中肯的评价：鸣得意！

无论那个时代，都有人活的很光彩、有人活的很艰难。我相信，没有人想生活的艰难，趋利避害是每个人的本性，所以，大家才拼命赚钱。

“想赚钱”这个理想很正常，这在西方经济学中被称为“理性人”。西方经济学最大的特征就是有一堆非常不靠谱的假设，“理性人”就是最基本的公理性假设之一。意思是说，每个人都能精准的判断自己的得失，然后根据能否赚钱再做决定。

西方经济学只是把“理性人”作为一种假设，这并不是现实。我们不是计算机，不可能每件事都斤斤计较得失，比如，扶起跌倒老人之前不可能预见到自己被讹诈……，这位嬴政，愣是把两千年后西方经济学的假设变成了秦朝的现实。

嬴政缔造的秦朝，最幸福的是嬴政，其次是他手底下那帮封建官僚：皇帝最光彩、大官有大光彩、小官有小光彩；国人，不光彩。

嬴政的光彩又是怎么得来的呢？

答：只求有利，不求有德。

结果：广大秦朝人民都成了“理性人”。

从商鞅开始，秦人就彻底抛弃了“王德”，凡事只要能获得利益，就算是冒天下之大不韪也要去做。大家可能还记得，前文提过公叔痤临终前曾求商鞅不要进攻魏国；为秦相后，商鞅以“故国之情”为由邀请魏国公子有赴宴，结果在宴会上俘虏了公子有。此后，秦国干的事情根本就拿不上台面：以王后之尊色诱犬戎酋长，后诈杀之；嬴政囚禁生母消灭嫪毐集团……

只要能取胜，什么法子都用：诸侯名将能以金钱收买的就收买，收买不到的就离间，实在离间不了就派人暗杀……。好歹吕不韦讨伐六国还找个理由，嬴政统一的道路上却充满了肮脏，没有丝毫道义可言，有的只是功利。

如果国王可以骗人、诱捕、要挟别人，王后可以不顾廉耻亲行使美人计，国人还有什么恶劣的手段不能用呢？

卑劣的手段，怎么可能得到高尚的结果？

封建社会，社会道德的沦丧必然是从封建帝王开始的，一旦封建帝王丧心病狂，整个社会的道德就会以棘轮效应向下滑坡。因为，社会底层不可能对此一无所知，封建帝王每沦丧一分，底层的痛苦就成级数增加。为避免痛苦，底层自然会效仿这些卑劣的手法获取财富，只不过他们的手法更为赤裸裸，也更为残暴。

六国统一后，秦人“告奸”成风，有时甚至会编造邻里罪名，为赏金不惜让邻居全家送命。据《汉书》记载，按照秦朝的法令，儿子成人后必须与父母分家，否则全家受罚；于是，贫穷的父母会让身体强壮的儿子先成家，让体弱的儿子们入赘寡妇之家，或者逼迫他们去行商。

要知道，入赘、行商，在秦朝是要被优先征发劳役的，都那是送命的活儿……

最终，儿子不认贫穷的父母，所有人都以有富贵亲戚为荣（贫穷则父母不子，富贵由则亲戚畏惧）。太史公司马迁慨叹，秦人除了追求“人生在世，势位富贵”，大概再也没有别的想法了。

楼主：天圆地方的困惑 时间：2021-10-16 00:57:12

前人成功的路径，人们往往会模仿；同样，成功者的心态人们也会模仿，毕竟成

功是每个人都期望的事情。

最成功的人，是嬴政；秦朝人无论多么恨嬴政，他们始终对嬴政这种生活有着些许艳羡：嬴政唯我独尊，于是，每个一个秦人也都这么希望。

处于社会的最底层、天天在长城上搬砖、游离于生死之间，却始终幻想自己有一天也能奴役芸芸众生。所以，秦人显现出一种山东六国无法理解的暴戾，可以用一年、多年积攒的粮食向封建官僚行贿，却无法容忍陌生人在路上挤一下。为别人车上落下草木灰，也能聚众斗殴，现在大家可以理解为何秦人法令对乱丢垃圾者要割鼻了。

整个大秦帝国，人人不知自爱、更不知爱人，所有人都只为利益而奔波。一旦所有的秦人都按功利做出决策，都以奴役他人作为自己的幸福观。那么，优秀者就会迅速被虚伪凶残卑劣者驱逐，事实上，秦人已经不可能允许高尚和坦诚存在。卑鄙是高尚者的墓志铭，高尚才是卑鄙者的通行证。

此时，秦帝国也就去日无多。因为，秦帝国中已经没有一个优秀的人，更没有优秀的人能挽救秦帝国衰亡的命运。

本来，嬴政指定的继承者扶苏是一个宅心仁厚的人，如果扶苏即位，或许能延秦朝之命。毕竟嬴政在位仅十年，扶苏也许回天有力，能力挽狂澜。

嬴政身边的人，都是李斯一类的“仓中鼠”，又岂能让扶苏之流存在？

想拥立秦二世嬴胡亥的宦官赵高只用了一句话，就让秦相李斯矫诏杀掉了公子扶苏：定太子之位就在我和君侯，扶苏必用蒙恬为相，君侯终不怀通侯之印于乡里。篡位的嬴胡亥全盘继承发扬了嬴政的幸福，刚刚即位就向赵高宣示了自己的帝王信条：人生如白驹过隙，我做皇帝，就可以穷尽心智去享乐一生了……

在位三年，嬴胡亥一直为自己的幸福奋斗。为保住帝位，嬴胡亥杀掉了自己 19 个兄弟和 10 个姐妹（注：杀全家）；就连帮他登上帝位的李斯也遭受了五刑，先割破脸部、削掉鼻子、剁去脚趾，最后拦腰斩为两截；至于出巡、陵墓乃至重修阿房宫，嬴胡亥一样都没少干。

还有一样，嬴胡亥也没忘：即位后，胡亥先后两次要求山东六国必须使用秦半两，即“复行钱”。

当然，嬴胡亥也没能统一货币，嬴政没有做成的事嬴胡亥照样做不成。兵戈可以消灭人的生命，却永远无法消灭生生不息的货币，只要人类还存在，经济进程就不可能由封建权力决定。

秦朝，一面是足值的高纯度黄金，一面是残破不全的布币；一面是嬴政一人占尽天下之利，一面是无数农人尸骨相枕……

楼主：天圆地方的困惑 时间：2021-10-16 00:57:12

嬴胡亥即位当年，有着“鸿鹄之志”的陈胜揭竿而起，引爆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民起义。虽然后人给了陈胜莫大的荣誉，刘邦以诸侯之礼祭祀陈胜、司马迁甚至以王侯之礼为陈胜立传，这位喊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农民领袖，不过是在嬴政幸福观激励下想做另一个嬴政而已。

此后，农民起义再没停止。

前 207 年，秦军主力在巨鹿向项羽投降，嬴胡亥在赵高威逼下自杀，被以平民礼葬于咸阳；前 206 年，刘邦率兵攻入咸阳，继任者嬴子婴向刘邦投降；一个月后，项羽入咸阳，杀子婴，阿房宫也被付之一炬。

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唐·杜牧《阿房宫赋》

从嬴政灭六国算起，统一的秦朝只存在了 14 年，嬴政所有子孙均被灭族。那么，何时我们才能不被后人哀叹呢？

楼主：天圆地方的困惑 时间：2021-10-16 00:57:12

第 3 章 犯我货币者，虽强必诛

（汉高祖-汉武帝）

汉初大通胀

年轻时刘邦混的相当不怎么样，经常去酒馆赊账，留下了中国历史上最早期的商业信用记录。至于后来这位皇帝是否还钱，史书却没有记载。史书只告诉我们，在陈胜吴广激励下，这位曾经借钱赊酒的“亭长”从事了一份很有前途的职业——造反。

造反的成绩很卓著，前 206 年刘邦终于以胜利者的身份进入了咸阳秦皇宫。看着富丽堂皇的宫殿，刘邦惊地目瞪口呆，说出了一句心里话：大丈夫当如此也！为了“当如此”的理想刘邦和项羽逐鹿中原。八年后，韩信以“十面埋伏”之计把项羽忽悠地自刎乌江，“楚汉之争”以刘邦的胜利而告终。

胜利后的刘邦一定很郁闷，战乱极大损耗了社会财富，史籍有记载的战争死亡人数就在百万以上，项羽在攻入咸阳的时候又一把火烧掉了阿房宫。刘邦登基的时候，堂堂皇帝居然连四匹白马都没凑齐，丞相、大将都要坐牛车上朝，社会经济凋敝可见一斑。

环顾汉帝国的版图，皇帝突然发现自己说话并不算数。

全国 45 郡，有 30 个郡在齐王韩信、淮南王英布、韩王彭越等十七个异性王手中。表面上这些异姓王对刘邦也算尊敬，每年都向他缴纳供奉，只不过把铜钱重量缩水百分之九十。古人给这种钱起了个很形象的名字——“荚钱”，“荚”是一种豆科植物，与浮萍意思相近。

看着国库这些破烂的“荚钱”，刘邦或许意识到自己距离至高无上的皇权还很远、很远，只要有异性王存在，刘邦就不可能实现“当如此”的理想。

异姓王都是刀头舔血的暴徒，断然剪除天下必遭大乱，于是，刘邦想到了一个法子：重申秦帝国的铸币标准，要求帝国臣民使用重 12 铢的秦半两。更重要的是，异姓王的 30 个郡也必须向朝廷缴纳这种足值的“秦半两”。

刘邦所铸“秦半两”很快就被诸侯回炉，再次铸成了“荚钱”，人们一旦拿到足值的“秦半两”也会藏在箱子底。这就是著名的“劣币驱逐良币”的格雷琴法则：如果良币、劣币同时流通，良币会逐步减少，市面上流通的将都是劣币。

诸侯依旧向刘邦缴“荚钱”，货币流通还是一团糟，至于粮食价格则一飞冲天。汉初，每石粮食从五千钱暴涨到每石一万五千钱，至于当时的奢侈品——马匹，则上涨到每匹百金以上。

高祖五年（前 198 年）刘邦实在撑不住了，宣布官方货币减重为“三铢”，实际上承认了“荚钱”的法定地位。

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有详细记载的大通胀，为争夺财富，皇帝和诸侯竞相对货币减重，谁的钱最破，谁在市场就最有竞争力。

楼主：天圆地方的困惑 时间：2021-10-16 00:57:12

货币减重无疑会危及帝国经济，但是，重建货币信誉的基础是帝国有良好的实体经济。为重建帝国经济，实行货币减重的同时，刘邦推出了自己的土地政策。汉高祖二年，刘邦将秦朝王室公田、官田、池林分给自己的士兵：普通士兵每人大约能获得一百亩土地。

自从铁器成为普通农具，中国人始终未曾真正有过自己的土地。战国七雄征战不

休、嬴政把劳动力都弄去啃砖头、跟着就楚汉争霸，是个男人都被拉出去当兵了。士兵是一柄双刃剑，既然可以与项羽作战，当然也可以吞噬刚刚建立的汉帝国。其实，没有谁天生就是暴力机器，只要有稳定的生活谁也不愿意靠舞刀弄枪吃饭。绝大部分士兵都是普通人，他们只想平静地度过一生。这也许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平静的一生需要稳定的收入；在农耕社会，稳定的收入需要一定数量的土地，即使刘邦这样的流氓无产者也向往田园生涯。

赐予士兵土地，士兵也就实现了这个梦想——“百亩之田、五亩之宅”，这是皇帝颁给帝国士兵的最高奖赏。一旦获得了稳定的收入来源，士兵就成为汉帝国最忠心的捍卫者：谁想打破我的铁饭碗，那是一定会和他拼命的。虽然刘邦弄出来一个大通胀，毕竟“荚钱”是计重货币，到底值多少钱，大家可以用秤砣衡量货币，对农人的影响不是很大。

刘邦大概没有想到，他的土地政策奠定了此后两千年的社会结构：皇帝是社会最高层，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皇帝之下是三公九卿等封建官僚，拿皇帝的钱，逐级管理小农；最底层是万千小农，他们对帝国纳税，用自己的血汗钱养活帝王与封建官僚。此后，中国封建社会结构始终没有摆脱“皇权-封建官僚-小农”这个三位一体的窠臼。

经营数年，在自己的 15 个郡国人再无战争之苦、不用秦朝酷刑、小农归于稼穡，俨然已经是四海升平。

刘邦有了底气，高祖八年颁《盗铸钱令》，明文禁止诸侯再以“荚钱”忽悠他。所谓《盗铸钱令》其实就一条，由皇帝统一全国铸币权，诸侯不得自行铸币。遗憾的是，诸侯并未执行刘邦的命令。

在封国之内，诸侯拥有自己的军队、税收权和官吏任免权，不允许私自铸币，如何对抗绝对皇权？毫无悬念，刘邦的《盗铸钱令》流产了。“荚钱”依旧风行各地，诸侯也照样拿“荚钱”忽悠他。

世界原来远未清静。

所有人都有可能觊觎帝位，尤其是手握重兵的异姓王。异姓王有独立的封国、独立的经济来源、不用拿薪水，当然也就不需要听皇帝的话。楚汉争霸的时候，韩信就要挟自己封他为齐王，现在诸王又拿“荚钱”忽悠他。

一定要消灭异姓王！

楼主：天圆地方的困惑 时间：2021-10-16 00:57:12

货币减重无疑会危及帝国经济，但是，重建货币信誉的基础是帝国有良好的实体经济。为重建帝国经济，实行货币减重的同时，刘邦推出了自己的土地政策。汉高祖二年，刘邦将秦朝王室公田、官田、池林分给自己的士兵：普通士兵每人大约能获得一百亩土地。

自从铁器成为普通农具，中国人始终未曾真正有过自己的土地。战国七雄征战不休、嬴政把劳动力都弄去啃砖头、跟着就楚汉争霸，是个男人都被拉出去当兵了。士兵是一柄双刃剑，既然可以与项羽作战，当然也可以吞噬刚刚建立的汉帝国。其实，没有谁天生就是暴力机器，只要有稳定的生活谁也不愿意靠舞刀弄枪吃饭。绝大部分士兵都是普通人，他们只想平静地度过一生。这也许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平静的一生需要稳定的收入；在农耕社会，稳定的收入需要一定数量的土地，即使刘邦这样的流氓无产者也向往田园生涯。

赐予士兵土地，士兵也就实现了这个梦想——“百亩之田、五亩之宅”，这是皇帝颁给帝国士兵的最高奖赏。一旦获得了稳定的收入来源，士兵就成为汉帝国最忠心的捍卫者：谁想打破我的铁饭碗，那是一定会和他拼命的。虽然刘邦弄出来

一个大通胀，毕竟“荚钱”是计重货币，到底值多少钱，大家可以用秤砣衡量货币，对农人的影响不是很大。

刘邦大概没有想到，他的土地政策奠定了此后两千年的社会结构：皇帝是社会最高层，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皇帝之下是三公九卿等封建官僚，拿皇帝的钱，逐级管理小农；最底层是万千小农，他们对帝国纳税，用自己的血汗钱养活帝王与封建官僚。此后，中国封建社会结构始终没有摆脱“皇权-封建官僚-小农”这个三位一体的窠臼。

经营数年，在自己的 15 个郡国人再无战争之苦、不用秦朝酷刑、小农归于稼穡，俨然已经是四海升平。

刘邦有了底气，高祖八年颁《盗铸钱令》，明文禁止诸侯再以“荚钱”忽悠他。

所谓《盗铸钱令》其实就一条，由皇帝统一全国铸币权，诸侯不得自行铸币。

遗憾的是，诸侯并未执行刘邦的命令。

在封国之内，诸侯拥有自己的军队、税收权和官吏任免权，不允许私自铸币，如何对抗绝对皇权？毫无悬念，刘邦的《盗铸钱令》流产了。“荚钱”依旧风行各地，诸侯也照样拿“荚钱”忽悠他。

世界原来远未清静。

所有人都有可能觊觎帝位，尤其是手握重兵的异姓王。异姓王有独立的封国、独立的经济来源、不用拿薪水，当然也就不需要听皇帝的话。楚汉争霸的时候，韩信就要挟自己封他为齐王，现在诸王又拿“荚钱”忽悠他。

一定要消灭异姓王！

楼主：天圆地方的困惑 时间：2021-10-16 00:57:12

皇权之下没有任何竞争，也不允许有人挑战皇权，所有的规则只有一条：服从。达到这个目标的途径可能是经济掠夺，也可能是肉体征服。既然经济手段不能让你交出财富，那就从肉体上消灭你！战争永远是经济斗争的继续，欺负人为快乐之本，别人的房子变成自己的房子、别人的金钱变为自己的金钱、别人的女人变成我的女人，那才是这个世界上最快乐的事情。

韩信的命运把这个法则体现的淋漓尽致。

楚汉争霸之时，谋士蒯彻向韩信献计：“以您的贤能和手中的兵力，又拥有燕、齐两国的土地，楚汉争霸消耗了各自的实力，您才是真正的天下之主。您要知道，天子弗取，反受其纠”。

然而，韩信没有造反；果然，反受其纠。

在刘邦默许下，韩信汉高祖十年被吕雉（汉皇后）和萧何（汉丞相）谋杀。汉室史官为我们留下了审讯蒯彻的记录：对蒯彻劝韩信造反的建议，韩信的回复却是“大丈夫怎么能因利益而放弃信义”！

你有能力，我就收买你；

你不听话，我就囚禁你；

你不服从，我就杀掉你……

韩信死后，刘邦又击杀了英布、彭越等异姓王，到高祖 11 年，除长沙王吴臣^①外异姓王被全部消灭。刘邦，这个出身流氓的皇帝（《鹿鼎记》中顾炎武对刘邦的评语），终于完成了中央集权的梦想。

既然消灭了异姓王，正常思维应该是效仿秦始皇强化郡县制。但是，这位平民皇帝选择了一条谁也意想不到的道路，他分封自己的兄弟子侄为王，并与诸王约定，此后非我子孙称王，天下人都可以杀了他（非刘姓为王者，天下共击之）。刘邦亲眼目睹了秦帝国的分崩离析，危机时刻无人愿意支撑起破败的帝国。毕竟，官

僚靠薪水吃饭，就算贪污的本事很大，也没有理由维护别人的一姓天下。如果没有血浓于水的同姓诸侯王，汉帝国将来同样无法应对真正的危机。事实证明，分封刘氏诸王是对的，如果没有刘邦留下来的同姓诸侯，恐怕汉朝早就得跟着皇后吕雉姓“吕”了。

无论对与不对，一切都与刘邦无缘了。前 195 年，刘邦在平叛南诏国的叛乱中死去，把这个烂摊子留给了自己的皇后吕雉。

楼主：天圆地方的困惑 时间：2021-10-16 00:57:12

人们习惯于将刘邦的皇后吕雉称呼为“吕后”，这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第一位临朝称制的太后，另外两位要等到盛唐和晚清才能在本书中出镜，三位女强人都是中国货币史上浓墨重彩的人物。

刘邦刚刚死去，吕雉就收到北部邻居匈奴的一封国书。在国书中，匈奴的单于冒顿轻佻地向吕后求婚：“我虽然是生长在牛马群中的粗人，也曾数次游历（抢劫）中国。听说你们的皇帝刚刚死去，你现在成了寡妇，恰好我也是单身，不如我们互通有无吧（嫁给我吧）”。

面对这封带有羞辱意味的国书，吕雉这位汉帝国的实际统治者只能忍气吞声。她知道，帝国经济根本不能支撑对匈奴的战争。然而，从吕雉开始，仅仅不到一个世纪，破败的汉帝国就一跃变为当时世界上最强盛的国家，直接把打遍天下无敌手的匈奴骑兵赶到了西欧，从此罗马帝国受尽了欺凌。吕后末年，中国单个农业劳动力的原粮产量已经突破了 3400 市斤，这不但是西欧 1500 年后的劳动生产率，也远高于 1978 年中国的劳动生产率（2240 市斤）。应该说，中西文明争霸就是从汉帝国驱赶匈奴开始的，在第一轮交锋中，西欧完败。

西汉帝国究竟是如何一举由弱变强的呢？

究竟是什么原因赋予了汉帝国击溃匈奴的能力？

是什么原因让这片原本破败的土地创造了当时世界第一的劳动生产率？

遗憾的是，我们的史书记述的是帝王将相。至于经济成因，尘封的故纸堆没有告诉我们答案。所幸，除了这些随着时间停滞的古文字，我们还有了现代考古学。1983 年 12 月，湖北省荆州市出土了一份汉代竹简《二年律令》，意思是吕后称制二年颁布的法律。这些带着腐土气息的竹简穿越了两千多年的时空，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史书中从未记载的吕雉。

吕雉继承发展了刘邦的土地政策，帝国中央政府把授田范围扩大到全体臣民。各级政府先要统计刘邦时代得到田地的退役士兵，对未得到土地的人登记造册，长期没有土地的人排名在前。最后，县令根据名册对无地之人授予土地。

全国国人被划分为 6 等，最高一级的“侯”可获得田地 90 顷，最低级的庶人可以获得田地 1 顷，就连犯有轻罪的犯人也能在释放后获得半顷田。

“侯”与“庶人”，90:1，看起来贫富差距还是蛮大的。

我要告诉大家的是，“侯”是战争时代的功臣，整个汉帝国只有 113 个“侯”，其他五等最高级的“大夫”（正部级）也只能获得 25 顷田。此后，任何一个王朝“大夫级”官员与普通人的贫富差距都远远超过了 25 比 1。

连接官员与庶民的纽带，便是税收。

吕雉坚决执行了一项前无古人（后有来者）的税收政策——“十五而税一”，换算一下，吕雉时代庶人个人收入所得税的税率为 6.6%，而且，没有累进税率。

《二年律令》彻底改变了中国历史发展轨迹，秦人以军功授田、刘邦以服兵役为代价授田，只有到了吕雉才真正实现了全国范围的“均田”。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以法律形式明确了土地私有制度，每一个最普通的庶人都获得了土地，整个

社会实现了孟子的“百亩之田、五亩之宅”。这是无数先贤追求的大同世界梦想——“耕者有其田”，请注意，我没有说这是“耕者有其田”的雏形，是实实在在的“耕者有其田”。

楼主：天圆地方的困惑 时间：2021-10-16 00:57:12

西汉小结：财富的循环

现在，让我们来回顾西汉帝国由弱变强、再由盛转衰的循环，一条清晰的财富生产、转移轨迹呈现在我们面前。

刘邦消灭了强势的异姓王，同时分封了弱势的同姓王，实现了帝国管理制度创新。在吕雉和同姓王的竞争中，双方都信奉清静无为的黄老之术，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农耕经济创造了巨大财富；放开经济管制，一批冶炼、商业、运输、畜牧、渔业等新兴行业崛起，帝国经济前景充满活力。

此时的汉帝国既有产业创新，更有制度创新，无论国家还是普通民众，焉能不富？文景之治时期，汉帝国的工商业呈现迅速发展。正是凭借从商税中获得的实力，汉景帝攫夺了同姓王权力，彻底消灭了对皇权的竞争。

汉武帝迅速花光了四代君王的积蓄，便想通过铸币聚敛天下财富，超级通胀使得敛财手段失效，于是把手直接伸向了所有产业。管理天下产业需要一批人，一旦“官商”成为一种势力，帝国政府就会凭借级数式扩张的实力不断蚕食社会财富、挤压小农的生存空间。

然后，失去了正常发财手段的帝国精英成为“豪强”，也挤压掉出小农身上残存的最后一口气息。

无论汉武帝多么贪心，也无论他多么有权势，在某一个时点上社会财富的总量必然是有限的。必须留出让全社会人继续生存的财富，也就是马克思所谓的“必要劳动时间”：社会最底层必需能维持自身和家庭的生存。

然而，参与掠夺的绝非汉武帝一个人，封建“官商”不但不靠生产就能获得财富，而且还占有了帝国绝大部分财富，此后的所有赚钱的途径都必须依附于这个强势集团。强势分利集团完全不遵守财富规则，显然，最终掠夺超出了帝国居民承受的极限，人们失去了土地、失去了工作、没有能力组建家庭，最终成为流民。整个循环的逻辑是：帝国抢占富人产业→富人把小农从土地上挤走→封建“官商”又从土地上挤出了富人→富人中的强者成为黑势力→小农成为流民……

最终结果：国弱、民贫，唯独官富。

皇权一旦使所有社会资源都匍匐在自己脚下，封建官僚就会在瞬间吸干帝国的经济血液，无论皇帝、黑势力还是黎民百姓都没有力量遏制这头怪兽。武、昭、宣三朝，皇权同样以各种残酷的手段镇压官僚集团，但是，皇权始终只能依靠一批官僚去镇压另一批官僚。汉宣帝错误的执行了通货紧缩政策，为官家豪强兼并土地提供了一把货币铸造的利刃。最终，皇权丧失了与官家豪强的博弈能力，元、成、哀、平四朝，封建官僚像病毒一样吞噬了帝国整个机体。

正是看到问题症结所在，王莽才终其一生锐意改革，晚年更是“常御灯火至明”。他试图以货币改革掠夺豪强财富，以皇权作为强大的后盾再次将帝国扳回“耕者有其田”的轨道。只是，王莽不能、也不可能平衡官僚利益与“天下大同”理想之间的矛盾，他所有的努力都无法挽狂澜之即倒、扶大厦于将倾。

西汉帝国缔造了一个“皇权-封建官僚-小农”的社会体系，这个社会体系成功地取代了西周以来的“王室-封臣”体系。与“王室-封臣”体系一样，这个统治框

架也存在自身难以克服的矛盾：皇权只有借助封建官僚才能统治整个帝国，但是，封建官僚自身就是一个强势分利集团，他们会借助手中的权力疯狂掠夺帝国财富。皇权根本就无法彻底遏制这种掠夺，毕竟联系皇权和封建官僚的纽带恰恰就是掠夺财富的权力。最终，封建官僚对财富的掠夺将成为帝国难以治愈的沉疴。

西汉帝国完整演绎了上述流程，流程的开始是“均田制”、流程的结束是普通人变成“流民”。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西汉历代帝王甚至使用了迁涉、杀戮等极端的方式打击封建官僚，然而，所有的措施最终又都为封建官僚所利用，成为他们抢劫财富的利器。这是一个缠绕中华民族数千年的封印，此后，无论多么伟大的王朝都将在这个封印之下灰飞烟灭！

楼主：天圆地方的困惑 时间：2021-10-16 00:57:12

唐朝小结：魔道相争胜者谁

与西汉帝国一样，大唐帝国也采用了“皇权-封建官僚-小农”的社会组织框架。在这个框架中，皇权是小农最后的庇护，也是“耕者有其田”最坚定的推动者，只有出现万千“耕织结合”的小农家庭，帝国才能拥有最坚实的统治基础。

问题的成因就在于“皇权”与“小农”的中间环节。西汉以来的所有王朝都证明了一个道理：一旦皇权放松对封建官僚的控制，封建官僚便会寻找一切机会兼并土地，在瞬间吸干帝国财富。

盗亦有道，封建官僚抢钱必然有一定之规。除了胡人入主中原的元朝，最有权势的封建官僚都不可能在光天化日之下无故抢夺别人的财富。要想抢夺财富，封建官僚就必须找到一种合法的方式。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先澄清一个认知上的误区：人们往往认为，“小农经济”是一种自给自足的生产状态，老死不相往来。“你耕田来我织布、你挑水来我浇园”的生产生活，能缔造一个鲁滨逊式的世外桃源吗？

答：绝无可能。

衡量一个经济体能否自给自足最关键的标志，是经济体内的生产和消费的产品数量是否一致。只要经济体内有货币存在，就绝不可能出现真正自我封闭的经济循环，真正的小农经济体根本无法孕育如此丰富的货币制度，更不要说西汉的“子钱家”、唐朝的高利贷。中原大地自古就是一片市场经济最发达的土地，甚至远比中世纪的西欧要发达的多。

然而，市场有很多种，有“好的市场”，也有“坏的市场”。

——在“好的市场”中，所有市场参与者都受到统一规则的制约，因而人们对市场交易结果有稳定的预期，市场运行没有什么隐性的成本。这种情况下，市场参与者不再依靠个人声誉进行交易（impersonal transaction），经济运行中的最强势者（通常是国家）为所有交易提供了最后的执行保障，买卖双方甚至不一定识对方。比如，今天你把一大笔钱存入银行，可能转眼就会忘记刚才银行员工的长相，这在农耕社会是根本不可想象的。新制度经济学的创始人诺斯和奥尔森都把英国崛起的成因归结于此，英法战争之前，光荣革命使得英国王室逐渐退出商业领域，在金融市场上建立了良好的声誉，同时代的法国王室却没有作到这点。在后来的英法战争中，英国王室通过发行国债征集大量军费，投资者却根本不相信法国王室，因为它的权力弗远无界，可以忽视一切许诺。

——在“坏的市场”中，必然存在一个强势群体，这个群体有可能掌握绝大多数社会资源，也有可能具备调动绝大多数社会资源的潜能，正是因为如此，强势群体可以忽略一切必要的规则，也可以在交易中不遵守任何承诺。既然其他社会成员既无法避免与强势群体交易（资源大多在强势群体手中），就一定会在交易中

被剥夺，从而整个市场变得缺乏效率。比如，19 世纪托拉斯掌握了美国社会绝大部分资源，12% 的人拥有全美财富的 90%。当时的一本畅销书《城市之羞》为我们记述了这样一个时代：一面是辉煌的大工厂，一面是肮脏的贫民窟，一面是光鲜的托拉斯总裁，一面是妓女和童工，此外，种族歧视、妇女歧视、对工人残酷的压榨、肆无忌惮在药品中作假……。据《城市之羞》的作者斯蒂芬斯自己说，书中内容都是经过亲自实地考察且“往往是历经生命危险”才写成。

当然，中国封建社会在很大程度上也具备“坏的市场”的特征。与周朝、晋朝、三国、南北朝相比，西汉、唐朝都建立了高度集权的封建社会，帝国调动资源的能力是之前其他朝代无可比拟的。正是利用这种调度资源的能力，封建官僚才获得了社会经济生活的支配权，在这种权力之下，天下无不可为之事、天下无不可夺之财，权力大的有大财富，权力小的有小财富。

真正的财富生产者——小农，没有财富。

楼主：天圆地方的困惑 时间：2021-10-16 00:57:12

在农耕社会，土地无疑是最重要的生产资料，也是最有效的财富象征。正是看到了这一点，唐玄宗才颁布了史上最为严厉的土地买卖禁令：无论何种原因，任何人不准买卖天下土地！只有禁绝了土地交易，才能彻底斩断封建官僚蚕食农人财富的根基。

这道土地买卖禁令奠定了帝国未来几十年的繁荣基础，在强势皇权面前，封建官僚即使再有势力，也无法明目张胆通过土地兼并蚕食民间财富。然而，在“皇权-封建官僚-小农”的社会框架之内，监督之制是一条单行线，皇帝一人又怎可能看住天下封建官僚？

晚年，天纵英才的唐玄宗陶醉于自己缔造的盛世，也逐渐放松了对封建官僚的警惕。秉政二十多年的铁腕宰相李林甫更是给了唐玄宗一种幻觉，实际上，并不是每一位宰相都能像李林甫一样出身于贵族世家，更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像李林甫一样能在所有政治势力之间纵横捭阖。

李林甫死后，杨国忠这个寒门出身的宰相终于找到了机会，他毫不犹豫的放开了“开元限购令”，在土地市场上重新拿到了财富分配的利刃。从放开“开元限购令”那一刻开始，情况便失控了：不足十年的时间里，帝国全境内 40% 以上的人全都变成了毫无土地的“流民”。

数代大唐帝王的积累毁于一旦！

杨国忠聚敛了财富，却无法收敛自己的贪婪之心。为了保住自己的相位，他不断以弱智的手法打击、挑衅、诬陷边镇节度使，尤其是安禄山。最终，安禄山率领着帝国最精锐的部队反叛，说到底，安史之乱不过是封建官僚的财富之争变成兵戎相见。

安史之乱使帝国彻底丧失了权威，“均田制”的皇权基础也就随之破灭了。

为挽救帝国于危亡之间，杨炎开始推行“两税法”，试图向大土地所有者收税，进而实现均贫富的梦想。然而，大土地所有者本身就是封建官僚，他们的财富本就不是来自于公平竞争的市场，又怎么可能依靠这些人自己剥夺自己的财富？杨炎的改革根本就不具备最基本的社会条件。

封建官僚的疯狂掠夺最终使社会失去了最基本的秩序，唐僖宗乾符二年（875 年），王仙芝、黄巢发动了唐末农民大起义，904 年唐昭宗为宣武节度使朱温所杀，907 年唐哀帝禅位给朱全忠（朱温后被赐名“全忠”，真是一个天大的讽刺）。大唐帝国，一个历时三百年的王朝崩溃了。

从汉代的吕雉到唐朝的李隆基，历代帝王的梦想都是实现“耕者有其田”，然而，

巍巍而立的大唐帝国终究还是未能破解西汉帝国留下的魔咒，东篱南山的田园在封建官僚毫无节制的掠夺下不断幻灭。为了破解这个缠绕千年的魔咒，大宋王朝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废弃了“均田制”，中国古代经济也在宋代达到了巅峰。新的盛衰嬗变中，货币得失几何？我巍巍中华又会遇到怎样的挑战呢？

楼主：天圆地方的困惑 时间：2021-10-16 00:57:12

盛世铸私钱

前 180 年，吕雉薨，南诏国随即自去帝号。也是这一年，刘恒登基称帝，是为汉文帝。自此，中国开始了长达 50 年的“文景之治”。

现在，很多人如是说：汉文帝、汉景帝代表了封建中央集权，是地主阶级先进生产力进步的象征；同姓王搞独立王国，是落后生产力的代表，是腐朽落后势力。

“文景之治”中，先进的汉景帝打倒了落后的同姓王吴王刘濞，是先进势力战胜落后势力，具有历史必然性。

没有这种必然性。

历史上，从来没有绝对的“先进”，也没有绝对的“落后”，所有的“先进”、“落后”都是从今人口中折射出来的脸谱。如果刘恒不是当了皇帝，他也是诸多诸侯之一，怎么可能因为当了皇帝就突然变得“先进”？

封建中央和地方封国也不是天然对立，历代帝王之所以要消灭封国只有一个原因：只有裂土封王的诸侯才有能力对抗封建帝王，其他，无论是地方封建官僚还是富甲一方的豪门巨室都没有这个能力。

如果用经济学语言解释会更为明晰：任何一个市场，一旦缺乏竞争就必然缺乏效率；在市场中，无论买方还是卖方，一旦形成垄断，日子就会过的非常舒服。帝王与诸侯，就是垄断与竞争的关系，帝王要想“千秋万代、一统江湖”，就必须消灭任何竞争势力。

皇帝一定要消灭诸侯，无论同姓王还是异姓王。

刘恒成为皇帝，情况更不乐观，全国改设 57 个郡，42 郡在诸侯手中。和自己的父亲刘邦一样，他只有 15 个郡；不同的是，刘恒这 15 个郡的面积更小。

要想让诸侯听从命令，必须先有强势的经济，有了强势的经济才有可能征服诸侯。结果，在经济建设上，汉文帝遇到了诸侯的强势挑战。

刘恒登基后两年（前 178 年），帝国小农的租税从刘邦、吕后时代的“十五税一”降低到“三十税一”，即个人所得税降低为 3.33%；十年之后，刘恒下令帝国十年之内免征“农业税”，“口赋”（人头税）也从一百二十钱降低到四十钱。有人估算，这个时代全体国人的整体税负负担降低到 2% 以下，在中国封建王朝历史上，这是一次“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低税收环境。

现在，让我们回过头来看一下同姓王的诸侯国。

很多人以为，“王爷”可以在自己地盘上收税、无偿征发劳役、训练军队，这些王爷肯定是为所欲为、欺男霸女、鱼肉乡里、无恶不作……

世界永远是有规则的，上述王爷的形象不过是某些人自己的理想世界，纯属臆测，跟汉代真实的同姓王没有一毛关系。皇帝就差在脸上写上“削藩”二字了，稍有不慎就会被治罪，要想对抗皇权、要想自己子孙继续封王，必须要有对抗皇权的经济实力。

况且，皇帝在自己地盘上大搞各种“减税、劝农”运动，连刘恒自己都亲自跑到地里种庄稼，诸侯如果自己先落了下风，那干脆皇帝也不用“削藩”了，过几年，诸侯自己投诚得了。

出于“削藩”的危机感，更出于获得优势经济的动机，诸侯对振兴封国经济的渴

盼远甚于皇帝刘恒，很多成绩也是汉郡所无。

《汉书》这样记载诸侯国当时的风气：刘恒登基后，诸侯国信奉治国之道在于清静无为，农人被打扰自然也就安心耕作；很多诸侯都不再对农人收取钱粮，以博得国人支持。以吴国的刘濞为例，吴国境内税赋的特点就是“薄赋”，由于没有税收，吴王刘濞才不得不靠煮盐、铸钱过活。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刘恒是被诸侯压力下才取消了汉郡内的农业税，此前，齐国、吴国、楚国均已无税。皇帝和诸侯都不对农人收税，帝国财政靠什么运转，又靠什么维持自身统治？

楼主：天圆地方的困惑 时间：2021-10-16 00:57:12

以下内容，应在《盛世铸私钱》之前，实在不好意思，顺序倒了。

楼主：天圆地方的困惑 时间：2021-10-16 00:57:12

后世，无数帝王都想模仿吕雉“均田”，却无一不羽煞而归。不是吕后比别人更聪明，更不是吕后有多么灵活的手腕。汉初之时，从六国贵族到刘邦分封的异姓王都被剪除，旧有既得利益者已经被消灭殆尽；刚刚建立起来的官僚体系还是一种不成熟的制度，任何官僚都不知道如果不按《二年律令》分配土地会造成什么样的结果。

包括在吕雉在内的所有人，未来都是一片模糊，所以，大家只能按照相对公平的方法平均田地。这种混沌初开的情况在经济学上被称为“模糊面纱”，在“模糊面纱”条件下，利益集团不可能剥夺普通人财富，一旦打破平衡，任何利益集团都可能称为被剥夺者。

看到辖内的庶人，吕雉知道人民安居乐业才是大权一统的根本。但是，每次吕雉看到刘邦留下来的同姓王，就如同刘邦看到当年的异姓王，这些人让吕雉距离至高无上的皇权同样很遥远。

授田政策执行了十年后，帝国的财富开始增长，吕雉一定觉得自己可以下手了。和刘邦一样，她最初对付同姓王法子也是改变币制。

吕后二年^①，吕雉下令禁止民间铸“荚钱”，由朝廷统一铸“八铢钱”，“八铢钱”模仿秦半两，在货币史上被称为“本秦钱”。吕后规定，荚钱此后在帝国境内不得流通，最要紧的，诸侯向朝廷纳贡时要缴纳“八铢钱”。政策的目标：禁止诸侯用荚钱忽悠自己，这样朝廷的收益比较实惠。

想法是好的，结果是差的。

废“荚钱”、缴“八铢钱”，这是一笔很大的支出，对诸侯来说自然很不情愿。吕雉 VS 同姓王=“八铢钱” VS “荚钱”，但是，很遗憾……

关键时候，匈奴再次拜访汉帝国边境。平时，只是隔三差五出来抢劫，吕后三年却零售改批发，直接派兵占领了汉帝国的阿阳城。

吕后可以隐忍匈奴单于对自己的侮辱，却不能坐视帝国领土被侵蚀。一旦获得一个稳固的根据地，匈奴骑兵便会一步步纵身进入中原腹地。是年，汉帝国出兵云中、后攻阿阳，一打又是一年，吕雉完全没有精力推行她的货币新政。

据匈奴于国门之外，必须有强盛的经济；建设强盛的经济必须是不能有大的战事，国人能够修养生息。对吕雉来说，这完全是一个悖论。与我们在这里纸上谈兵不同，吕雉必须用实践解决这个悖论。

吕雉给出的答案是：战争经费全部来源于货币减重。

吕后二年七月，吕雉宣布推行“八铢钱”，此后匈奴南侵。吕后三年末，官方铸币从“八铢”改为“五分”。所谓“五分”是“二铢四系”，相当于“八铢钱”的四分之一多一点，货币贬值接近 75%。

吕后五年，匈奴主力终于退回了大漠。吕雉喘了一口气，第二次动手收拾同姓王，是年，再次下令禁止“铸伪钱”。

吕雉实在是一个很不幸的女主。

吕后五年，帝国又发生了一件大事：南部边境的象、桂林、南海三郡拥立一个叫赵佗的地方官自立为“南越武帝”。可怜北部边境尚未肃清，又要远征南越，那可是一个瘴气满山、气候暑湿的地方，比对付匈奴一点都不少花钱。

吕后只好拿出老办法，继续让货币减重。据史书记载，吕后五年，吕雉将铜、锡合铸的“五分钱”改为铜、铅、铁合铸。铅和铁要比锡重很多，铸币含铜量急剧下滑。这个时期出土的文物则证明，实际情况比史书记载还要差很多，铸币的重量已经从“三铢钱”变为“一铢钱”，为官方铸币标准“八铢”的三十分之一。三年内货币贬值三十倍，如此铸币减重，钱还是钱吗？但是，汉帝国经济没有因为通胀而崩溃。

因为，吕雉坚守住了自己的底线：边疆战事最紧张的时候，仍旧维持对小农“十五税一”的政策。所以，这位女强人才穷到不得不实行货币通胀。

对民生来说，“低税收”、“高通胀”是两难选择，帝国危机的时候只能择其一。农耕时代，最主要的财富生产手段是种地，普通人对货币的需求量远低于诸侯和封建官僚。大通胀给帝国经济带来的伤害，更多是对工商业和封建统治阶级，对农人而言，如此低的税收才是最重要的。

尽管中国第一位女主与民生息、轻徭薄赋，然而，历史并没有给这位女强人以良机，甚至没有给她足够的时间。刚刚得到土地的农民还不能生产足够的财富，建立一个强盛的帝国仍需要时间……

楼主：天圆地方的困惑 时间：2021-10-16 00:57:12

后世，无数帝王都想模仿吕雉“均田”，却无一不羽煞而归。不是吕后比别人更聪明，更不是吕后有多么灵活的手腕。汉初之时，从六国贵族到刘邦分封的异姓王都被剪除，旧有既得利益者已经被消灭殆尽；刚刚建立起来的官僚体系还是一种不成熟的制度，任何官僚都不知道如果不按《二年律令》分配土地会造成什么样的结果。

包括在吕雉在内的所有人，未来都是一片模糊，所以，大家只能按照相对公平的方法平均田地。这种混沌初开的情况在经济学上被称为“模糊面纱”，在“模糊面纱”条件下，利益集团不可能剥夺普通人财富，一旦打破平衡，任何利益集团都可能称为被剥夺者。

看到辖内的庶人，吕雉知道人民安居乐业才是大权一统的根本。但是，每次吕雉看到刘邦留下来的同姓王，就如同刘邦看到当年的异姓王，这些人让吕雉距离至高无上的皇权同样很遥远。

授田政策执行了十年后，帝国的财富开始增长，吕雉一定觉得自己可以下手了。和刘邦一样，她最初对付同姓王法子也是改变币制。

吕后二年^①，吕雉下令禁止民间铸“荚钱”，由朝廷统一铸“八铢钱”，“八铢钱”模仿秦半两，在货币史上被称为“本秦钱”。吕后规定，荚钱此后在帝国境内不得流通，最要紧的，诸侯向朝廷纳贡时要缴纳“八铢钱”。政策的目标：禁止诸侯用荚钱忽悠自己，这样朝廷的收益比较实惠。

想法是好的，结果是差的。

废“荚钱”、缴“八铢钱”，这是一笔很大的支出，对诸侯来说自然很不情愿。吕雉 VS 同姓王=“八铢钱” VS “荚钱”，但是，很遗憾……

关键时候，匈奴再次拜访汉帝国边境。平时，只是隔三差五出来抢劫，吕后三年

却零售改批发，直接派兵占领了汉帝国的阿阳城。

吕后可以隐忍匈奴单于对自己的侮辱，却不能坐视帝国领土被侵蚀。一旦获得一个稳固的根据地，匈奴骑兵便会一步步纵身进入中原腹地。是年，汉帝国出兵云中、后攻阿阳，一打又是一年，吕雉完全没有精力推行她的货币新政。

据匈奴于国门之外，必须有强盛的经济；建设强盛的经济必须是不能有大的战事，国人能够修养生息。对吕雉来说，这完全是一个悖论。与我们在这里纸上谈兵不同，吕雉必须用实践解决这个悖论。

吕雉给出的答案是：战争经费全部来源于货币减重。

吕后二年七月，吕雉宣布推行“八铢钱”，此后匈奴南侵。吕后三年末，官方铸币从“八铢”改为“五分”。所谓“五分”是“二铢四系”，相当于“八铢钱”的四分之一多一点，货币贬值接近 75%。

吕后五年，匈奴主力终于退回了大漠。吕雉喘了一口气，第二次动手收拾同姓王，是年，再次下令禁止“铸伪钱”。

吕雉实在是一个很不幸的女主。

吕后五年，帝国又发生了一件大事：南部边境的象、桂林、南海三郡拥立一个叫赵佗的地方官自立为“南越武帝”。可怜北部边境尚未肃清，又要远征南越，那可是一个瘴气满山、气候暑湿的地方，比对付匈奴一点都不少花钱。

吕后只好拿出老办法，继续让货币减重。据史书记载，吕后五年，吕雉将铜、锡合铸的“五分钱”改为铜、铅、铁合铸。铅和铁要比锡重很多，铸币含铜量急剧下滑。这个时期出土的文物则证明，实际情况比史书记载还要差很多，铸币的重量已经从“三铢钱”变为“一铢钱”，为官方铸币标准“八铢”的三十分之一。三年内货币贬值三十倍，如此铸币减重，钱还是钱吗？但是，汉帝国经济没有因为通胀而崩溃。

因为，吕雉坚守住了自己的底线：边疆战事最紧张的时候，仍旧维持对小农“十五税一”的政策。所以，这位女强人才穷到不得不实行货币通胀。

对民生来说，“低税收”、“高通胀”是两难选择，帝国危机的时候只能择其一。农耕时代，最主要的财富生产手段是种地，普通人对货币的需求量远低于诸侯和封建官僚。大通胀给帝国经济带来的伤害，更多是对工商业和封建统治阶级，对农人而言，如此低的税收才是最重要的。

尽管中国第一位女主与民生息、轻徭薄赋，然而，历史并没有给这位女强人以良机，甚至没有给她足够的时间。刚刚得到土地的农民还不能生产足够的财富，建立一个强盛的帝国仍需要时间……

楼主：天圆地方的困惑 时间：2021-10-16 00:57:12

@tianyamike2012

第一，我绝不敢说自己品行高尚，只是觉得有的词语不文明、发言方式不一定对，这样不好，起码不值得倡导。

第二，如果有人觉得看我回复不爽，一定随便发言，要不还混什么论坛。您说呢？

楼主：天圆地方的困惑 时间：2021-10-16 00:57:12

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疑惑，也有很多人这样解释：文景时期汉帝国机构高度精简，一个县衙往往只有三到五个官吏，其余大家平时电视上见到的衙役都是临时从富户子弟家里拉来凑数的。加之刘恒确实是一个比较节俭的皇帝，在位期间皇室没有任何大型工程，他甚至舍不得花一百金修一个露台，因为这是十户小农的所有家产。

这是对的，在中国历史上，比刘恒更节俭的帝王大概只有马上就要出场的王莽和此后的崇祯帝。

这又不完全对，因为，钱绝对不是省出来的。刘恒时期，汉帝国的财政税收一点也不少，只不过进项不一样罢了。

为改变对诸侯国的经济劣势，刘恒想到了一个新的办法：放开帝国的铜矿开采、冶铁业、山林采伐、工商贸易、煮盐业、畜牧业……，民间可以进入一切可以进入的行业，只要你能赚钱！

就连人主之权的象征——铸币权，刘恒也完全放开，包括普通农人在内都可以自由铸币，只要你造的钱能花出去。

从嬴政开始，每一代帝王都深刻意识到铸币应该是皇帝独有的权威，到刘邦、吕后甚至想以垄断铸币权打击诸侯经济。也是从嬴政开始，中国的货币混乱不堪，汉初更是荚钱盛行，通胀不断。刘恒治下的帝国政府，只给出了一个铸币标准：货币重应达到四铢，货币制形应该是方孔圆钱；至于造成什么样子，那是铸币者自己的事情。

用今天的货币数量论来解释刘恒的货币制度一定会遇到难题，因为，恶钱增多是物价腾贵的原因，只有停止铸造恶钱才能恢复币值稳定。现在，刘恒放开私铸，怎么可能禁止恶钱流通。

让普通农人私铸货币，物价还不得飞上天？

经济运行有自身的规律，货币只是经济的表象，一旦有其他行当比货币减重赚钱更多，没有人会干这种受累不讨好的活。

在绝大部分人还要辛苦农耕的时代，冶铁、畜牧、贸易、手工都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换句经济学语言，这些行业，都是创新行业，想象一下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一台VCD能卖几千块钱，大家就明白为何无人再私铸“荚钱”了。

铸币赚钱很是麻烦，有这么多赚钱的行当，费这事干啥？

有了山川林泽的税收，刘恒再也没有兴趣关心吴王刘濞是不是私自铸币。民间铸币还是官方铸币，造出来的都是钱，民间铸币不但节约了官府费用，还能再有一笔税收，何乐而不为？

刚刚萌动的汉帝国，绝大多数人的目标已经是“耕作三年，剩余足供一年用度”，这个所谓“耕三余一”的目标只在汉唐两代盛世曾经实现，除此之外皆为虚幻。

《汉书》为我们这样记述这个时代：很多村落都有人养马（注：公马相当于当时的保时捷、捷豹以及劳斯莱斯），农闲的时候每一个村落边上都有成群的人在赛马（类似于今天有人在半夜两点在北京五环上开赛车），人们纷纷把自己的马匹牵出来向大家炫耀，最后，家里有母马的人都不好意思出门了……

楼主：天圆地方的困惑 时间：2021-10-16 00:57:12

吕雉死的时候，汉文帝刘恒并非帝王的最佳人选。他是刘邦的儿子，跟汉惠帝平辈，理论上不能继承大统，但是，皇室贵胄不愿扶住一个强势诸侯登上帝位。于是，这个在代国韬光养晦的“代王”刘恒被送上帝位。

从治理帝国经验上，刘恒是绝对见过大世面的。登位之初，刘恒诛杀吕后子弟、摆平汉初功臣残余势力，就连扶住他等位的周勃等人都会被弄回老家去种地了。多年的沉浮告诉刘恒，裁撤诸侯一定会给帝国带来莫大的伤害，所以，他才把不断忽悠削藩的贾谊放逐到长沙，把号称“才华横溢”的晁错弄去研究《尚书》……这位信奉黄老“无为而治”的皇帝，采用了一种比较温和的手段对付同姓诸侯。他提出，诸侯死后不能由一个王子继承，国土要平分给所有儿子；没有子嗣的诸

侯，在诸侯死后皇帝将收回封国。按照这个政策，对每一代诸侯来说，把土地平分给儿子并未直接减少土地，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可以接受的。刘恒虽然看不到皇权统一，但是几代人下来，诸侯一定会被温水吞青蛙般吃掉。

胜利就在前方的时候，刘恒死掉了。该来的，还是没有躲掉。

楼主：天圆地方的困惑 时间：2021-10-16 00:57:12

刘恒的继任者叫做汉景帝刘启，父子俩完全不是一回事。文景之治，文帝、景帝并列，可是，无论史籍对刘启如何溢美，我始终觉得刘启是一个愣头青。

当太子的时候，刘启就因为一辆马车不给他让路杀掉了对方，被杀的人正好是吴王刘濞的王位继承人，大概刘启觉得“我爸是李刚”吧。

刘启成为汉景帝后，第一件事就是启用刘恒时期的废臣——晁错（时贾谊已死）。晁错的治国思路，用一句话就可以当时概括：活脱脱就是一个商鞅的再版。保甲连坐、重农抑商，甚至把几十万农人发配到北部边境戍边……

帝王追求绝对权力，是因为有着绝对权力有着绝对收益：消除了诸侯竞争，才能贪天下之利。帝王一个人并不能管理天下，所以，帝王抛弃了诸侯却选择了封建官僚。与诸侯相比，封建官僚是一种更可怕的利益群体。

皇帝与诸侯之间是一种“压力双向传导机制”，如果皇帝政令对封国不利，诸侯为了自己的利益可以驳回命令，压力传导到最末端的小农就会逐步衰减。封建官僚是一种“压力单向传导机制”，压力只能逐级向下传导，封建官僚不但不会分散压力，而且会为了自身利益扩大这种压力。这样，压力传导到最后的小农便会呈级数扩张。无论诸侯还是帝王，说到底对国家财富是具有所有权的，一家一姓的地盘，民不聊生对他们也没有好处。封建官僚却完全不同，只要达到目的，管你大浪滔天，反正又不是我的天下。

诸侯确实会危害帝王权力，广设封建官僚却会危及全体臣民，社会上下层之间会彻底丧失沟通机制。从剪除韩信、英布等异姓王开始，皇帝手下的大臣都是急先锋。对消灭吴王刘濞的任务来说，也是如此。

吕后死的那一年朝廷动乱，周勃、陈平等入废掉了少帝，刘姓诸王与吕姓诸王斗的天昏地暗。如果刘濞真的处心积虑想造反，这个时候不造反，反而选择二十年后国泰民安的时候起事，除非是脑袋坏掉了。

晁错是不会考虑这一点的，他只看到刘濞十多年不来朝拜皇帝，只看到刘濞的封国富甲天下，富甲天下又没有他晁错的份儿。他没有想想，正是帝位上的刘启杀掉了刘濞最钟爱的太子。

面对帝国的财富，晁错只会红眼睛，虽然他从政多年，却一直被刘恒放在冷板凳上，根本没有处理复杂政治斗争的经验。晁错认为，所有的权力都源自皇帝那张板凳，只要他一声令下，诸侯就该臣服、就该老老实实交出封地。

所以，晁错选择了一个毫无新意的方法对付诸侯：不准铸币。

在晁错眼里，铜钱之所以能成为货币，完全是因为诸侯私自铸币。至于货币，压根就是没用的东西，之所以货币能代表财富，完全是因为诸侯拿走了帝王的东西。除了帝王（当然，还有晁错自己），包括诸侯在内的汉帝国的臣民都应该去田里种地，至于粮食值多少钱，只需要皇帝一纸敕令。

晁错不准刘濞铸币，把吴国国富民强的结果说成谋反的证据。摆明了是想抢劫刘濞多年积攒的财富，让他彻底丧失与皇室谈判的筹码。

您就是土匪也不能这么霸道吧？

楼主：天圆地方的困惑 时间：2021-10-16 00:57:12

这确实是一部书稿，在天涯发帖有做宣传的意思，更重要的是诸位求纠错，已经

有很多网友提出了个人意见，也为我们纠正了错误，在这里一并感谢。
书稿全篇希望借货币演进之机缘阐述王朝兴衰背后的经济成因，当然，这只是我们的一家之言，做不得准。
之所以提前把西汉和唐朝的小结拿出来，是因为这两个朝代完整演绎了一个财富循环，其他朝代没有这么典型。
另外，书名还没有定，现在的想法，《盛衰之刀》或《贫富之刀》。也希望诸位能帮忙出出主意。

欢迎批评指正！

楼主：天圆地方的困惑 时间：2021-10-16 00:57:12

就这样，刘濞什么都没有做，一直在忍。

汉景帝三年，晁错再出昏招，直接削去吴国中的两个郡、楚国的一个郡、赵国的六个县。因为，他认为封国只是帝国的脚趾头，脚趾绝不能比腰粗，无论自己是否削去他的封地，刘濞这帮人都会造反，与其如此，莫若先发制人。

谁告诉你诸侯就不能比皇帝富裕了？我什么都没做，你就说我造反，不就因为我有钱，我有钱又不让你管吗？

此令一出，诸侯哗然，既然你认定我要造反，那我就反了吧。吴王刘濞挑头，纠集六个诸侯起兵，要求“清君侧、诛晁错”，史称“七国之乱”。

这里不想记述平定吴楚七国之乱的过程。我只想告诉大家，“七国之乱”的结局特别无厘头：为平定“七国之乱”，刘启派人暗杀了晁错；晁错死后刘濞声称“朕已称孤家”，造反也就失去了合法性；此后，刘濞被汉将周亚夫剿灭；至于周亚夫，最后也因“谋反”被杀，至于理由：周亚夫平叛的目标是要追随刘濞去阴间造反……

从争夺铸币权到兵戎相见，斗争双方目的只有一个：统一手中的权力，不再有人对皇权至高无上的地位产生竞争，这样，皇帝就可以为所欲为了。所以，“七王之乱”中没有正义，无论哪一方胜利都权力都会向皇权演进。

平定七国之乱后，汉帝国同姓王不再拥有税收权，也丧失掉了封国内的官吏任命权，留下的只是一个封号。当权力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货币之上，皇权便开始主宰中国经济的进程。刚刚统一的汉帝国，在帝王一个人的旨意下又将走向何方？

楼主：天圆地方的困惑 时间：2021-10-16 00:57:12

期盼大家为本书赐名，多谢！

楼主：天圆地方的困惑 时间：2021-10-16 00:57:12

汉武的梦想

从吕后到文景之治，四代统治者与民生息、对生产农耕不闻不问，汉家天下有了半个世纪的太平时光。刘启的继任者是汉武帝刘彻，《汉书》记载，刘彻称帝的时候天下一派承平气象：农人家中粮食充盈，几辈子也吃不完；郡县府库的粮食全是满满的，很多已经腐朽不能吃了；国库中存了几百亿个铜钱，很多穿钱的绳子都已经腐朽了，官员却没有时间清理……

没有人知道，汉家盛世已经潜伏了莫大的危机，根源就是这位诞生于盛世的帝王——刘彻。

危机的开始，是汉匈之战。

嬴政时代匈奴曾经败于秦将蒙恬，秦末汉初中原大乱，匈奴却在冒顿单于的治理下破东胡、走月氏、臣服诸羌，国力空前强盛。对刚刚建立的汉帝国，匈奴自然不放在眼里，经常骚扰帝国北部边境，杀我边民、烧我房舍、掠我财物，刘邦险些被匈奴俘虏、吕后不停被冒顿羞辱，即使如此，刘邦、吕后、文景二帝都不得

不以和亲的方式安抚匈奴。

要知道匈奴是一个游牧民族，常年在水草肥美的地方流浪，隔三差五出来打牙祭；汉帝国却是一个农业国家，居民常年定居在一个地方，根本经不起折腾。和亲政策只能维持表面的和平，一劳永逸解决匈奴只能靠武力。

充盈的国库给了刘彻解决帝国外部危机的能力，一定要解决匈奴！

建元六年，老娘窦太后刚刚过世，现在刘彻说话算数了，他马上就发动了对匈奴的第一波攻击。

战争归战争，对这位富有天下的帝王来说，“不花钱、办大事”也是最好的选择。于是，刘彻构思了一盘大棋：马邑之谋。他想以边贸为名把匈奴单于骗到马邑一举生擒，然后，事先埋伏在马邑周围的 20 万汉军再出兵击溃匈奴主力。

遗憾的是，单于看破了刘彻的计谋，并未上钩，既然撕破了脸皮，双方就从小打小闹改为大打出手。

对汉帝国来说，战争的代价也是极其惨重的。

——元朔二年，卫青收复朔方，费金数千万，山东男丁悉被征发；

——元朔四年，卫青连年征战，仅给将士的赏金就超过了二十万金，要知道当年汉文帝花一百金修个露台都没舍得。

——元狩二年，匈奴浑邪王率四万人归降，刘彻想派三万辆车马去迎接。此时，堂堂汉帝国已经连三万车马（民用）都凑不出来了。长安令向刘彻求情，希望能为长安郡留下马种，刘彻却觉得长安令让他丢了面子，一怒之下斩杀长安令，顺带杀了长安市集上五百多个不肯掏钱买马捐赠朝廷的商人。

——元狩四年（前 119 年），汉匈决战。是年，汉帝国共出动十万骑兵，配合作战的步兵、辎重兵有几十万人，此外，还有边境协同出战的十万边民。霍去病、卫青从两个方向出击匈奴，共斩杀匈奴兵 9 万人。

在经历了长达 11 年的战争后，汉帝国终于迫使匈奴流窜到西欧去欺负罗马帝国去了。不过，仅此一战，汉帝国也损失了四万多名战士、十一万匹战马。尽管霍去病、卫青是获得了五十万金赏金，但是，出征的士兵没有领到薪水，原来国库里粮食和铜钱堆积如山，现在早就变成空荡荡……

楼主：天圆地方的困惑 时间：2021-10-16 00:57:12

为挽救频于崩溃的汉帝国的财政，更重要的是刘彻还得继续挥霍，汉帝国又一次推出了货币改革。在诏书中，刘彻毫不掩饰的说明了本次货币改革的目的：弥补日益浩繁的战争开支；借推行新币禁商人之利。

货币改革的主要内容是：废除了原来民间流通的四铢钱，推出三种新的货币：“皮币”、“白金币”和“三铢钱”。所谓“皮币”就是弄了块鹿皮，告诉全国人民，这块皮值四十万钱；白金币则分为龙币、马币和龟币，分别可以兑换三千钱、五百钱和三百钱。至于“三铢钱”，望文生义，就是重为“三铢”的钱。

皮币、白金币都是虚值货币，根本就不值钱。白金币是银、锡合金，算是一种金属货币，但也不会达到三千钱、五百钱和三百钱；至于“皮币”，说好听点是白鹿皮，说难听点就是一块擦桌布，这样的东西居然要当四十万钱。

为保证三种货币能够流通，刘彻规定凡朝廷的供奉、租税都必须以皮币、白金币缴纳，他不收零钱（三铢钱）。

——“皮币”面额实在是太高，普通人根本用不起，刘彻要求王公巨室必须以黄金向刘彻兑换；

——“白金币”针对殷实的小康家庭，必须用足值的四铢钱换取白金币；

——“三铢钱”针对小农，小农要以“一比一”的比例用四铢钱兑换三铢钱……

除了向刘彻交钱，谁也不会真在日常交易中用“皮币”或“白金币”，这两种钱代表的价值太高。至于“三铢钱”，从文景之治计算，四铢钱已经流通了五十年，谁也不再愿意用这种小钱。

马克思教导我们“如果有 100% 的利润，资本家就会铤而走险；如果有 200% 的利润资本家就会藐视法律；如果有 300% 的利润，资本家就会践踏世间的一切，甚至不惜冒断头的风险”。

马克思这句话，用在汉朝商人身上一点错都没有。

一张上好的鹿皮最多也就两千钱，一块皮币却值四十万钱，利润何止 300%。至于“白金币”，同样是利润超过 300% 的生意，如果不盗铸，出门都不好意思跟人打招呼。一年间，为惩罚盗铸货币，朝廷处死了几十万人，民间因为盗铸自相残杀的人更不可胜数。就这样，仍然是“犯法者众，吏不能尽诛”。

这不是币制改革，是彻头彻尾的抢劫！不得已，一年后，皮币、白金币、三铢钱就被废除。

有人说，废除皮币、白金币后刘彻开始推行五铢钱。至此，天下风行官铸五铢钱，刘彻第一次在中国货币史上统一了货币。刘彻确实废除了皮币、白金币，此后，汉帝国也确实流行五铢钱，只不过始作俑者不是刘彻。

此时，刘彻还没有上收铸币权，民间开始按照交易的标准自行铸造“五铢钱”。这批五铢钱被称为“郡国五铢”，因为流通的地域集中在诸侯郡国，毕竟，在郡国之中皇室的权威会稍稍得到抑制。有了民间自铸“五铢钱”，“三铢钱”几乎没有任何市场，就算皇室去市集上买东西也要先兑换成“五铢钱”

而且，我还要告诉大家，刘彻是一个很聪明的人，他马上顺应形势，开始自己铸造“五铢钱”。官铸“五铢钱”币材为紫铜，钱文、制形都非常精美，绝对是货币收藏中的极品。由于民间没有掌握紫铜铸造技术，甚至不能盗铸。

所以，说收刘彻第一次在中历史上统一了货币，也是没有错的。

刘彻的五铢钱被称为“赤仄五铢”，一枚“赤仄五铢”可以抵五枚“郡国五铢”，赋税、官府供奉必须用“赤仄五铢”。紫铜的质量就是再好，也不可能以一当五，即使刘彻杀掉了几个以“郡国五铢”作为赋税郡守，“赤仄五铢”仍旧不能在市面上流通。

两年后，“赤仄五铢”就支撑不下去了。

在货币流通规律面前，不可一世的汉武帝低下了高昂的头颅。元鼎四年（前 113 年），刘彻下令官府上收铸币权，开始铸造行现在人们所说的“三官钱”，即我们今天见到的“五铢钱”。

楼主：天圆地方的困惑 时间：2021-10-16 00:57:12

抢劫无极限

战争期间，很多事情一定给刘彻留下了很深的记忆，从骨子里，刘彻痛恨有钱人……

——元狩二年，匈奴浑邪王归降，他没钱摆谱的时候，长安的商人没有给他钱。

——元狩三年，卫青、霍去病即将征伐匈奴，国库却不足以支撑这次大战。刘彻再次要求天下富人捐出自己的财富，每家富人要捐出自己财产的 3-5%，这在历史上被叫做“算缗令”。然而，一年来只有一个叫做“朴适”的牧羊人愿意捐出 20 万钱。

刘彻收缴了这 20 万钱，封朴适为中郎、赐给他徭役 400 人、将朴适的事迹宣谕天下，希望天下富人能以此为榜样。然而，直到元狩四年决战结束，刘彻也只收到这一笔捐款。天下富人争先恐后的自己隐匿财产，唯恐露富。

汉匈之战刘彻胜利了，虽然帝国国库空虚，刘彻花钱也丝毫没有收敛：
——在宫内修昆明池、柏梁台，建章宫更是“度为千门万户，辇道相属焉”；
——为羽化登仙，做了一个铜质乘露水的盘子，居然高达 20 丈、直径 7 丈……
——征伐南越，设 15 郡；征伐西北，设 2 郡；
——最离谱的，刘彻喜欢大宛宝马，发 20 万士兵征大宛，得汗血宝马数匹……
这些，都需要钱，需要很多钱。就是贵为汉武帝，赚钱也很不容易。既然不能靠货币减重赚钱，那么就撕下所有伪装，直接去抢吧。

前 120 年，刘彻想到了一个今人看来简直匪夷所思的办法。为推行“算缗令”出台“告缗令”：告发隐匿财产的人，就可以获得对方财产的一半，另一半则由帝国没收。此令一出，帝国所有人都为之疯狂，也彻底改变了财富生产轨迹——如果能靠欺诈获得财富，谁又肯去创造财富呢？告缗令确实让帝国“得民财以亿计”，但是，帝国的掠夺之手遍及每一个角落，富裕的人家几乎被一扫而空。偶然剩下几个富户，是因为“告缗令”之外还有一个“不告缗令”：只要向边关捐赠一定数量马匹，或者一定数量粮食，就可以不被“告缗令”追究，不被“告缗令”追究的前提是这家人没有现钱，所有的财富都集中于土地。

从古至今，很多人批评“告缗令”是赤裸裸的抢劫、败坏社会风气，却很少有人提及“不告缗令”。

在我看来，两者相比“不告缗令”更为恶劣。

战争时期非比寻常，朝廷逼不得已出台“告缗令”情有可原。总有个把富户通过种种渠道逃脱“告缗令”，而且，将来总还会有富人出现。问题是，“不告缗令”把所有的货币都引到了一个方向——土地。

楼主：天圆地方的困惑 时间：2021-10-16 00:57:12

于是，大家宁可去购买土地，也不愿意捐款给刘彻。既然你还是不愿意给，那我就直接抢吧。

在推行“三官钱”的同一年（前 113 年）朝廷宣布：官方上收铸币权、民间不准铸币、收缴全国所有铜矿、上收煮盐、铁矿、货物运输……

这在历史上被称为“盐铁官营，均输平准”。

文景之时没有农业税，煮盐、铸铁、铜矿、运输为帝国财政提供了所有经费，这些产业都是帝国的支柱。对帝国来说，这些产业不仅意味着税收，甚至不是为帝国创造了多少富豪、多少财富。

最重要的是，这些产业吸纳了帝国的顽疾——流民。

每个人都要生存下去，西汉最常见的谋生方式就是种地，失去了土地的人，就是中国历史上一群特有的人——“流民”。流民没有土地、没有固定的收入、没有户籍，属于“三无”人员。

但是，流民也要活下去，他们必然要寻找一种适合自己的生存方式。帝国没有垄断所有盈利行业的时候，他们可以去煮盐、可以去冶铁、可以去采矿，还可以搞运输。《盐铁论》记载，当时的大盐商雇佣人数在千人以上，一个人劳动者的收入足以买到一个六口之家的粮食。

——现在，帝国垄断了赚钱的行业，从事煮盐、冶铁、铸钱的普通人变得无所事事。刘彻为了省钱，垄断行业的劳动力都来自于徭役和犯罪分子，也就是说现在这些行当不能再维持“三无”人员生存。

——现在，帝国垄断了赚钱的行业，从事煮盐、冶铁、铸钱的有钱人同样无事可做。有钱人不用四处流浪，他们手中的金钱却要寻找一个去处：货币的本性就是要寻找低风险、高收入的回报。

在“不告缗令”引导下，有钱人很自然地发现了一个低风险、高收益的渠道——土地！随着商人手中大量的货币迅速转向土地，汉帝国第一波土地兼并开始了。结果不言而喻，儒学大师董仲舒给出了那句最精准的评价：富者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

对汉帝国来说，土地不仅仅是一种商品，还是维持万千小农生存的基础。从刘邦到文景之治，汉帝国维持了五十年的兴盛，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工商业发达，更重要的基础的则是每个小农都有土地，能给工商业者提供稳定的市场和社会环境。现在，帝国的土地集中到有钱人手里，小农也就失去了谋生之路。

不过，这里要说，这不是最坏的结果，毕竟商人买了土地也要请失去土地的农民来耕种，人民还不至于变成“流民”。

可怕的是，让商人无事可做的人，不是市场竞争者，他们是“官商”。这些人，是商、也是官，故称“官商”，官在前、商在后。

楼主：天圆地方的困惑 时间：2021-10-16 00:57:12

为了垄断盐铁、运输、酒业，刘彻增设了很多机构，汉帝国的官僚机构空前膨胀。他们垄断了各种赚钱的买卖，对胆敢入侵这个领域的普通人处以极刑。

商人要生产、要经营、要盈利；官，不需要生产、不需要经营，盈利很辛苦、过程也很漫长，抢劫才是发家致富的捷径。官商已经完全具备了抢劫的能力，无论什么破烂东西，我说多少钱就是多少钱，这不是抢劫莫非还是慈善？

史书记载，官营铺造出来的镰刀，据说割草都嫌钝；现存文物中有一种大铁犁，特点是个头特别大，大概有一米多高，颇类似上世纪 60 年代的“深耕改土犁”。而且，汉代官家却只生产这种大铁犁。

因为，这样的东西价格可以卖很高。

这哪里还是农具，简直就是一堆废铁。这样的破烂一样要卖给国人，反正独此一家，别无分号。

在没有任何竞争的情况下，“官商”迅速染上了帝国官场习气。自此，官与商一体、权与利结合，所谓“成贪鄙之化”。当然，这些官商都能迅速各自把持了一块地盘，完全把民间经济消灭干净（诸官各自市，相与争）。

更可怕的是，垄断地位赋予了官商大量的金钱，这些人同样冲入那个致命的市场——土地。《汉书》记载了各种各样的帝国官僚购买土地：下至水衡、少府、大农、太仆，上至三公九卿，无不“攘公法、申私利、跨山泽”。

据《汉书》记载，红阳侯王丽是皇帝的舅舅，他强占了南阳几百顷土地，接着又将这些土地卖给了官衙。这此投机倒把行为王立赚了一亿个铜钱，有人曾经做过测算，一枚铜钱在当时可以买到一升小米，这笔生意的纯利折合成 2012 年的人民币至少是两亿六千万。如果考虑到汉代粮食的稀缺性，这笔生意的利润又远远高于两亿六千万……

楼主：天圆地方的困惑 时间：2021-10-16 00:57:12

两亿六千万又会让多少人无家可归？

汉武帝打击了商人和工商业者，却培植出一批比商人更为可怕的人。单纯的商人、地主或者有钱人，很快被“官商”挤出，就算再有钱，找个理由整治你还不容易？

现在，丞相、王侯、大夫才是帝国真正的有钱人。此后，历朝历代都没有超脱出“官商”的窠臼，工商业永远成了附属于封建官僚集团的牟利之道。“想致富、当干部”成为汉帝国每一个人的人生信条，富人必须先是官僚，然后才能集官僚、商人、地主于一身。

与普通商人、地主不同，“官商”对金钱的渴求根本没有止境。毕竟单一的商人、

地主或者官僚都有自己的规矩，就算欺行霸市，商人的价格也不能贵到离谱；就算地租再高，也不能不让小农生存。

“商人+地主+官吏”就完全不一样了，此时整个社会的财富规律已经转变，人们不再热衷于生产财富，而是如何去抢劫财富。

《汉书》这样记载当时的汉帝国：亡义而有财者显于世，欺谩而善书者尊于朝。行虽犬豕，家势富足，列田畜者弥郡国……

最可怕的事情终于发生了。断绝了人们正常的求利空间，一定会有另一种非正常的牟利方式出现。在西汉历史上，这批通过非正常手段致富的人也有一个专属名词——“豪强”。

帝国最有势力的人群是封建官僚，民间精英一定会找到渠道结交帝国高官，成本则是最底层小农的生命与鲜血。最初的豪强多来源于当年被官府挤出的富豪，这些人是帝国的精英，也是创造财富的先驱，既然不能以合法的方式牟利，那么他们也就必然同流合污：勾结官府欺压小农、强买强卖土地、使用暴力抢夺小农身上的最后一枚铜钱……

郭解是关中最有势力的豪强之一，他最要好的朋友之一是当朝大将军卫青，此人作奸犯科、欺男霸女、无恶不作，但是，此人又总能找到理由逃避法律的惩罚。在当地有钱人的一次宴会上大家聊起了郭解的为人，有人称赞他是一个侠士，另一个则随口说此人“专以奸犯公法，何谓贤”。很快这位背地里说坏话的人就被杀掉了，而且割掉了舌头。事后，官府追问郭解，郭解却辩称自己对这件事毫不知情，于是，只能被无罪释放……

你猜的没错，所谓“豪强”就是中国第一代黑势力，他们剪断了维系小农生命的最后一根游丝。

前 106 年，四十万“流民”突然冲入了汉帝国的首都长安，全国无家可归的人则超过了百万。毕竟长安是帝都，这里人多、事多、钱也多，或许帝国的皇帝和官僚不能把手伸到每一个角落，能有一丝空间养活自己……

楼主：天圆地方的困惑 时间：2021-10-16 00:57:12

@芦苇达摩;@lyszq;@1987665216;@看我我就喂你奶;@lcy74191;@czx566

非常非常感谢诸位！感谢赐教！

楼主：天圆地方的困惑 时间：2021-10-16 00:57:12

多谢各位支持，放假啦，我要出趟门预计 10 月 15 日回程，期间可能不能更新，抱歉！祝各位大侠双节快乐啊

楼主：天圆地方的困惑 时间：2021-10-16 00:57:12

休假刚刚回来，多谢支持。

我们的专业是金融，不是历史，其中细节难免有偏差，还望诸位不吝赐教。

楼主：天圆地方的困惑 时间：2021-10-16 00:57:12

第 4 章 迷失的货币

（汉昭帝-新莽）

让子弹飞：豪强变身

汉武帝连年对外征战，流民如同蝗虫一样席卷了整个西汉帝国，一半以上的人口在这片土地上彻底消失了。面对铺天盖地的流民，刘彻迅速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这位铁腕帝王试图以更野蛮的方法制止豪强掠夺小农——杀戮。

晚年，刘彻任用了一批酷吏对付地方豪强。这些酷吏由刘彻亲自从最底层提拔，很多本身就是流民，当然，这些人只对刘彻一个人负责。他们可以搏击王侯、砍

杀豪强、刑讯富商、屠戮贪官，因为，这批酷吏本身就是流民出身，自己没有任何可以珍惜的东西，他们可以为了一时的欢愉毁掉整个世界。

汉代死刑核准权在最高统治者汉武帝手里，由于交通不便，死刑犯经常拖一两年也不能处死。唯独这批酷吏审判的死刑，有专用的公文渠道，保证能在最短时间内将判决文件（竹简）送到汉武帝面前，迅速把人杀掉。

史籍为我们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

宁成是南阳地区的大豪强，此人勾结官府的方法很别致：专门搜集全国高官的黑材料，然后以此要挟官员。

宁成强抢土地，则与金融欺诈有关。他经常借钱给濒临破产的小农，很长一段时间不去追讨本息，甚至小农想还钱都找不到地方。一段时间后，宁成及其爪牙会突然出现在债务人家中，要求连本带利收回贷款，结果必然是抢占债务人土地。通过这种方式，宁成在南阳地区抢占了数千顷良田，他每次出行都要带上几百个护卫，据说当地人宁可见到最凶猛的老虎，也不敢惹怒宁成（宁见乳虎，无直宁成之怒）。

这样一个不可一世的土匪，碰到了同行出身的太守——义纵，演绎了一场真实版《让子弹飞》。

义纵本是抢劫犯出身，与鹅城“麻匪”唯一的不同，就是那张委任状是刘彻亲自签发的。面对来势汹汹的义纵，宁成根本没把他放到眼里，义纵进城的时候宁成也只是派人送了一顶轿子。

此后，义纵拿出了与“麻匪”相同的手腕，要求宁成缴纳剿匪费用；宁成缴纳了剿匪费用，暗地里却想借剿匪之机杀掉新任太守义纵。

获知消息后，义纵拿出了比“麻匪”更狠的手段，没有经过任何司法手续，甚至连调查取证都没有，义纵就给宁成扣了一个大帽子：宁成的房子是一块“有王气”的土地，靠着这个罪名，杀掉了宁成全家及其团伙骨干，只有宁成孤身一人逃走。在这个故事里，宁成死没死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宁成的钱归了汉武帝，义纵自己成为当地豪强。另外补充一句，之所以用“义纵”作为例子，是因为义纵后来负责禁绝私铸货币，为此，他杀掉了成千上万的人。

杀戮豪强给刘彻再次带来一笔财富，然而，这些钱根本不足以安抚数以百万计的流民。何况，诛杀豪强也是有成本的，这批酷吏本就是流民中最聪明的人，不但自己借机成为豪强，同时还要清除朝堂之上的异己。

征和二年（前 91 年），汉帝国爆发“巫蛊之祸”，刘彻相信了酷吏的诬告：太子和举国官员正通过巫术将他置之于死地。太子被迫起兵反抗，最后，包括太子和皇后在内的一批皇族被诛杀。

“巫蛊之祸”背后的逻辑是：酷吏作为封建官僚中的后起之秀，当然也希望掌握帝国财富，此时，民间已经没有多少油水可捞，他们就把屠刀就转向了豪强和强势官僚，最后，他们自己变成了官僚，也变成了豪强。

从此，豪强有了一个新的专有称谓“官家豪强”。

官吏一旦变成豪强，黑势力也就转成白势力，其对社会的危害程度又远远大于土生土长的豪强黑势力。面对风雨飘摇的政局，亡秦之迹昭昭在目，刘彻明白自己深深伤害了帝国经济，帝国统治行将崩溃。

征和四年（前 89 年），刘彻写下中国历史上著名的《轮台罪己诏》，忏悔自己一生所为，立意停止对外征伐，希望帝国政策能重新回到轻徭薄役、与民生息的正常轨道。在诏书中，刘彻检讨了自己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国库空虚，他要求朝廷罢黜那些伤害百姓、糜费天下的政令，希望军马能回到土地、农人能

安心耕作……

一生醉心于权力的刘彻终于从皇权的黑洞中走了出来，盛世场景却已是昨日落花。这位时日无多的老人只得赤膊上阵，力图再凭一己之力扭转乾坤，实现“禹汤罪己，其兴也博焉”。只是，历史没有再给这位强人机会，《轮台罪己诏》颁布后两年（前 87 年）刘彻薨，问题留给了继任者汉昭帝和他顾命大臣：霍光、桑弘羊（汉昭帝刘弗陵即位时刚刚 8 岁）。

霍光和桑弘羊水火不容。

霍光是大将霍去病的弟弟、首辅宰相（相当于内阁总理），他希望坚持汉武帝晚年的《轮台罪己诏》，放开官营、轻徭薄役；桑弘羊出身于富豪之家，大司农（相当于财政部长兼央行行长），他坚持盐铁专卖、平准准输。

昭、宣两朝，霍光才是帝国真正的统治者^①，他甚至废掉了汉昭帝的继承者，从平民之中把汉宣帝刘询直接扶上皇位。桑弘羊本是盐商出身，盐铁官营后成为全国最大的“官商”，一旦放开盐铁专卖，他就会失去所有权柄。

如何让西汉帝国走出亡秦之迹，霍光一定有过一番缜密的思考。

汉家天下虽然破败，却与吕雉时代有着完全不同的逻辑。吕雉时代，包括三公九卿在内的汉家人都很穷，外有匈奴、内有诸侯，内忧外患之下封建官僚不可能成为强势分利集团，所以，吕雉能够顺利推行“耕者有其田”。

现在，封建官僚势力已成，要想废黜这些苛政，必须在舆论上做好准备，同时，霍光也必须找到新的同盟军。

霍青用来对抗桑弘羊的人，在历史上被称为“贤良”、“文学”。贤良文学也就是在野的儒生，他们没有官职，却是各地推举出来的道德楷模。在霍青支持下，贤良文学与桑弘羊展开了一场为期半年的大辩论——盐铁论战。

楼主：天圆地方的困惑 时间：2021-10-16 00:57:12

第 4 章 迷失的货币

（汉昭帝-新莽）

让子弹飞：豪强变身

汉武帝连年对外征战，流民如同蝗虫一样席卷了整个西汉帝国，一半以上的人口在这片土地上彻底消失了。面对铺天盖地的流民，刘彻迅速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这位铁腕帝王试图以更野蛮的方法制止豪强掠夺小农——杀戮。

晚年，刘彻任用了一批酷吏对付地方豪强。这些酷吏由刘彻亲自从最底层提拔，很多本身就是流民，当然，这些人只对刘彻一个人负责。他们可以搏击王侯、砍杀豪强、刑讯富商、屠戮贪官，因为，这批酷吏本身就是流民出身，自己没有任何可以珍惜的东西，他们可以为了一时的欢愉毁掉整个世界。

汉代死刑核准权在最高统治者汉武帝手里，由于交通不便，死刑犯经常拖一两年也不能处死。唯独这批酷吏审判的死刑，有专用的公文渠道，保证能在最短时间内将判决文件（竹简）送到汉武帝面前，迅速把人杀掉。

史籍为我们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

宁成是南阳地区的大豪强，此人勾结官府的方法很别致：专门搜集全国高官的黑材料，然后以此要挟官员。

宁成强抢土地，则与金融欺诈有关。他经常借钱给濒临破产的小农，很长一段时间不去追讨本息，甚至小农想还钱都找不到地方。一段时间后，宁成及其爪牙会突然出现在债务人家中，要求连本带利收回贷款，结果必然是抢占债务人土地。通过这种方式，宁成在南阳地区抢占了数千顷良田，他每次出行都要带上几百个

护卫，据说当地人宁可见到最凶猛的老虎，也不敢惹怒宁成（宁见乳虎，无直宁成之怒）。

这样一个不可一世的土匪，碰到了同行出身的太守——义纵，演绎了一场真实版《让子弹飞》。

义纵本是抢劫犯出身，与鹅城“麻匪”唯一的不同，就是那张委任状是刘彻亲自签发的。面对来势汹汹的义纵，宁成根本没把他放到眼里，义纵进城的时候宁成也只是派人送了一顶轿子。

此后，义纵拿出了与“麻匪”相同的手腕，要求宁成缴纳剿匪费用；宁成缴纳了剿匪费用，暗地里却想借剿匪之机杀掉新任太守义纵。

获知消息后，义纵拿出了比“麻匪”更狠的手段，没有经过任何司法手续，甚至连调查取证都没有，义纵就给宁成扣了一个大帽子：宁成的房子是一块“有王气”的土地，靠着这个罪名，杀掉了宁成全家及其团伙骨干，只有宁成孤身一人逃走。在这个故事里，宁成死没死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宁成的钱归了汉武帝，义纵自己成为当地豪强。另外补充一句，之所以用“义纵”作为例子，是因为义纵后来负责禁绝私铸货币，为此，他杀掉了成千上万的人。

杀戮豪强给刘彻再次带来一笔财富，然而，这些钱根本不足以安抚数以百万计的流民。何况，诛杀豪强也是有成本的，这批酷吏本就是流民中最聪明的人，不但自己借机成为豪强，同时还要清除朝堂之上的异己。

征和二年（前 91 年），汉帝国爆发“巫蛊之祸”，刘彻相信了酷吏的诬告：太子和举国官员正通过巫术将他置之死地。太子被迫起兵反抗，最后，包括太子和皇后在内的一批皇族被诛杀。

“巫蛊之祸”背后的逻辑是：酷吏作为封建官僚中的后起之秀，当然也希望掌握帝国财富，此时，民间已经没有多少油水可捞，他们就把屠刀就转向了豪强和强势官僚，最后，他们自己变成了官僚，也变成了豪强。

从此，豪强有了一个新的专有称谓“官家豪强”。

官吏一旦变成豪强，黑势力也就转成白势力，其对社会的危害程度又远远大于土生土长的豪强黑势力。面对风雨飘摇的政局，亡秦之迹昭昭在目，刘彻明白自己深深伤害了帝国经济，帝国统治行将崩溃。

征和四年（前 89 年），刘彻写下中国历史上著名的《轮台罪己诏》，忏悔自己一生所为，立意停止对外征伐，希望帝国政策能重新回到轻徭薄役、与民生息的正常轨道。在诏书中，刘彻检讨了自己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国库空虚，他要求朝廷罢黜那些伤害百姓、糜费天下的政令，希望军马能回到土地、农人能安心耕作……

一生醉心于权力的刘彻终于从皇权的黑洞中走了出来，盛世场景却已是昨日落花。这位时日无多的老人只得赤膊上阵，力图再凭一己之力扭转乾坤，实现“禹汤罪己，其兴也博焉”。只是，历史没有再给这位强人机会，《轮台罪己诏》颁布后两年（前 87 年）刘彻薨，问题留给了继任者汉昭帝和他顾命大臣：霍光、桑弘羊（汉昭帝刘弗陵即位时刚刚 8 岁）。

霍光和桑弘羊水火不容。

霍光是大将霍去病的弟弟、首辅宰相（相当于内阁总理），他希望坚持汉武帝晚年的《轮台罪己诏》，放开官营、轻徭薄役；桑弘羊出身于富豪之家，大司农（相当于财政部长兼央行行长），他坚持盐铁专卖、平准准输。

昭、宣两朝，霍光才是帝国真正的统治者①，他甚至废掉了汉昭帝的继承者，从平民之中把汉宣帝刘询直接扶上皇位。桑弘羊本是盐商出身，盐铁官营后成为全

国最大的“官商”，一旦放开盐铁专卖，他就会失去所有权柄。
如何让西汉帝国走出亡秦之迹，霍光一定有过一番缜密的思考。
汉家天下虽然破败，却与吕雉时代有着完全不同的逻辑。吕雉时代，包括三公九卿在内的汉家人都很穷，外有匈奴、内有诸侯，内忧外患之下封建官僚不可能成为强势分利集团，所以，吕雉能够顺利推行“耕者有其田”。
现在，封建官僚势力已成，要想废黜这些苛政，必须在舆论上做好准备，同时，霍光也必须找到新的同盟军。
霍青用来对抗桑弘羊的人，在历史上被称为“贤良”、“文学”。贤良文学也就是在野的儒生，他们没有官职，却是各地推举出来的道德楷模。在霍青支持下，贤良文学与桑弘羊展开了一场为期半年的大辩论——盐铁论战。

楼主：天圆地方的困惑 时间：2021-10-16 00:57:12

@lovelydean

@一潭影一

@handsetft

@rainstoness

@萧雨之寒

感谢诸位提出的错误和修改意见，一定马上纠正。

楼主：天圆地方的困惑 时间：2021-10-16 00:57:12

另外，我真的也很奇怪，我不是手机发帖，也不是无线网卡，怎么会显示手机发帖？那位高人帮我解释一下啊？

楼主：天圆地方的困惑 时间：2021-10-16 00:57:12

盐铁之辩

这场震铄古今的盐铁论战，正方第一辩手桑弘羊是从讨论行政级别开始的。

“贤文学良”是纯粹的民间儒生，没有任何官职。面对这些曾在自己脚下匍匐的草民，桑弘羊显得很有自信，他气势恢宏地说：官职级别不够高的人不可以言政，住着蜗居、没有粮食、穿衣破烂的人怎么知道国家政治，怎么知道县官要做什么？并且，桑弘羊在辩论中一点礼貌都没有，给这些对手起了一个有侮辱性的绰号“鄙儒”。

跟很众多辩论一样，双方辩题从剖析社会时弊开始：究竟什么原因导致流民众多？对此，桑弘羊给出的答案是：人天生就是不一样的，一个人的贫富完全取决于个人智力水平，聪明的人能够拥有一百个人的财富，愚蠢的人连自己都养不活。天子圣明，盐铁官营的利润可以周济穷人，怎么可能是盐铁专营的过错？

先帝（刘彻）怜百姓之愁苦，各地县官就像百姓的亲爹（县官之于百姓，若慈父之于子也），水旱灾害给他们衣食，为他们修水渠、劝农桑，难道因为爱民就可以让百姓不事稼穡？

正方结论：流民都是因为自己太懒惰，不耕耘就播种、不播种就想收获，总之，活该！（墮民不务劳作，其不耕而欲播，不种而欲获。饥寒及己，固其理也）

桑弘羊虽然承认了流民众多的现实，却又不肯承认朝廷施政存在失误。这种说法当然激怒了贤良文学，“鄙儒”用一个例证驳斥了桑弘羊：最聪明的人，能靠自己的能力在短短几年之内富比王侯吗？现在，富人一年内赚取的财富超过了普通人数代人、数百年的积累，世界上怎么可能有这样的聪明人？

跟着，“鄙儒”把矛头指向了盐铁专营。所谓“盐铁官营”根本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谎言，经营盐铁生意的第一个条件就是居高官，原有的盐铁商人迅速地销声匿迹，为这些高官留下了广阔的盈利空间。此后，盐铁商人亦官亦商，又利用

手中的金钱为权力铺平了道路。这些人府邸却能占好几条闾巷：幽暗之处曲径通幽、开阔之地驰骋骏马、亭台之上素女抚琴……

如此富有、位居庙堂之高，却与市井之人争利！

百姓何尝愿意流离失所，先帝只是征伐四边，封建官僚却借机征收苛捐杂税、无休止征发徭役，工商不得发展、农人不得安宁，百姓为了躲避人头税甚至会杀死自己刚出世的孩子。随着“官商”势力成长，百姓在高压之下不断贫困、破产、失业，最终成为流民。

反方结论：朝廷垄断盐铁，创造了一批富比王侯的“官商”，“官商”毫无止境的穷奢导致流民四起。

双方从现象入手找原因，盐铁专营既然已经进入了视线，第二个场辩题顺理成章就是：盐铁专营该不该废黜。

在桑弘羊眼中，盐铁专营自然是不能废黜的。桑弘羊为盐铁专卖找到了第一个非常好的辩护理由：匈奴是汉帝国的心腹大患，必须随时保持对匈奴的武备，一旦武备松弛，匈奴随时有可能卷土重来。盐铁专营确实很赚钱，但是，这些钱的用途是为帝国筹措军费，用来征伐匈奴。鉴于此，罢黜盐铁官营，国家就会没有军费，等到匈奴真的杀入帝国心脏，纵有披坚执锐的勇士、有与匈奴决战的信心，也无力回天。

桑弘羊给出的第二个理由是：盐铁专卖赚取的利润是调剂物资、保证物价平稳，尤其是粮价不能暴涨暴跌。西周之时天下承平，但是，国有沃野而百姓食不果腹、有山海矿产人们却没有铁器，是先帝建立了官营铁匠铺，人们才有铁器使用。国家统一生产盐铁，产品质量有保证、有专门的技术指导、可以杜绝商贾趁机抬价。桑弘羊给出的第三个理由是：盐铁专营可以削弱豪强势力，进而减少流民。民间富豪没一个好东西，国家穷困的时候不肯捐钱，就连唯一捐款者朴适后来也被汉武帝发配边疆。盐铁之利留在民间，一定会助长豪强势力，这些破坏分子靠着盐铁之利“赈赡穷乏”，以小恩小惠招揽亡命之徒。有了经济实力，豪强便会靠着就会依靠暴力推进土地兼并，农人就会变成流民。

正方结论：帝国必须垄断盐铁专营之利，才能扶住百姓安居乐业（夫理国之道，除秽锄豪，然后百姓均平）。

面对滔滔不绝的桑弘羊，贤良文学指责桑弘羊在论证一个伪命题：你说广大西周人民没有铁器，没有铁，那里来的铁器？（我理解，“鄙儒”的意思，好像今天指责明朝没有发展信息产业）现在有了铁器，官府生产的铁器根本不能用，却要求各家人口数量购买铁器，本来规定生产铁器只能征发囚徒，官府却让普通百姓为盐铁生产服徭役……

接着，“鄙儒”把矛头直接指向了桑弘羊本人。

盐铁官营目的是为帝国聚敛财富，各级官吏却无不借口帝国之利敛财，最典型的代表就是您桑公弘羊。桑公处公卿之位，执掌天下财政十多年，最大的功劳就是您自己先富起来，现在您已经是“家累万金”。在您带领下、在盐铁暴利的诱使下，全国“官商”无不“以权势以求利”，官家是官吏自己的官家，官吏无一不以权力来满足一己私欲。最终，百姓愁苦怨恨，官场更是恶习辈出（吏不奉法以存抚，倍公任私，各以其权充其嗜欲，人愁苦而怨思，上不恤理，则恶政行而邪气作）。

文帝时期，没有盐铁专营而天下富足，桑公推行了几十年的盐铁专营，天下人没有见到盐铁的利益，却看到了很多害处。现在，我们来告诉你这究竟是因为什么：

天下之利都是一点一点生产出来的，没有人能凭空创造财富，官家获得利润一分，民间就会损失百倍。靠盐铁专营聚敛财富，好比一个蠹材反穿裘皮大衣去背柴薪，爱惜裘皮的毛发，却全然不知，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反方结论：一切的罪恶之源，都是盐铁官营。

楼主：天圆地方的困惑 时间：2021-10-16 00:57:12

既然盐铁之利搞得国破民穷，那么下一个辩题就是讨论应否重视盐铁等非农产业：即是否应该“重农抑商”？所谓重农抑商，“重农”是双方的共识，关键是否“抑商”？与很多人想象的不一样，在这个问题上，桑弘羊主张放开商业，恰恰是贤良文学力主抑商。

桑弘羊指出，没有手工业则缺乏农具、没有商业则物品不流通，缺乏农具、物品不流通农业也不会兴旺。何况，有了官营盐铁，富国何必非要靠农业，人民富饶又何须依靠田地？所以，官营盐铁、运输、冶铁，一定要大力提倡。

这个道理听起来是不错的，不过桑弘羊提倡的并非民间工商业，他尤其看不惯那些富比王侯的大商人，谁让你无权无势却过上比我更为骄奢的生活。

正方结论：要重农、也要有区别的重商。

在汉朝之前倡导“重农抑商”的是法家，现在，儒家却开始提倡打击商人。贤良文学是儒家代表，所以，后世无数人指摘就是儒家这个“重农抑商”的思想让中国落后了两千年，似乎儒家是中国经济落后的罪魁祸首。

此一商人，非彼一商人。

原始自由经济下的商业属于创新行业，与封建官僚体制下“官商”根本不是一个逻辑。“鄙儒”极力攻击的是所谓“官商”，辩论一开始，他们就提出：盐铁、酒榷、均输不是所谓商业，“官商”与民争利，所赚取的钱不但不能回到百姓手中，甚至根本不可能进入朝廷国库。“官商”会找到种种借口把钱搂入自己腰包，最终国困民穷。唯独“官商”是帝国最富有的人，他们藏钱满室、享尽天下富贵，前院足以放置钟鼓、后院金屋藏娇、家中犬马声色不可胜数……

在贤良文学眼中，这些“官商”穷奢极欲，全国淳朴厚重的小农都会模仿他们，百姓相互争耀，为博得一时欢愉甚至会做出卖儿卖女的极端行为。一旦社会形成骄奢淫逸的风气，无论有钱没钱都会一切向钱看，纵然朝廷掌握了山海之利，又如何能够拯救黎民于水火之中？

反方结论：崇本抑末才能求得国家富庶、政治稳定，要重农，更要抑“官商”！

第四个辩题就显得颇有深度了：既然盐铁官营是与民争利，那么，国家富强的基础究竟是国富才能民强，还是民强才能国富？

在这个辩题上，桑弘羊首先把命题深入到“人性本恶”的讨论。桑弘羊认为，人性充满了丑恶，每个人出生的时候，父母都尽心尽力抚养自己的儿女，儿女长大以后对父母的奉养何其之薄？

既然人性本恶，就一定不能让百姓先富起来。因为，百姓卖力种田是为了地主的钱财、为国家做工是恐怕遭到国家责罚，何曾看到民众有一丝道德？

为了论证自己的命题，桑弘羊抬出了法家的祖先——商鞅：有了商鞅的“弱民强国”之策秦国才可以斥地千里，最终蒙恬一举击溃犬戎。商鞅主张“利出一孔”，国家财富应该集中于皇帝手中，财富分散于民间就会干弱枝强。再者，国家积蓄了足够的粮食，百姓才能安居乐业，如果百姓比国家都富裕，功名利禄就无法打动百姓；如果百姓过于强大，国家刑法就难以制约。但凡能赚大钱的行业，比如铸币冶铁，都在深山之中，不是豪强难以获得这些利润，当年的吴王刘濞就是靠

着盐铁铸币之利对抗朝廷。如果将铸币、盐铁之利收于朝廷，无论价格贵贱百姓都不会产生疑虑，只有这样，一个五尺童子行走在街市之上也没有人敢欺瞒，这才是真正的大同社会。

正方结论：国富与民强，国富必须优于民强。民富就会产生豪强，人的贪心是无止境的，他们聚众闹事，最后尾大不掉，社会上就会奸邪之徒众多。（今放民于权利，罢盐铁以资暴强，遂其贪心，众邪群聚，私门成党，则强御日以不制，而并兼之徒奸形成也）

谁是国家？

谁又是百姓？

当然是大司农桑弘羊代表国家、贤良文学代表百姓，桑弘羊不让贤良文学“后富起来”，这些人当然不会答应。

贤良文学提出了四个铿锵有力、掷地有声的问题：

“鄙儒”一问桑公：孟子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商鞅峭法长利，秦人民不聊生，于国于民有何益处？

“鄙儒”二问桑公：盐铁、均输、平准确实为国家积蓄了大量钱财，你可知上府下求之县，县又求之乡，乡安取哉？

“鄙儒”三问桑公：汉文帝在位，国家何曾看重这些浮利，又何曾私藏畜牧，不过是有了富裕的居民才有了富强的汉帝国；今天帝国有了盐铁之利，何曾看到一丝国富民强的迹象？

“鄙儒”四问桑公：田地还是那些田地、矿产还是那些矿产、百姓还是那些百姓，怎么可能矿产、土地归朝廷官吏就能多生产百倍之利？

普通人不过是在自己家垒个墙头藏住自己的财富，天下就是皇帝藏住财富的院落，民富则国必强！

最后，“鄙儒”继续对桑弘羊展开人身攻击。桑公终日夸夸奇谈，就是你这些歪理在逼迫底层官吏，就是你搞的百姓家中毫无余财、役力老母日夜哭泣、怨女终日叹息……

反方结论：民富国才强，皇帝不能以猜忌、怀疑甚至嫉妒的态度对待自己国民的财富。

盐铁论战的最后，贤良文学把矛头指向了辩论发起者、自己的后台——霍光。“鄙儒”认为霍光只推举自己的关系当官：老爹一旦当了官，儿子就横行街市；老公一旦当了官，所有人都痛恨他老婆飞扬跋扈。这些“鄙儒”给了霍光一个相当到位的总结：无周公之德而有其富、无管仲之功而有其侈。

贤良文学的激烈言辞引起了霍光的注意（大将军常仇之），盐铁论战被叫停。

楼主：天圆地方的困惑 时间：2021-10-16 00:57:12

盐铁论战发生在汉武帝颁布《轮台罪己诏》之后八年，为了确定帝国施政方针，御史大夫和贤良文学展开了这场为期半年的“盐铁论战”。为记录这场论战，桓宽写下《盐铁论》，全书共 60 篇，思想之深邃毫不逊于当代货币学派代表人物弗里德曼，足以批判当代西方经济学奠基之作《就业、货币与利息通论》。

桓宽没有就任何一个辩题做出判断或者评价，也许他想说的内容都融汇在辩论中了；也许他相信，悠悠千载、洗尽铅华，当清者自清、浊者自浊。

也有人说，盐铁论战不可能有如此详细的记录，全书都是作者杜撰，《盐铁论》更类似一本小说。

无论是史实还小说是，《盐铁论》都是中国封建王朝经济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其中滋味，读者当自有公论。

最后，做一点说明，本节盐铁论战所有内容不过是翻译古文，毫无原创，当然，文责应由《盐铁论》作者桓宽承担。

楼主：天圆地方的困惑 时间：2021-10-16 00:57:12

通货紧缩是好事吗

尽管贤良文学已经把桑弘羊驳斥的体无完肤，但是，这些在野人士根本没有可能撼动官家豪强。现在，具备掌控官僚集团能力的人只有一个，那就是帝国的实际统治者——皇帝。面对如此沉疴，西汉末年的历代皇帝也一定试图挽救危亡，毕竟，帝国是一家一姓之天下，鱼死网破对大家都没有好处。

汉武帝死后，汉昭帝、汉宣帝一直都在努力。

人们往往认为，封建皇权最黑暗、剥削最残酷的时候，就会激化社会矛盾，引发反抗，最后，这个黑暗的封建王朝会就会灭亡。我想告诉大家：封建皇权的灭亡，不可能从最坏开始，更不可能在最坏的时候发生。

恰恰相反，一个王朝的覆灭，往往是从试图逐渐变好开始。

最坏的封建统治者只能播撒仇恨的种子，相对宽松的统治环境才能让种子发芽、开花、结果。比如，在汉武帝刘彻鼎盛时期，别说造反，就算封疆大吏想成为富人也绝无可能。此后，汉武帝末年以及昭、宣两朝，又恰恰是统治者试图变好的时期。尤其是汉宣帝刘询，他甚至宣布自己不再修建陵墓，只是在汉武帝陵墓边上选择了一个宫人的寝陵作为墓地。

登基之前，刘询只是一个被废黜的皇族，在这位平民皇帝眼中，豪强因为有钱才能强抢农人土地，农人会流民。直觉告诉他，没有货币，就不会有土地兼并。汉宣帝刘询就想到了一个新的方法：帝国将不再铸造新的货币，任由原有货币在流通中逐渐消亡。

所以，刘询的货币政策非常离谱

宣帝在位 25 年，史书没有记载一次铸币记录，在他对奏疏的批注中，却不止一次出现类似的话：国家没有货币，豪强也就失去了兼并土地的手段，天下自然承平。国家不铸钱、民间不准私铸，25 年间铸币没有丝毫增加。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国家完全停止了货币供应。结果是必然的：物价暴跌，一跌就是二十几年，这就是传说中的通货紧缩。

宣帝元康年间，关东平原的粮价降至“谷石五钱”、每亩土地不足三十钱；边远地区的粮价也不过是八钱一石，土地更是落到了二十钱一亩。这是整个西汉历史上最低的粮价和地价，甚至低于辉煌的“文景之治”。

正是这些原因，有人将汉宣帝刘询在位时期称为“宣帝中兴”——一个没有金钱的世界，将是一个清平的天下。

我要说，汉宣帝这种认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是对的。只是，治疗这个病症，实在不应该使用通货紧缩的药方。货币的作用不仅仅是代表生产剩余，也代表其他资产。例如，在没有创新的时代，货币也可以代表土地价值。

或者，也可以这样说。

官家垄断了煮盐、采矿、冶铁、运输、酿酒等几乎所有创新行业，投资土地就是最安全、最保值、最有效的渠道。相对而言，最简单的产业创新都需要一点一滴积累，吸纳货币也就相对较长的时间；土地是高价值资产，吸纳货币的速度、能力都远高于的创新产业。如果货币不能流向高利润的创新产业，只有依靠土地才能转换为财富（也许是泡沫），就会形成一种恶性循环：……货币投资于土地→土地成为吸纳货币的重要渠道→刺激货币进一步流向土地→土地兼并……。

无疑，在这个循环中谁拥有更多的货币，谁就可以拥有更多的土地。通货紧缩使得每一个人手中的货币都升值，货币越值钱、农人的境遇就越悲惨。通货紧缩也进一步强化了官家豪强的货币优势，这些人又非普通货币持有者，他们会连骗带抢剥夺百姓土地。要知道，土地本不是普通商品，农耕时代是绝大多数人维持生计的唯一本钱。失去了安身立命之本就会形成大规模流民，所以，无论汉宣帝年多么节俭、也无论他多么努力，宣帝年间都是汉朝流民最多的时期之一。

当然，通货紧缩还带来了另外一个后果，就是小农的赋税负担陡然加重。皇权的经济基础从来就不是、也不可能是封建官僚集团，只有小农才能为皇帝提供赖以生存的税赋资源。所以，从刘邦、吕后开始，汉家皇帝从来不承认超过秩级的官僚可以超量占有土地。

法律不承认豪强抢占土地，本来是件好事，任何事情到了官僚手里都能变废为宝、找到赚钱的理由。不承认豪强抢占土地的另一层意思是：郡县户籍是给定的，税收不可能减少；豪强抢占土地，法律却不承认事实，豪强当然也就不需要为这些土地缴纳赋税。

问：这些赋税从哪里出？

答：残存的自耕农要替代流亡的农人纳税，包括逃亡人口的徭役。

宣帝年年，官府强令小农以货币缴纳税赋，而且只收足值的“五铢钱”。“五铢钱”经常被凿出几个缺口以盗铸货币，两枚破钱往往才能换得枚完好的一枚五铢钱。按《盐铁论》的估算，汉昭帝末年农人的税赋就已经高达 50%以上，如果加上宣帝年间的通货紧缩，黎民百姓的税赋应该在所有收入的 70%以上。

结果：辛苦劳作，不能保住性命；相反，只要把土地送给豪强，也就逃掉了国家的赋税和徭役。

楼主：天圆地方的困惑 时间：2021-10-16 00:57:12

货币确实越来越少，反而加速了小农破产。面对愈演愈烈的土地兼并和流民并起，汉宣帝刘询开始以更为残暴的方法剥夺豪强土地，即“迁涉豪强”。

——汉宣帝地节元年（前 69 年），迁 70 万人迁入平陵，其中就包括两个宰相之家、一个博士之家、一个太守之家；

——汉宣帝地节三年（前 66 年），再迁 30 万人进入平陵，这一次包括当朝丞相、将军、列侯和一批两千石的官吏。

“迁涉豪强”的原意是官家豪强只能带走动产，留下来的土地可以重新分配给小农。可是，官家豪强本就亦官亦商，他们既是政策的执行者、又是政策的剥夺对象，怎么可能自己剥夺自己？本来，流窜到人烟稀少的地方还有一丝活路，豪强的到来让老少边穷地区也出现了极为严重的土地兼并，流民终于无处可以流窜。当然，我们也可以从中看出，此时豪强已经与官吏完全合二为一了。尽管汉宣帝非常努力，可是，官家豪强势力不断壮大，皇权和农民却同时衰微。

1978 年，河南省唐河县一座西汉末年的古墓重现人间，这座古墓的主人是“大尹冯君孺”。当时，“大尹”不过是一个和郡守平级的官员，年俸在两千石左右。然而，这座墓葬的豪华却让所有考古学家吃了一惊：墓形制仿照诸侯，实际面积又远远超过了文景时期的同姓王，当地人把这个汉墓群叫做“九冢十八塔”。墓地如此超标，在西汉可是灭族之罪，却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这个“冯君孺”受到了惩罚。此时，封疆大吏在已经控制了属地的方方面面，他们甚至开始在自己境内修筑城池、修缮甲兵，理由很充分：防范流民作乱。

宣帝之后，《汉书》再无迁涉豪强的记录，可能皇室已经没有这个能力了。官僚蛀空了帝国财富，也剥夺了皇帝权柄，汉哀帝年间，御史大夫鲍宣曾经为末世王朝做了一个精辟的总结：民有“七死七亡”。

——水旱灾害，百姓破亡；
——毫无顾忌的税赋（以货币缴纳），百姓破亡；
——所有公务都成为中饱私囊的工具，百姓破亡；
——各级官吏贪得无厌，百姓破亡；
——徭役使农桑失时，百姓破亡；
——最底层的流氓也经常把村民赶去干活，百姓破亡；
——盗贼劫掠，百姓破亡……

“七亡”之外还有“七死”：酷吏殴打死、徭役劳累死、冤狱恶搞死、盗贼杀死、互相斗殴死、饿死、瘟疫死。鲍宣感叹，百姓有十四种死法，却没有一条生路，国富民强已经是不可能的事情……。

汉宣帝之后，元、成、哀、平四朝仅四十年间，《汉书》却记载了十六次流民大爆发，动辄“百万”的流民游荡于广袤富饶的关东平原，却得不到维持自己生命的一点财富。

——汉元帝年间，丞相匡衡一人占有良田达三十五万亩之多；汉成帝年间，河南地区发生水灾，出现了“人相食”的惨剧；

——汉哀帝年间，朝廷抄没大司马董贤家产，现金竟高达四十三亿个铜钱，大约折合今天的人民币110亿元，而这位董贤入朝当值仅仅两年；

两者对比的结果就是：汉平帝年间，愤怒的长安市民烧掉了汉武帝刘彻的坟墓，火光照亮了未央宫。

此时，官僚集团的势力超越了皇权，皇帝转而要仰官家豪强鼻息。这种现象在秦汉之前的历史中从来没有发生过，帝国的崩溃，已经只是时间问题……

楼主：天圆地方的困惑 时间：2021-10-16 00:57:12

王莽确实已经削弱了官家豪强经济实力，也建立了自己的货币储备，胜利似乎唾手可得。但是，王莽没有看清楚谁是自己的敌人，更没有找到自己的朋友。

王莽要推行他的改革政策，不可能依靠农人对土地的渴望，他甚至不太可能依靠这些人。最重要的，他需要有忠于自己的干部队伍。王莽的粉支持者可以是黎民百姓，干部队伍却绝不能是这些人，百姓要是有能力抗衡官家豪强，也不至于混成流民。王莽的干部队伍，必须同样是一批有治世之能的封建官僚，只有他们才有实力对抗同样有能力的封建官僚。

然而，王莽抓干部建设的能力实在难以恭维。

这位儒生皇帝把大多数官吏的名称换了一下，绝大多数官僚只是“新瓶装旧酒”。最离谱的，王莽正式授予郡级最高行政长官（牧）军事指挥权，等于承认了豪强可以拥有军队。王莽确实也亲自提拔了一批人，比如，孔光、刘歆、哀章。这批人原本都是提笔写字的儒生，毫无从政经验，秉政十多年最大的成绩就是编纂了诸多儒家典籍，焚书坑儒后多数儒家经典都是在王莽时代恢复的。

或许是王莽改革之心过切……

或许是王莽太迷恋儒家学说……

或许是王莽开始迷信皇权的威力，以为自己可以无所不能……

最终，王莽未能培养出足以抗衡官家豪强的力量，改革（抢劫）政策的推行者仍旧是官家豪强。土地仍在官家豪强手中，封建官僚是地方豪强、地方豪强就是封

建官吏，跟迁涉豪强一样，怎么可能依靠他们剥夺自己的土地？在官家豪强眼中，自己根本不是帝国体制的支撑者，当官只是借助帝国权力掠夺财富罢了。现在，王莽的朝廷诏令却是剥夺他们自己的财富，这样的命令当然要互相推诿，新朝行政立刻陷入瘫痪。

按汉朝典制，每逢新皇登基、改年号这样的大事都要释放犯人，新莽朝的官吏却根本不告诉囚犯大赦消息，无罪之人也经常监狱里一关就是几年。因为人命关天，这些权力都可以替代货币向黎民百姓讹诈土地……

看到改革政策难以实行，始建国二年（公元 10 年），王莽推出了第三次货币改革——“宝货制”，试图彻底摧毁官家豪强的经济基础。

“宝货制”是世界货币史上绝无仅有的货币制度，包含一种金币、两种银币、四种龟壳、五种贝壳、六种铜钱、十种布币，总计二十八种货币。在兑换比例上，一枚龟壳最高可以兑换两千一百六十枚铜钱、一枚贝壳最多可以兑换二百一十六枚铜钱。王莽的本意，可能是托古代西周货币制度，以龟壳、贝壳这些不值钱的东西再次打击官家豪强。

货币的职能是价值尺度、财富贮藏、支付手段，等等。不用说二十八种货币同时流通，单百姓手中日常使用的布币就有十种之多，其中，幺布和小布重量比例实际为 16:15，名义价值却是 2:1。

这样的货币制度，不用说抢夺别人财富，在实际中根本就不可能得到执行。所有人都想赚钱，而以“龟壳、贝壳”换钱实在是一本万利的生意，严峻的也刑罚没有挡住人们对财富的追求，新莽朝出现了严重的“伪造货币”问题——如果龟壳、贝壳能称为货币的话。

更糟糕的是，始建国三年（公元 11 年），也就是王莽第三次币改的第三年，汹涌的黄河在魏郡溃决，泛滥清河郡以东数郡；同年，黄河沿岸各郡发生了严重的蝗灾。在物资本就极度匮乏的新朝，再次爆发了巨额通货膨胀，以黑市五铢钱计算，关中平原的谷物价格已经上涨到万钱一石，是汉宣帝年间的 100 倍。

《汉书》这样描述当时的年景：富贵之家还可以坐卖田宅应对灾荒，黎民百姓只能坐在街道上哭泣，百姓被饥饿和贫穷折磨，饿死者十之七八，再次出现了“人相食”的惨剧……

任何时代，货币制度都是统治者权威的象征，币值稳定则统治稳定，反之则社会动荡不安。“宝货制”巨大的缺陷给天下黎民造成了巨大损失，“王田制”又不能让百姓真正得到土地，人们在一点一滴中渐渐丧失了对新朝的信心，没有人知道，这位儒生皇帝要把帝国带向何方。

抢占官家豪强财富，王莽彻底得罪了官僚；“王田制”未能让天下苍生真正得到土地，王莽更是得罪了天下黎民百姓。从此，改革再无朋友、只剩下敌人，民间开始流传“黄牛白腹、五铢当复”的民谣……

——“宝货制”实行一年后，面对天下“瞽然”，王莽终于承认了自己的失败：宣布允许买卖“王田”，再次承认了土地私有；

——天凤元年（公元 14 年），废除“宝货制”，罢金、银、龟、贝四种货币，朝廷只发行货布和货泉，货布重 25 铢、货泉重 5 铢，等于恢复了原来汉朝五铢钱。如果到此为止，新莽朝或许还能像后来的东汉一样苟延残喘。可是，王莽真的是很不幸……

从始建国三年（公元 11 年）黄河闹水灾开始，一直到王莽灭亡，黄河就再也没有消停，有文字记载的大水灾就有 13 次之多。最后，黄河改变了河道，入海口

由天津改为山东半岛。

于是，我们才看到了今天的黄河。

楼主：天圆地方的困惑 时间：2021-10-16 00:57:12

这是中国有文字记载以来最凶猛的水灾，大家可以想象，黄河平地搬家是一种什么样的灾难。洪水遍及河南、山西、山东、河北、天津等省份，其中，山东夹在新旧两条河道中间，受灾最为严重。在水利工程匮乏、道路并不通畅的汉代，无论官家豪强还是平民百姓基本都断绝了生路。

一次偶然事件点燃仇恨之火。

王莽废除“宝货制”当年，琅琊海曲县令（今山东日照）诛杀了一个因小罪获刑的吕氏豪强。此后，吕氏家族纠集几千人杀掉了县令，又集合源源不断的流民，农民起义爆发了。后来，这些流民在自己前额抹上红色，以区别同样穿着破烂的官军，他们就是“赤眉军”。

疲敝的新莽帝国已根本无力应对如此大规模的战争，何况“赤眉军”与王莽军在昆阳决战的时候，王莽的精锐部队正在北部与南匈奴苦战……

与大家想的不一样，最后攻破未央宫的并不是“赤眉军”，而是一批长安城内的地痞流氓。“城中少年”（《汉书》给无业游民的雅称）朱弟、张鱼等人在狂欢式的抢劫中引发了长安城骚乱，人群冲向了未央宫。

最后的时刻，王莽身着朝服在未央宫平静地等待死亡，他的身边还有同样盛装的一千多名公卿大臣。请注意，陪王莽一起等死的不是普通士兵，而是朝臣。如此多的朝臣心甘情愿为一位末代王朝的皇帝殉葬，过去从来没有、将来也再未发生。最后，骚乱者以斧头劈开了未央宫宫门，王莽被愤怒的人群乱刃分尸。王莽死后，这片土地陷入史无前例的混战之中……

东汉年间，在班固所著的《汉书·王莽传》中，王莽被贬成一个篡位者、野心家、暴君。然而，英国《剑桥中国通史》却给王莽以最高荣誉，认为他是中国古代最杰出的帝王；民国时期，胡适更是将王莽评价为“中国古代空想社会主义者”。我们不想在这里争论王莽身后的是是非非，只是以马克思的话为王莽得出结论：“君主们在任何时候都不得不服从经济条件，并且从来不能向经济条件发号施令”。

楼主：天圆地方的困惑 时间：2021-10-16 00:57:12

西汉小结：财富的始与终

现在，让我们来回顾西汉帝国由弱变强、再由盛转衰的循环，一条清晰的财富生产、转移轨迹呈现在我们面前。

首先，我们想跟大家提到一个成语叫“萧规曹随”，其中的“萧”指萧何，“曹”则指他之后的另一位宰相叫曹参。曹参是自沛县起兵就追随刘邦，刘邦建立汉朝后，曹参在功臣中排名第二。

萧何死后曹参成为西汉帝国的第二号人物，谁也没有想到，这位新任宰相只干两件事：喝酒、吃肉。据说此人从拜相开始就没再清醒过，至于政务，他只用刻板的笨人，一切按前朝规矩办；如果有人想推陈出新，则一律都被曹参拉住——不醉不归。

官场之上历来都是上行下效，既然宰相天天买醉，六部官僚也几乎都成了伯伦不归。有一次，几个古板的士大夫带曹参去一个花园，因为一干人在上班时间的这里饮酒买醉。估计他们的意思是想让宰相看看这帮家伙如何不务正业。结果，曹参见到酒席狂喜，然后就跟着大家一起喝，硬是把拉他来的几个士大夫也给灌醉

了。

长此以往，终于搞的吕后朝会也见不到人了。

在吕后示意下，当时的汉惠帝差遣曹参的儿子（宫中侍卫）质问这位当朝宰相：先帝刚刚驾崩，您现在是宰相，奈何日日欢歌，不以天下为忧，咱这日子还过不过了，您到底想干什么（高帝新弃群臣，帝富於春秋，君为相，日饮，无所请事，何以忧天下乎）？

谁也没有想到的是，儿子没有等来回答，却等来了二百棍子，附带被骂了一句：这种事情焉能是你一个侍卫能过问的，滚回去当你的侍卫！

曹参这个二杆子等于把吕后、皇帝的面子都驳了。于是，吕后就拆迁皇帝当面喝问曹参：你明知是我派他去询问此事，为何还要把他打成这样？

这一次，曹参终于从半梦半醒之间回到了现实，他脱掉自己的帽子、跪在地上，却提出了一个跟这件事毫无关系的问题：您觉得您比高祖英明吗？

汉惠帝答：我们怎么能比的上高祖的雄才伟略？

曹参又问：那陛下觉得我喝萧何谁更英明？

汉惠帝非常生气：你当然无法和萧何先生比拟。

曹参答：既然如此，有了先朝的规矩，我们为何还要费心费力？官出一寸之政、民失一尺之财，唯有让当官的清静，黎庶才能安宁（载其清静，民以宁一）

汉惠帝答：善。

在西汉帝国建立后的数十年里，帝国的统治者始终信奉清静无为，最终消灭了一心攫夺权力的异姓王——并无半分侥幸。此后，在与同姓王的竞争中，双方都信奉黄老之术，西汉帝国终于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农耕经济创造了巨大财富；放开经济管制，一批冶炼、商业、运输、畜牧、渔业等新兴行业崛起，帝国经济前景充满活力。

此时的汉帝国既有产业创新，更有制度创新，无论国家还是普通民众，焉能不富？

正是凭借从商税中获得的实力，汉景帝攫夺了同姓王权力，彻底消灭了对皇权的竞争。

接下来便是中国古代最生猛的皇帝汉武帝，他迅速花光了四代君王的积蓄，便想通过铸币聚敛天下财富，超级通胀使得敛财手段失效，于是把手直接伸向了所有产业。管理天下产业需要一批人，一旦“官商”成为一种势力，帝国政府就会凭借级数式扩张的实力不断蚕食社会财富、挤压小农的生存空间。

然后，失去了正常发财手段的帝国精英成为“豪强”，也挤压掉出小农身上残存的最后一口气息。

无论汉武帝多么贪心，也无论他多么有权势，在某一个时点上社会财富的总量必然是有限的。必须留出让全社会人继续生存财富，也就是马克思所谓的“必要劳动时间”：社会最底层必需能维持自身和家庭的生存。

然而，参与掠夺的绝非汉武帝一个人，封建“官商”不但不靠生产就能获得财富，而且还占有了帝国绝大部分财富，此后的所有赚钱的途径都必须依附于这个强势集团。强势分利集团完全不遵守财富规则，显然，最终掠夺超出了帝国居民承受的极限，人们失去了土地、失去了工作、没有能力组建家庭，最终成为流民。整个循环的逻辑是：帝国抢占富人产业→→富人把小农从土地上挤走→→封建“官商”又从土地上挤出了富人→→富人中的强者成为黑势力→→小农成为流民……

最终结果：国弱、民贫，唯独官富。

皇权一旦使所有社会资源都匍匐在自己脚下，封建官僚就会在瞬间吸干帝国的经济血液，无论皇帝、黑势力还是黎民百姓都没有力量遏制这头怪兽。武、昭、宣三朝，皇权同样以各种残酷的手段镇压官僚集团，但是，皇权始终只能依靠一批官僚去镇压另一批官僚。汉宣帝错误的执行了通货紧缩政策，为官家豪强兼并土地提供了一把货币铸造的利刃。最终，皇权丧失了与官家豪强的博弈能力，元、成、哀、平四朝，封建官僚像病毒一样吞噬了帝国整个机体。

正是看到问题症结所在，王莽才终其一生锐意改革，晚年更是“常御灯火至明”。他试图以货币改革掠夺豪强财富，以皇权作为强大的后盾再次将帝国扳回“耕者有其田”的轨道。只是，王莽不能、也不可能平衡官僚利益与“天下大同”理想之间的矛盾，他所有的努力都无法挽狂澜之即倒、扶大厦于将倾。

西汉帝国缔造了一个“皇权-封建官僚-小农”的社会体系，这个社会体系成功地取代了西周以来的“王室-封臣”体系。与“王室-封臣”体系一样，这个统治框架也存在自身难以克服的矛盾：皇权只有借助封建官僚才能统治整个帝国，但是，封建官僚自身就是一个强势分利集团，他们会借助手中的权力疯狂掠夺帝国财富。皇权根本就无法彻底遏制这种掠夺，毕竟联系皇权和封建官僚的纽带恰恰就是掠夺财富的权力。最终，封建官僚对财富的掠夺将成为帝国难以治愈的沉疴。

西汉帝国完整演绎了上述流程，流程的开始是“均田制”、流程的结束是普通人变成“流民”。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西汉历代帝王甚至使用了迁涉、杀戮等极端的方式打击封建官僚，然而，所有的措施最终又都为封建官僚所利用，成为他们抢劫财富的利器。这是一个缠绕中华民族数千年的封印，无论多么伟大的封建王朝都将在这个封印之下灰飞烟灭！

楼主：天圆地方的困惑 时间：2021-10-16 00:57:12

修改了西汉的小结，添加了一个萧规曹随的故事，多谢支持，欢迎批评！

楼主：天圆地方的困惑 时间：2021-10-16 00:57:12

@442965221y

多谢提醒，我核实后修改，再次感谢。若还有其他问题，还望不吝赐教，一并修改！

楼主：天圆地方的困惑 时间：2021-10-16 00:57:12

@442965221y

关于昆阳之战是否是王莽主力

关于刘秀部下是否是赤眉军

这两个问题其实不是金融问题，我没有发言权。既然行文中涉及，理应考证。

楼主：天圆地方的困惑 时间：2021-10-16 00:57:12

@gtfz99 @swanazure

诸位，感谢关注，颇多网友提出了书稿中的问题，拟再考证一些细节，所以，正文暂缓贴出。仅提出每章结论性评论，供大家批判。

第五章 国家与土匪（东汉）恰巧也在讨论两位网友讨论的问题，再次感谢关注，欢迎批评。

楼主：天圆地方的困惑 时间：2021-10-16 00:57:12

东汉小结：盛衰小农一钱间

西汉末年，刘秀不过是众多举兵的豪强之一。由于力量太弱，刘秀不能像其他军

阀一样铸造铁钱，只能尊重货币规律任由民间私铸。在优秀的货币制度下，刘秀最终成为军阀中的佼佼者。正是看到西汉帝国的灭亡的原因，刘秀才故意保持了一个弱势官僚集团，东汉帝国也始终依靠民间私铸货币。

摆脱了封建官僚的羁绊，人们对金钱的渴望再次迸发，社会生产力发达程度更甚于西汉鼎盛时期，社会财富也再次呈几何式增长。

“文景之治”的基础是“耕者有其田”，“耕者有其田”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小农经济”。“光武中兴”虽然缔造了第一代华夏创新产业——陶瓷业、造船业，但是，这些创新的社会组织基础是“坞堡”，“坞堡”依靠宗族纽带而存在，只不过是“小农经济”的2.0版。

西方经济学认为，小农家庭会精准地计算利润，在“边际投入”大于“边际产出”的时候停止投入，进而实现利润最大化。

不是这样的。

农业生产也可能遵循利润最大化模式，可以用来描述现代化生产的农场，但不是中国的小农和坞堡。中国小农抵抗风险的能力极差，人们就像站在齐颈深的河水之中，一排细浪就可以将之淹没。

直白的说，在封建社会，能够生存下去就是绝大多数中国小农的理想。

所以，为了获取生存资源、为了能够抵抗未来的风险，小农会对土地无限制投入劳动，直到土地的边际产量为零！这样的社会组织结构基础缺少契约精神、人们也不可能去冒太多风险，当然无论产业创新、管理创新还是组织创新也就都变得步履维艰。

只要家庭是抵抗风险的最终社会单位，那么，绝大多数人对财富的渴望都会达到无所不用其极的地步，劳动就会丝毫不知疲倦，甚至以损害自身健康乃至生命为代价。所以，小农家庭衡量剥削残酷与否的标准根本不是被拿走多少，而是还剩多少。

东汉“坞堡”竞争的残酷性远胜于单一小农家庭，毫无节制的私有经济竞争同样产生了严重的社会问题：东汉中期，一小撮富比王侯的大坞堡主、大批无依无靠的“部曲”（奴隶）同时出现在帝国的版图之上。更加严重的是，面对强势坞堡，帝国朝廷政令不行、朝廷的统治能力已经被弱化甚至被完全忽略不计了。

恰恰在这个时候，西羌继匈奴之后成为汉帝国又一个心腹大患。

面对西羌的劫掠，弱势朝廷根本无法集中资源保护黎民百姓乃至整个帝国，一盘散沙的坞堡军队也无力抗衡倏忽而来的马上民族。

在对抗异族的战争中，东汉帝国一败涂地。

并非坞堡不努力，而是坞堡必须保证自己的“部曲”不被齐颈深的水淹没，所以，每次战争都不足以毕其功于一役。在西羌常年累月的劫掠中，东汉帝国消耗掉了240亿枚铜钱，损失一点不亚于汉武帝刘彻征伐匈奴。更恶劣的结果是，尽管未能消灭西羌，坞堡却借机掌控了军事力量，成为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批军阀。

从汉灵帝开始，朝廷中枢再次铸造“四出五铢”应对日益浩繁的军事开支和地震救灾。“四出五铢”属于足值货币，不可能在短期内获得巨量财富，无奈之下，汉灵帝开始卖官搂钱，不仅为自己留下了千古骂名，也让军阀统治权名正言顺。董卓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控制朝廷中枢的军阀，国家由此变为土匪。

土匪对财富的掠夺比国家更为贪婪与残忍，他们眼中只有金钱，没有道德、没有规矩，甚至没有人性。董卓发行的“无字小钱”已经完全违反了货币规律，包括他自己的手下也卷入反对他的斗争。

董卓死后，中原大地陷入军阀混战之中。

这是中华历史上另一个无奈的悖论：经济发展需要摆脱封建官僚的羁绊，也需要自由竞争激发活力，但是，弱势帝国无法建立一支强势军队。冷兵器时代，农耕民族如果无法有效集中资源，外族入侵和军阀混战也许就是难以摆脱的宿命。东汉帝国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遇到这个问题，显然，这个时代没能给出答案。不要说史家口中昏聩的汉灵帝，后世即便英明若唐宗宋祖也未能将其中的玄机识破……

楼主：天圆地方的困惑 时间：2021-10-16 00:57:12

三国小结：礼崩乐坏的时代

曹操任由民间私铸五铢钱，刘备拼命造“直百五铢”、“太平百钱”，孙权造出了更离谱的“大泉五千”。单纯从币制来看，三国应统一于曹魏，然而，曹魏终亡于西晋司马氏。

这是偶然吗？

董卓之后，最大的两个军阀是北方的袁绍和南方的刘表，这两人已经先后为曹操攻破。曹操当时是唯一有实力统一全国的军阀，赤壁败溃却阻挡了曹军前进的步伐。此后，曹操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防御之上，他认为蜀汉和孙吴是“搓饵小国”，经过其田野，农民每每面带菜色，这样的土匪当不攻自破。

关于赤壁之战，史学界还有一种观点：曹操到达赤壁的军队不足万人，而且在长江遇到了瘟疫，曹操心痛士兵伤亡，于是一把火烧掉了荆州水军。无论这种观点是否正确，我只是想提醒大家：20万军队肯定是曹操的所有老本，如果在赤壁之战中被击溃，刘备根本就不用去借荆州、孙吴早就挥军“为汉家天下去污秽”了。无论赤壁之战胜败如何，我可以确信的是：此后曹操在北方锐意改革，坚持不懈地推行“耕者有其田”。

楼主：天圆地方的困惑 时间：2021-10-16 00:57:12

所以赵翼云才在《廿二史劄记校证》中这样评价：人才莫盛于三国！

然而，曹操的屯民不用承担兵役，小农也可以自由离去。曹魏武力支撑同样来自北方的世家大族，跟江南世家大族一样，这也是一批成长于西汉的官商、发迹于东汉的军阀。曹操本是宦官家庭出身，世家大族又怎么肯在这个“赘阉遗丑”治下称臣？何况，曹操要做的不仅仅是当皇帝，而是要以土地国有彻底断掉世家大族的命脉。

也许，曹操不愿意在建立强盛的封建集权之前看到世家武装进一步中壮大，这才是他一生不愿轻起边衅的真正原因；

也许，曹操出身低贱，知道辗转呼号于生死边缘的苦楚，所以，他不愿意看到百姓再受战乱之苦；

也许，曹操是确实也想统一中国，只不过心有余而力不足罢了……

历史给我们开了一个玩笑，曹操一念之差，中国统一的进程戛然而止，也为后世埋下了更大的祸根。

建安二十五年一月二十三日（公元220年），曹操薨。

曹操尸骨未寒，陇西大姓陈留就上书魏王曹丕，要求确立“九品中正制”，此后，选官要看“世、状、品”。也就是说，但凡有人做官都要看其家室、看族谱、看世家大族的评判。自此，豪门大族在历史上又出了一个专有名词——士族。

曹丕为了获得士族支持，同意在魏国实施“九品中正制”，也终于登上了皇帝的宝座。只是，一旦曹丕向士族妥协，就必须借助他们的力量才能统一全国。如此，不但刚刚萌发的小农经济将消弭于无形，士族门阀势力更将历久弥坚。

楼主：天圆地方的困惑 时间：2021-10-16 00:57:12

第5章 国家与土匪

（东汉）

无官的世界

赤眉军在中原大地四处游荡的时候，官家豪强也在欢呼雀跃，谁能在纷纷乱世组织一支强有力的军队，谁就是帝国未来的主人。“赤眉军”流窜到南阳地区，当地官家豪强立刻表示热烈欢迎，并为流民提供了最需要的物品——粮食（吃不饱，只能凑合维持活下去）。当然，官家豪强也毫无悬念地取得了起义军领导权，自此，他们在史籍上有了一个新名字——“豪强军阀”。

优雅的中国古文这样描述当时的场景：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直白的翻译只需要四个字：天下大乱。

豪强军阀就是传说中的土匪，从王莽被杀到汉光武帝刘秀建立东汉，中原大地先后出现了11个皇帝。很难分清这些人那个是真的皇帝、那个是真的土匪，或者，皇帝本就是土匪，土匪当大了就成了皇帝。

新制度经济学代表人物诺斯曾经比较过国家与土匪。他认为，国家和土匪本质是一样的，大家都以暴力为基础进行抢劫，土匪抢钱、有去无回，国家抢钱、有去有回。土匪也可变成国家，只要能保护黎民百姓不让别的土匪抢劫……

要成为最牛的土匪，就得有最多的钱，有钱才能招兵买马、才能铸造刀枪、才能打败其他土匪。

所以，各路土匪都想让自己更有钱。

如果没有钱，也可以自己造。

王莽死后，南阳的刘伯升和蜀地的公孙述是最大的两伙土匪，他们几乎同时推出了自己的货币制度——“铁钱”，这也是中国货币史上第一次出现铁质货币。

铁钱，顾名思义就是用铁铸造的钱。

在金属货币时代，货币实际价值必须与面值相当，否则不但会引起物价暴涨，甚至有可能让经济退回到实物交换时代。

铁钱，就起到了最坏的作用。

“铁钱”根本就不是钱，“铁”也根本不值钱。刘伯升、公孙述在自己的领地上以铁钱向百姓换取各种战略物资，不接受铁钱的人将被处死。一般百姓拿到铁钱之后并不能用于交换，南阳和蜀地偌大地盘，能用铁钱的只有他们两个人。铸造铁钱，是典型的“有借无还”土匪行为，鬼才知道你什么时候被打跑，留下来的这些铁钱能不能继续使用。

刘伯升、公孙述都是有去无回的土匪，只拿钱、不办事。东汉的创立者刘秀不一样，他是那种“有去有回”的土匪，也没有铸造“铁钱”。

至于没有铸造铁钱的原因，很搞笑，不是不想铸钱，实在是没有足够的实力逼迫人们用铁钱。

刘秀的地盘实在是太小，只局限于洛阳一隅，如果强行推动铁钱，怕连这块地方都守不住。刘伯升推出铁钱之后，刘秀也想铸造铁质货币，手下谋臣邓禹曾劝谏刘秀：将军想图一时之利，还是图万世之利？铸造铁钱只能图一时之利，您不能以“一时之利”坏了“万世之利”。

不能铸造铁钱、又造不起铜钱，刘秀只能放任民间货币私铸。

尽管私铸货币重量可能少些，与土匪的铁钱相比，还是私铸更靠谱些。因为，民间交易向来不承认铁钱，要想让钱花出去，起码得是铜币。在刘秀管辖的地方，谁有足够的财富，谁就可以私铸货币，绝对无人追究。

相对优秀的货币制度之下，洛阳一带成为西汉末年商品和粮食集散地，刘秀也把

辖地逐步扩充到了河北、山东。这里要说，刘秀控制河北、山东，不是因为自己实力增强，而是因为这两个地方受灾最重、流民最多，谁也不想沾手。

洪水不辨穷富，也不分不清黎民百姓和官家豪强，滔天巨浪让所有财富都化为乌有。当洪水退去，官家豪强已经消失的无影无踪，留下了大片无主土地，也留下了“重连”、“铁胫”、“大枪”、“上江”、“青犊”等五十多只赤眉军。

这些队伍的名字听起来还蛮威武，其实，他们只是无家可归的流民。或者说，真实的“赤眉军”根本不是军队，大多数情况下是全家扶老携幼一起出动，官军只需要几百人就能打跑上千、上万甚至是十几万“赤眉军”。王莽的军队之所以败给“赤眉军”，是因为“赤眉军”的流窜目标不是作战，而是吃饱肚子。

百姓就是赤眉、赤眉就是百姓，王莽既然不可能杀尽天下百姓，当然也就消灭不了“赤眉军”。

刘秀对付“赤眉军”的方法颇有空手套白狼的感觉，他向这些流民队伍宣布，自己将把山东、河北的无主土地分配给“赤眉军”战士，每家可以得到土地七十亩。与纯粹的流民相比，刘秀实力还是比较强大的，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抗衡其他土匪。有了土地，谁也不愿意四处流窜作案。结果，刘秀不但获得了一个稳固的根据地，也从流民中选拔强壮男丁充实了自己的军队。

随着实力不断提升，公元 25 年刘秀称帝，改元“建武”。

刘秀本人就是官家豪强，自然知道官府种种盘剥小农的伎俩。正是看到封建官僚体系对西汉帝国的危害，刘秀推出了史无前例的封建官僚制度——既然封建官僚危及宗庙，干脆不要官僚好了。

西汉地位最高的官僚是“三公”：司徒、司马和御史大夫，刘秀虽然也设置了“三公”、给“三公”年俸万石的待遇，但是，东汉“三公”没有任何实权，所有事权都交给皇宫内朝的“尚书台”。如果硬套级别，“尚书台”最高领导大概相当于正处级，年俸不过六百石。建武年间，“云台二十八将”^①之一的李挺担任司徒，由于没有事情做，李挺愤然请假一年。对此，刘秀非常高兴，马上准假，并赐给李挺黄金，让他在家安心养病。

这种“高位虚权”、“实权低位”的制度让所有官僚都非常难受，高位之官员没有实权、实权官员品秩又实在太低，大家捞钱的难度都大大提高。

东汉建武年间，刘秀裁撤了全国 90% 的官僚，全国三分之一的县根本没有县令。至于盐铁官营、平准准输、冶铁铸币，刘秀确实没有明确废黜，这些衙门却根本无人办公。

国家税收，称帝之前刘秀在自己地盘上执行“十而税一”，称帝之后则恢复了文景之治的“三十税一”。对刘秀来说，他没有多少官僚需要养活、士兵都回老家种地了，自己也厉行节俭，确实不需要多少钱。

弥留之际，刘秀留下了这样的遗诏：我活着对天下百姓毫无益处，所做的一切也不过是模仿汉文帝刘恒，我死之后一切务必从简，正部级以下官员不得守丧（按以往惯例，通常是全国守丧），不得将我的死讯传达至郡县。

《后汉书》用了一个精准的词汇描述了刘秀的政策——“息民”。

事实证明，一旦摆脱了封建官僚的束缚，这个民族的创新能力和创造力是惊人的。建武年间，东汉以极快的速度恢复了生产，创造了令人世人惊叹的“光武中兴”。

《后汉书》这样记述这个时代：天下再无征战，朝廷也恢复了对西域的管辖；人们再无徭役，乡间没有盗贼，村落里晚上也不用闭门；粮食连年丰收，家家殷富，牛马在田野里四处游荡，也不担心被人牵走。据《齐民要术》记载，东汉时代农作物种子与原粮产出比约为 60-80 比 1，远高于西欧中世纪的 4-5 比 1。

遗憾的是，尘封的故纸堆没有为“光武中兴”提供更多的证据，它的恢弘与伟大似乎只停留在人们的想象之中。

非常幸运，今天，我们有了现代考古学。

与文景之治相比，东汉初年的墓葬数量更丰富，墓葬的主人也从大官僚变为民间富豪甚至普通百姓。今天，古墓重见天日，为我们揭开了那段尘封两千年的历史。汉光武帝年间，人民生活逐步丰富起来。1973年，浙江海宁出土了一个东汉墓葬群，墓室中的壁画为我们描绘了墓主人车马出行、宴饮、炊厨和舞乐百戏的盛况。汉光武帝年间，畜牧业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1955年，湖南长沙3号东汉古墓出土了一个养鸡坊模型：这是一个狭长的鸡舍模型，鸡舍中又有几十只鸡的陶俑，有的鸡站在室内、有的鸡则把头伸出窗外。这是养殖理论中典型的“圈养”，家禽很少能自由行动，所以育肥速度更快。

楼主：天圆地方的困惑 时间：2021-10-16 00:57:12

汉光武帝年间，会稽、江陵等长江沿岸城市成为举世闻名的造船中心。建武九年，刘秀讨伐蜀地公孙述，《后汉书》记载，刘秀就派出了数千艘几层楼高的战舰，可见东汉初年造船业之发达。长沙203号东汉墓的陪葬品中有一个长达150米的木船模型，船舵装有宽大的舵叶，船舵也可以自动提起进入船身，模型本身就是一艘庞大的舰船。

汉光武帝年间，陶瓷业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发展。当代，江苏、湖南、江西、湖北、广西、贵州都曾大量的东汉瓷器出土，这些瓷器胎质白嫩、细腻致密，质量远高于元、明两代。现代科技已经证明，只有在1300度以上的高温中才能烧制到这种瓷器，至于当时东汉陶瓷业究竟使用什么技术才达到如此高温，现在已经不得而知。

令人无比困惑的是，东汉如此发达的商品生产，却极少有官方铸币记录；刘秀一生仅在建武四年铸过一次五铢钱；此后，东汉12帝前后195年，只记载了两代帝王五次铸币，其中，四次是汉灵帝、另一次是董卓铸小钱。

官方铸币如此稀少，东汉又绝无铜钱匮乏之虞。

——光武帝建武二十二年（公元46年），南阳郡发生地震，在这场惨烈的自然灾害中很多家庭断门绝烟。地震之后，东汉朝廷出面为无人送葬的罹难者办理了丧事，并为每个普通人提供了三千枚铜钱作为殉葬品。

——1976年，浙江绍兴南钱清公社在一个东汉墓葬中出土了33万枚铜钱，总重为一吨。如此数量货币作为随葬品，在任何一代盛世都即位罕见，南钱清汉墓远非唯一以巨量货币作为随葬品的东汉墓葬。

一般来说，随葬品是人们日常生活用品，希望死者能在另一个世界继续使用这些物品。既然货币成为日常随葬品，那么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就一定经常使用货币。

官方没有铸造货币，这些铜钱又是哪里来的呢？

答：民间私铸，据彭信威先生考证，东汉一朝民间私铸货币总量应在300亿枚左右。

出土的东汉货币证明了我们的观点。东汉初年的铜钱，制形虽然仍是“五铢钱”，重量也在4克左右。但是，制造技术却比“赤仄五铢”和“上林三官五铢”差了很多，铜材也不再是紫铜。明显不是官家铸造。

汉光武帝、汉明帝、汉章帝三代，前后68年，物价稳定，每石粮食的价格只有二十钱，已经低于西汉文景之治的水平。然而，货币最好的投向却不再是土地，这是一个崭新的时代，人们有了更为赚钱的陶瓷、造船、畜牧……

此时，铸币权已经重回民间。我们有了创新产业、有了遨游长江的舰船、有了自

由铸造的货币，只要我们再向前走一步，可能会率先走近海洋、走向世界。然而，历史的合理性有时候让人感到无比困惑……

楼主：天圆地方的困惑 时间：2021-10-16 00:57:12

钱断桃花源

西汉末年，天下大乱。人们以血亲为联系建立城堡，以宗族的力量对抗流民、官僚甚至皇权。人们生活在城堡之中，耕地围绕着城堡，一旦有事可以迅速回城堡组织防御。这种城堡叫做“坞堡”，是东汉最基础的社会单元细胞。

某种意义上，正是有了宗族对人民的管理，东汉政府才不需要这么多官僚。当代中国乡村就起源于这个时代，现在绝大多数汉族村落仍旧以姓氏命名，比如，“陈庄”、“杨庄”，原型就是东汉时期的“坞堡”。

《后汉书》记载，西汉末年有一个叫做田畴的书生，他在同姓之人中有着很高的威望。看到中原遍地“白骨露于野，千里无人烟”，田畴带领族人在徐武山找到一块盆地，披荆斩棘、凿井筑屋，自此，田姓人家在这块盆地中过起了与世无争的农耕生活。

看到这里，大家可能想到东晋陶渊明一篇著名的散文，也是千百年来中国人的理想——《桃花源记》。“坞堡”就是《桃花源记》的原型，只不过“桃花源”远非与世无争的人间仙境……

“坞堡经济”是一种典型的私有经济，竞争和剥削的残酷性丝毫不亚于西方世界原始自由竞争时代。

为了理解这个时代，我们首先介绍当代经济学一条公理性假设：资源稀缺。然后，强调一下，这个不是假设，是血淋淋的事实。所谓资源稀缺，直白的解释是：生存在这个世界上，钱不好赚。

东汉时代赚钱就更不容易，当时人类开发资源的手段极为有限，为了生存下去，每个人、每个家庭、每个宗族乃至每个民族都要付出极大的辛苦。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江湖就有纷争。与小农家庭相比，“坞堡”无论生产、分工还是对抗官府的能力都比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高很多。

正因为能力强，竞争也更为残酷。

光武、明、章三朝，在残酷的竞争中，一些坞堡衰败了，也有一些坞堡更加强盛。东汉帝国社会财富总量远远高出西汉时期，坞堡的经济实力也远远超过了西汉的“官家豪强”。西汉中期超过万顷土地的大豪强已经非常罕见，东汉中期坞堡却往往占据一两个郡，其财富总额足以令人咋舌。

《居延汉简》这样记载当时的大坞堡主：他们的房屋连接成片，肥沃的田地遍及郡县，仓库已经装不下他们的奇珍异宝，山谷已经装不下他们的牛羊……

既然是竞争，就一定会有失败者。换句话说，竞争一定会产生贫富差异。一旦胜负已分，接下来的竞争中将贫者愈贫、富者愈富，最后产生极度贫富分化。

汉章帝以后，坞堡之间的竞争已经经历了一百多年，桃源不再是同姓聚居，而是多出了许多新人——“部曲”。这些人可能是外姓流民，也可能是竞争中离散的其他坞堡居民。“部曲”的生活如此悲惨，以至于后世经济史家认为东汉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奴隶制。

《东观汉记》记述了一个叫“倪萌”的部曲，倪萌的哥哥在一次灾害中死去，倪萌收养了哥哥的儿子；岁末的时候，为供养兄长的遗孤，倪萌自己的儿子反而被饿死了。

本来，政府（强盗）的重要作用之一是合法地“杀富济贫”，通过剥夺富人调节

社会财富分配。东汉朝廷却是这样一个政府——京兆、太尉这样的高级官僚同样要“食麦蔬”。所谓“食麦蔬”，说白了就是粮食和野菜掺和着吃——不是为了健康，不是因为饭局太怕患高血脂，而是因为真的吃不饱饭。

连自己都吃不饱的封建官僚，如何能有能力管理强大的坞堡？

不能管理自己版图上的坞堡，又如何能对抗异族入侵？

如果封建官僚势力过弱，就无法抑制自由竞争产生的贫富分化，更无法有效集中资源。如果帝国无法建立有效的统治，一旦面临强大的异族挑战，国家同样会生灵涂炭，甚至被灭族。

东汉中期，在并不遥远西部，异族对中原财富早就觊觎已久……

汉代，青海地区生活着另一个古老的民族——“西羌”。与匈奴一样，西羌也是一个游牧民族，自己只能饲养牛羊、马匹，粮食、布匹都要靠汉朝供应。对西羌人来说，能换到粮食、布匹当然更好，如果换不到，纵马抢劫更省事。

西汉年间，汉武帝曾经收服诸羌，并在羌地设置了郡县；汉宣帝、汉元帝先后对西羌发动过三次大的战争，诸羌从此一蹶不振。西汉末年，天下大乱，帝国无暇西顾，西羌由此获得了广阔的生存空间。

东汉中期，西羌人口数量已经与匈奴鼎盛时期相近。

东汉举国上下对此却毫无警觉，醉心于发财的坞堡主当然不会关心军事；西汉时期的军马饲养基地也变成了“科研机构”，流传后世的《相马术》就是代表成果；甚至皇帝直接统辖的禁军（常备军）却不足万人，更可笑的是，帝国末年禁军居然有很大一部分由宦官组成。

弱势的政府、弱势的军力、强大的经济，最容易引来外敌窥视。

汉安帝永初年间，西羌多次侵扰冀县、平襄（今甘肃甘谷、通渭），经常一次就屠杀上上万名汉人；多名高官先后罹难，汉中太守郑勤阵亡、凉州刺史皮扬阵亡、征西将军司马钧兵败自杀；最后，西羌甚至一度围攻故都长安。

战乱之中，人们追求财富的梦想被打破了。甘肃、陕西地区的汉人开始大规模内迁，人们放弃了自己的家园，再一次走上了流浪的道路。

流民，再一次出现在帝国的版图之上……

为一劳永逸解决西羌，汉安帝刘祜举全国之力对西羌发动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与汉武帝直接派兵征伐匈奴不同，汉安帝无论征发士兵，还是屯兵边境，都要依靠富可敌国的坞堡。

在汉安帝号召下，吃尽了西羌苦头的坞堡也只能心甘情愿有人出人、有钱出钱。只不过，坞堡军队没有统一的领导，在战争中当然不会分工合作，更多情况是，一支坞堡军队遇到敌人，友军龟缩不出，坐看友军失败。加之东汉坞堡派出的士兵原来都是抗锄头的农夫，临时拼凑起来组成军队，单兵作战能力确实远低于西羌，十个汉军步兵也未必能打赢一个西羌骑兵，东汉军队逐渐被各个击破。

这场战争持续了 14 年，东汉帝国全体臣民一共花掉了 240 亿枚铜钱，差不多相当于西汉帝国二百年间铸造的货币总和。很遗憾，旷日持久的战争并未能击溃西羌，也没有保护内地黎民百姓，反而从坞堡中培养了一批强大的军阀：张焕、皇甫规、段颎等等，还包括后来祸乱汉家天下的董卓。

汉羌战争消耗的社会财富越多，东汉帝国解决危机的可能性就越小。汉安帝死后，东汉帝国再没有能力主动对西羌发起攻击，在汉羌战争中几乎完全处于守势，西羌之祸愈演愈烈。之后，汉桓帝在位 21 年，西羌却 45 次入侵，朝廷甚至未能组织一次有效反击。战火蔓延到朔方、云中、雁门、代郡、涿郡、渔阳、辽东内地诸郡，西羌士兵一度进攻都城洛阳。

连年征战使得东汉人民无心稼穡，帝国政府既然解决不了西羌入侵，其他社会问题也就随之更为激化。

恒帝永兴元年（153 年），全国近三分之一的郡县遭受蝗灾，帝国版图内再次出现了数以百万的流民。这些人光着身子、吃着草根（裸行草食），在饥饿和病痛折磨下流浪于帝国阡陌之间……

楼主：天圆地方的困惑 时间：2021-10-16 00:57:12

诸位，前段时间实在是太忙，中间断更了，还希望大家谅解。即日起，恢复更新，多谢支持！

楼主：天圆地方的困惑 时间：2021-10-16 00:57:12

铜臭的由来

江山风雨飘摇之际，一位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昏君”登上了舞台——汉灵帝刘宏。汉灵帝之所以臭名昭著，据说是因为卖官。后世史家认为，他在帝国统治行将崩溃之际仍旧卖官敛财，最终导致东汉帝国灭亡。今天的电视剧中也经常有这样的镜头，每当皇帝醉心享乐的时候，总有忠臣站出来大骂皇帝（一般会义正言辞、声色俱厉甚至声泪俱下）：你难道想学汉灵帝刘宏吗？

其实，卖官不是汉灵帝首创，更不是后无来者，卖官者也不乏所谓“明君”，前有秦国的秦穆公、西汉的汉武帝，之后有唐朝的唐玄宗、宋朝的宋神宗，卖官的皇帝多到不可胜数。只不过，公卿大僚之位居然被拿到市场上叫卖，终究不是什么光彩事。皇帝卖官就像鬼子进村，悄悄买、悄悄卖，声张的不要。

中国两千年封建王朝，公开颁行诏书卖官的皇帝只有汉灵帝一人而已。非但如此，汉灵帝卖官还大鸣大放，生怕别人不知道，他为官职规定了种种价格折扣，上至公卿、下至县令，几乎无一不卖。

如此明目张胆卖官，不仅仅是皇帝丢脸，连官僚的脸也被丢光了。所以，无论史学家还是平民百姓，都认为汉灵帝是一个昏君。汉灵帝，这个名字几乎成了灰太狼和懒羊羊的合体。

真的是这样吗？

东汉朝廷本就是最穷的封建王朝，除去西羌入侵，汉灵帝当政 29 年，全国居然发生了 31 次大地震。

刘宏，真是穷到了极点。

按照一般思维，为挽救风雨飘摇的帝国，统治者一定会铸大钱敛财。

汉灵帝的情况，属于二般。

汉灵帝确实选择了铸币敛财，只不过，他没有选择铸大钱，反而铸造了足值的“五铢钱”。中平初年，刘宏重铸五铢钱，灵帝五铢背面有四道斜纹，所以灵帝五铢也被称为“四出五铢”。从出土文物来看，四出五铢重 3.5 克，仅比赤仄五铢低 0.5 克。灵帝一朝，先后三次铸币，都是这种“四出五铢”，始终没有发行虚值货币。

灵帝初年，帝国已经发生严重的通货膨胀。每石粮食价格为万钱，一匹马的价格约为 200 万钱，这个数字已经和西汉末年战乱时代不相上下。“四出五铢”并非虚值货币，在超级通胀中，这点钱对巩固东汉统治根本就是杯水车薪。

“四出五铢”刚刚面世，坊间就开始流传，铜钱背后的四道斜纹代表四方邪气冲天，四方必将大乱……

第一次读这段历史，我非常奇怪，汉灵帝这么做究竟是出于什么考虑？后来，我明白了，汉灵帝敛财的方法就是卖官。

光和元年（公元 178）年，汉灵帝颁布诏书，公开买卖官职，上至公卿、下至县

令，所有官职无不需以钱换官。现任官僚也需要补缴费用，官声卓著者也可以打五折、三折。比如，刘宏就曾打五折，以 500 万钱把司徒的位置卖给了“晋州望族”（晋州坞堡主）崔烈。

在崔烈的受封典礼上，刘宏突然有点后悔，说“司徒五百万钱卖给你实在是便宜你了，这应该是一千万钱的价格（悔不千万）”。

事后，崔烈问儿子（崔钧），自己现在位列“三公”，可曾听到外界对此有何议论。儿子答：父亲曾经历任卿、太守之职，无论从资历还是官声，您都应该得到三公之位。今天，您却通过买官获得司徒的位置，实在让天下人失望。因为，您这个司徒的位置，铜臭味道实在是太重……

这句“悔不千万”为刘宏留下了千古骂名，也给封建官爵留下了一个响亮的名字——铜臭。

或许汉灵帝认为，帝国已经出现了“三空”（“田野空”、“府库空”、“朝廷空”），既然封建官吏没有实权，卖掉又有何妨？卖官不用盘剥百姓，又能增加国库收入，这才是敛财的最佳手段。

何乐而不为？

让汉灵帝没有想到的是，虚值货币，皇帝不发，我替你发！

买官者本就是坞堡中的军阀，现在，终于获得了合法的官职。他们到任之后，第一件事往往就是私铸货币——“铅券”。

“铅券”顾名思义，就是铅质的货币。遗憾的是，我没有找到“铅券”的出生地，史籍对此语焉不详，可能是有一个地方官铸造“铅券”，之后大家纷纷模仿。在这里，我只能为大家总结一下铅券的特点：但凡流传下来的铅券，货币单位不是可以抵多少铜钱，而是可以在某地兑换多少土地，也可以按照土地价值交换其他财富。

乱世之中，大概大家都觉得铜钱也不靠谱了。

铅只是一种比铁还重的金属，虽然单位价值高于铁，却比黄金便宜很多。土地可是农耕时代最大的财富，以铅券换土地，这何止是抢劫！

可以说，“铅券”是中国历史上最恶劣的虚值货币。

经历了羌人之乱，所谓“官员”面对的根本不是黎民百姓，而是跟他一样强势的军事坞堡。大家都是军阀，凭什么让我挨你的刀子？既然你只是名义上的官府、实际上的强盗，那么，也只有比一比谁的刀把子硬了。

结果：坞堡 VS 坞堡，也就是传说中的军阀混战。

本就已经羸弱不堪的底层黎民再也不能承受军阀混战的压力，在灾害、异族战争的多重压力下，史籍再次出现了“人相食”的记录：河内人妇食夫、河南人夫食妇，流民再次成为一股无法遏抑的洪流……

当连“活下去”都成为奢望，一个道教的分支便开始在民间广为流传，在这些信徒奉为神灵之语的《太平经》中，人们开始发泄对帝国无能的愤恨：皇帝不是隐士，天下间的事情、天下间的道理，作为皇帝却一无所知，这才是皇帝最大的错误（君乃隐深处，天地所欲言，人君不得知，大咎在此）。

这支道教分支的首领叫做“张角”，他自封“大贤良师”。毫无生的希望，人们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给了虚无，不再相信自己的理性——理性并不能延续人们的性命。这些信徒认为，所有人都应该臣服于这位“大贤良师”，之所以有人没有得救，是因为对“大贤良师”还不够忠诚。

灵帝光和七年（184 年），这些无比忠诚的道教徒在青、徐、幽、冀、荆、杨、充、

豫八州同时起义。无以为生的流民在头上围起了黄巾，高喊着“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中原大地再一次陷入混战之中……

楼主：天圆地方的困惑 时间：2021-10-16 00:57:12

在官家豪强眼中，自己根本不是帝国体制的支撑者，当官只是借助帝国权力掠夺财富罢了。现在，王莽的朝廷诏令却是剥夺他们自己的财富，这样的命令当然要互相推诿，新朝行政立刻陷入瘫痪。

按汉朝典制，每逢新皇登基、改年号这样的大事都要释放犯人，新莽朝的官吏却根本不告诉囚犯大赦消息，无罪之人也经常在监狱里一关就是几年。因为人命关天，这些权力都可以替代货币向黎民百姓讹诈土地……

看到改革政策难以实行，始建国二年（公元 10 年），王莽推出了第三次货币改革——“宝货制”，试图彻底摧毁官家豪强的经济基础。

“宝货制”是世界货币史上绝无仅有的货币制度，包含一种金币、两种银币、四种龟壳、五种贝壳、六种铜钱、十种布币，总计二十八种货币。在兑换比例上，一枚龟壳最高可以兑换两千一百六十枚铜钱、一枚贝壳最多可以兑换二百一十六枚铜钱。王莽的本意，可能是托古代西周货币制度，以龟壳、贝壳这些不值钱的东西再次打击官家豪强。

货币的职能是价值尺度、财富贮藏、支付手段，等等。不用说二十八种货币同时流通，单百姓手中日常使用的布币就有十种之多，其中，幺布和小布重量比例实际为 16:15，名义价值却是 2:1。

这样的货币制度，不用说抢夺别人财富，在实际中根本就不可能得到执行。

所有人都想赚钱，而以“龟壳、贝壳”换钱实在是一本万利的生意，严峻的也刑罚没有挡住人们对财富的追求，新莽朝出现了严重的“伪造货币”问题——如果龟壳、贝壳能称为货币的话。

更糟糕的是，始建国三年（公元 11 年），也就是王莽第三次币改的第三年，汹涌的黄河在魏郡溃决，泛滥清河郡以东数郡；同年，黄河沿岸各郡发生了严重的蝗灾。在物资本就极度匮乏的新朝，再次爆发了巨额通货膨胀，以黑市五铢钱计算，关中平原的谷物价格已经上涨到万钱一石，是汉宣帝年间的 100 倍。

《汉书》这样描述当时的年景：富贵之家还可以坐卖田宅应对灾荒，黎民百姓只能坐在街道上哭泣，百姓被饥饿和贫穷折磨，饿死者十之七八，再次出现了“人相食”的惨剧……

任何时代，货币制度都是统治者权威的象征，币值稳定则统治稳定，反之则社会动荡不安。“宝货制”巨大的缺陷给天下黎民造成了巨大损失，“王田制”又不能让百姓真正得到土地，人们在一点一滴中渐渐丧失了对新朝的信心，没有人知道，这位儒生皇帝要把帝国带向何方。

抢占官家豪强财富，王莽彻底得罪了官僚；“王田制”未能让天下苍生真正得到土地，王莽更是得罪了天下黎民百姓。从此，改革再无朋友、只剩下敌人，民间开始流传“黄牛白腹、五铢当复”的民谣……

——“宝货制”实行一年后，面对天下“瞽然”，王莽终于承认了自己的失败：宣布允许买卖“王田”，再次承认了土地私有；

——天凤元年（公元 14 年），废除“宝货制”，罢金、银、龟、贝四种货币，朝廷只发行货布和货泉，货布重 25 铢、货泉重 5 铢，等于恢复了原来汉朝五铢钱。如果到此为止，新莽朝或许还能像后来的东汉一样苟延残喘。可是，王莽真的是很不幸……

从始建国三年（公元 11 年）黄河闹水灾开始，一直到王莽灭亡，黄河就再也没有消停，有文字记载的大水灾就有 13 次之多。最后，黄河改变了河道，入海口由天津改为山东半岛。于是，我们才看到了今天的黄河。

这是中国有文字记载以来最凶猛的水灾，大家可以想象，黄河平地搬家是一种什么样的灾难。洪水遍及河南、山西、山东、河北、天津等省份，其中，山东夹在新旧两条河道中间，受灾最为严重。在水利工程匮乏、道路并不通畅的汉代，无论官家豪强还是平民百姓基本都断绝了生路。

一次偶然事件点燃仇恨之火。

王莽废除“宝货制”当年，琅琊海曲县令（今山东日照）诛杀了一个因小罪获刑的吕氏豪强。此后，吕氏家族纠集几千人杀掉了县令，又集合源源不断的流民，农民起义爆发了。后来，这些流民在自己前额抹上红色，以区别同样穿着破烂的官军，他们就是“赤眉军”。

疲敝的新莽帝国已根本无力应对如此大规模的战争，何况“赤眉军”与王莽军在昆阳决战的时候，王莽的精锐部队正在北部与南匈奴苦战……

与大家想的不一样，最后攻破未央宫的并不是“赤眉军”，而是一批长安城内的地痞流氓。“城中少年”（《汉书》给无业游民的雅称）朱弟、张鱼等人在狂欢式的抢劫中引发了长安城骚乱，人群冲向了未央宫。

最后的时刻，王莽身着朝服在未央宫平静地等待死亡，他的身边还有同样盛装的一千多名公卿大臣。请注意，陪王莽一起等死的不是普通士兵，而是朝臣。如此多的朝臣心甘情愿为一位末代王朝的皇帝殉葬，过去从来没有、将来也再未发生。最后，骚乱者以斧头劈开了未央宫宫门，王莽被愤怒的人群乱刃分尸。王莽死后，这片土地陷入史无前例的混战之中……

东汉年间，在班固所著的《汉书·王莽传》中，王莽被贬成一个篡位者、野心家、暴君。然而，英国《剑桥中国通史》却给王莽以最高荣誉，认为他是中国古代最杰出的帝王；民国时期，胡适更是将王莽评价为“中国古代空想社会主义者”。我们不想在这里争论王莽身后的是是非非，只是以马克思的话为王莽做出结论：“君主们在任何时候都不得不服从经济条件，并且从来不能向经济条件发号施令”。

楼主：天圆地方的困惑 时间：2021-10-16 00:57:12

（此段内容重复）

西汉小结：财富的始与终

现在，让我们来回顾西汉帝国由弱变强、再由盛转衰的循环，一条清晰的财富生产、转移轨迹呈现在我们面前。

首先，我们想跟大家提到一个成语叫“萧规曹随”，其中的“萧”指萧何，“曹”则指他之后的另一位宰相叫曹参。曹参是自沛县起兵就追随刘邦，刘邦建立汉朝后，曹参在功臣中排名第二。

萧何死后曹参成为西汉帝国的第二号人物，谁也没有想到，这位新任宰相只干两件事：喝酒、吃肉。据说此人从拜相开始就没再清醒过，至于政务，他只用刻板的笨人，一切按前朝规矩办；如果有人想推陈出新，则一律都被曹参拉住——不醉不归。

官场之上历来都是上行下效，既然宰相天天买醉，六部官僚也几乎都成了伯伦不归。有一次，几个古板的士大夫带曹参去一个花园，因为一千人在上班时间在

里饮酒买醉。估计他们的意思是想让宰相看看这帮家伙如何不务正业。结果，曹参见到酒席狂喜，然后就跟着大家一起喝，硬是把拉他来的几个士大夫也给灌醉了。

长此以往，终于搞的吕后朝会也见不到人了。

在吕后示意下，当时的汉惠帝差遣曹参的儿子（宫中侍卫）质问这位当朝宰相：先帝刚刚驾崩，您现在是宰相，奈何日日欢歌，不以天下为忧，咱这日子还过不过了，您到底想干什么（高帝新弃群臣，帝富於春秋，君为相，日饮，无所请事，何以忧天下乎）？

谁也没有想到的是，儿子没有等来回答，却等来了二百棍子，附带被骂了一句：这种事情焉能是你一个侍卫能过问的，滚回去当你的侍卫！

曹参这个二杆子等于把吕后、皇帝的面子都驳了。于是，吕后就拆迁皇帝当面喝问曹参：你明知是我派他去询问此事，为何还要把他打成这样？

这一次，曹参终于从半梦半醒之间回到了现实，他脱掉自己的帽子、跪在地上，却提出了一个跟这件事毫无关系的问题：您觉得您比高祖英明吗？

汉惠帝答：我们怎么能比的上高祖的雄才伟略？

曹参又问：那陛下觉得我喝萧何谁更英明？

汉惠帝非常生气：你当然无法和萧何先生比拟。

曹参答：既然如此，有了先朝的规矩，我们为何还要费心费力？官出一寸之政、民失一尺之财，唯有让当官的清静，黎庶才能安宁（载其清静，民以宁一）

汉惠帝答：善。

在西汉帝国建立后的数十年里，帝国的统治者始终信奉清静无为，最终消灭了一心攫夺权力的异姓王——并无半分侥幸。此后，在与同姓王的竞争中，双方都信奉黄老之术，西汉帝国终于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农耕经济创造了巨大财富；放开经济管制，一批冶炼、商业、运输、畜牧、渔业等新兴行业崛起，帝国经济前景充满活力。

此时的汉帝国既有产业创新，更有制度创新，无论国家还是普通民众，焉能不富？

正是凭借从商税中获得的实力，汉景帝攫夺了同姓王权力，彻底消灭了对皇权的竞争。

接下来便是中国古代最生猛的皇帝汉武帝，他迅速花光了四代君王的积蓄，便想通过铸币聚敛天下财富，超级通胀使得敛财手段失效，于是把手直接伸向了所有产业。管理天下产业需要一批人，一旦“官商”成为一种势力，帝国政府就会凭借级数式扩张的实力不断蚕食社会财富、挤压小农的生存空间。

然后，失去了正常发财手段的帝国精英成为“豪强”，也挤压掉出小农身上残存的最后一口气息。

无论汉武帝多么贪心，也无论他多么有权势，在某一个时点上社会财富的总量必然是有限的。必须留出让全社会人继续生存财富，也就是马克思所谓的“必要劳动时间”：社会最底层必需能维持自身和家庭的生存。

然而，参与掠夺的绝非汉武帝一个人，封建“官商”不但不靠生产就能获得财富，而且还占有了帝国绝大部分财富，此后的所有赚钱的途径都必须依附于这个强势集团。强势分利集团完全不遵守财富规则，显然，最终掠夺超出了帝国居民承受的极限，人们失去了土地、失去了工作、没有能力组建家庭，最终成为流民。整个循环的逻辑是：帝国抢占富人产业→→富人把小农从土地上挤走→→封建“官商”又从土地上挤出了富人→→富人中的强者成为黑势力→→小农成为流

民……

最终结果：国弱、民贫，唯独官富。

皇权一旦使所有社会资源都匍匐在自己脚下，封建官僚就会在瞬间吸干帝国的经济血液，无论皇帝、黑势力还是黎民百姓都没有力量遏制这头怪兽。武、昭、宣三朝，皇权同样以各种残酷的手段镇压官僚集团，但是，皇权始终只能依靠一批官僚去镇压另一批官僚。汉宣帝错误的执行了通货紧缩政策，为官家豪强兼并土地提供了一把货币铸造的利刃。最终，皇权丧失了与官家豪强的博弈能力，元、成、哀、平四朝，封建官僚像病毒一样吞噬了帝国整个机体。

正是看到问题症结所在，王莽才终其一生锐意改革，晚年更是“常御灯火至明”。他试图以货币改革掠夺豪强财富，以皇权作为强大的后盾再次将帝国扳回“耕者有其田”的轨道。只是，王莽不能、也不可能平衡官僚利益与“天下大同”理想之间的矛盾，他所有的努力都无法挽狂澜之即倒、扶大厦于将倾。

西汉帝国缔造了一个“皇权-封建官僚-小农”的社会体系，这个社会体系成功地取代了西周以来的“王室-封臣”体系。与“王室-封臣”体系一样，这个统治框架也存在自身难以克服的矛盾：皇权只有借助封建官僚才能统治整个帝国，但是，封建官僚自身就是一个强势分利集团，他们会借助手中的权力疯狂掠夺帝国财富。皇权根本就无法彻底遏制这种掠夺，毕竟联系皇权和封建官僚的纽带恰恰就是掠夺财富的权力。最终，封建官僚对财富的掠夺将成为帝国难以治愈的沉疴。

西汉帝国完整演绎了上述流程，流程的开始是“均田制”、流程的结束是普通人变成“流民”。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西汉历代帝王甚至使用了迁涉、杀戮等极端的方式打击封建官僚，然而，所有的措施最终又都为封建官僚所利用，成为他们抢劫财富的利器。这是一个缠绕中华民族数千年的封印，无论多么伟大的封建王朝都将在这个封印之下灰飞烟灭！

楼主：天圆地方的困惑 时间：2021-10-16 00:57:12

靠，刚检查了一下，居然把西汉的又重新贴出来了……，实在抱歉。

正确的顺序应该是汉灵帝后接董卓……

楼主：天圆地方的困惑 时间：2021-10-16 00:57:12

无字的小钱

有时候，历史充满了诡异。

西汉帝国如此强势，却无法遏制汹涌的流民——官军终究不会为剿灭流民尽到最后一份力量；东汉帝国朝廷中枢没有直接控制军队，却以极高的效率消灭了农民起义——坞堡对防范流民不遗余力，流民经常无处可以流窜。在不足半年的时间里，各路军阀把黄巾军消灭的干干净净，董卓，就是镇压黄巾军的军阀之一。

一个人做一件坏事并不难，难的是做一辈子坏事。做坏事被人骂并不难，难的是被人一骂就是两千年。西汉的王莽、唐朝的李林甫、宋朝的秦桧……，中华上下五千年出了很多坏人，绝大多数顶级的“坏人”都毁誉参半，不会一边倒骂声一片。唯独这位董卓，这么多年、这么多史书，无论正史野史，我从来就没见任何人说过他一句好话。

据《三国志》（跟《三国演义》的不一样）记载，董卓年轻时勇武有力，经常身带双鞭，在马上可以左右开弓。西羌霍乱中原的时候，董卓凭着一身好武艺找到

了一份工作——郡守派他率领乡民抗击西羌，大概相当于今天的民兵连长。董卓非常热爱这份工作，为抗击西羌付出了巨大努力。他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同羌人头领喝酒，面酣耳热之际也常常纵声放歌，据说这样可以联络感情。当然，喝酒唱歌之际董卓顺带挑拨离间，挑动羌人内斗。

挑拨离间工作取得了卓越的成绩，董卓居然成为西羌几个部族的首领，时而抢劫汉家、时而打击羌人其他部族。

靠着这些家底，董卓参与了镇压黄巾军的战争，势力逐渐强大起来。

这里要说，汉灵帝是一位眼光敏锐的帝王，他意识到董卓的存在对帝国是一个巨大的威胁。公元189年，汉灵帝在弥留之际发出最后一道诏书，在没有收钱的情况下免费任命董卓为并州刺史，希望以此稳住董卓，让他不要来京城惹是生非。汉灵帝死后，东汉帝国失去了最后一位有能力统辖全局的帝王，朝廷由此变得一团糟。在宦官、外戚、朝臣无数次斗争中，董卓找到了一个机会率兵进入洛阳，成为主宰东汉王朝的人。

说起来很可笑，董卓进京，带来多少人马呢？

答：三千人。

没错，是三千名士兵，这已经是董卓的全部家当。三千军队就让朝廷束手就擒，董卓当朝后甚至鸩杀了新皇刘辩、再立刘协为汉献帝。堂堂帝国中枢，不能抵抗3000士兵，朝廷弱势到何种地步，大家可想而知。

接着，董卓自封太尉，领前将军，兼节传、斧钺、虎旌……。了不起、真了不起，如此多的官职，听起真是来位高权重。

官职的权力并非来自于一纸任命状，而是来自于官职背后的掠夺实力。朝廷中枢有权任命官员，基础是国家是最大、最强的土匪，如果无法震慑其他土匪，国家也就无法创造、管理甚至抢劫财富。

大家甘心奉汉室为皇帝，是因为汉室是几百年来来的正统皇室，竖起来，这起码是一面旗帜。

听你董卓号令？

说笑话呢？

董卓这些官职，其实只能自己骗自己，颇类似于小孩的游戏“过家家”。连正宗皇帝汉灵帝都得靠卖官捞钱，何况董卓你这个冒牌货？就算董卓把所有的官职都放在自己头上，仍然不能拿到一枚铜钱！董卓终于明白，这个所谓“朝廷”，对他来说根本不是一笔财富，而是一个沉重的负担。

最为尖锐和现实的问题是：在洛阳这块人生地不熟的地盘上，如何养活自己的军队？

军阀混战的年代，军队之所以听从指挥，从来就不是什么“士兵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没有钱，听你的话就是十三点！

董卓的军队也很愤怒，这些人十有八九本是西羌盗匪，出来当兵，就图钱财。以前凉州是穷乡僻壤，也经常有酒喝、有肉吃；现在到了洛阳这样的大城市，却混得连酒肉都没有了。

弄不到钱，谁肯为董卓卖命？

楼主：天圆地方的困惑 时间：2021-10-16 00:57:12

国家虽然有土匪的性质，但国家讲文明、讲礼貌。此前，汉武帝的“算缗令”、王莽的“宝货制”、汉灵帝的“卖官”都是抢劫，可谁也不会直接拔刀出鞘。抢钱之前会先作个揖，宣传一下“纳税光荣”。如果土匪变成国家，一般会轻徭薄役，不断巩固自己的根基，力求统治万古长青。

土匪虽然也有国家的性质，但土匪不讲文明礼貌，最大的规矩就是“你的就是我的，我的还是我的”。土匪抢钱之前也有宣传，一般是炫耀武力、杀人立威。国家一旦再变成土匪，就会比土匪更可怕。所谓“匪来如梳、官来如界、兵来如剃”，剃刀，用那玩意儿剃头会一毛不剩。

董卓本是土匪，董卓又挟持着汉献帝，就是国家变成土匪。

董卓根本不能指望郡县缴纳赋税，洛阳满城财富也只属于私商。既然无人肯上缴，董卓就发明了他自己的抢劫方式——“搜牢”：放纵士兵抢劫洛阳城，以此换来羌族士兵效忠。洛阳可是东汉帝国经营 200 年的国都，董卓却以朝廷之名行土匪之实，借机在洛阳给民间财富剃头！

据《后汉书》记载，董卓的士兵冲进洛阳人家，见钱抢钱、没钱抢粮、没粮杀人，然后烧毁房屋、劫掠妇女。董卓自己尽取皇宫财宝，每天晚上潜入宫中奸淫女性，上至公主、下至宫女，照单全收。凡有人提出异议，往往都会被虐杀，朝廷百官也不能幸免。洛阳之外，抢劫更为惨烈，董卓的士兵曾经冲入一个叫做“阳城”的小镇，人们正行走于街道之上，快马而来的士兵逢人便杀，他们把财物、妇女装在车上，车辕上挂满了人头，然后高唱凯歌回到洛阳城。

这哪里还是国家，已经是人间地狱。

无论黎民百姓还是其他土匪，没有人希望搞到这个田地。汉献帝初平元年（190 年），董卓进京不足一年，后将军袁绍、冀州太守韩馥、兖州刺史刘岱、河内太守王匡，包括当时无权无势的曹操，大家共推袁绍为盟主，一定要先拿下这个祸国殃民的董卓！

董卓的应对之术，无论如何我也接受不了。

董卓自知不敌，他居然把洛阳附近公卿以上的坟墓尽数掘开，也包括东汉数代帝王陵寝，拿走殉葬珍宝。然后，一把火烧尽了洛阳的宫殿、王府、衙门、民宅、商店、街道……，自己率军逃向长安。

讨伐董卓的联军未到洛阳，洛阳方圆二百里之内已成为一片焦土。东汉二百年财富、二百年人才、二百年积蓄，毁于一旦！

当年六月，董卓占据了故都长安。毕竟这里距离凉州较近，董卓在这里的势力较强，于是，董卓推出了中国历史上一次史无前例（后有来者）的货币更迭，妄图借此尽掠长安财富。

长安是秦朝曾经的帝都，秦始皇曾收天下金铁铸 12 铜人，每个铜人重 24 万斤。此外，未央宫中还有数不尽的铜台、铜缸……。董卓毁掉 9 个铜人和无数铜器，以此为基础开始铸行“无字小钱”。

——晋代陈寿的《三国志》这样描写“无字小钱”：钱面没有文字，钱内方孔也没有明显的轮廓；

——唐代房玄龄的《晋书》这样描写“无字小钱”：这种钱没有轮廓，钱缘太小以至于无法刻字；

——从出土文物来看，无字小钱没有钱文，重量也不统一。我见过最重的无字小钱重 0.8 克，最轻的重 0.3 克，一般情况下重 0.3-0.5 克，约为西汉五铢钱的十分之一。

在这里，我想打一个形象的比喻：无字小钱如同大家玩过的“呼啦圈”。因为，无字小钱也属于方孔圆钱，只不过“钱缘”跟“方孔”的比例跟呼啦圈差不多。这那里还是货币，简直就是破烂，这样的破烂却要当一枚五铢钱用！

为确保无字小钱流通、为了让别人屈服，董卓表现出无与伦比的残忍。据说董卓经常在宴会杀人助兴，有一次在酒席中屠杀了数百人，先断舌头、再斩手足、凿

穿眼睛，最后扔进开水里烹 间吃饭的众人吓的浑身哆嗦，筷子掉在地上，唯独董卓谈笑自若，饮食如常。

如此货币制度，长安城立即爆发了超级通胀，《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同时提到，董卓推行无字小钱后，长安城内一斛粮食价格已经暴涨到百万钱。（东汉末年一斛约等于今天的三十市斤）

很多人说，一百万枚“无字小钱”少说也要有数千斤铜材，在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上跟一斛粮食根本不对等。所以，大家得出结论，一斛粮食价值百万钱的记录只是史书中一种夸张的写法。

以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衡量物价，那是在和平年代。

有了董卓这样的超级土匪，长安附近根本没有人安心生产，也没有人敢到这里贩卖粮食。我找到了当时长安城的一首民谣：你虽有千金，不如我一斗粮食，一斗粮食可延我性命，黄金万两又有何用？我还找到了同时代的幽州的粮价，不过仍旧是百钱一斛。

如果“三十斤粮食百万钱”的记录为真，那么，无字小钱就是中国古代最高通胀记录，此前此后，无论多么离谱的统治者均未突破这个极限。

单纯从货币价值来说，董卓的小钱好歹还是铜币，不比东汉初年刘伯升的铁钱、东汉中期军阀的铅券更恶劣。董卓之错，在于他明明是土匪，却偏偏以国家名义发行无字小钱。与其说无字小钱打破了人们对货币的信任，毋宁说自此封建帝国信誉完全崩溃，封建帝国已经完全成为强盗，再也没有一个土匪能取得黎民百姓信任。

此后三百多年，汉家天下成为一个弱肉强食的霍布斯丛林。这个残局，注定不会有人胜出，最强大的土匪都会葬身其中，只有彻底毁灭所有财富才能让一切重新回到起跑线上。

当掠夺超过被掠夺者的极限，掠夺者就会成为所有人的敌人，包括他最忠诚的同伴。何况在纷纷乱世之中，董卓还不能算是真正的强者，不过是他挟持了汉献帝才在史籍中显得如此刺目。很快董卓开始以无字小钱支付军款，他的军队调转了刀口，董卓最后被他的义子吕布所杀，吕布戏貂蝉的故事就是从这段历史上演绎出来的。

最无厘头的是，汉献帝居然在东汉王朝最大的敌人——黄巾军残部保护下逃回洛阳。黄巾残部被曹操收编，汉献帝也落入曹操手中，中国开始了一个叫做“三国”的时代。

楼主：天圆地方的困惑 时间：2021-10-16 00:57:12

东汉小结：盛衰小农一钱间

西汉末年，刘秀不过是众多举兵的豪强之一。由于力量太弱，刘秀不能像其他军阀一样铸造铁钱，只能尊重货币规律任由民间私铸。在优秀的货币制度下，刘秀最终成为军阀中的佼佼者。正是看到西汉帝国的灭亡的原因，刘秀才故意保持了一个弱势官僚集团，东汉帝国也始终依靠民间私铸货币。

摆脱了封建官僚的羁绊，人们对金钱的渴望再次迸发，社会生产力发达程度更甚于西汉鼎盛时期，社会财富也再次呈几何式增长。

“文景之治”的基础是“耕者有其田”，“耕者有其田”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小农经济”。“光武中兴”虽然缔造了第一代华夏创新产业——陶瓷业、造船业，但是，这些创新的社会组织基础是“坞堡”，“坞堡”依靠宗族纽带而存在，只不过是“小农经济”的2.0版。

西方经济学认为，小农家庭会精准地计算利润，在“边际投入”大于“边际产出”

的时候停止投入，进而实现利润最大化。

不是这样的。

农业生产也可能遵循利润最大化模式，可以用来描述现代化生产的农场，但不是中国的小农和坞堡。中国小农抵抗风险的能力极差，人们就像站在齐颈深的河水之中，一排细浪就可以将之淹没。

直白的说，在封建社会，能够生存下去就是绝大多数中国小农的理想。

所以，为了获取生存资源、为了能够抵抗未来的风险，小农会对土地无限制投入劳动，直到土地的边际产量为零！这样的社会组织结构基础缺少契约精神、人们也不可能去冒太多风险，当然无论产业创新、管理创新还是组织创新也就都变得步履维艰。

只要家庭是抵抗风险的最终社会单位，那么，绝大多数人对财富的渴望都会达到无所不用其极的地步，劳动就会丝毫不知疲倦，甚至以损害自身健康乃至生命为代价。所以，小农家庭衡量剥削残酷与否的标准根本不是被拿走多少，而是还剩多少。

东汉“坞堡”竞争的残酷性远胜于单一小农家庭，毫无节制的私有经济竞争同样产生了严重的社会问题：东汉中期，一小撮富比王侯的大坞堡主、大批无依无靠的“部曲”（奴隶）同时出现在帝国的版图之上。更加严重的是，面对强势坞堡，帝国朝廷政令不行、朝廷的统治能力已经被弱化甚至被完全忽略不计了。

恰恰在这个时候，西羌继匈奴之后成为汉帝国又一个心腹大患。

面对西羌的劫掠，弱势朝廷根本无法集中资源保护黎民百姓乃至整个帝国，一盘散沙的坞堡军队也无力抗衡倏忽而来的马上民族。

在对抗异族的战争中，东汉帝国一败涂地。

并非坞堡不努力，而是坞堡必须保证自己的“部曲”不被齐颈深的水淹没，所以，每次战争都不足以毕其功于一役。在西羌常年累月的劫掠中，东汉帝国消耗掉了240亿枚铜钱，损失一点不亚于汉武帝刘彻征伐匈奴。更恶劣的结果是，尽管未能消灭西羌，坞堡却借机掌控了军事力量，成为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批军阀。

从汉灵帝开始，朝廷中枢再次铸造“四出五铢”应对日益浩繁的军事开支和地震救灾。“四出五铢”属于足值货币，不可能在短期内获得巨量财富，无奈之下，汉灵帝开始卖官搂钱，不仅为自己留下了千古骂名，也让军阀统治权名正言顺。董卓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控制朝廷中枢的军阀，国家由此变为土匪。

土匪对财富的掠夺比国家更为贪婪与残忍，他们眼中只有金钱，没有道德、没有规矩，甚至没有人性。董卓发行的“无字小钱”已经完全违反了货币规律，包括他自己的手下也卷入反对他的斗争。

董卓死后，中原大地陷入军阀混战之中。

这是中华历史上另一个无奈的悖论：经济发展需要摆脱封建官僚的羁绊，也需要自由竞争激发活力，但是，弱势封建官僚没有能力解决自由竞争中产生的社会问题，帝国也无法建立一支强势军队。在冷兵器时代，农耕民族如果无法有效集中资源，外族入侵和军阀混战也许就是难以摆脱的宿命。

东汉帝国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遇到这个问题，显然，这个时代没能给出答案。不要说史家口中昏聩的汉灵帝，后世最英明的帝王也未能将其中玄机识破……

楼主：天圆地方的困惑 时间：2021-10-16 00:57:12

第6章 铜钱三国志

（三国）

曹操隆中对

2009 年 12 月 27 日，河南安阳发掘了一座古墓，据说是“曹操墓”。关于墓葬真假的辩论在国内媒体掀起轩然大波，向来无人问津的考古学硬是被媒体炒作成了一个尽人皆知的娱乐话题，实在让人大跌眼镜。

娱乐话题，对与错、善于恶、美与丑，都可以颠倒；因为，娱乐可以虚构、可以美化，甚至可以胡说八道。

历史，不行。

历史曾经真实地存在，因为真实，所以残酷。真实的曹操，犹如今天安阳这座曹操墓，早就淹没在毫无边界的想象当中，扑朔迷离、真假难辨……

曹操出身于宦官集团（宦官义子），却愤然反叛了自己的阵营，灵帝死后曹操协助袁绍尽诛宦官；董卓入朝后，曹操羞于为官，在第一时间化装成百姓逃离了洛阳。在开封军阀卫兹支持下，曹操散尽家财，聚众 5000 人起兵讨伐董卓。

此后，曹操苦心孤诣十年经营，建安元年（公元 196 年）曹操迎汉献帝于洛阳，后定都于许都（今许昌）。十年生死茫茫，中原大地失去了皇权，处处是无主孤坟、处处是满眼凄凉。

——据《三国志》记载，董卓死时，每郡人口仍在几十万户以上。10 年征战，90% 以上的人口在这片土地上彻底消失了，故都长安甚至成了无人居住的“鬼城”。流民人数再次达到“百万”的量级，人们带着耕牛、农具举家流亡，且耕且战，经常以野谷、野菜、树皮为生，没有人知道到底多少人倒在了流亡路上……

——据《三国志》记载，汉献帝回到洛阳后，人们像看猴戏一样参观这位末代皇帝，皇室威严荡然无存。朝臣只能栖身在破壁残桓中，正部级以下官员要靠采摘野谷充饥，很多人就这样无声无息地消失在田野中……

纷纷乱世，货币早就在战乱中消失的无影无踪了，粮食才是最金贵的物品。即使手里有货币，又怎么会有人肯把赖以生存的粮食卖给你？一个没有货币的世界，天下英雄当又如何自处？

据说诸葛亮出山之前曾与刘备纵论天下大事，也就是所谓“隆中对”。关于这场“隆中对”最初的来源是《三国志》中的一段描述，今天学界已经证明这段所谓诸葛亮的“隆中对”是后人比照《三国演义》添加，并非《三国志》作者陈寿所做，《三国志》只为我们记载了曹操和谋士毛玠的“隆中对”。

兴平二年（公元 195 年），在曹操和谋士毛玠的一次会谈中，二人深刻剖析了国内形势、精确判断了敌我优劣，也确定了曹操此后的立国方针。当时，最强大的军阀首推北方的袁绍和南方的刘表。毛玠认为，袁绍为人多疑而少断（我始终认为，《三国演义》把袁绍的性格嫁接到曹操身上），根本没有紧抓经济建设，他的军队有时甚至靠野果充饥；刘表为人小富即安，只要不冒犯他的利益，他就不会主动进攻别人。

结论：袁绍、刘表都不可怕，曹操要想成就“霸王之业”只须“守位以财”。这句话也是当代国际关系中永恒的真谛：要想成为世界霸主，必须有最强势的经济！曹操“守位以财”的方法，在历史上叫做“屯田”。

楼主：天圆地方的困惑 时间：2021-10-16 00:57:12

所谓“屯田”就是招募流民开垦无主荒地，是典型的空手套白狼：曹操之所以能招募流民，是因为流民相信他能保护自己安心生产；曹操之所以能保护流民，是因为他身后有众多流民。

“鸡生蛋、蛋生鸡”的道理大家都知道，关键是第一只蛋、第一笔招募流民的钱究竟要从哪里来？

乱世之中，无论增加税收（财政政策）还是铸造大钱（货币政策）都不好使。大家都快饿死了，税收肯定捞不到油水；至于铸大钱，就算有人肯要，也没有粮食可卖。

既然征税和铸大钱都骗不到财富，那就无须遮遮掩掩，直接明火执仗地抢劫好了！定都许昌之后，曹操收编的第一批黄巾军是青州流民，大约有一百万人。为了安抚这批流民，曹操挑选了其中的精壮者，号“青州兵”。然后，曹操亲自带着青州兵劫掠了汝南、颍川来的黄巾军，夺得了自己的第一桶金。

靠着这些资财，建安元年，曹操颁布《置屯田令》。流民每五十人为一屯，春夏耕种、冬秋操练，屯民如果使用官家耕牛（也是抢来的）收成与官家四六分成，如果屯民自备耕牛则收成与官家五五分成。

实践证明，这是一个好方法。仅仅一年，曹操就分到了一百万斛粮食。成绩的背后是悲惨的屯民，他们要向曹操缴纳 50%甚至 60%的收成。

这样的税率，很高吗？

高不高，分跟谁比。跟“文景之治”的三十税一比，50%当然很高；跟其他军阀比，已经相当低了。

聪明人不止曹操一个，所有军阀都想空手套白狼，都在招募流民。只不过，店大欺客，多数军阀并不在乎流民生命，甚至不在乎生产多少粮食，他们只在乎自己占有多少土地。在他们眼里，流民是“部曲”、是任人蹂躏的奴隶，不要说分成，流民经常连自己都养不活。

按照“国家和土匪”的逻辑，这些军阀是典型的“土匪”。要想彻底解决流民问题，必须有一个大土匪，也就是国家来制止小土匪的过火行为。东汉末年，但凡有点模样的军阀都要靠手下众多坞堡支持，谁也不敢禁止军阀圈禁流民，包括实力最强大的袁绍和刘表。毕竟大家要靠小军阀支撑台面，禁止抢占流民和土地，见面怎么好意思再跟人家打招呼？

曹操，是唯一禁止圈禁流民的大军阀。曹操本是出身寒门，跟坞堡没有多少利益瓜葛，所以，他能下去手。

50%的开价确实黑了点，比起要钱又要命的其他军阀还是宽松了很多。何况，50-60%的税率是非常时期的非常之举，只执行了一年。官渡之战后，立即改为“每亩每年四升谷、每户每年二匹绢、二斤丝绵”；遇灾年，官府赈济灾民；遇丰年，税率不再提高；屯民可以自由选择，留在屯田或者离开。四升谷、二匹绢、二斤棉已经是屯民的所有负担，此外，任何人不得向屯民摊派杂税、徭役、兵役。

其实 50%也不是一个很高的税率，甚至比当代西方福利国家的平均税率还低一些。

楼主：天圆地方的困惑 时间：2021-10-16 00:57:12

曹操的土改

看着曹操挟持汉献帝、看着曹操的一百万斛粮食、看着流民不停投奔曹操，袁绍马上意识到不能由着曹操的性子折腾下去了，否则，就轮到自己四处流窜了。建安四年（公元 199 年），仅在曹操开始屯田后的第三年，袁绍提兵 10 万进犯许都，试图一举消灭曹操，并劫夺汉献帝。

对这场战争，袁绍满怀信心。

袁绍是征讨董卓主力，手下将士身经百战，光铠甲就有一万多领。曹操的军队就像理工院校的女生，本来数量就少的可怜，质量更是相当差劲。“青州兵”总数只有三四万人，其实就是一群吃不饱、穿不暖的流民，连铠甲也只有十几领。双方真在战场上硬碰硬，不用一个回合“青州兵”就得溃败。

袁绍确实猜到了故事的开头，却没有猜对故事的结尾。

僵持一年后，建安五年（公元 200 年），双方决战于官渡，袁绍堂堂十万大军只落得八百轻骑逃奔北方，官渡之战以袁绍的彻底失败而告终。

我们无法为您解析战争中排兵布阵的问题，不过，我们可以为您解析战争背后的经济玄机。

决战之前，袁绍的监军沮授曾建议不要急于决战，曹操只有一州之地，屯田也才刚刚开始。只要派兵驻扎在兖州境外，在春耕夏收之际不断派兵骚扰，不出三年兖州就会大乱；如果同时“外结英雄”，让刘表、刘备同时等人同时骚扰兖州，不出两年，曹操将不战自溃。如果非要一战解决曹操，万一失败，后果则不堪设想。

玩过《帝国时代》的人一定知道，在从“黑暗时代”升级到“帝国时代”的过程中只要不断派兵骚扰对方生产，一定会降低对方军事实力。真实的战争也是如此，如果想在战争中事半功倍，一定要先摧毁对方经济，1990 年美国“沙漠风暴”行动之前伊拉克已经被“禁运”、“制裁”搞得奄奄一息。

袁绍谋士的点子相当中肯也是相当阴损的，可惜，袁绍果然是一个多疑少断之人。他不但没有采用沮授的建议，反而集中了冀、幽、并、青四州的全部存粮，希望毕其功于一役。出兵之前，袁绍满怀信心向战士宣布，军粮足够支撑一年以上，希望战士们安心作战，一年内保证大家能吃上饱饭！

约一万多车粮食，浩浩荡荡运往官渡前线——那可是曹操的地盘！

正是看到了袁绍的强大，曹操才坚定不渝地执行了逃跑路线，曹操一路从黄河以北的官渡逃到黄河以南的阳武、滑县，每次都是闻风而逃，绝不损失一兵一卒。从建安四年九月开始，整整一年时间，袁绍从来就没有接触过曹操主力。因为，曹军最主要的工作不是打仗，而是摸黑打闷棍之类的小贼行为——偷袭敌军粮道，官渡决战之前，曹军最高战绩已经是一次就烧掉了敌军几千车粮食。

袁绍要在兖州地盘上找到曹操主力，就如同东汉军队当年在大漠上找西羌骑兵——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东汉经济如此强大，尚且被西羌拖累到天下大乱，何况不富裕的袁绍。

出兵作战不是公费旅游，十万适龄男子，一年多时间光吃饭不干活，粮草又不断被袭击，咱这日子还过不过了？

楼主：天圆地方的困惑 时间：2021-10-16 00:57:12

日复一日的游荡中，袁军锐气早就被消耗的一干二净。建安五年八月，曹操终于找到了袁绍最大的屯粮之地——乌巢，并一把火将之烧了个干净。消息传来，袁绍十万大军在前线向曹操投降，自此失去了争霸天下的实力。

袁绍在北部四州卯足了劲刮地皮的时候，曹操在兖州又在干什么呢？

答：斗地主、减租减息、分田分地真红火。

官渡决战当年（建安五年）曹操宣布缓征屯田户所有份粮，颁《抑兼并令》。明确禁止各地坞堡收容流民、抢占无主土地，坞堡不能再奴役流民，但凡收容流民，都要直接成为曹操（国家）的屯民。无论天潢贵胄的皇亲国戚，还是位极人臣的宰相，都必须遵守这道《抑兼并令》。

例如，曹操的堂弟曹洪。

董卓之乱的时候，曹操被董卓军队袭击，曹操的战马不幸死亡。危机时刻，曹洪把自己的战马让给曹操，说：“天下可以没有曹洪，但天下不能没有曹操”（天下可无洪，不可无君）。战乱之中，让出战马，相当于让出自己的生命啊！当时，曹氏兄弟抱头而泣，曹操发誓定不辜负曹洪。

胜利了，曹洪既是曹操的亲戚，又有如此的资历，自然要把家业做大做强。

面对曹操《抑兼并令》，曹洪倒也不敢公开抗命，只是让手下豪奴在长社县私自招揽流民，隐匿土地不缴税款。结果，长社县令杨沛一点面子也没给曹洪留，亲自跑到曹洪家里把人抓走，不但把当街豪奴的腿打折了，还终日把人放到大街上作为反面教材展览……

曹洪是一个厚道人，看到仆人替自己受过，就跑到京城找曹操，希望能把人先捞出来。不用说曹操、曹洪是堂兄弟，就凭当年让出战马的情分，曹操也应该给曹洪几分面子。让人没有想到的是，曹操不但没下令放人，反而将那个替曹洪背黑锅的仆人拉到大街上，咔嚓一刀给砍了。

如果事情到此为止也就算了，曹洪只是损失了长社县的土地和一个仆人，做一做秀，可以理解。

让人更没有想到的是，事后，曹操居然派那个“抓人、打人、杀人”的县令杨沛到曹洪的老巢邳城当了县令。

杨沛临行前，曹操当着曹洪的面问杨沛：你想如何治理邳城？

杨沛答：臣当竭尽心力，依您的法度办事。

曹洪终于明白，曹丞相的誓言是相当不靠谱的。曹操的言下之意是，你如果再不老实，连你一起砍。自此，曹洪只得收起买田置地的心思，亲自督导邳城的奴才们歇业关门。

其实，历史有时候很可笑。

曹操确乎是一个土匪，一个很大的土匪。正因为曹操是大土匪，所以，他在一定程度上能代表“国家”。曹操禁止其他军阀圈禁流民和土地，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当时的流民问题。正是因为他解决了这个问题，才损害了坞堡集团的利益，在史书中留下了顶级的骂名。

曹操跟王莽既是京剧里两个最具代表性的大白脸，也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两个奸臣。无论古代的演义小说还是今天的影视剧，总有一些满脸正气的“忠臣”痛斥一个奸臣为“操莽”，之后，这个忠臣往往被杀。可见，“操莽”是一个相当有力度的骂人词汇。

把曹操跟王莽并列在一起，还是相当有道理的。曹操的《置屯田令》、《抑兼并令》跟王莽的“王田制”根本就是一回事：国家对小农发放土地，小农直接向国家缴纳地租。推行耕者有其田当然会得罪了那帮子封建官僚，这些人掌拿着后世史笔，愤怒之余也就把曹操和王莽画成了大白脸。

只不过，王莽推行“王田制”的阻力实在是太大，最后以失败而告终，社会由无法从大乱恢复到大治；曹操当政时天下无主土地不可胜数，把这些土地分给流民，在全社会绝大多数人都获益的情况下，个把军阀只能保留意见，社会由大乱转向大治。

曹操的士兵虽然少，但大家却抱有同一个信念，如果要过好日子，必须击溃袁绍，何况，作战任务并不困难——只是在自己地盘上找到别人的粮食，能带走的就带走、带不走的烧掉。袁绍的士兵虽多，也不过是来军队混饭吃的农民，就算能取得偶然的胜利回去以后还不是要挨饿？

官渡之战，其胜、其败，早已一目了然。

只不过，人们不愿意相信，一个篡汉的土匪才是真正的国家、才是正义的化身、才是真正保护他们的人；人们更愿意相信篡汉的土匪应该是奸诈、狡黠、邪恶的化身；人们特别愿意相信，篡汉的土匪就应该是一个京剧中的大白脸。

有时候，这人可真够操蛋的。

楼主：天圆地方的困惑 时间：2021-10-16 00:57:12

悠悠我心，不负五铢

按照中国历史的逻辑，一代枭雄如果获得了经济实力，会马上征讨四方，最后统一中国。在三国历史中，事实正好相反。有能力统一中国的曹操始终隐忍不发，更加笃定地坚信毛玠提出的信条——“守位以财”，坚信只有再现“文景之治”才可能真正统一中国。没有能力的蜀汉却搞了一个“六出祁山”，搞得蜀地国将不国。

赤壁之战后十年，面对刘备、诸葛亮不停骚扰，曹操甚至放弃了汉中，专心经营中国北方。至此，中国北方终于建立了较为安定的社会秩序，流民也终于为自己找到了一片栖息之地。

十年，曹操最主要的工作不是征战，而是带着流民修运河——反正流民流窜的目标是吃饱饭、活下去，有了这份公差自然也就结束了流窜。建安七年（公元 203 年）到建安十八年（公元 213 年），曹操共主持修成淮阳渠、白沟、平虏渠、泉州渠、新河和利漕渠等六条运河。《三国演义》中大家所熟知的夏侯惇，最主要的功绩也不是对抗蜀国，在不为人知的史实中，他曾主持修建了太寿渠和淮阳渠。曹操修建的运河是京杭大运河的雏形，也是中国古代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水利工程。此后，中原大地形成了以洛阳为中心，贯穿黄河、淮河的扇形运河网，对后世政治、经济乃至华北平原水系的变迁，产生了几乎决定性的影响。

大家想象一下，隋朝隋炀帝只是把这些运河贯穿成一条京杭大运河，就搞得全国鸡飞狗跳。在纷纷乱世，曹操启动了这么大的治水工程，史籍中对曹操修运河却无片言腹诽之词，这需要多么强盛的经济！

建安十三年（公元 208 年），曹操罢黜汉代三公，自称“丞相”。此时，距离许昌屯田已经整整 12 年。《晋书》这样记载当时社会场景：曹操称丞相之时，各州郡府库粮食已经充盈，有的州郡粮食寄存甚至达到了数千万斛；黎民百姓可以安心务农，不用再四处流浪，运河中再次出现贩运粮食、布匹的船只，造船业再次开始兴盛。

由于民间评话的影响，北宋以后史籍对曹操颇有微词。现在，我们已经很难想象曹操时代的经济到底有多发达。我们只是知道，有了能养活人的粮食、有了再次兴盛的造船业、有了贯通关中平原的航道，货币也再次出现在这块土地上。

关于曹操时代的钱币，史书实在没有为我们提供多少有用的资料，我找到的唯一线索是《晋书·食货志》上的一句“至魏武为相，罢之，还用五铢”。至于曹魏五铢钱的版式、制形、前后的背景，根本没有提及。

对《晋书》中的这句话，历代钱币收藏家展开了丰富的想象，最为著名的是清代刘体智在《小校经阁金文》中给出的一幅“曹魏五铢铜范”。1997 年，钱币学界根据这些零散的资料认定曹魏五铢钱最主要的特点是：径 23 毫米、穿 11 毫米、重 3 克，钱文为“五”、“金”二字，所以，曹魏五铢钱也被称为“压金五铢”或“侵边五铢”^①。

实际上，刘体智生活在清代，距三国时期早已时代久远，这枚凭空蹦出来的铜范拓片究竟从何而来，我实在没有把握。

所以，我们只能确定地告诉您两件事。

第一件事，曹操称丞相后，货币经济已经初具规模。曹操时期的洛阳墓葬，每每都有货币出土，只是钱币数量较“光武中兴”时代大为减少，大的墓葬几百枚或者上千枚。您千万不要将之理解为：曹操时代货币经济发达程度远不如东汉初年。曹操是一个极度节俭的人，他在自己的《遗令》中写道：天下尚未安定，我不得厚葬，我死之后，就穿平时的衣服入殓，不得有随葬珍宝；墓葬要选择在不能种

庄稼的贫瘠之地。要知道，曹操活着的时候一件衣服可是要穿十几年，自己儿媳穿件绣花的衣服就被斩首。

连曹操自身都不得厚葬，其他人的墓葬里能挖出几百枚铜钱，足以证明当时货币流通已经有了相当规模。

第二件事，曹操时代，没有官铸货币，流通中的货币主要是东汉时期遗留下来的五铢钱，或者是商人私铸新钱。

1997年江苏苏州市一中工地出土了一批三国时期的铜钱窖藏，其中70%为完整无缺的普通东汉五铢，20%为剪凿过的东汉五铢，另外10%是“钱体轻小”、“轮压钱文”、“制造粗劣”的“五金五铢”。1987年出土的陕西兴平县三国货币窖藏、1989年山东微山县出土的三国货币窖藏均有类似的比例。

凭着这些文物，现在，让我们来还原《晋书》中那句话代表的史实。

曹操消灭了袁绍、吕布等北方军阀，统一了中国北方，也为经济发展奠定了较为良好的基础。随着小农经济逐步恢复，曹操有能力在辖内修建运河。发达的水系为中国北方带来了沃野良田和运输便利，商业、手工业、制造业随着农业之后再度繁荣，货币经济由也开始再度兴盛。

经历了董卓乱世，社会上流行的仍旧是“无字小钱”，曹操下令禁止“无字小钱”流通，也就是所谓“罢之”，以国家强制力再度恢复了五铢钱的铸币标准。

其后，曹操把铸造货币的权力留给了民间，铸造货币的人也许是商人、也许是坞堡、甚至可能是小军阀，无论铸造者是谁，只要所铸货币能在流通中得到认可，也就得到官方允许。今天，曹魏五铢往往和东汉五铢钱同时出土，史学界对曹魏五铢钱的断代也就倍加着迷。

如同曹魏五铢，我们可能永远无法知道三国钱币窖藏中究竟那一枚出自曹操时代。唯一可以肯定的是，这些曾经流通过的铜币就隐藏在三国年间的墓葬之中。真实的曹操，就像他所推行的五铢钱，或许将永远淹没在虚幻的烟尘之中。隐约中，我听到陈寿在为曹操呐喊：非常之人，超世之杰！

楼主：天圆地方的困惑 时间：2021-10-16 00:57:12

祭坛上的蜀汉

《三国演义》用了一百二十分力气美化刘备，把蜀汉尊为汉室的正统。尽管如此，我们依然可以看出，刘备是一个流氓气十足的人：

——早年先后投奔公孙瓒、袁绍、曹操、吕布……，皆反；

——最后一任主子是刘表，刘表死后就篡夺军队领导权；

——蜀地刘璋请他帮忙镇压张鲁农民起义，刘备居然率军攻破成都，逼走刘璋。蜀地与中原有群山相隔，根本受到中原战争影响。刘备入蜀之前，史籍这样描写蜀地经济：水渠散布在田野之中，良田好像绸缎般靓丽，黍稷油油、粳稻莫莫，村落中楼宇相望、桑梓相连，好一派沃野千里的天府之国！

刘备入蜀之后四十年后，史籍这样描述蜀地：男子都被拉去打仗、女子都被拉去搞后勤运输，耕地荒芜殆尽；无论君子、小人都对蜀汉心怀怨恨，黎民百姓由于害怕惩罚又不敢逃离。

堂堂天府之国居然饿殍遍野，刘皇叔等一干人，到底在这里做了什么？

回答这个问题，其实相当困难。

魏、蜀、吴三国之中，唯独蜀国没有史官，根本没有留下治史的第一手资料。大概是因为蜀汉经济已经破败到了极点，无法再多拿出一份俸禄供养史官。现在，我只能从《三国志》、《晋书》中找到只言片语，希望能为您展示一个真实的蜀汉。

让我们从建安十六年说起，这一年四处流窜的刘备时来运转。

张鲁在益州（今四川）搞了个“五斗米教”，顺便起了起义。建安十六年，益州牧刘璋感觉自己无力控制事态发展，只得向刘备求援，希望他派兵剿灭张鲁。当时，有人劝告刘璋：刘备虽然素有仁义之名，其实是一个比曹操还坏的枭雄。刘备如果进入益州，您能给他什么职位？如果让他做益州牧，主公您将何以自处？刘璋没有听从这个建议，坚持借兵对付张鲁。结果，刘备刚进益州，就跟张鲁眉来眼去，联手恶搞刘璋，两人约定事成之后奉张鲁为“汉宁王”。张鲁当然没有当上汉宁王，却可怜被刘备忽悠到打击刘璋的第一线。

刘备进入蜀地的时候已经穷到家了，普通士兵连饭都吃不饱，至于军饷是想都不用想的。那么，刘备以什么激励自己的将士作战呢？

答：抢劫！

兵临成都的时候，为了给将士一点盼头，刘备承诺攻下成都之后城内财富自己分文不取，宝物尽归将士。（与士众约：若事定，府库百姓，孤无预焉；及拔成都，士众皆舍干戈赴诸藏，竞取宝物）

好一个“分文不取”、好一个“尽归将士”，说白了，就是纵兵抢劫。此情此景，与董卓何异？！

至于成都城内的刘璋，尚有 3 万军队，城内粮草也足以支撑一年。生死存亡之机，刘璋却认为“我统治益州二十多年，没有给百姓带来丝毫恩惠；刘备入蜀三年，生灵涂炭，黎民百姓的尸体横卧于田野之中。继续战争只能带来更多死亡，我愿以一身赎百姓于水火”。

当时，蜀地仍以汉代五铢钱作为货币，可以说，益州是乱世唯一保留汉风的州郡。刘备入主益州之后，立刻拿出了自己的抢劫方案——货币改革，这是三国时代最离谱的一次货币改革。

刘备铸造的货币叫做“直百五铢”，最初重 10 克左右，约是原蜀地五铢的三倍，却要当一百枚蜀地五铢用。这说白了就是铸造大钱，以 1/30-1/40 的成本去抢劫蜀地的粮食、布匹乃至所有财富。

刘备的抢劫已经达到近乎疯狂的地步，不但把府库里所有的铜钱都改铸“直百五铢”，还强行收兑民间铜材，甚至连挂蚊帐的铜钩都被搜刮去铸造这种虚值货币了。

不接受直百五铢者，杀无赦。

楼主：天圆地方的困惑 时间：2021-10-16 00:57:12

“直百五铢”钱为刘备带来了巨额财富，《三国志》这样描写当时的情况“数月之间，府库充实”。大家可以想一想，一拨连饭都吃不饱的流寇，数月之间居然兵强马壮，这会是多么惨烈的抢劫！

至于那位还在做着“汉宁王”梦的张鲁，眼巴巴地看着刘备出兵抢占成都，只得将自己经营三十多年的汉中献给曹操，以完甲之师不战降曹。汉中是益州的门户，无汉中则无益州，司马懿等人向曹操建议：我们已经拿下汉中，刘备入蜀不足一年，此时发兵益州，蜀地传檄可定；否则，后患无穷。

刚才我们说过，赤壁之后曹操不想再被拖入战争泥潭，对他来说，汉中也成了一块“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于是，他反问司马懿：人的欲望有止境吗？今天我们已经取得了陇右之地，怎么能还奢望蜀地，不能得陇望蜀（人苦无足，既得陇右，复欲得蜀）。

曹操没有主动进攻，相反刘备却对汉中发起了攻击。汉中是蜀地门户据说，张鲁投降曹操后刘备很长一段时间一夜数惊，那是拼命也要抢过去的。

当然，起兵之前刘备又铸造了一批新的“直百五铢”。

与第一批“直百五铢”比，这批“直百五铢”可以用“破、小、薄”三个字来形容，每枚8克左右，钱文也很不清晰。

对刘备的攻击，曹操没有接招，他只是把汉中黎民尽数迁往长安、三辅、洛阳、邳城，然后就退出了汉中。

如果说刘备与曹操争夺汉中是生存需要，那还说得过去，毕竟汉中关系到蜀汉生死存亡，值得放手一搏。

刘备死后，辅政大臣诸葛亮丞相所作所为就实在显得太不靠谱了。

诸葛亮，在华人心目是一个家喻户晓的人物。在大多数人的认知中，诸葛亮代表着智慧、代表八阵图，代表着很多玄而又玄东西，似乎他有神一般的魔力，能让一切困难迎刃而解。

今天，也有一个词可以精准的描绘推崇诸葛亮的心态——意淫。

人一旦失去自信，“意淫”就会大行其道，可能是当年的神机妙算，也可能是玄幻神魔、时空穿越。这些故事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主人公都具有超自然的力量，在虚幻的世界中无所不能，读者在“阿Q”式的满足中弥补了来自真实世界的遗憾。

意淫替代不了真实的世界，也不能缔造强盛的经济，更不能取得从来就没有过的胜利，只能让虚幻与现实的距离越来越大，直至二者再也不可弥和。当一种毫无根据的虚幻占据了一个人头脑，而在现实中这种虚幻又不见丝毫踪迹，此时，意淫便丝豪不再有理想的作用，而是造就一种极为浮躁的心态，有人就会真的以为世界应该让他无偿占有、自己就应该是无所不能、自己就应该是这个世界的神。他甚至不会允许陌生人冒犯他哪怕是一点点利益，哪怕是一个加塞浪费掉三分钟、哪怕是别人在公共区域内影响了他的视线，哪怕是别人开车时想并线，他甚至会为些许小事让别人付出生命的代价——哪怕你沾了我一分钱的便宜，我也要就剥夺他人最宝贵的生命！

这样的社会不存在任何妥协和退让，也就自然不会产生双赢、多赢，只有非此即彼的你死我亡，这是一个戾气十足的社会，有时暴力案件的起因让人啼笑皆非。

楼主：天圆地方的困惑 时间：2021-10-16 00:57:12

古代，人口数量是一个国家综合实力最直接的体现。全国十三州，魏国独占九州，人口570万，还包括洛阳和长安东西两个最大的经济重心；孙权有三州，人口230万，曹丕称帝后，孙权在名义上接受了魏国“吴王”的封号；蜀国只有益州一地，人口90万，是名副其实的弹丸之地。

也就是说，蜀汉和曹魏的军事实力是6:1，经济实力蜀汉只能更差。如果按规矩出牌，蜀汉应该避免主动出击，凭借蜀道天险被动防守。谁也没有想到的是，诸葛亮居然敢先动手打人。

诸葛亮也知道“益州疲敝，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他还是将蜀汉全体人民绑架在这辆毫无希望的战车之上。《三国志》记载，诸葛亮率10万蜀中将士先后三次北伐，另外蜀国还有官吏4万人（带甲将士十万二千，吏四万人）。10万将士绝非蜀国全部军事力量，每十个士兵至少需要三到四个人做后勤。蜀国只有94万人口（全蜀领户二十八万，男女口九十四万），平均9人要负担一个战士，7家要负担一个官吏，还不计算后勤保障，这就是真实的蜀汉、真实的诸葛神侯。

“蜀道难，难于上青天，黄鹤之飞尚不得过，猿猱欲度愁攀援”，今天的动车、高铁也不能穿越蜀地的崇山峻岭，诸葛亮北伐交通要基本靠走——10万军队要

走出巴蜀古栈道，诸葛丞相如何支撑？

答：继续铸钱。

1980年4月，成都市房管所重建办公楼。人们惊奇的发现，原来自己的办公楼下还埋藏着一批古代钱币窖藏和一件铜钱母范。这批铜钱就是“太平百钱”，意思是一枚太平百钱同样要等于100枚五铢钱。由于史籍对太平百钱语焉不详，上世纪80年代，人们曾猜测太平也许为汉中张鲁、蜀地刘璋所铸。

——三国货币史中，曹魏推行五铢钱，孙吴则以“五百”和“千”作为进位单位，唯独蜀国以百为进位单位；

——三国墓葬中，“太平百钱”往往伴随“直百五铢”，地点集中在今四川成都附近；

——现代科技已经证明，最早一批“太平百钱”铸造于公元221-227年之间，即刘备死后到诸葛亮第一次北伐之间，此时，蜀地能铸钱的唯诸葛亮一人而已。

结论：“太平百钱”为诸葛亮所铸。

“太平百钱”是一种极其离谱的货币，离谱到根本就不能称其为钱。这种钱重0.1-1克，不但低于西汉末年的“莢钱”，甚至低于董卓的“无字小钱”，是中国历史上质量最差的铜钱之一。也就是说，在“六出祁山”之前，诸葛丞相曾以1:100的比例抢劫民间财富，惨烈程度就连董卓都望尘莫及。

非但如此，“太平百钱”和“直百五铢”属于并用货币，只不过“直百五铢”发给官吏，收购小民财富一律用“太平百钱”。后来，蜀地经济凋敝，据《三国志》记载，蜀建兴十二年、十三年蜀国再次铸币，“直百五铢”重量也降到2克，跟“太平百钱”成了一样成了地摊货。

对这段历史，彭信威先生在那部传世的《中国货币史》中给出了一段非常搞笑的评语，思之让人忍俊不禁：“那时诸葛亮还也许还没有死，他也许不赞成这种改制，但假若是在他死之前，那就是在他为北定中原鞠躬尽瘁的时候，自然把这次改制放在建兴十三年更为恰当”。

也许彭信威先生不愿意相信，一个中国历史上几乎传说为神的人会在货币大做文章，敛财程度居然与董卓不相上下。还是陈寿在《三国志》中的评价中肯：诸葛亮身处孤绝之地，本应偏安一隅；却连年空劳师旅，实在是一个志大才疏之人，最多只适合做太平宰相。

楼主：天圆地方的困惑 时间：2021-10-16 00:57:12

预告：

书稿第一卷已经整理完毕，即将于2013年1月出版，书稿定名为《中国是部金融史》。很抱歉，未能采用诸位网友给出的书名。

本贴为第二作者所开，所贴出的内容按第二次修订后，与最后出版有一定差距，但是不大。

楼主：天圆地方的困惑 时间：2021-10-16 00:57:12

货币战争之三国演义

西汉末年，江南还是蛮荒之地。赤眉军霍乱天下的时候，累世为官的世家大族纷纷带领自己的族人、部曲渡江南逃，希望在这里找到一片没有战乱的土地。《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记载，扬州陆姓祖先是春秋齐国大夫陆发，西汉末年迁入江南；一把火烧掉刘备八百里连营的陆逊就是扬州陆氏子孙，南北朝之后，陆氏子孙在唐朝还曾数次出任宰相。

这些江南豪族各有私人武装，军队控制权父子相承、兄终弟及，根本不受孙权控制。陆逊在夷陵击溃了刘备，断然拒绝了孙权进军蜀汉的命令。对陆逊来说，他

只要保住江南一隅，根本没有雄心壮志统一全国。陆逊死后，其子陆抗继承了兵权，陆抗死后其子陆玄、陆景继承了兵权。

对付江南豪族，无论孙策、孙坚还是孙权，历代孙吴统治者都一点办法没有。孙权没有能力跟江南世家争锋，只能把矛头转向江南最原始的土著居民——山越，最后，孙吴官家势力几乎消灭了江南所有的土著村落。

即便如此，孙吴经济主体仍以江南豪门为主，本地流通的主要货币是江南豪门私铸的五铢钱。至于孙权铸造的官方货币，大多流向了蜀汉和曹魏，孙吴朝廷先后三次铸钱，是名副其实的三次“货币战争”。

第一次铸币是在建安七年，赤壁之战之前，这些钱运往了曹魏。

赤壁之战前，周瑜提醒孙权：“江南铜矿富甲天下，铸钱数量不知比曹操多多少倍，我们为何要怕曹操”。

既然我们有铜矿、既然我们有铜钱，那么就从铜钱入手击溃曹操的货币体系。于是，孙权开铸“大泉五十”，“大泉五十”重4克，一枚“大泉五十”可以抵50枚五铢钱。

孙权的这些“大泉五十”不是用来交换江南豪门的财富，甚至不是为了抢劫自己手下的“山越”。“大泉五十”最主要的用途是被化装成商人的士兵拉到曹操的地盘换取粮食和其他物资，试图以50倍的力度抢劫敌人财富。

孙权想的实在太简单了，“大泉五十”根本就值不了五十枚五铢钱，您又不是北方之主，怎么可能有人听您的？

结果1：“大泉五十”在曹魏的地盘上与五铢钱的兑换比例约为1:1。

结果2：曹魏的百姓拿到“大泉五十”后反而经常拿到孙吴地盘上来花——“大泉五十”要抵50枚五铢钱，这可是孙权您自己的规定。

结果3：“大泉五十”铸行不足一年就被迫停铸，孙权不得不下令官府一旦收到“大泉五十”，必须回炉重铸。

孙权不但没弄到财富，反而损害了自己。

问：孙权为何不禁止粮食等物资出境？

答：这确实是货币战争能否取得胜利的关键，或许孙权也想这样做，但禁止物资出境的第一个后果就会损害孙吴与北方的贸易往来。这些贸易控制在江南豪门手中，他们不可能允许孙权这样胡作非为。

第一次货币战争，孙吴完败。

楼主：天圆地方的困惑 时间：2021-10-16 00:57:12

第二次铸币是在建安二十四年，吴蜀之战后，这些钱运往了蜀汉。

中国有句俗语，叫做刘备借荆州——有去无回。实际情况则是，吕蒙刚刚消灭了盘踞在荆州的关羽，孙权就给他运来了1亿枚“直百五铢”，让他弄到蜀地去交换物资。此时，蜀汉“直百五铢”已经减重到6-8克，孙权这批铜钱却完全按照蜀汉初年10克标准铸造。两者相比，这批铜钱很快就成了成都的主要交易货币，给蜀汉统治能力造成了致命打击。

理论上，1亿枚“直百五铢”能换得100亿枚蜀地五铢钱，汉代两朝官私总共才铸造了500亿枚五铢钱，显然，1亿枚“直百五铢”已经足以取代蜀汉货币体系。这段时间，诸葛亮只得下令不准民间再以铜钱作为交换媒介，蜀汉交易退回到物物交换时代，所谓“钱既太贵，徒有虚名”。

结果：蜀汉在丢掉荆州之后又几乎丢掉了所有财富。

第二次货币战争，孙吴完胜。

楼主：天圆地方的困惑 时间：2021-10-16 00:57:12

第三次铸币是在孙吴赤乌九年，这些钱运往蜀汉。

诸葛亮死后，蜀汉大权落在蒋琬手中，蜀国获得修养生息的机会。蒋琬执掌蜀国十二年，十二年间，蒋琬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去孙吴骗吃骗喝。

当时，孙吴与蜀汉结成军事同盟共同对付曹操。蜀汉延熙元年（公元 235）开始，蒋琬开始不断派士兵化装成商人进入孙吴境内，这些人以“直百五铢”在孙吴境内购买粮食等物资。“直百五铢”重量约合两枚五铢钱，由于蜀地朝廷高压一枚“直百五铢”要当一百枚五铢钱花；蜀国的国家信誉也为“直百五铢”谋到了一些市场，一枚“直百五铢”在吴国大约能当十枚左右五铢钱用，蒋琬确实捞了点实惠。

毛泽东同志教导我们，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结果 1：得到“直百五铢”后，江南豪门、坞堡乃至小农，都纷纷带着赚来的“直百五铢”流窜到蜀汉去购买粮食。

最后，蜀汉士兵居然也加入了这种投机倒把的生意。

至此，这场货币战争的结果已经是毫无悬念了，在千百万人追求财富的梦想中，蜀汉将完败、孙吴将完胜。

此时，蜀国人民的老朋友、曾火烧连营八百里的陆逊站了出来，在陆逊主导下孙吴对蜀汉货币战争发动了反击。

你不是 1 枚铜钱当 100 枚五铢钱吗？我就当 1000 枚、2000 枚甚至 5000 枚五铢钱！嘉禾八年，孙吴开始铸造“大泉五千”、“大泉两千”、“大泉当千”几种货币。以最值钱的“大泉当千”为例，约 8-9 克，比蜀汉“直百五铢”减重 10 倍，这些钱全部用来运输到蜀地换取物资！

陆逊的想法是好的，陆逊的做法是坏的。

建安七年那场货币战争，孙吴就是因为试图在曹魏地盘上推行自己的虚值货币才输的一干二净。现在，蜀汉已经露出了明显的败绩，陆逊居然又出此昏招。

不长记性啊！

孙吴与蜀汉比，蜀汉有着天然的优势：蜀汉可以封锁边境，因为国内没有士族高门和大商人掣肘；孙吴却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大家从来都是把孙吴皇帝的命令当废纸的。

结果 2：这些“大泉五千”、“大泉两千”几乎全部回流到孙吴国内——这可是孙吴的国家法定货币，最后蒋琬居然试图以这些钱购买江南豪族铁矿。

陆逊的货币制度却在江南豪族间引起了强烈不满，孙吴赤乌九年（公元 247 年），陆逊只得下令取缔“大泉两千”和“大泉五千”，已经铸行的“大泉五千”、全部回炉重铸成“大泉一千”。

在豪门大族一致反对下，陆逊也于赤乌九年罢相，直到孙吴灭亡，官方再未推行任何铸币。

第三次货币战争，孙吴完败。

楼主：天圆地方的困惑 时间：2021-10-16 00:57:12

在这里，我还想告诉大家，由于绝大多数“大泉五千”都被回炉重铸了，“大泉五千”成为今天一种极为罕见的铜钱。直到清代金石家刘喜海著《泉苑薈华》，人们才见到了“大泉五千”的拓片，至于原钱早就不知去向。民国年间曾出土了两枚“大泉五千”，江湖传闻袁克文（袁世凯的儿子）曾花巨资购买到一枚，后来，袁克文在贫病交加中死去，原钱也就流失了（一说流到海外）。

至于另一枚民国出土的“大泉五千”，我确实见过，在现在的中国历史博物馆。

楼主：天圆地方的困惑 时间：2021-10-16 00:57:12

预告：

书稿第一卷已经整理完毕，即将于 2013 年 1 月出版，书稿定名为《中国是部金融史》。很抱歉，未能采用诸位网友给出的书名。

本贴为第二作者所开，所贴出的内容按第二次修订后，与最后出版有一定差距，但是不大。

楼主：天圆地方的困惑 时间：2021-10-16 00:57:12

第 7 章 迷失的货币

（两晋）

炫富的下场

对于中国货币史来说，晋代是一个难以琢磨的时代，《晋书》中根本就没有哪怕一次官府铸钱记载，历代钱币学家也对西晋货币也语焉不详，甚至连出土文物中都杂乱无章，没有一种主要货币。有人据此得出结论，两晋之时货币经济极度衰落，虽有竹林七贤等神仙般的隐逸之士，却无打动凡夫俗子的尘世金钱，凡首尾 200 年晋代已经退化到奴隶社会。

公元 265 年，司马懿之子司马炎逼迫曹操的曾孙曹奂退位，建立了仅有 51 年寿命的西晋王朝。

司马氏本就是士族高门，所以司马炎自称“本诸生家，传礼来久”。司马炎一旦成为皇帝，士族高门立刻也就成为他最大的敌人——士族不但有强大的经济基础，甚至还掌握着铸币权乃至军队。

皇权的本质必然是封建专制，司马炎连魏国皇帝都已经灭掉，如何不想消灭士族？要想消灭士族，就必须比士族更有钱。

为了赚钱，司马炎一直在努力。比如，卖官。

中国历代封建王朝，一般来说开国皇帝都会励精图治、奋发图强，唯独这位晋武帝司马炎，从开国之日起就卖官鬻爵，包括死刑在内的所有刑罚都可以拿钱赎罪。

家里有事，不怕。只要您有钱、又肯出钱，皇帝亲自出面为你摆平！

有一天，司马炎问国子监祭酒刘毅：“你觉得汉朝那个皇帝能跟我比？”。也许，司马炎满心希望刘毅回答汉高祖、汉文帝、汉景帝。

结果，刘毅的回答是：“桓帝、灵帝”。

汉桓帝、汉灵帝可是东汉的亡国之君，说皇帝是“桓灵”等于骂人是乌龟王八蛋。

刘毅似乎还不过瘾，接着说：“桓灵卖官，收入归国库，司马炎卖官，收入归自己。我看你还不如桓灵二帝”。

面对如此羞辱，司马炎只好自嘲说：“桓灵之时，无人敢如此对皇帝讲话，你敢这么对我说话，足见我比桓灵二帝强多了”。

卖官这件事，刘毅还真是冤枉司马炎了。

大家可能想不到，在提拔干部这件事上，堂堂皇帝司马炎说了根本不算。收点钱不过是走走形式，提醒大家这个世界上还有一个职位叫做皇帝的人。

据《文献通考》记载，西晋的选官方式分为“公府征辟”、“州郡察举”、“曹掾提升”和“任子四条”。无论多大的官、无论通过那条途径当官，都要通过集体推荐，推荐者有一个统一的名称——郡姓。

所谓“郡姓”就是当时占地最多、祖先官位最高、最有钱的士族大家，按级别分有公认的“国家级”士族二十六家（柳芳二十六姓），其下又有存在争论的“省

部级”士族二十余家。无论谁当官，都得经过这四十余家集体讨论后批准。至于皇帝只是个橡皮图章，实在是损封建社会专制的威名。

士族高门组织的集体推荐，绝对没有让今天博士生们情何以堪的行政能力测验、申论，考察标准只有一个——家室，即考生的父亲、爷爷、曾祖、曾曾祖究竟当过什么官。考试的过程比较特殊，由考生拿着自己的家谱到“有关部门”（史称“有司”）核实家世真伪。如果老爸不是高门、爷爷不是高官、祖先中没有宰辅，寒门素族想在这些考官手底下混个一官半职，无异于痴人说梦。

当时曾有位吏部尚书感叹“魏国设立‘九品中正’是迫不得已，而且为寒门素族留下了乡里荐官的途径。今天，所有官职选人都要靠出身，非士族高门已毫无晋身之阶了”。

既然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既然选来选去都是你们士族高门，既然选官皇帝说了不算数。

再不从中捞点钱，司马炎就是痴线！

中原士族，不是有钱吗？

中原士族，有钱不是要跟皇帝叫板吗？

那么，就先把钱拿出来买官吧！

何况，这些士族高门根本就不是什么好东西，没事就出来炫富。一个小小的“地市级”士族也比皇帝富裕！

——荆州士族石崇的家里有个厕所，墙上挂着妙曼的轻纱、纱笼之下站立着身挂香囊的美女。客人起身如厕，还以为进了内宅女眷的房间……

——石崇曾与琅琊王氏斗富，琅琊王恺用麦芽糖刷锅、石崇就用蜡烛做饭；王恺用花椒面泥房子、石崇就用赤石脂作涂料；王恺府邸门口的一条路，四十里外仍有绸缎作帷幕，石崇就把自家门口五十里的道路围成了锦绣长廊……

——王恺请人吃饭，每每都有素女伴笛，笛声稍微跑调，王恺就把女侍杀掉；石崇请人吃饭，就让美人劝酒，有人恶作剧连续三次没有喝酒，石崇就连续杀掉了三个美人，没喝酒的人还自我解嘲“彼杀自家人，关我何事”……

石崇不过是五品散骑常侍，只是一个低级士族，他的财富甚至不是来自于祖辈积累，而是来自于在自己的地盘上（荆州）私建收费站，对过往行人收取过路费。最后，石崇被斩杀于洛阳东市，临死的时候石崇感叹：这些人杀我，还不是为了我的钱？（奴辈利吾家财）

行刑者反问石崇：既然知道钱财的害处，为何不早早散去？（知财致害，何不早散之）

楼主：天圆地方的困惑 时间：2021-10-16 00:57:12

我听说现在也有很多人在网路上炫富，这点家当都敢出来炫富，到了西晋，怕是出门都不好意思跟人打招呼吧？

也许，在炫富者眼中所谓“富”就代表着名表、名车、豪宅，代表着挥金如土、花天酒地，代表着对人呼之即来，挥之即去。

这不是“富”，这只是暴发户的浅薄与无知，只有极度自卑的人才试图收获那些更加无知人群的艳羡。

——炫富者只知道“爱马仕”的产品价格动辄以十万为基数，似乎拥有了它就拥有了财富；炫富者也许并不知道，爱马仕其实是一位希腊神话中的天神，奥林匹亚纪念馆中的爱马仕永远带着两种表情，一半脸儿有着静怡微笑、另一半脸儿却充满了愤怒——在尽展现奢华的背后同样有着无尽的愤怒。所以，爱马仕的商家才试图只留下微笑，爱马仕一线产品上永远不会找到那些刺目的商标。

——炫富者只知道“爱马仕”的产品可以满足自己那颗近乎于变态的虚荣心；炫富者也许并不知道，这位爱马仕是希腊神话中速度最快的神（信使之神）——财富去来同样如此：只有尊重财富者才能懂得财富、只有懂得财富者才会创造财富、只有创造财富者才能真正拥有财富……

我是金融学教师，关于名车、名表、名鞋、名包、名海鲜确实知之甚少，在这里我只想给大家讲一个真实的故事，希望初窥财富真谛。

十九世纪初期，俄国有一位名垂千古的作家叫列夫·托尔斯泰，他的血管里流淌着俄国最高贵的贵族血液，属于那种富的有点离谱的“高富帅”。这位“高富帅”的日常起居却一样头戴草帽、穿着树皮鞋和农奴一起在田野里耕作。晚年，托尔斯泰把庄园分送农奴，并宣布放弃所有作品的版权，人们可以自由出版他的著作，他自己则孤身出走。

公元1910年11月6日凌晨5点，流浪到阿斯塔波瓦小镇的列夫·托尔斯泰走到了生命的尽头。人们闻讯而来，有沙皇特使、有省长、有高级军官，也有很多贫民，面对所有的人，托尔斯泰最后的遗言是：世界上有这么多受苦的人，为何你们只想到我？

托尔斯泰长眠的地方环绕着古老的橡树，墓上却没有任何文字。童年时，托尔斯泰常常随大哥尼古拉来这里玩，此地曾经有一个传说：这片土地之下埋藏在一根神奇的魔杖，谁能找到它，就可以知道人类怎样得到幸福。

现在，这根魔杖就埋藏在无字墓碑之下。

列夫·托尔斯泰是一个真正的富者，他就是那根魔杖，历史会永远铭记他；对历史的看客，石崇炫富不过都是一场闹剧；对今天的炫富者，他们很快就会被浮躁的媒体遗忘。其实，财富从来都没有罪恶，这个世界上没有富人，怎么会有创造财富的动力？西晋社会最恶劣的逻辑是：在晋代士族高门把持持续下，绝大部分人不但没有财富，甚至无论如何辛勤劳动都不能获得财富，所以，炫富才会显得如此刺目。

石崇的故事证明：在任何时代炫富都不会有好下场，无论古今。如果有人想继续炫富或正在炫富，请参考石崇的遗言。

楼主：天圆地方的困惑 时间：2021-10-16 00:57:12

司马炎的绝招

晋灭孙吴的时候，曹魏“屯田制”已经在中原大地消失了几十年，财富日益集中于士族高门、屯田客再次沦为部曲。绝大部分人没有购买力，曹操时代刚刚复苏的造船业、手工业、商业也就必然失去了市场。失去产业创新的时代，土地是最佳的投资渠道，西汉末年土地兼并的故事，马上就要重演……

很幸运，司马炎看到了问题的所在。

很不幸，司马炎虽然贵为皇帝，却束手无策。

在刚刚建立的晋朝，士族官位来自门阀，从来不买皇帝面子：他们有自己的封地、自己的奴婢，甚至有自己的军队，还经常骂皇帝是“桓灵”。

面对这样一群不靠谱的人，司马炎肯定也认真思考过如何遏制士族，又如何保住锦绣江山。卖官远远消耗不掉士族的财富，只有彻底断掉士族财富的根源——土地，皇帝才能真正君临天下、乾纲独断。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司马炎终于使出了自己的绝招——“占田制”。

“占田制”规定：如果有部曲愿意脱离士族高门，每个部曲可以在皇帝那里得到70亩土地，士族不得阻拦；另外，士族高门要逐步把土地还给皇帝，官居一品的

士族最高只能占田 50 顷，占田数量按品秩依次递减。为吸引部曲离开士族，司马炎恢复了“三十税一”的税收制度，作为代价占田的农民要为国家承担兵役。

“三十税一”的低税率保证了足够的农民从士族高门流向皇族，晋武帝太康元年全国民户只有 245 万户，太康三年已达到 377 万户。

复苏的小农经济也再次展现了中华民族创造财富的能力，据干宝的《晋纪》记载：晋武帝年间，每个村落里都是牛羊遍野，有吃不完的粮食在田野中晾晒，出远门的人们可以在存粮的草棚中吃住。

今天，有人也把司马炎初政时期称为“太康之治”

干宝的《晋纪》或许有所夸大，《晋书》的人口记录却应该真实反映了太康年间农民的流向——大家无疑都是冲着土地、冲着“三十税一”来的。当兵怕什么，只有皇帝掌握了兵权才能真正保卫自己的土地！

用赞美的话说，“占田制”是一把好算盘：以低税率刺激农民流向国家，士族失去了农民、皇帝取悦了小农，同时，士族也失去了兵源、皇帝却获得了强大的武备。

好一个一石二鸟之计！

“占田制”其实毫无新意，不过和王莽的“王田制”、曹操的“屯田制”一样，本质也是在国家土地所有权下再现“耕者有其田”。

如果按照西方经济学理论来解释，这个制度还远远不够尽善尽美。土地私有制必然优于土地国有制。理想的土地制度，不但应该承认农民对土地的使用权，还应该允许土地自由流转，而不是将土地所有权控制在帝王手中。也就是西方经济学所谓：只有“资源自由流动”才能实现社会收益最大化。

在一个纯净的经济学世界里，没有交易成本、没有信息成本，所有交易者的身份都是平等的，没有人能逼迫你买卖土地，当然所有交易都有效率。

真实的世界永远不会如此纯净，在一个所谓“自由”的市场里，士族亦官亦商，他们会以种种手段掠夺农民土地，可能是强买强卖、可能是巧取豪夺、可能是暴力抢占，唯一不可能的就是经济赎买。如果以公平的经济赎买来交换农民土地，这个官当着还有什么意思？

士族高门把持朝政的西晋，除了强大的皇权，再无任何力量可以保障农民真正获得土地。西晋农民土地如果真的可以自由流转，那才真是一场灾难。

皇族 VS 士族，斗争终于在司马炎帝位继承人的问题上爆发了：如果皇帝的继任者继续推行“占田制”，士族高门可能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权柄尽失；如果培养一个白痴登上帝位，那么，士族也许还可以继续一小撮人的辉煌。

士族推举的皇位继承人司马衷由此闪亮登场。此人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顶级的白痴，面对百姓挨饿的问题，居然提出了“何不食肉糜”的政策建议，并因这句名言被中华历史臭骂了两千年。

司马炎当然知道不能把万里江山交给这个超级白痴，他中意的继承人是另一个儿子司马攸。推行“占田制”时，冲在第一线的恰恰就是这个司马攸，为了把士族抢占的荒地分给投奔皇帝的部曲，司马攸不知得罪了多少士族高门。

士族高门但凡还有点脑子，就不可能让司马攸登上皇位。

所谓皇族并非铁板一块，司马炎的皇后杨氏出自士族高门，是司马炎为了争取士族高门支持才娶回家的。杨氏的远近亲戚几乎囊括了所有的“国家级”士族（柳芳二十六姓），更重要的是，杨氏之所以能成为皇后完全是因为这些远近亲戚。也就是说，杨氏确实是皇后，可皇后的位置来自于士族门第，士族一旦地位衰微，

她也就失去了对皇族的利用价值。士族要想保住利益、杨皇后要保住位置，扶持司马衷称帝是最佳答案。

为了达到目的，杨氏给司马衷娶了一个更狠的老婆——贾氏。这位贾氏出自平阳贾姓，家中累世为官、能人辈出，尤其是贾氏的父亲贾充。魏主曹髦早知司马家族有篡位之心，曾说“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结果堂堂皇帝居然被贾充一刀给咔嚓了；司马昭临死的时候就想直接立司马攸为帝，在贾充坚持下才立司马炎为帝。

司马衷获得这样一位老丈人，就好比身后树起了一棵参天大树。谁想废掉司马衷，就等于直接跟贾充叫板——这可是一个有能力直接挑战皇帝的人。司马炎只好放弃立司马攸的心思，把他远远打发到齐地做齐王。

司马攸临行前，常山、常广两位公主在司马炎面前放声痛哭；就连司马衷的老师也借酒装醉向司马炎谏言，他抚摸着皇帝宝座说：“唉，可惜了这么好的椅子啊”……

可怜司马攸，心胸还是太狭小，在去齐地的路上忧愤而死。对这段历史，明清交替之际的王夫之曾经感叹：司马攸死，晋朝并无必亡之理，唯士族不除，晋朝根本就没有存在的可能。

司马炎又何尝不知道这个道理，只是，历史没有留给他足够的时间。汉代，刘邦吕后用了 10 年时间以武力讨伐异姓王，而且刘邦还是马上皇帝；文景二帝又用了 70 年的时间才渐渐消灭了同姓王，司马炎却只有 10 年时间推行“占田制”，寒门素族的势力远未成气候。

司马炎把所有的希望寄托在孙子司马遹身上（不是司马衷的儿子），据说这是一个很聪明的孩子。司马遹五岁的时候皇宫曾经起火，司马遹拉着司马炎的衣角说“黑夜之间防备不周，皇帝不应该火光照到的地方”。此后，司马炎钦点这个孙子为皇太孙，并经常向大臣宣示，司马遹才是帝国未来真正的主人。

如果关于司马遹的记载是真的，从心里学来看，他确实是一个聪明的孩子——聪明而又胆小的孩子，只有这样的孩子才能意识到危险。聪明加胆小当然不可能成为司马遹当选皇太孙的理由。真正的原因，是因为司马遹只是一个宫女所生，而且，这个宫女曾侍奉司马炎多年，绝不会和士族高门有任何联系。

为了司马遹顺利称帝，司马炎这个当爷爷的可谓费尽心机：先是极力反对贾后成为司马衷的太子妃，结果被士族高门否决；分封庶出的司马柬、司马玮、司马允分镇秦地、楚地和淮南，希望能以皇族整体的力量抗衡士族，结果几位王爷先后做了刀下之鬼；临终前又命汝南王司马亮入朝辅政，结果皇后杨氏篡改司马炎遗诏，改为由其父杨俊辅政。

白痴司马衷登上了帝位，世界变得一团糟。

士族不但掌握了财富，还掌握了晋惠帝司马衷。失去了皇权的制约，掠夺也就失去了任何底线：“占田制”马上就被废弃；汝南王司马亮、楚王司马玮先后被诛杀，就连那位聪慧的皇孙司马遹也被“丑而短黑”的贾后诬以谋反罪处死……

楼主：天圆地方的困惑 时间：2021-10-16 00:57:12

一钱杀二士

一望无际的华北平成为游牧民族最好的战场，西晋根本无法抵挡对倏忽而来的骑兵。然而，面对浩浩长江，游牧民族没有强大的水师，不可能旦夕之间攻破天堑。

公元 317 年，出镇江南的司马睿在扬州称帝，史称“东晋”，首尾 103 年。

江南尚有半壁江山，“鹄立南望”的西晋遗民纷纷前往投奔，不仅包括皇族、士族，还包括每一个普通人：东晋初年，约 90 万户汉人迁徙到江南六郡，占北方

战乱地区人口总数的 50%，这是汉族历史上最大的一次迁徙，自此中国经济重心南迁。

西晋灭亡前，江南绝大部分地区只有火耕水耨的原始农业；晋室南迁后，江南一地在 100 年间一跃成为中国经济和文明的继承者，最后，居然能以区区数万人马大破前秦百万雄兵。

东晋又是如何从衰亡走向繁荣，直至足以对抗游牧民族入侵的呢？

《晏子春秋》记载过一个“二桃杀三士”的故事。春秋年间，齐国有三位著名的勇士：公孙接、田开疆、古冶子。这三位武将都曾经为齐国立下了赫赫战功，而且三人意气相投，结为异姓兄弟。为遏制三位武将的声势，齐景公赐给三位勇士两个桃子，并让他们评判自己的功劳，功劳最大的两位才能吃到桃子。结果，三位武士为了争抢两个桃子互殴，最后全部死掉了。

东晋初年，官府特准铸币权就是那个桃子，江南豪门则是争抢桃子的那些武士。最后，江南豪门势力在铸币权争夺斗争中全部衰败。

本来江南豪门各家都自己铸行货币，只要铸造的货币能用出去就行。司马睿来了，江南就不一样了。

为了稳固自己在江南的统治，司马睿选中了吴兴沈氏作为自己的代言人，并且宣布：只有吴兴沈氏才拥有合法的铸币权，其他人铸造的货币都不合法。为了让这个理念深入人心，东晋朝廷不遗余力的在江南宣传（没有强制能力，也就只能靠宣传）：组织五毛党编写民谣，然后在民间（乞丐）中传唱；组织盛大的宣讲会（实际上就是乞丐在唱莲花落），让所有人都认识到官方货币的重要性……

吴兴沈氏最大的敌人是义兴周氏，本来周氏家族并未把官府特准铸币权放在眼里，就是私铸货币皇帝又能把我如何？

义兴周氏没有想到的是，朝廷的宣传工作取得了很大成效。

货币说到底不过是一种交换媒介，能否用于交换，在很大程度上要看有多少人承认。在普通百姓心目中毕竟皇帝还是至高无上的，官方货币也有着更高的信誉，币材一样、重量相类、制形相似，还是要首选官方货币的。

结果：吴兴沈氏所铸行的货币铸币在江南一地取得了统治地位，即“沈郎钱”^①。

在义兴自己的地盘上，周氏家族的铸币也不太好使了。于是，我们有了“榆莢相催不知数，沈浪青钱夹城路”的诗句。

义兴周氏的领头人周札不得不放下架子，低头来找司马睿要求朝廷也承认周氏家族的铸币权。周札得到的答复是，鉴于已经授予沈氏家族特许权，周氏家族应就此与沈氏家族进行亲切友好的磋商——沈氏家族是绝对不会同意的！

任何时代金融牌照都是最值钱的东西，金融牌照虽然不能创造财富，通过它却可以获得财富的使用权。所以，要想持有金融牌照，就一定要付出代价。沈氏、周氏争夺铸币特许权的代价，就是双方在皇帝的挑拨下大打出手。

可怜这位“一门五侯”的周氏家族，领头人周札却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吝啬鬼，兵临城下的时候，周札居然不肯把仓库里精良的刀枪分给农人，而是让大家以木棍应对沈充手下士兵的刀枪。

在这场斗争中，周札兵败被杀，江南最大的豪门之一周氏从此一蹶不振。鼓动吴兴沈氏灭义兴周氏之后，曾铸“沈郎钱”的吴兴沈氏也被剿灭。义兴周氏和吴兴沈氏是江南土著最强大的势力，随着周札和沈充败亡，江南豪门逐步成为历史的陈迹。

楼主：天圆地方的困惑 时间：2021-10-16 00:57:12

吴兴沈氏与义兴周氏的战争，为司马睿赢得了极为短暂的宝贵时光。江南豪门内耗的时候，东晋皇族又在做什么呢？

答：开山泽之禁、土断，即，培养江南的小农经济。

司马睿渡江的时候，大约有一千多家北方士族跟随。

纷纷乱世，无论士族还是部曲说白了都是流民，单独迁徙根本不可能在江南有一席之地。于是，最大的流民头子、东晋皇帝司马睿命令手下较大的流民头子、北方士族，率领普通流民在长江下游建立了很多“侨郡”，即南琅琊郡、南徐州郡、南兖州郡（侨郡建立的地方一般是江南豪门势力较弱的地方，原有土著居民被北方流民赶到了今广东、贵州一带）。

在侨郡之中，北方士族依靠原有习惯和名望维持了对部曲和流民的统治，当然，他们的部曲可以不向朝廷纳税，朝廷有事也要临时召集士族才能起兵。西晋就是这样亡国的，殷鉴不远，岂能重蹈覆辙？况且，东晋初年，北方士族势力远较西晋衰微，司马睿也看出了这个便宜。

司马睿第一个打击士族的方法，叫“开山泽之禁”。

江南本是鱼米之乡，普通人靠捞鱼也能维持一些生计。刚刚到达江南的时候，北方士族就抢占了山川林泽，升斗小民片缕不得下水，敢擅自捞鱼者一定要往死里罚。

公元320年，司马睿颁布诏书：凡强占山林、霸占湖泽的人，收入达到一匹布的价值，杀无赦！那一年是农历壬辰年，这封诏书也称“壬辰之诏”，目的是保证民间对自然资源的开采权，后世无数封建帝王都曾模仿，刘宋元嘉十七年、元嘉三十年、大明七年都曾屡屡下令禁封山泽。

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天下之利岂能由一二人所独占？

司马睿第二个打击士族的方法，叫“土断”。

土断，按字面意思理解就是：按照土地断定户籍，通过清查土地逼迫士族高门承认“部曲”对土地的所有权。朝廷宣布：无论您是谁，您流窜到那里就是那里人，立马给户口，纳税不满五年也直接赐予土地，反正这些土地是大家一起从“山越”手里抢来的！

“土断”并不是司马睿的点子，早在西晋初年就有人向司马炎建议以“土断”替代“九品中正制”，彻底剥夺士族的治民权、废黜士族高门对官位的垄断。只不过，当时司马皇族只是个绣花枕头，不敢这样做而已。

现在，既然北方士族成了高级流民，司马睿也就有了机会。晋元帝太兴四年（公元321年），司马睿下诏在南兖州禁止士族高门收容流民。

诏书首先总结了文景二帝以来的均田制经验，回顾了西汉、东汉两代的辉煌历史；接着，诏书又给出西晋亡国的官方托词：士族高门占有众多土地和农民，却刻意逃避朝廷赋税，焉有不亡国之理？

最后，诏书提出了解决办法：为避免江南再现中州之难，必须再次推行“耕者有其田”！诏书规定，所有士族高门都要如实禀报部曲数量，此后，一品大员占田不得超过280亩，奴婢不得超过3人，其余土地要分给原来的部曲。

为了吸引流民自动归于朝廷，东晋政府不断提高对小农的优惠条件，赐其田宅、先免租税三年、后免租税五年。优惠到期，小农每亩只需要向朝廷缴纳三升粮食，当然，士族所占土地也同样要向朝廷缴纳三升粮食。这种按土地面积征税的方式在历史上被称为“度田收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士族将抢占土地税收强加给自耕农。

史籍为我们精准的总结了东晋初年的治民政策——“镇之以静、群情自安”，也就是说东晋中央政府在很大程度上削减了官吏的职能，恢复了西汉初年的无为而治。毕竟官吏都是士族大家，让这些人捞到钱，对皇族没有一点好处。有了自耕农的支持，东晋两代帝王司马睿（晋元帝）、司马绍（晋明帝）终于重新建立了封建中央集权。

江南兴起的小农经济创造了一个巨大的市场。相反，如果财富仅仅集中于士族高门，购买力也就必然集中于一小撮人，这样的社会结构除了能造就奢侈品市场，普通行业能兴盛才真的奇怪。

——江南水系丰富，原比北方农耕条件优越，北方移民带来了耕牛和铁质农具。加之充足的劳动力保证了精耕细作，江南稻田产量从孙吴时代的五六斛增长到三十斛，产量增长了5-6倍，麦田甚至出现了一年三熟的耕作制度；

——冶铁技术冠绝天下，号称“中国绝手”的铸剑师谢平创造了“横法钢”，用这种钢练成的刀剑弹吹之间可以隔断十五根头发；

——所产瓷器胎质坚硬、型制美观、釉色青翠，有的甚至与宋代官窑所差无几，唐人这样夸赞东晋瓷器“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

——造纸术真正得到应用，东晋人能根据不同用途把纸加工成青、赤、缥、绿、桃花等颜色，就是这些纸张造就了一代书圣王羲之……

《南齐书》这样记载这个时代：太武年间，江南百余年来未有兵锋之灾，家家都经常设宴款待客人，到处都是沃野良田，人们不辞辛劳的从事农耕，只要一郡粮食丰收，数郡则无饥饿之虞。荆城是南楚最富有的城市，扬州则是吴地最富裕的地方，两个城市的纺织业足以衣被天下！

楼主：天圆地方的困惑 时间：2021-10-16 00:57:12

钱，国之重器，不可轻废

中国史书如同今天的影视剧，历史人物都具有鲜明的脸谱，好人长相威武、坏人长相猥琐，单凭长相就能判断一个人是好人还是坏人。

桓温在晋明帝年间登上历史舞台，《晋书》对这位中兴名臣却毫无尊敬之意，把他描写为“长着一双三角眼、胡须像刺猬一样”，一副典型的奸臣模样，也许是因为东晋终为桓温的儿子桓玄所灭的原因吧。

桓温（公元312-373年），属于中下层士族，他的另一个身份是司马睿的孙女婿，南康公主的丈夫，也就是传说中的驸马爷。从明帝开始，桓温历经五代帝王，官拜大司马、统帅内外诸军，是东晋中期第一代有能力统领全局的人物。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东晋一代桓温是第一个有能力建立“大一统”的皇权的人（篡位），是曹操、王莽一类的人物，所以，他才成为京剧中又一个大白脸。

在中国货币史上，桓温曾经提出了一个很离谱的设想——废弃钱币，改用谷帛作为交易媒介。

针对桓温提到的这个极其离谱的建议，当时的祠部尚书孔琳之就以无可辩驳的雄论驳斥了桓温的建议：古代圣王把没用的东西来交换有用的东西，这样有用的东西既不会损毁，又可以省去物物交换运输的麻烦。现在的铜钱正好起到古代龟贝的作用，历代使用的铜钱今天绝不能废弃（制无用之货，以通有用之财，既无毁败之费，又省难运之苦。此钱所以嗣功龟贝，历代不废者也）。

从古至今，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桓温的货币知识为零，还是孔琳之识大体、顾大局，认识到了货币运行规律的真谛。钱币是国之重器，当然不可轻易废黜。

真的是这样吗？

孔琳之当时还说了一句话，这句话在有意无意间被很多人忽略了：贫穷的人要仰望富人，天下才能安宁；如果骤然废弃货币，那么士族高门就会丧失所有财富。孔琳之属于士族高门，他知道桓温废弃货币的真正用意：尽管数十年“土断”只是剥夺了北方士族土地，以皇权的强制力遏制了土地兼并。但是，士族高门手里还是照旧留有大量货币，要消灭士族势力，最重要的就是剥夺他们手中的所有财富，直接废弃货币当然就是最好的选择。

剥夺士族高门财富、彻底斩断他们侵占土地的能力，这才是桓温废力主废弃货币的真实意图。

况且，桓温被逼出此狠招，是因为士族高门不厚道在先。

东晋朝廷没有铸币权，流通货币全靠私铸（也就是“沈郎钱”）和前朝留下来的古钱（也就是一部分五铢钱），两者重量差异实在是太大，相当一部分五铢钱被人减凿。

所谓“减凿”，就是把完好的古钱去掉一块，再把原来的五铢钱染上铜锈，这样的钱被称为“剪边五铢”。当然，被凿下来的铜材或铜屑会被重新铸造成“沈郎钱”重新进入流通。最狠的做法是，把完好五铢古钱用利刃圆凿切割，将之一分为二，成为一大、一小两枚钱币，大钱大环被称之为“艇环钱”、小钱小环被称为“鸡目钱”。

由于东晋一朝货币奇缺，被减凿后的“剪边五铢”购买力降低非常有限。这样减凿货币的人既得到了一部分铜材，又保持了原来货币的购买力，实在是一笔稳赚不赔的好生意。

理论上，无论货币如何减凿，只要能承担货币职能就可以了，总比废弃不用的好。

如果减凿集中于某一个阶层，却一定会引起财富重新分配。

但凡减凿古钱获利，手里必定有相当数量的五铢古钱；仅仅减凿一枚五铢钱，估计废品收购站都不会要那点铜渣；偶有刚富裕起来的寒门素族，只能开山冶矿、铸造新币。手里具有巨额五铢古钱的人，恰恰就是桓温最讨厌的一个群体——士族高门。士族高门的购买力越来越强，黎民百姓乃至皇族可控制的资源就会越来越少，最后一定会打破原本脆弱的权力平衡……

桓温看到了问题的所在，却没有给对药方。

朝廷连铸币权都没有，要废弃货币谈何容易？何况，这本就是一个馊主意，货币制度承载了几近千年的经济运行，岂能由皇帝一道诏书自动消失。西汉王莽只是想以龟贝替代货币就搞得天下大乱，更不要说东晋时代皇族权柄远不如西汉。举朝反对之下，桓温废弃货币的建议最终未能推行（朝议多从琳之，故玄议不行）。在士族高门货币优势的冲击下，晋穆帝年间前期土断成果几乎丧失殆尽，朝廷直接控制的人口数量急剧下降。

现在，我们给出两个案例以说明当时的情况。

案例 1：晋帝室彭城王司马玄隐匿流民，查实后司马玄被桓温送进了监狱；

案例 2：会稽王氏隐匿民户，查实后，被隐匿的流民尽得土地，从此归朝廷统辖。

这是两个史书上最常见的例子，现在，我们稍微丰富一下两个案例的数据。彭城王司马玄一共隐藏了五户民户，结果这位皇族王爷被抓紧了监狱；会稽王氏隐匿了三万户口，那个反对废弃货币的孔琳之就是会稽士族高门，仅仅是喝个酒、道个歉，别说监狱就连城管的面都没见。

结论：这个时候士族高门的势力很可能已经超越了皇族，长此以往，皇族又将沦为舞台的配角。和平年代土地兼并最多引发流民潮，此时，前秦已经吞并了鲜卑燕国，就等挥军饮马长江岸了……

楼主：天圆地方的困惑 时间：2021-10-16 00:57:12

尽管桓温不是一个合格的货币理论家，却实在是一个铁腕政治家，既然温和的货币改革行不通，桓温就迅速拿出了更狠的方法——即东晋最著名“庚戌土断”。与晋元帝、晋明帝年间的土断不同，庚戌土断不但要斩断士族高门与南迁流民的联系，而且要清理士族高门隐匿的所有民户。

“庚戌土断”是东晋历史上最彻底的一次土地改革，脱离士族的农民从此要向朝廷服兵役。桓温征召寒门子弟，在自己出镇的兖州、徐州、扬州建立了一支所向披靡的军队，这支军队后来的发展对中国历史走向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我研究的领域是金融，我的职业却是教育。

所以，在这里我必须强调桓温的一份奏折——《七项事宜疏》，在这封奏疏中桓温坦言了当时官场七大弊病，并提出了一些改革方案，最核心的一条：让东晋寒门素族接受教育，给他们晋身之阶。在这篇传世的奏疏中，桓温以雄浑的文笔论证一个道理：士族高门把持教育会弊端丛生，要想富国强兵、光复中华只有一个途径，那就是兴办教育、实现社会阶层流动。

当代，西方列强的历史也证明，要想成为第一流的世界强国，首先要发展的行业一定是教育，其次才是制度和科技。正如同一个社会的表象是财富、生产财富的是科技、刺激科技创新的是制度、决定制度的是文明，能改变文明的力量则只有教育。

如果把这个顺序颠倒过来就是“科技→制度→文明→教育……”，这一切，就如同《天龙八部》里的鸠摩智，先练少林七十二绝技、再练内功《易筋经》，少林寺藏经阁无名老僧对此的评价是：次序颠倒，大难便在旦夕之间。

——在这个颠倒的顺序中，科技一定不是原创的、只能是模仿的，先进科技确实可以模仿，但这些科技创造的利润却只归属于原有强势阶层，甚至成为劫掠社会财富的工具。

——在这个颠倒的顺序中，制度一定不是内生的、而是舶来嫁接的，确实也可以依样画葫芦原封不动建立所有的行政框架、法律制度。如果全社会的人都没有受到这样的教育，又怎么可能从内心里尊重这些制度？无人尊重，这些制度又怎么可能真的得以实施呢？

——在这个颠倒的顺序中，缺失了教育，文明底蕴不会有丝毫改变，一旦教育开始演绎腐朽，就会蛀空整个社会的脊梁。

要想摆脱历史的宿命，必须有一个条件，让教育普惠于国民。只有教育，才能使下一代人比我们过的更好，才能建立一个公平的社会阶层流动渠道，在这种不停的流动中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会更加富强。

当然，桓温远没有如此伟大，他不过是东晋打破士族垄断教育，给寒门素族一个希望。借助这些机会，东晋寒门素族涌现出大量杰出人物。

只有靠自身才学晋身的寒门素族才是皇帝最忠诚的支持者，他们一旦离开皇权就会变得一无所有。中国古典读物《三字经》里有一句“如萤囊，如映雪；家虽贫，学不辍”，其中借萤火读书的人就是被桓温重用的素族车胤，最后，车胤也为皇室尽忠而亡。桓温有了寒门的军队、寒门的官僚，终于把事业推上了巅峰：灭西蜀成汉、三次北伐，一度甚至光复故都洛阳。

桓温的改革也使东晋获得了重生，桓温死后5年，正是寒门素族组成的北府兵，以8万人击溃了前秦100万南大侵军，汉族在江南一地延续了民族血脉，晋祚得保。

刘宋王朝的开国皇帝刘裕曾对桓温有一句中肯的评价：“大司马桓温当政之前，黎民百姓已经没有土地，国家败亡之象已现。庚戌土断之后，农人得以归于土地，此后东晋能够财阜国丰，完全是桓温的功劳”。（大司马温，以民无定本，伤治为深，庚戌土断，以一其业，于是财阜国丰，实由于此）

楼主：天圆地方的困惑 时间：2021-10-16 00:57:12

两晋小结：胡马过阴山

游牧民族习惯于迁徙，他们必须找到水草肥美的地方，即使是寒冷的冬季。游牧民族向北是寒冷的西伯利亚、向南是一望无际的华北平原，只要头脑还清醒，任何一个游牧民族都会选择向南。

向南这本没有任何错误，只不过，南部是我们的中国。

上古时代的事情，我不清楚。我只能告诉大家，大约公元前8世纪的时候，北方游牧民族掌握了骑射征战技术，自此，汉族就再也没有消停过：西周 VS 犬戎、秦 VS 匈奴、两汉 VS 匈奴、两晋 VS 十六国、唐朝 VS 突厥、两宋 VS 辽夏金元、明 VS 女真；1644年，最后一个汉族帝国为北方游牧民族满清所灭……

游牧民族的生活习惯本身就建立在民众与畜牧的流动之上，一般情况下，为争夺草场，各个部落之间也是征战不休，很难对外形成合力。即使如此，已经让北方的汉族相当难受，这些人倏忽而来，官军唯一有效的抵抗方式就是投入数十倍于敌方的军力坚守每一个据点。

只有极端强盛的经济，才能坚守每一个据点，一般王朝根本做不到这一点。所以，汉武帝才不得不举全国之力驱赶匈奴。为了动员全国的力量，汉代建立并完善了史无前例的统治框架——以三公九卿为代表的封建官僚体系，也是这个封建官僚体系彻底毁掉了强盛的西汉帝国。

汉光武帝吸取了西汉亡国的教训，裁撤了近90%的官僚机构，放任民间经济发展，终于出现了“光武中兴”。遗憾的是，东汉帝国失去了封建官僚，也失去了对国家的统治能力。一旦帝国失去了集中资源的能力，也就无法遏制边境游牧民族成长。西羌，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名字开始不断进入东汉帝国版图，甚至数度威胁都城长安。可怜堂堂东汉帝国，几乎浪费掉全国的财富也未能克制西羌。

统一北方之后，曹操的实力也无法对抗游牧民族，只不过，他想出来一个相当阴损的点子。当时，最为强盛的游牧民族是乌桓，曹操就在鲜卑等游牧民族的地盘上做生意——专门收购乌桓人头。乌桓势力有所衰微的时候，曹操采用游牧民族的战术，以一支汉族轻骑兵长途奔袭、重创乌桓主力，为汉族赢得了半个世纪的和平时间。

最不地道的是蜀汉的刘备和诸葛亮，他们不断引游牧民族入关分散曹操兵力。七擒孟获的故事相信大家都知道，藤甲兵的真实用途是对付自己的同族曹操。就连祸患东汉的西羌，蜀汉也欢迎之至，蜀汉大将马超、姜维都是因为与西羌联系密切才得到重用。罗贯中居然能把异族打击汉族的事迹列为诸葛亮的功绩之一，颇有以文乱义、混淆是非之嫌。

从此，胡人入关一发不可收拾。

西晋年间，士族当政又给了游牧民族以机会，既然无法建立天下一统的皇权，自然也就不可能集中全国力量抗击胡人入侵。西晋统治者对付外敌的办法颇有曹操风范——不断派杀手暗杀游牧部落首领，游牧民族各部落为争夺首领位置内耗不断，也算以最小的成本为中原争取了和平。

长达十六年的“八王之乱”给了游牧民族以发展空间，远遁大漠的南匈奴单于刘渊第一次在中原腹地建立了游牧民族政权——后汉。刘渊幼年时曾在西晋当人质，

当政期间汉化程度很高。

按照游牧民族的传统，部族首领要负责全部族人的福利，要定期给大家发粮、发钱、发奢侈品（瓷器和茶叶）。刘渊既然要仿效汉人建立封建中央集权，也就必然要抛弃原始的氏族制。最终，刘渊丧失了对南匈奴部落的统治能力。

游牧民族统治者没有统治定居人民的经验，他们可以很容易实现征服，却无法建立有效的统治；要想统治中原臣民就必须模仿汉制，汉制又无法控制本族这个强大的军事集合体。在整个中国历史上，只有清朝曾经解决了统治结构“二元化”的问题，把曾经骁勇的八旗铁骑变成了提笼架鸟的八旗子弟……

现在，让我们来检视中原大地与游牧民族较量的全过程：

……强权的秦帝国→→→封建中央集权→→→蒙恬北拒匈奴……

……西汉初年“无为而治”→→→和亲、被匈奴勒索→→→放任民间私铸货币、小农经济兴盛、文景之治……

……汉武帝巩固封建中央集权→→→盐铁官营、统一铸币、经济衰败→→→匈奴分裂、霍去病祭贝加尔湖……

……东汉初年裁撤绝大部分官僚→→→坞堡兴起、中央集权衰败、私铸盛行、工商业兴盛→→→西羌侵扰内地→→→坞堡无法抵抗→→→天下大乱……

……曹操屯田→→→小农经济兴盛→→→收服乌桓……

……西晋士族兴盛→→→士族皇族内耗、八王之乱→→→五胡乱华……

在这些循环中，我看到了一条无比清晰的运动轨迹：封建集权→→→货币官铸→→→击溃异族→→→经济衰退。集权必然导致强势封建集权，也就一定能集中全国资源对抗游牧民族，强势帝王又怎么可能容忍游牧民族在自己的地盘上闲庭信步？只不过，强势的封建集权一定要靠封建官僚才能实现，小农经济在短暂辉煌之后又会陷入长久的沉寂。

吃此一堑，帝国又必然转向另一种统治模式：封建分权→→→货币私铸→→→经济兴盛→→→异族入侵→→→丧失半壁江山！分权必然伴随着封建统治者衰落，既然封建统治者无法干预经济，经济也就获得了成长空间。只不过，封建集权衰败的同时，一定会为游牧民族入侵留出空间，中原大地可能陷入长久的战乱之中。不必惊讶于历史的相似，这也不是中国历史独有的怪圈，而是世界范围内存在的一个问题。只不过，东方游牧民族的形象是倏忽而来的骏马，西方海盗的形象是船桅杆上的骷髅旗。上古时代，发达的爱琴文明是典型的分权社会，结果，希腊城邦制国家为罗马铁骑毁灭；古罗马也建立了原始民主制度，结果，罗马帝国被日耳曼雇佣兵击溃；法兰克王国几乎所有王室成员都为四处流窜的北欧海盗烦恼。从此，欧洲进入了黑暗的中世纪。

我们的模式是“集权-分权-集权”，汉祚得以延续几千年；西欧的模式则是“分权-集权-分权”，西欧不断变更着主导民族，雅典、罗马人早就在历史的长河中消失的无影无踪，曾经烜赫一时的日耳曼人则在城堡里龟缩了几个世纪不敢出头。集权、经济衰败、民族延续，分权、经济兴盛、亡国亡族，根本无法判断历史逻辑的对错。

得失之间，我只见到了历史老人狡黠的笑容。

楼主：天圆地方的困惑 时间：2021-10-16 00:57:12

楼主：天圆地方的困惑 时间：2021-10-16 00:57:12

楼主：天圆地方的困惑 时间：2021-10-16 00:57:12

《中国是部金融史》作者简介：

陈雨露：金融学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校长，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入选人事部“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

杨忠恕：副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管理学博士后、金融学博士。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获得者，中国青年发展研究基金获得者。

楼主：天圆地方的困惑 时间：2021-10-16 00:57:12

第8章 南朝金粉

（南朝）

人人生而不平等

有人天生丽质、有人生而丑陋，有人出生就含着金钥匙，有人奋斗终生还不如别人的起点。尽管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选择奋斗、选择创造财富，却永远不会有人能选择自己的出身，出身的平等注定会在下一代人身上延续。

这当然不合理；这是残酷的现实；这才是人类社会进步最终动力。

从来没有一个暴君能毁灭一切社会财富，也就不可能让所有人都回到同样的起点。说起来，西方那句振聋发聩的“人人生而平等”是一句绝对违反西方经济学常识的口号，没有贫富之分就没有竞争，没有竞争社会又如何可能存在？

所以，1776年美国《独立宣言》的才向全世界庄严宣布：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每一个人若干不可让渡的权利，这些权利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力。

平等永远是相对的，不平等才是绝对的。

自古以来，人类从来都靠祖先的积累传承利益：日耳曼氏族首领逐步演化为骑士，中国士族的官位也来源于祖荫。无论士族还是骑士，这些人都有自己的封地、有独立的利益，不可能对皇帝（国王）惟命是从，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分权博弈，成为制约皇权最强大的力量。

要想打破这种源自祖先的财富传承，只有具有绝对皇权的力量，绝对皇权一旦出现，世界的财富规则就会改变。

这又是一种怎样的不平等呢？

桓温废了九牛二虎之力推行庚戌土断，桓温死后还是无疾而终。东晋谢安继续启用寒门素族，打赢了淝水之战，刘牢之、刘裕等一批出身贫寒的将领获得了北府兵军权，最终成为东晋王朝的掘墓人；桓温子桓玄靠北府兵篡夺了东晋帝位，大将刘裕又消灭了桓玄。公元420年，北府兵将领刘裕称帝，起自草莽的刘宋王朝诞生了。

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我们要敢于打破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刘裕的问题，就在于他只能打破一个旧世界，却不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刘裕既不是皇族，更不是士族，只是一个不太认字、以卖草席为生、喜欢赌博、从来就不被人看得起的流氓（仅识文字，以卖履为业，好樗蒲，为乡间所贱）。北府名将也无不是二百五出身，当兵之前从来没有光辉的事迹可以炫耀（并起自竖夫，出于皂隶当牧之下）。这些人在刀剑锋镝中摸爬滚打，永远不会对弱者妥协，一旦出镇一方无不刮地三尺（贪纵过甚），甚至直接从国库拿钱，刘宋立

国数年，依旧是府库空虚（府库为之空虚）。

这样粗鄙的统治集团，士族高门当然无法接受。在他们眼里，刘裕等人不仅是彻头彻尾的乡巴佬（言音甚楚，举止施为、多诸鄙拙），也永远是一群刀头舔血的暴徒。

士族虽然被剥夺军权，却依然对北府集团表现出最大的不屑。太后的胞兄去拜访琅琊王氏家中拜访，主人对客人一言不发，反而问自己的仆人：“这个人是跟你什么关系？”，然后，当面把太后胞兄坐过的椅子烧掉……。

现在，刘裕已经是皇帝，他不能容忍士族高门如此放肆。在皇权眼里，没有朋友，也不会有敌人，只有“被统治的人”和“不被统治的人”。士族高门之所以觉得自己高高在上，不就是因为有钱吗，有钱就不想被皇权统治吗？

谁不把你的钱给我，就让你彻底没钱！

历史没有留给刘裕足够的时间，刘宋王朝刚刚建立两年（422 年）刘裕就死掉了，抢钱的任务落到太子刘义符的身上。

刘义符主要靠兴办金融业捞钱，即，放贷款。

大家也许不会想到，在世界范围内旅馆是最早经营银行业务的行业之一，中国当然也包括在内。因为，宾馆的作用不仅仅是为客人提供住宿，还为客人寄存财物，一般情况下宾馆会留存一个货币余额，也就可以用这个余额对外放款——高利贷。刘义符在位仅六个月，六个月内，最大的施政亮点就是宣布京城所有的邸店都归他所有。要知道，先秦时代邸店可是一个下九流的职业。现在皇帝居然亲自操刀上阵，实在是因为太赚钱了，据说资本回报率达到 1000%，绝对是一个最拉风的“暴利”行业。

京城皇家邸店有着固定的目标客户——士族高门，放贷的目标也不是获得利息收入，而是直接瞄准了贷款人的抵押物——土地。皇帝会以各种手法逼迫士族高门借款，士族高门借款又必须以土地抵押。

又有那个士族高门真的敢来还钱呢？

鉴于刘义符实在太离谱，跟直接抢钱基本没什么区别，很快他就被自己兄弟刘义隆干掉了。

楼主：天圆地方的困惑 时间：2021-10-16 00:57:12

敬启者，图书刚刚出版，预计店商上线需 10 天左右时间，春节前应该可以到达实体店。感谢各位支持，希望能继续为大家奉献更好的作品。

同时说明一下：《中国是部金融史》原拟定名为《贫富之刀——世界是部金融史（中国卷）》，目前出版为第一册，主要内容并不限于金融货币政策，为把问题能说明白，古代财政、古代土地、古代税收均多有涉及。

本帖内容为 8 月份校正版，有些地方存在错误，很多网友已经批评指正，多承教诲、受益良多、一并感谢！

也感谢@东经 105 度 @scbelief @ancharn 等诸网友的支持！

楼主：天圆地方的困惑 时间：2021-10-16 00:57:12

@东经 105 度

感谢信任，推荐几本新制度经济学的经典著作。

诺斯，《经济史上的结构与变迁》、《西方世界的兴起》、《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效益》

奥尔森，《国家兴衰探源》、《权力与繁荣》、《集体行动的逻辑》

新制度经济学普及读本

《新制度经济学》——现代外国经济学大系丛书，著者：程恩富 等

《新制度主义》——现代外国经济学大系丛书，著者：张林

《当代西方经济学流派》——著者：方福前

另外也想跟诸位探讨一下，全书借鉴了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即财经制度供给与需求是一个财富分配各方势力的博弈。在语言上，力求平实、诙谐、易读，能为非经济学理论专业读者讲述财经故事。这种写作对我们来说，也是一种尝试。在网路上也见到许多网友对这种思路进行了友善的批评，我们在后续写作过程中一定尽量悉心吸收、改正。我们的专业是金融，重点研究方向是国际金融、农村金融和经济学说史，在历史考据方面肯定还存在很大偏差，希望大家能不吝赐教，以期更大进步、为大家奉献更好的图书及相关作品。

楼主：天圆地方的困惑 时间：2021-10-16 00:57:12

刘义隆便是刘宋历史上的宋文帝，之所以被称为“文帝”，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刘义隆抢钱的手段比较文明——用钱来剥夺别人的钱。宋文帝之“文”少了很多暴力，却更为残酷，按照他的做法，士族高门的财富在瞬间全部贬值。

以钱抢钱的方法，说穿了就是货币改革。

刘宋元嘉七年，宋文帝设立钱署开炉铸币。对中国货币史来说，这次铸币有着特殊的含义，此时，官铸货币在中国已经消失了三四百年，数百年来货币始终靠旧钱和民间私铸。刘义隆的出现改变了这一切，官铸货币再次出现在中国大地上。宋文帝推出的货币在历史上被称为“四铢钱”，制形与汉代五铢钱相似，重量也在3.5克左右。四铢钱与五铢钱最大的不同的是，一枚四铢钱可以当两枚五铢钱，又可抵大致八枚“沈郎钱”。反正包括刘义隆在内的皇族和封建官僚都没多少钱，只有士族高门才有五铢钱和沈郎钱。

对拥有五铢钱和沈郎钱的士族高门来说，这绝对是一笔赔钱的买卖。与晋王朝相比，刘宋王朝更倾向于以暴力解决问题，今夕不同往日，士族高门对此几乎无法反抗。货币改革后，皇权和士族高门的财富优劣立刻扭转。

这里要说，刘义隆推行的“四铢钱”还不是刘宋一朝最恶劣的货币制度。

“四铢钱”与西汉五铢钱重量相当，只是一种“大钱”。文帝之后的几代帝王不停执行货币减重，宋明帝刘彧年间居然推出了一种“永光四铢”，虽然钱币上还铸有“四铢”二字，实际重量不足1克。就是这种永光四铢钱，居然要和文帝四铢钱一样要换两枚古钱或者八枚沈郎钱！

民间私铸者无论如何也不能强迫所有人接受他的货币，也就没有人能靠铸币抢劫别人财富。封建官府铸币的基础却是皇权，是具有暴力性质的国家机器，无论如何减重都是法定的货币，也就成为最犀利的抢劫利器。

光怪陆离的末世王朝，当帝国统治者已经丧失了其他掠夺手段，虚幻出来的货币财富也就成了救命稻草。超级货币减重无异饮鸩止渴，如果封建帝国已经丧失了统治能力，谁会承认虚值货币，谁又会真的把财富让渡给帝国统治者呢？

楼主：天圆地方的困惑 时间：2021-10-16 00:57:12

钱财断手足

最显而易见的赚钱方式是创新，只有全新的技术、全新的产品、全新的运作模式才容易形成垄断、才可以由经营者定价、才能赚大钱。对中古时代的农耕民族来说，任何一种异地商品都是显而易见的创新，商业也是利润最丰厚的行业之一。

魏晋年间，江南扬州、建康、益州、荆州水路通畅，本来是天下货物的集散地，也是天下最富庶的地区。刘宋年间，江南民间商业几乎绝迹。能做生意的人只有一种，那就是封建官僚。其他人想经商，也可以，只要缴足够多的税收——足以让任何一家富商破产的税收：刘宋时代商路关卡林立，每个关卡都要缴 1% 的关税，另外还要在贩卖地和采购地缴 4% 的商税。

蜀马耐走长路、天府织锦更是冠绝天下，益州典签刘道济正好经营蜀马和蜀锦。典签不过是一个七品官，却握有很大权力，因为典签是皇帝派来监视刺史的就是这个刘道济，居然以官府名义出台这样一个政策：苛杂的税收之外，普通商人贩运丝、锦加在一起每次不得超过五十斤；除他本人之外，只要川马出境，无论良莠，价格都不准低于二万钱——这是一个不可能交易的价格，当时一头耕牛的价格不过只有三千钱。通过垄断川马和丝锦贸易，刘道济短短数年间赚到了 3 亿个铜钱，可以买到 10 万头耕牛。

任何一个时代，小康之家都有一个公认的非货币标准，比如今天的“有房有车”。刘宋年间小康之家的标准则是有一头耕牛，也就是说，刘道济一个人的财富至少抵得上 10 万个小康之家。以今天耕牛的价值核算，10 万头耕牛需要三亿人民币，如果将耕牛折算为今天成都的房产，这个人的身价量级已经是千亿。

千亿，一个多么恐怖的财富单位！

财富积累自有规律，除非改变世界的创新，比如机械、电能、互联网，除此之外，如此暴利唯一来源就只能是存量财富的再分配。这种利益分割甚至是通过市场的名义进行的，一类名为商品的货物只掌握在封建官僚手中，即使通过市场进行买卖，本质也只是以市场为手段重新分割财富存量，实现财富向一小撮人手中转移。刘宋是封建官僚最幸福的时代之一，据《宋书》记载，当时的封建官僚那是相当有钱：宁州刺史萧惠开家财数亿钱，益州刺史刘郡以黄金铸造浴盆……。《南史》中绝大部分刘宋官僚都有这样的绰号：刺史一级的经常被人称为“孙亿万”、“刘千万”，县令一级的则被人称为“王新车”、“庾大宅”……

如许规则之下，最赚钱的行业当然是“当干部”，最能捞钱的“干部”是最大的官——皇帝，刘宋皇帝中最能捞钱的当属宋孝武帝。

宋孝武帝抢劫的第一个对象，当然就是这些“有钱的官”。

我虽不会玩麻将以及扑克牌，却也知道，下级跟上级打麻将、玩扑克是不能真赢的，所以“领导听牌我自摸”属于几大傻。时光流转，刘宋孝武帝时代领导与下属的赌博规矩要残酷许多：封疆大吏是一定要跟皇帝赌博的、赌博是必须输的、输钱是必须输到倾家荡产的。这就是宋孝武帝别出心裁发明的捞钱方式——赌博，专门对付有钱的封建官僚。

宋孝武帝末年，凡两千石以上的官僚罢任返京，皇帝都要亲自跟他玩几把骰子，结果自然皇帝是有赢无输，一直要把对方家产赢干净才肯罢休（孝武末年贪欲，刺史二千石罢任还都，必限使献奉，又以蒲戏取之，要令罄尽）。

楼主：天圆地方的困惑 时间：2021-10-16 00:57:12

对付没钱的黎民百姓，宋孝武帝也有自己的方法。

黎民百姓不是封疆大吏，皇帝不会为了几个小钱亲自动手，况且收税的皂隶还不知要捞多少中饱私囊。宋孝武帝很聪明，他想到了一种很好的方法——囤积居奇，只不过手法远比一般奸商高明。

两晋以来，江南就有“衣被天下”之称，历代君王对江南纺织业始终轻徭薄赋：养蚕户纳绢不过三匹，而且只限于长江下游一带。为了抢夺黎民百姓的钱，宋孝

武帝以江南绢丝为题布下了一局大棋……

第一步，布局。

大明四年，宋孝武帝开始在全国高价收购绢丝（请注意，是高价收购，不是强行征收）。结果，一年间，江南所有绢丝全部断货。

第二步，中盘。

大明五年，宋孝武帝突然宣布：养蚕税税基扩大到全国所有黎民百姓，每户百姓要纳绢四匹。这对黎民百姓就是一个悖论：百姓根本不可能上缴如此多的绢丝，新产绢丝存量不足，原有的绢丝又早就被皇帝买走了；百姓又必须缴纳绢丝，否则，对抗皇粮国税是要坐牢的。

结论：手里没有绢丝的人也可以去市场上去买，比如，皇家的直营店。全国绢丝价格立即暴涨，当年，一匹绢居然涨到 2000-3000 钱，这可是当时一头耕牛的价格，相当于今天让每家一年内缴纳一套房子作为税款！

第三步：收官。

就在这个时候，宋孝武帝不失时机抛售了一批绢丝，虽然绢丝价格最后控制在 1000 钱左右，但是，百姓仅有的一点土地、仅存的一点铜钱也都流入了皇帝的腰包。

即使 1000 钱的价格，绝大多数人仍旧是缴纳不起，那一年，不知多少人倾家荡产，“卖妻儿，甚者或自缢死”。宋孝武帝当政最后一年（464 年），富庶的浙东数郡发生旱灾，朝廷不但无力赈灾，反而照旧收租。结果，灾害程度不及古代一半，饿死者却是古代数倍（病未半古，而死已倍之），富庶的京师也是饿殍遍野……

西汉年间，皇权缔造了“皇帝-封建官僚-小农”的社会框架：这是一个倒“丁”字形的社会结构，封建官僚站掌控了绝大部分社会财富，其余的人都处在低端，顶层和低端之间没有任何缓冲带。如果顶端的人选择了掠夺，所有的人同样会选择虚伪和卑劣，这才是获得财富最有效的渠道。这样的社会框架不会也不可能提供创新空间，重大创新的历程必须依靠帝国全体臣民在点滴试错中积累。

刘宋时代，“皇权-封建官僚-小农”的社会结构再次出现在江南一地。士族高门势力被迅速清洗，寒门素族以军功起家，十几年间占据了所有朝廷要津，也迅速把触角伸及社会每一个角落，从货币、土地到税收，皇权推行的所有政策都被异化为抢劫的工具。

不同于西汉的是，刘宋本就是一个偏安江南的王朝，国家时刻面对来自北方异族的挑战，根本没有前世的财富积累。皇权对财富的获取机由掠夺变为抢劫——不仅是对社会底层的抢劫，也包括皇族和封建官僚集团之间互相抢劫。刘宋皇室也成为中国历史上命运最为悲惨的皇室，开国皇帝刘裕共有男性后代 158 人，这 158 人中有 114 人死于非命：子杀父者 1 人、臣杀君者 4 人、兄弟相残 103 人、为外人所杀者 6 人。皇室成员如此大规模自相残杀，此前从未有过，此后也再未发生。

在皇权的逻辑里，权力才是真正的手足，只要有钱就会满街都是兄弟。一旦皇权开始抢劫自己的支持者乃至宗室，帝国就基本丧失了统治能力，强者在皇权之下都会沦丧财富，何况苍苍蒸民？

衣服破尤可补，手足断不可续！

楼主：天圆地方的困惑 时间：2021-10-16 00:57:12

全民高利贷

刚刚建立的刘宋王朝必须依靠封建官僚，又不能让封建官僚过分掠夺百姓。刘宋末年，宋明帝为了搞平衡、平民愤，经常对封建官僚施以残酷的刑罚，不但让人血本无归，还经常搞满门抄斩、虐杀之类的娱乐活动。显然，这不是平衡跷跷板的方法，如此，封建官僚和天下黎民都被搞的血本无归、家破人亡。

无论是谁，要想彻底逃出这个循环，只有一个选择——自己成为皇帝。

刘宋右军将军萧道成成为刘宋王朝出生入死，仍不见容于宋明帝，于是，萧道成选择了拉杆子造反。十年经营，公元 479 年，萧道成终于废黜了刘宋末代皇帝刘准，创立了又一个新王朝——萧齐。

萧道成是一个雄才大略的君主，曾经发下宏愿“我治天下十年，当使黄金与土同价”。萧齐同样是一个短命的王朝，只存在了 27 年，其兴也忽焉，其亡也勃焉。关于萧齐王朝，我们同样从货币说起。

成功的货币制度都是相似的，一定会顺应经济发展需要；恶劣的货币制度却各有各的卑劣，无论大钱、小钱、通胀、通缩，货币改革的同一个梦想都是抢劫财富。萧齐王朝仅有一次铸币记录，即永明初年所铸的“南齐五铢”。从出土文物推断，南齐五铢重量与刘宋四铢钱相仿，重量在 3.5 克左右。

同样重量的货币到了不同皇帝手里，却能发挥不同的作用：刘宋王朝的四铢钱是类似于“大钱”的虚值货币，造成了通货膨胀；南齐五铢同样是一种“大钱”，却制造了中国历史上极为罕见的通货紧缩。

问题的关键就在于萧齐王朝只有一次铸币记录，南齐五铢铸造量相当小，所以，也就出奇的值钱。萧齐官价规定，一枚南齐五铢的官价可以换 30 枚左右完好的五铢钱，实际流通中，南齐五铢的抢劫能力又远远高出 1:30 的兑换比例。如果以南齐五铢计价，永明年间，一石米的价格仅为几十钱，一匹绢的价格也仅为 300 钱，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萧道成“黄金与土同价”的愿望。

物价下跌虽然可怕，更可怕的是，萧齐王朝维持了刘宋年间的货币税率。刘宋年间一亩地要缴 500 钱作为税款，萧齐年间仍旧要缴纳 500 钱。此 500 钱非彼 500 钱，物价下跌一倍，税款就多出一倍。刘宋永初年间一匹布的市价是 600 钱，永明年间一匹布的价格却只有 100 钱，凭空多出了 5 倍税款。

何况，萧齐官府只收未经减凿的钱币，税收又何止增加了 5 倍？

萧齐王朝一直在有意维持通货紧缩的局面，如果想打破通货紧缩，官府随时可以铸造大钱。因为，真正拥有南齐五铢的人是皇族和封建官僚，通货紧缩越严重，他们手中的财富就越值钱，靠货币掠夺财富的能力就越强。

黎民百姓确实没钱，税款缴不上怎么办？

答：高利贷。

楼主：天圆地方的困惑 时间：2021-10-16 00:57:12

南朝墓葬中经常可以看到借贷契约，令人惊讶的是，除了王公贵族的大墓，相当一部分小康之家的墓葬中也可以见到借贷契约。这些契约记载了借贷事由、时限、利率，借债者多是自耕农，一般数额不会超过 30 文，以半年为限，年化利率平均为 200%，是货真价实的高利贷。

如果债务人到期无力偿还贷款，还可以延长归还期限（今天这种业务被称之为“展期”）。如果延期几次之后，作为抵押的田宅会被债务人收走——那应该是家中仅有的田宅。最后的结果，是债务人以自身作为抵押再次举债，自己沦为奴婢或者部曲。很遗憾，墓葬中的契约无一例外在债主生前都没有得到偿还，也许这些债务已经永远不可能被偿还。之所以这些借据被放入坟墓，是因为债务人在债权人入殓之前要继续签字画押，人们相信在另一个世界里，已经死掉的人仍旧可以向

阳世索债。

按货币经济发展程度推断，南朝货币总量当远逊于汉代；按商品化程度推断，南朝商品化程度又远不如后来的宋代。汉代、宋代当然也有高利贷存在，只不过，汉代高利贷者“子钱家”仅限于大商人，借钱的人一般也是王侯甚至皇帝，至于普通人，您就是想借高利贷，人家还嫌麻烦。宋朝小农高利贷最为普遍，但高利贷者是官府。

唯独乱世偏安的南朝，高利贷规模居然如此之广，实在令今天的经济学家瞠目结舌。《南史》这样记载当时的情况，高利贷“子息滋长，督责无穷”，虽然“财物布在民间”却“为患遍天下”。当然，通常情况下高利贷会以土地作为抵押，一旦债务到期不能归还，债主就会夺其田宅，债务人则沦为佃农（期讫，便驱券主，夺其宅，都下东土百姓，失业其一）。

这里要说明的，不是高利贷利率有多恶劣，也不是失去田宅、沦为奴婢的百姓有多么悲惨，而是全民高利贷背后一个更为可怕的逻辑。

货币的本质就是寻找高收益、高回报，获得收益的渠道有很多种，为何大家都选择“以钱生钱”的高利贷？

刘宋、萧齐是封建官僚长成的时代，萧齐一如刘宋王朝，封建官僚新贵几乎垄断了所有的创新行业，所有真正赚钱的投资渠道都被封建官僚堵死，上古时代又没有资产泡沫可以制造，剩余货币也就只能投资高利贷了。

这是一种怎样残酷的逻辑？

——只要有了货币先发优势，抢先一步比别人占有更多的金钱，就一定可以把别人踩在脚下。拥有货币先发优势的人，一般来说是有进取心的人，所以，他们抢先适应了那个时代的规则，获得了财富。一旦这些人把获取财富的轨迹定位为高利贷，也就不会有人再从实体领域谋求财富了。

——贫穷的人只能被货币役使，死去的人不可能有人埋葬，鳏居的人不愿意再娶，生了孩子只能偷偷杀死（贫者但供吏，死者弗望埋，鳏居不愿娶，生子不敢举）……，无怪乎有人惊叹“杀人之道日有数途，生人之法岁无一理，不知复百年间，将尽以草木为世邪”。

货币只是财富的一种符号，并不是真正的财富，高利贷所有的作用只是财富转移，不是创造财富。如果所有人都不去创造财富，萧齐王朝的前途又在那里呢？

楼主：天圆地方的困惑 时间：2021-10-16 00:57:12

西汉末年的流民魔咒很快应验，可怕的流民再次出现在江南水乡：一县之中经常有数千流民，上万人的流民队伍又开始在阡陌间游荡，问题是，南朝一共才有多少臣民？这些人啸聚深山，以天险对抗官军，平日则以抢劫为己任。可怜江南鱼米之乡、三吴之地，居然成为“仓廩既虚”、“草窃充斥”、“饥寒尤甚”、“流冗者多”……

萧齐永明三年（公元 485 年），就是在王朝开始铸币的当年，富阳人唐氏聚集数万人流民，一路攻破桐庐（今江西桐庐西）、钱塘、盐官、诸暨，最后在钱塘称帝，国号“吴”。尽管萧齐王朝派出的“台军”（皇宫禁卫军）最后攻破了这支流民军队，但是，台军所到之处抢劫之风更甚于流民。

萧齐立国 27 年，几乎年年都有流民暴动，连年通缩加上全民高利贷，刚刚建立的萧齐王朝，仅历一帝就变得风雨飘摇……

在这里，我们还要提及另外一种高利贷债主——寺庙。寺庙也是世界范围内最早从事信贷活动的主体之一，希腊神殿就经常把人们送来的供奉借给自由民中的赤

贫者，然后将之变为自己的奴隶。

中国佛教最早见于断代史《后汉书》，其实，所有宗教的教义都是导人向善，佛教莲花的寓意也是此岸淤泥中的纯净，象征着人类可能站在莲花上走向彼岸。所以，佛教徒要讲苦行，83 版电视剧《西游记》中唐僧有一句经常用的台词“悟空，去化些斋饭来”；其实，这句话也可以理解成“悟空，去要些饭来”。

萧齐时代，在册寺庙共有 2500 座，僧尼 8.2 万人。在生产剩余本就十分稀少的中古时代，供养如此庞大数量的消费者，绝对是一个令人瞠目结舌的数字。我没听说这些南朝僧侣有孙悟空的法力，我却知道他们有着比齐天大圣更为幸福的生活，在尘世此岸就已经到达了彼岸的天堂——物质的天堂。

朝寺庙发明了一种新的业务——僧邸粟，寺庙还有经营僧邸粟的常设机构——长生库。因为，《大藏经》曾说过“以佛塔物出息，佛言，听之”，何况，僧侣要在此岸享受彼岸就必须有钱，有钱还得让钱生钱。

僧邸粟，说白了也是高利贷。其市场定位颇和佛祖普度众生的教义，上至王侯、下至百姓，大家都可以来寺庙借钱度日，主要区别是贷款期限，有长期也有短期。——长期贷款本金通常是货币，一般以十年为期，利息“不啻倍徙”，即高于官府给定的年利率率 100%。如此高的利息率、如此长的借贷时限、又在一个如此之高的通货紧缩时代，借钱的人也就只能是封建官僚。只有封建官僚才可能还的起这笔利息，也只有这些人确保能在十年内连续获得年 100% 的收益。

——短期借贷以粮食、杂物为本金，一般以一季作物为限，是“咱南朝老百姓自己的银行”。就是利率实高的离谱，以“一日一夜”计算，隔夜拆借利率高达三分七厘（37%），贷款逾期罚款则利上生利，迟还两天就要做牛马偿还（按通行价格，做耕牛一天偿还 8 文钱，做马一天偿还 7 文钱）。一般情况下，僧邸粟利滚利会让债务人当一辈子“牛”、“马”了。寺院还往往借助佛祖的威力恫吓债务人，欠债潜逃来生就会真的变牛变马，只有死亡才能逃脱这种厄运。所以，债务人只有两个结果，要么“奴为比丘僧，婢为比丘尼”、要么“自缢而亡”。

高利贷业务为寺庙赢得了丰厚的利润，高级僧尼不但有役徒、婢女，而且“出则必车”、“归则必浴”、“居必方城”，京城三分之一的地产居然都是寺庙的庙产，绝对比今天任何一家寺庙 CEO 都拉风。

在神性面前，人性永远只能求得宽恕，萧齐僧徒却向神求官、求财、求子、求平安……，总之，尘世所有得不到的东西都向神求。作为报答，人们建大佛像、建大寺庙，似乎只有这样佛祖才会施恩于信徒。当人们顶礼膜拜这些偶像的时候，不知可否想过，如果金钱才是通往神性的康庄大道，神性和人性又有什么分别？人性的罪孽，岂可用金钱偿还？

用钱可以买通的神，真的是神吗？

楼主：天圆地方的困惑 时间：2021-10-16 00:57:12

萧齐祸福

萧齐之后是萧梁，萧梁享国 55 年，开国皇帝梁武帝萧衍一人独占 47 年，这也是一个让历代史家头疼的皇帝：

——萧衍自幼好学，耄耋之年仍手不释卷；

——萧衍称帝之前就已经文名满天下，称帝后崇儒重道、信仰佛教，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融汇儒、道、佛三教的皇帝；

——萧衍是中国历史上最长寿的皇帝之一……

以上种种，都没用。对中国历史而言，萧衍最重要的身份永远是皇帝——梁武帝，他所缔造的萧梁是又一代起自寒门素族的封建王朝。

与萧齐对货币的谨慎态度相反，萧梁王朝立朝之初就开始铸造货币，而且没有禁止民间私铸。萧梁之前，中国铸造技术还不能实现在一枚铜钱的两面上都锻造出花纹，所以钱币都只有一面有钱文；萧梁之后，官府掌握了双面压制技术，只有官铸货币才是双面压制，民间私铸只有单面钱纹。虽然官铸和私铸货币同时流通，普通人凭一眼就可以判断出那枚是民间私铸、那枚是官铸。

这是最好的防伪标识，靠着这种技术，萧梁王朝也发明了一种恶劣的掠夺制度。——萧梁官铸的铜钱叫做“天监五铢”，这种钱至今已经没有流传，按《隋书》记载天监五铢有内外两个轮廓，应该是一种精美的足值货币。

——萧梁还有另一种铜钱叫做“公式女钱”，为民间私铸。女钱的意思，就是说这是一种又轻又薄的小钱，其重量与太平百钱、女钱相仿，大约重量为1克。

萧梁朝廷规定，一枚天监五铢可以换10枚公式女钱。事情的结果却是，天监五铢和公式女钱同时流通时间不到一年，梁武帝却发现自己的钱越来越少，似乎所有的天监五铢都人间蒸发了，官衙却不得不耗费铜材铸造新的天监五铢……

为了对抗“劣币驱逐良币”的格雷琴法则，梁武帝想到了一种新的方法，让自己成为劣币，民间又不能模仿……

一年后，梁武帝又铸造了一批双面带花纹的货币，这些货币又大又圆：大富五铢、大吉五铢、大通五铢……，名字都很好听，其实不过是一堆“铁钱”。此前，只有末世王朝穷凶极恶的封建军阀才铸行铁钱。西汉铸铁钱、蜀汉铸铁钱，广大人民无畏严峻刑罚积极私铸，当权者也就无法真的依靠铁钱聚敛财富；萧梁铸铁钱，既然可以在铜钱上实现双面压制，同样也可以在铁钱上双面压制，民间确实无此技术，也就无法模仿官铸铁钱。

梁武帝并不是一个一无是处的人，他也有理想，希望帝祚永延。所以，梁武帝捞到钱后，便开始以铁钱赎买士族高门土地，并把这些土地分给游荡于阡陌之间的流民。

在“皇权-封建官僚-小农”的框架中，封建官僚不但会放大皇权对小农的压力，同样也会屏蔽皇权巩固统治根基的政策。安置流民本是一件巩固萧梁王朝根基的政策，广大萧梁封建官僚还是很快就从中找到了发财机会。毕竟黎民百姓距离皇权最为遥远，根本不可能拿到皇权手中的资源，只能“老弱转乎沟壑，壮者散于四方”。

我曾经说过，皇权处理这个问题的关键是在“培养封建官僚”与“打击封建官僚”之间走平衡。刘宋王朝末年对官僚打击十分残酷，最终导致丧失了统治基础；萧梁王朝却把这个逻辑翻转过来，对封建官僚过于仁慈。

面对封建官僚疯狂的掠夺，梁武帝不但无动于衷，还经常以佛教教义教训子孙，对人要宽容、对人要仁慈、对人要有善心。梁武帝所谓的“人”仅包含封建官僚，他对封建官僚最仁慈……

梁武帝的六弟叫做萧宏，官居南兖州、北兖州、北徐、青、冀、豫、司、霍八州“北讨诸军事”，是一个权倾朝野的人物。此人曾率军北征，大军夜遇风雨，萧宏对敌情保持着十二分的警惕，那真叫“风声、雨声、声声入耳”——他居然以为风雨声是敌军来袭，于是只身逃窜，萧梁数十万大军不战自溃……

这样一根废柴，家中居然有无数房间常年锁闭不开。

关于萧宏家中紧锁的房子，梁武帝也得到了线报，他的消息是：那些都是秘密仓库，藏满了兵器，就等着皇帝打盹的时候起兵篡位了。

寒夜，萧宏在家独坐。

一群不速之客突然造访，为首的是梁武帝梁武帝。饮酒半醉之后，梁武帝突然提出要查看萧宏的库房，然后，不等萧宏答应就命令卫兵砸开了后院的三十多间仓库……

没有见到兵器，却见到满库金银珠宝和铜钱——天监五铢。

看起来，萧宏这根废柴对货币还是有一定判断力的，知道铁钱不值钱，要存就存天监五铢。仓库里很有秩序，每十万钱装一个箱子、每百万钱放到一起再贴上一道黄纸、每千万钱再放到一起贴上一道紫色的缎子……；除了天监五铢，还有很多库房则堆满了绢、丝、棉、朱砂、蜡烛、漆器……

面对目瞪口呆的皇帝，萧宏心中一凉，觉得末日到了。

看到满室财宝后，梁武帝心中也很轻松。钱币财宝又不是刀枪兵器，有这么多钱财，说明这位手把兵权的弟弟并无意染指皇权的意思。最后，皇帝只是说了一句，“阿六，还是你会打点生活”。

兄弟二人继续喝酒，是夜，尽欢而散。

在历代文学作品和今天的影视剧中，皇帝打击贪官无疑是一个永恒的观点。皇帝真在乎手下这帮封建官僚贪污吗？

分析这个问题，我们要借用西方经济学里两个基本假设条件：经济理性和交换对等。封建官僚是理性的，所以，他们要赚钱。赚钱，就是皇帝给封建官僚的交换条件，价格起码要高于一个普通人的财富总额。

开创盛世的条件是在封建官僚和黎民苍生之间合理分割社会剩余，保证黎民苍生不被齐颈深的水淹没，也要保证封建官僚有维持王朝统治的积极性。刘宋王朝皇室对封建官僚进行了超量掠夺，结果，萧道成反叛；萧梁王朝则对封建官僚过于仁慈，梁武帝当政四十七年，对封建官僚百般容忍，对黎民百姓又尽极剥削，“罔恤民之不存，而忧士之不禄”。

在实实在在的利益面前，纵有一两个“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处庙堂之高则忧其民”的治世能臣，风节俊厉的烛光又怎能照亮黑夜？

皇权对封建官僚有多少容忍，对黎民百姓就有多少罪恶。

楼主：天圆地方的困惑 时间：2021-10-16 00:57:12

——一方面，国家的池苑、王公的宅邸、僧尼的宝塔布满了帝国，在位官僚妻妾满室、仆从数千、不耕不织而锦衣玉食。这些财富，不耕不织，不夺百姓，从何得之！（梁自近岁以来，权幸用事，割害齐民，如曰不然，公等试观：今日国家之池苑，王公第宅、僧尼寺塔、及在位庶僚，姬姜百室，仆从数千。不耕不织，不夺百姓，从何得之）。

——另一方面，萧梁王朝对百姓又如此残酷，萧梁编户不过 500 万人口，每年判处 2 年以上徒刑的人却有 5000 人之多。萧梁王朝从第一天起就始终面对流民的威胁：天监四年（505 年）、天监十年益州地区爆发十万人的流民起义、中元大通元年（529 年）北兖州流民起义、中大通二年会稽流民起义、中大通五年益州流民居然攻破成都……

梁武帝丝毫不知控制封建官僚的力量，封建官僚中迟早会生出擎天巨孽，不是这些民贼贪婪、狡诈、阴险，而是黎民百姓已经羸弱不堪，根本不足以支撑一个王朝了。很快，萧梁王朝的惩罚者就出现了——侯景。

在这场史称“侯景之乱”的闹剧中，封建官僚演绎了最为丑陋的一幕。太清二年（548 年），东魏降将侯景以萧宏（前面所谓的“阿六”）之子肖正德为内应，起兵反叛梁武帝。大名鼎鼎的侯景，其实只有马匹数百、士兵更是不足万人，这样的军力居然在数十日内势如破竹直逼京城建康。

萧梁又有多少军队呢？

不算台城军队，仅集结在建康附近的勤王之师就多达 20 多万。危亡之际，梁武帝一直引为柱石的封建官僚居然作壁上观：邵陵王萧纶、东扬州刺史萧大连、南兖州刺史萧会理、司州刺史柳仲礼、西豫州刺史裴之高、高州刺史李迁仕，等等，这些人不但不出兵，反而在城外大发战争财。

侯景总计包围建康一百三十多天，当地百姓早被屠戮殆尽，在叛军无法获得给养的情况下，居然靠勤王之师接济粮草！

勤王之师对侯景开出来天价：一斛粮食要几十万钱，据说当时交易已经不再数钱，而是数一数有多少装钱的车（交易者以车载钱，不复计数）。至于建康城内，被围时间既长，城中粮食耗尽，人们吃光了城里的麻雀和老鼠，一斛粮食高达八十万钱，一条狗也要二十万钱。

侯景本是一个顽劣不堪的乡里流氓，军事上的成功丝毫不能掩饰其品行的下流和卑劣。建康城破，这群暴徒不但焚烧了文德殿珍藏的历代典籍，还想到许多变态的方法屠杀士族：驱赶高门子弟服劳役，死掉的人被直接埋入城墙；破城后把士族子弟下半身埋在土中，以军马践踏上半身，死者两千余人；将士族高门妻女发配给奴隶为妻，或尽没入军营……。逃出建康城的士族“填委沟壑、不可胜记”，没有逃出来的人，只能关上家门、穿好衣服、兜里揣着珍宝金钱，听天由命（衣罗绮、怀金玉，交相枕藉，待命听终）。

经此一难，江南士族几乎被屠戮殆尽：谢安是曾经指挥淝水之战的人物，子孙谢贞死在乞讨的路上；吴兴沈氏曾经“沈郎青钱满鹿城”，侯景之乱后，一名男婴要靠父辈所有人供养才得以延续香火……，数百年长盛不衰的江南士族终于彻底走向了衰亡。

大宝二年（公元 551 年），侯景兵败被杀，荆州刺史萧绎在江陵称帝，即梁元帝。称帝当年，梁元帝就开炉铸造新币，史称“当十大钱”，一枚大钱可以当十枚铁钱用，等于公开承认货币贬值 5 倍。

大通胀再现江南，萧梁王朝终于走到了尽头。

楼主：天圆地方的困惑 时间：2021-10-16 00:57:12

南朝小结：逝去的贵族

东汉至刘宋，中原大地 400 年间再无官方铸币记载，这并不奇怪。400 年间，士族高门大鸣大放地私铸货币，搞出了一批又一批伪劣残次品：“沈郎钱”、“女钱”、“青钱”……。尽管这些私铸货币又轻又破，但是，这是战国之后中国货币制度的又一次内生演进。士族高门之间的竞争保证了货币多元化，根本就没有人能靠铸币聚敛天下财富。所以，董卓的“无字小钱”被人痛骂了几千年，却从无人指摘士族私铸。

皇帝并非不想禁止士族高门私铸，只是士族高门在地方上有自己的地盘、在朝堂之上靠祖荫为官、甚至有自己的军队，根本就不会仰皇权鼻息。

在历代史籍中，士族高门看起来又是一群非常不靠谱的人：喜欢酒后裸奔的刘伶、想念鲈鱼美味就挂冠而去的陆生、连公文都不认识却官至极品的嘯父……。故纸堆之外，我还想再跟大家提起另外一些湮灭已久的士族高门，也许他们才代表士族高门真正的精神。

——西晋末年，五胡乱华，如果从经济视角考虑，投降、保存经济实力并与异族政权合作无疑是最优选择。除了南渡的士族，更多士族高门选择了坚守坞堡，当繁华已成焦土，这些人孤军抗敌，希望能靠一己之力在“长安-洛阳”一线延续汉族血脉，最后，身陷虏廷却杖节不屈。

——东晋有一批对中华文明做出卓越贡献的人，封建权力已经无法泯灭他们的功勋，画家顾恺之，书法家王羲之、王献之……，这些人都是第一流的士族高门。很遗憾，历代史籍在有意无意间忽略了这个背景。

也许，尘封的故纸堆从来就没有士族高门的容身之处，因为，他们是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可以称为贵族（aristocrat）的人。贵族代表的精神，恰恰是皇权最为讨厌的东西——超越经济利益，追求独立、责任和文明。

真实的士族高门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群体？

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先要解决另一个问题：什么才是士族高门？

在中国史籍中，士族高门曾有很多名字：世族、豪族、势族、冠族、大族、右族、旧族、甲族、望族、茂族、华族、高门、著姓、华阀、阀阅、门阀……，这些名字只传递了两个信息——“权”和“钱”。

有权又有钱，就一定是士族高门吗？

“当官的有钱人”在中国历史上曾经另有一个专有称谓，叫“素族”。“士族”之“士”传承于东周，是列国贵族门下的客卿，战国则专指知识分子，也是上大夫的代称。秦灭六国后，贵族从未风流云散，十几年后他们重出江湖成为抗秦战争的中坚，比如，西楚霸王项羽。西汉年间，这群人是为数不多掌握文字的人，理所当然成为帝国的官僚，毕竟中国古代读书同做官从来就是不可分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批人既不同于西汉帝国创建时期的军功地主，更不同于汉武帝之后武断乡曲的地方豪强。

所谓“士族”，必自战国起就累世为官、以儒术传承家室。唐朝曾修《宰相世袭表》追溯士族世系，只有其中的“柳芳二十六姓”才能称得上“士族高门”。当然，以“九品中正制”为基础的士族体制断绝了社会阶层流动、占据了社会绝大多数社会财富，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寄生性群体。

开好车，就一定是坏人吗？

楼主：天圆地方的困惑 时间：2021-10-16 00:57:12

开好车，就一定是坏人吗？

不同时代、不同问题、不同情况，关于一个事物、一个现象、一个群体的判断标准也是不同的。“士庶天隔”确实非常反动，这却是中国历史上唯一曾经对真正制约皇权的群体。鉴于自己已经有权、有势、有财，有权、有势、有财又不用靠皇帝，士族高门能自觉地将文化价值的理性孕育于治国活动，社会由此也获得了稳定的根基。权力制衡的本质就在于各种竞争势力之间形成妥协，不会有一人独占天下之利。

也是这个原因，士族高门之间的斗争具有理性，不会出现社会财富大规模毁灭，东汉、三国、魏晋历代亡国之君也都得以保其首领。东晋更是历代王朝中幼主最多、皇权最为孱弱的时代，却又是皇位最稳定的王朝之一。东晋从来不缺乏可以主宰皇帝命运的士族高门，沈充、周札、王导、庾亮、邢鉴、谢安、谢玄乃至桓温，这些人都手握重兵，却没有一个可能取而代之成为新的皇帝。因为，所有士族高门都不希望出现一个威胁群体利益的强势皇权，同是琅琊王氏，王敦造反却不可能得到王导的支持。

历史选择的方向有时令人无比困惑。

上述道理也可以反过来说，皇帝对士族高门都无能为力，士族高门自己就更不可能形成绝对权威，一旦面对骁勇的游牧民族就会束手无策。

东汉年间西羌搞的天下大乱，晋代却要同时面对匈奴、鲜卑、羯、羌、氏五胡。西晋耍阴谋、搞暗杀那一套只能遏制异族一时，最后还是被赶到了江南；东晋不

是没有能征善战的骁将，桓温在前面北伐，士族高门在后方断其粮草，正如前燕谋臣申胤说“桓温看似声势浩大，却必定无功而返，东晋的朝臣根本没有人希望他得胜。这些人一定会在后方掣肘，让他功败垂成”（以温今日声势，似能有为，然在吾观之，必无成功。何则，晋之朝臣未必皆与之同心，故温之志众所不愿也，必将乖阻，以败其事）

既然士族高门无法整合力量对抗外敌，危亡之际选择一个强势人物统一权力就具备了相当的合理性。前凉、前秦等不过一群土匪就已经把东晋折腾的鸡飞狗跳，东晋末年，北魏已经统一了北方，汲汲然全面汉化，俨然以华夏正统自居，绝非一般杀人放火的土匪可比。

面对如此强大的外敌，桓温被迫启用由流民组成的北府兵。对付外敌之余，北府兵也要当个官、发点财，这是很正常的想法。

就是这个看似正常的想法拉开了士族高门衰亡的序幕：

——刘宋开国皇帝刘裕就是靠北府兵崛起的“匹夫”；

——萧齐开国皇帝依靠三齐流民才得以称帝；

——萧梁开国皇帝萧衍则以秦雍流民为根基起兵灭齐；

——陈朝开国皇帝陈霸先本人是地地道道的土匪出身。

草莽英雄确实有可能在军事上消灭所有的对手，不过，要成为真正的皇帝还必须建立控制帝国的制度。只靠武力不靠制度的人不是皇帝，是土匪，宋、齐、梁、陈四代皇帝确乎只是土匪，不是皇帝。

在他们眼里，士族高门不但不让出财富，还经常与皇帝叫板，致使东晋“王纲弛紊，朝权国命，递归台辅，君道虽存，主威久谢”。既然如此，就要选一批新的代言人——同样出身草莽的寒门素族，也就是封建官僚。

楼主：天圆地方的困惑 时间：2021-10-16 00:57:12

开破车，就一定是好人吗？没权又没钱，就一定能“梅花香从苦寒来”吗？

虽然大家都有钱、有权，封建官僚却有着与士族高门截然不同的财富获取逻辑。坞堡历经数百年风霜，士族高门虽然没有直接创造财富，确保门阀的历程同样要面对强者的竞争，必须不停创造、积累；流民依靠武力起家，需要迅速获得财富，当然不会选择创造。既然有这么多社会财富存量，抢来就是了。刘宋一朝，无论官家铸币还是信贷，都是皇族和封建官僚掠夺财富的利器，“官商”更是垄断了南朝所有赚钱的行业，民间经济遭到一次空前洗劫。

封建官僚必须彻底打破现有社会财富分配格局才能达到目的，他们不需要妥协，对毁灭社会财富也毫无顾忌。靠当官发财的本质从来都是重新分配社会财富存量，只要抢劫财富的成本低于创造财富，封建官僚就一定会选择抢劫。

《廿二史札记》这样评价南朝皇帝：宋、齐、梁、陈诸君，无论贤否，皆威福自己，不肯假权于大臣。疑天下而欲专天下之心，昭然若揭！结果，刘宋皇帝抢红了眼，连自己的父亲、叔父、兄弟、子侄都一并杀掉，顺带抢劫了所有的封疆大吏，在封建官僚洗劫了民间财富之后，皇族再次洗劫整个统治集团。

宗室和封建官僚本是皇权的根基，现在南朝皇帝不按规矩出牌，也就失去了统治的根基。于是，刘宋、萧齐、萧梁、陈朝交替命短。

魏晋南北朝，中国曾在封建集权和封建分权之间犹疑。

很遗憾，至高无上的皇权和封建官僚取代了士族高门，西汉年间“皇权-封建官僚-小农”的社会框架终于在南朝定型。于是，我们也看到了一群比士族高门更加寡廉鲜耻、聚敛无度的强盗。

究竟应该怎样评判这个过程，很遗憾，我无法回答。

楼主：天圆地方的困惑 时间：2021-10-16 00:57:12

第9章 大隋悲歌

（隋朝）

壮哉盛隋

侯景之乱后，江南士族高门衰微，北方士族的中坚——关陇贵族元气仍在。从血统上讲，关陇贵族并非累世为官，也不以儒术传家，他们属于起自西汉末年的豪强，五胡乱华后依附北方异族。公元581年，关陇贵族出身的杨坚废黜了北周皇帝，自立为帝，国号“隋”；589年隋帝国攻破南陈王朝京城建康，生俘南陈皇帝陈叔宝及满朝文武。

东晋以降，中国经历了480年分裂，在隋文帝手中再次统一，仅此一项，隋文帝在中国历史上的功绩就毫不输于唐宗宋祖。不仅如此，隋文帝更是中国历史的一个超级“神人”，中国历史如果缺少了隋文帝，后来的路径可能完全改变。西汉帝国用了整整一百年时间才实现“文景之治”，中间还经历了霍乱天下的“八王之乱”。隋朝立国前，北方“户口租调，十亡七八”，江南也是“千里无烟，人迹罕至”；隋朝立国时，北方突厥已经兴起，当时这是一个毫不逊于匈奴的游牧民族，后来曾逼的唐太宗曾献举国之宝求和；隋朝立国后，短短十几年从大乱转向大治，不但平定突厥，社会财富也开始成级数增加，所谓“古今称国计之富者莫如隋”。

唐朝著《隋书》，对隋朝尽极攻击之事。即使如此，《隋书》仍然这样记载隋朝开皇年间的景象：人们喜欢节俭的生活，民间徭役并不是很重，官府和百姓的仓库里都堆满了粮食，朝廷法令得到执行，富裕人家享受着自在的生活，小康之家也各安其业，见不到强者凌辱弱者，很少有暴力犯罪，天下一派承平景象（众节俭，平徭役，仓家实，法令行，君子咸乐其生，小人各安其业，强无陵弱，众不暴寡，人物殷阜，朝野欢娱）……

隋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奇迹中的奇迹。

从秦朝到宋、齐、梁、陈，历代王朝已经把财富生产和毁灭的轨迹说的很清楚：天下人生产财富的动力是获得财富，一个成功的财富生产分配制度，必须平衡所有集团利益，必须遏制掠夺之手，不能让一个人、一小撮人独占天下利权，更不能让人们劳而无获。

这个道理说起来很简单，做起来又几乎是不可能的。

群雄逐鹿、江山谁属，自然是英雄人物最为关心的话题。“打江山、坐江山”说到底不过是为了掌握、分配天下财富，不为天下之利谁又会颠沛流离半生？从龙之士又怎么可能不去热火朝天地去搞兼并土地呢？

然而，隋文帝坚定的选择了对封建官僚说：不！

与此前所有王朝不同，隋文帝建立了“科举”制度，给封建官僚带上了紧箍咒。隋朝以降，以科举为基础的文官制度始终是中国封建社会赖以生存的根基，直到清末袁世凯效仿西欧推行“新官制”才被打破。

只是近代戊戌变法开始，废科举呼声才不绝于耳，似乎就是这个制度牢笼了中国人才。在痛骂科举之前，我劝大家还是想想，如果科举制真的一无是处，怎么可能流传千年？

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先要明白什么是“科举”。简单点说，科举就是“高考（秀才）+考研（举人）+考博（进士）+公务员考试（中央国家机关）+领导职位公开竞聘（副处级以上领导职务）”，只有一路过关斩将的人才能进入帝国中枢。从

隋朝开始，历朝历代科举舞弊都是一件难度和风险极高的活儿，偶有作弊者并不影响制度本身公平性。这是最接近现代国家“考试权”的一种制度，把选官机制建立在社会阶层流动之上，一定会得到全社会支持。既得利益者无法对抗整个社会，何况，科举制从关陇士族自身开始。

公共经济学认为，权力只对来源负责；简单点说，谁给你官当，当官的就对谁负责。只有到了隋朝，哪怕是九品芝麻官也要由皇帝任命，无论谁要想当官都得走“科举”这套程序。所有封建官员都必须从心底里听命于皇帝，皇帝不希望封建官僚拼命捞钱，封建官僚在必要的时候必须有所收敛。

我从事教学工作多年，不得不承认人的学习能力确实存在差异，依次类推，商业敏感性、吃苦耐劳精神、风险承受能力自然也存在差异。任何时代试图打破、能够打破现行利益格局的人都是最有能力的人，这些人既然能搞得天翻地覆，也一定能从科举遴选途径中胜出。

科举为皇帝选拔了天下最聪明的人，隋文帝还设计了在当时看来一个近乎完美的权力制衡制度，极大提高了封建官僚捞钱难度。

——中央设内史省、门下省、尚书省“三省”，分别负责决策、监察和执行，三省独立对皇帝负责。文官制度是一种类似于立法、司法、行政的权力制衡机制，在这个体系内，任何位高权重的人都不可能肆无忌惮的靠权力捞钱。此后每到末世王朝，文官制度被破坏殆尽，神奸巨蠹才会登上历史舞台。

——北周末年“民少官多，十羊九牧”，已经遍地都是公务员。隋文帝提出了一条简单易行的办法——裁撤，州、郡、县被裁撤为郡县两级，一半以上官员失业——反正这些人也是前朝官僚，隋文帝没有任何心里负担。

——隋文帝主持制定了《开皇律》，这是中国封建时代一部极其奇怪的法律，五百条开皇律令，绝大多数是对着封建官僚而来。皇帝对官员一年一小考，考核不合格，罢免；父老若公认地方官不合格，罢免；即使连续三年合格，也必须轮换岗位。

——最阴损的，门下省经常雇佣百姓向本地官员行贿，甚至雇佣小吏向封疆大吏送礼。一旦官员收受礼物钱财并被查证为事实，结果就是很不幸的——死罪，无论收礼多少。

隋文帝的大儿子杨俊因为生活奢侈、生活作风有点问题被幽闭（归第）。事后，很多大臣为杨俊求情：秦王不过犯了点小事，不应为此遭此严惩，希望陛下再行斟酌（秦王之过，不应至此，愿陛下详之）。

隋文帝的回答是：我是五个儿子的父亲，难道不是天下子民的父亲？如果按照你们的意思，何不单独制定一部“皇帝儿子的法律”？我历尽艰辛才创立隋帝国，自己尚且努力成为臣民道德榜样，他是我的儿子，却来败坏我的江山，断不容赦（我是五儿之父，非兆民炎父？若如公意，何不别制天子儿律！我戮力创兹大业，作训垂范，庶臣下守之。汝为吾子，而欲败之，不知何以责汝！）

.....

楼主：天圆地方的困惑 时间：2021-10-16 00:57:12

干部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有了驯服的干部队伍，隋文帝才得以真正推行“耕者有其田”，他创立的办法叫“输籍法”。“输籍法”其实毫无新意，还是按照“百亩之田”的规则，授予大隋帝国每一个成年男丁 100 亩土地。

在这里，我们忽略过程，直接给出结果。

开皇初年，全国仅有纳税农户 410 万（土族无需纳税）；到大业元年，全国纳税农户在不足 20 年内增加到 890 万户，共开垦 5585 万顷农田，在中州大地再现了

吕后年间的“耕者有其田”！

大唐贞观十一年，监察御史马周对唐太宗李世民说：隋朝洛阳义仓的粮食，瓦岗军李密用了很多；扬州义仓的丝绸，王世充用了很多；长安义仓的粮食、布匹、丝绸，都是我们在用，虽然你送给了突厥人很多，不过，现在还没用完（隋家诸洛仓，而李密因之；东京积布帛，王世充居之，西京府库皆为国家之用，至今未尽）。也就是说，大唐帝国在中国版图上存在了几十年后，仍然在使用隋朝积攒下来的财富。

中国史籍如果赞美一个朝代，经常会夸大其事，大家对“如山”、“万万”之类的形容词大可一笑了之，这些内容大部分都是著史者梦呓般的意淫。《贞观政要》里这段话却不太可能是传说，唐朝没有必要为隋朝皇帝表功。

更为重要的是，出土文物证明了这一切。

隋朝是第一个民间大规模设立储备粮仓（义仓）的朝代，据史籍记载当时每郡义仓存粮都在百万石以上。遗憾的是，很长一段时间大隋帝国的这种繁荣只能停留在尘封的史籍中。

1969年，洛阳市郊发掘了一座隋朝粮仓——含嘉仓，这座粮仓为我们展示了一个真实而又伟大的大隋帝国。1969~1972年，人们用了整整四年时间才完成这座古粮仓的发掘，结果震惊了当世考古学家，粮仓建筑面积45万平方米，有259个粮窖，窖口一般为10~16米（最大直径为18米）、深7~9米。如此规模，在世界考古界也是最为辉煌的古粮仓之一。人们甚至惊异的发现，其中一个粮窖中居然还留存着50万斤已经炭化的谷子，颗粒仍旧清晰可辨。

如此盛世，隋文帝的生活却非常惨淡。

隋代国都面积为82平方公里（明清之际的北京也只有60平方公里），最破的地方就是大兴宫——皇帝的房子。在这所破房子里，有一次隋文帝染上了风寒，配药需要一两胡椒面，居然没有找到。最离谱的，各郡均有如此多的粮食，开皇四年关中大旱，隋文帝宫殿中的粮食居然不够吃，只得率领文武百官一起逃奔洛阳（一说出关中就食），后世也有人将隋文帝讥讽为“逐粮天子”。

明末清初王夫之说：隋之富，汉唐之盛未之逮也。如此盛世，尚有一位“逐粮天子”，我认为很好！

楼主：天圆地方的困惑 时间：2021-10-16 00:57:12

隋五铢的奇迹

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货币的人是隋文帝杨坚。

——秦始皇试图以秦半两统一六国货币，但短命的秦王朝根本没有能力完成这个伟大的任务。

——西汉年间，汉武帝以铁腕统治整个帝国，以杀头威吓不准私铸货币，仍然无法统一全国货币发行，白金币、皮币改革期间，盗铸更是成风。

——东汉、魏晋南北朝，皇权孱弱，历代皇帝根本不曾想过要统一货币。

——隋文帝也要同时面对南陈五铢、六铢、鹅钱，北朝常平五铢、永通万国、五行大布……，平定南陈后数年，中国流通中的货币只剩下隋朝官铸货币——“隋五铢”。

杨坚统一货币的方式非常特别，隋朝货币没有统一的重量甚至制形，但是，所有的货币基本都出自官府。

开皇元年（589年）隋帝国消灭了南陈王朝，隋文帝并没有立即下令禁止私铸货币，只是要求各地统一按照西汉五铢钱样式铸造新钱，毕竟在大多数人心中西汉

五铢是传承数千年的货币，象征着帝国的统一和富强。

一年之后，隋文帝很生气。

没有人按照五铢钱的样式铸造，历代旧钱也依旧在市场上照旧流通。隋文帝拿把五铢钱标本挂在全国各地的市集之上，并拿出了杀手锏——罚没。有人敢用旧钱或者不合格货币者“尽没于官”，忠于皇帝的各级官僚派出皂隶在路口截、在市场罚、甚至跑到商人家里搜查，无所不用其极……

两年之后，隋文帝更生气了。

旧钱确实在市场上销声匿迹了，民间私铸的鹅眼钱又开始盛行。私铸鹅眼钱的重量远小于西汉五铢钱，只要有利益就会有人铸小钱。谁又会真的用那么多铜材铸造与鹅眼钱面值相等的五铢钱呢？

此后，隋朝的货币制度就颇显得离经叛道了。

开皇三年，隋文帝推出了自己的货币改革，宣布禁止民间私铸货币，并同时推出了官方铸币——隋五铢。隋五铢是一种中国历史上最奇怪、最有意义的货币，并非朝廷统一铸造，而是要求各郡县官府自行铸币，至于铸币标准由各县“父老”自行议定。结果让令所有人瞠目结舌，隋朝 1255 县几乎所有的郡县都无一例外选择了一个货币标准——2.42 克。

我一直认为，中国古代经济自然演进中最合理的单一货币重量既不是西汉官定的五铢钱，也不是民间私铸的鹅眼钱，而是隋五铢。这个标准的确立有赖于隋文帝放开了市场，废黜了盐铁专营、对民间放开了所有工商业渠道，天下只有一种人不能做生意，那就是封建官僚。

大将张威在平定北周贵族叛乱时曾经孤身连破连营三十里，是大隋帝国的英雄。隋文帝称帝后，张威官拜青州总管，业余时间做了点生意——买卖芦菰。关于“芦菰”，《后汉书》曾记载汉朝宫女无聊时喜欢“幽庭掘芦菰”，后世也有诗词夸赞“食指忽然动，篱落见芦菰”……

芦菰还有一个很通俗的名字——大萝卜，张威所在的青州就盛产大萝卜。

张威本是关陇士族，家中财力雄厚。到任第一年，张威在青州哄抬萝卜收购价，忽悠全郡百姓都开始种萝卜；第二年，青州萝卜大丰收，张威又不再市场上收购萝卜，直到把萝卜价格压到跳楼价才肯出手。

张威这局棋布了两年，终于以极低的价格在本郡收购运萝卜，又在外郡卖了个好价格，确实捞了一票。

张威所作所为，充其量也就是个奸商。

这件事情被门下省的御史上奏给隋文帝，经门下省合议，判定张威有罪，愣是因此将张威一个堂堂省部级干部削职为民。隋文帝在诏书中责备张威：我将一州之地交付给你，等于跟你赤心相见，你却不珍惜名声、不检视自己的行为，只会唯利是图。你是执笏大臣，官人怎可争百姓之利？官家多一分利，百姓失一家血？如此，天下人当如何看我？

倒卖萝卜、倒卖萝卜还为此丢官，让倒卖马匹、丝绸的前辈情何以堪啊……

对官员来说，自己不能做生意、家人也不能做生意，门下省盯的实在太紧，何必去费心铸造伪劣货币？何况，每个郡县都面对其他郡县的挑战，一旦铸行小钱，就等于葬送了百姓发财机会。当务之急是要找到一种合适的货币重量成为价值尺度，让大家都能从中赚钱。

2.42 克的隋五铢应运而生！

对关陇贵族，隋文帝也授予其货币特许铸造权，这种货币叫“阔边直笔五铢钱”。

“阔边”顾名思义就是钱廓非常宽，钱廓是古代铜钱中最厚的一部分，结果就是这种钱非常重。隋文帝时代，“阔边直笔五铢钱”只有一个用途——关陇贵族向皇帝缴纳“供奉”。遗憾的是，隋文帝拿到阔边直笔五铢钱后便会将之回炉重铸，这种钱目前已经没有文物存世，我们无法一睹真容。

楼主：天圆地方的困惑 时间：2021-10-16 00:57:12

在当时的国际贸易中，大隋帝国就是那个换了马甲的土匪。

按照当代国际贸易理论，大隋帝国的比较优势在于生产瓷器、漆器、丝绸和粮食；游牧民族似乎没有什么优势，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养了几头牛、几匹马、几只羊，不远万里送到中原，却发现换回的粮食还是不够吃。

游牧民族很生气，于是，就想到了自己另一种比较优势——抢劫。隋炀帝要游牧民族放弃这种具有暴力性质的比较优势，也就只能别出心裁。为分化西突厥和吐谷浑，隋炀帝有选择的对西域 21 国放开贸易。

如果单靠市场，任何一个西域部落都不可能在这种国际贸易中捞到实惠，大隋帝国只能对来做贸易的胡商给予补贴，甚至以低于成本价的方式对这些客商出售商品。大家也可以将之理解为，游牧民族来中原做生意的时候，享受了大隋帝国的超国民待遇。比如，西客商来到都城长安的时候，无论在那个客栈、酒肆都不需要花钱，也以低于市价的价格在官府拿到货物。

在这种有损于大隋帝国经济的国际贸易中，获得贸易特许权的西域诸国可以源源不断得到隋朝的好处。既然已经获得了好处，这些部落也就必然切断了和西突厥、吐谷浑的往来。游牧民族化整为零，也就失去了挑战大隋帝国的实力，正如当时朝廷重臣正如裴矩所言“诸蕃既从，浑、厥可灭”。

大业五年秋（608 年），隋军攻破吐谷浑，生俘王公贵族 200 余人，建立河源四郡。

问题是，隋炀帝经略西域贸易的方式已经违反了市场规则，大隋帝国同时存在一个市场化的国内生产体系和官僚控制的国际贸易体系，也就为败亡埋下了严重的隐患。

从当时进口商品来讲，西域商品集中在香料、珠宝、犀角等奢侈品，对普通人福利毫无效用；从出口产品来看，又集中于粮食、丝绸、布匹等等日用品，封建官僚自己不从事生产，货源当然是没本钱的买卖——税收，结果不仅不能刺激民间生产，反而会破坏国内市场秩序，加重黎民百姓的负担。

最离谱的是，一旦封建官僚被允许经商，利益驱使下这些人便会迅速把手伸向社会每一个产业，甚至自行创造盈利机会挤压民间商业。在利益驱使下，封建官僚同样也会拿出自己的聪明才智，不断创新赚钱方法，何况，这批人是科举考试选拔出来的人中之龙！

——《隋书·食货志》记载，隋炀帝有时别出心裁要用某些特殊的商品向西域展示中华富足，比如，野鸡尾巴上的毛。接到这个命令，各郡不但没有公布隋炀帝的命令，封建官僚反而借机悄悄收购彩色鸟羽，市场上的鸟毛早就被买空了。在限时限仅剩一月的时候，各郡几乎同时突然宣布这道征收鸟毛的命令，几乎全国的百姓都被逼去抓野鸡、抓白鹭（自己动手，这样比较省钱）……

——《贞观政要》记载，帝国在西京长安征集向西域河源郡运输粮食的驴子，封建官僚用同样的手段愣是把 500 钱一头的驴子炒到 1 万钱一头……

楼主：天圆地方的困惑 时间：2021-10-16 00:57:12

尽道隋亡为此河

如果说封建官僚仅仅是业余时间炒作一下鸟毛和毛驴，大隋帝国并无必亡之理。错就错在大隋是一个强盛的帝国，隋炀帝有动机、有能力、更有财力干一些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比如，贯通京杭大运河。

京杭大运河，是我国历史上最具影响的巨型水利建设工程，是一条联通中国经济血脉的河流，为中国古代经济发展注入了一针强心剂……。以上种种，仅对后世而言，京杭大运河“在唐之民不胜其利也”，却“在隋之民不胜其害也”。

在手挖肩扛的时代，贯通京杭大运河这样的工程不但需要很多民工，还需要相当数量的封建官僚从事管理工作。一旦封建官僚的势力渗透到社会各个角落，帝国蒸蒸日上的经济进程也就戛然而止。

各种历史资料告诉我们，为修建京杭大运河，隋炀帝毫无节制的征发劳役，最终引爆了流民暴动，把大隋帝国引向了不归路。据《隋书》记载，大业四年开凿永通渠，沿线 7 郡 79 县，隋炀帝一共征调了 360 万民夫，加上后勤补给共计 540 余万，共有 257.30 万人永远的消失在河道之中。

这事儿，没有。

永通渠总计长 300 里，从今天京杭大运河的规模推算应该只有 1.5 亿个土方，用 360 万民夫来挖，平均每人不过四十个土方！这样的工程量居然用了一年时间，莫非 360 万河工天天在开茶话会？

实际上，京杭大运河并非隋炀帝一人修造，他只不过在现有运河和自然河流之间建立了三条小运河。即大业元年开凿的通济渠、大业四年开凿的永济渠、大业六年开凿的江南河，这三条新运河全长八百里，贯穿了中国南北水系，为唐宋盛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八百里河道的工程量，以隋朝的富强，断不至于为此亡国。大隋亡国，又确实与京杭大运河有关，只不过另有一种逻辑。

修建运河并不必然导致国家败亡，也可以激发财富创造力。1200 年后，美国第一条运河伊利运河通航，当时联邦政府穷的要命，根本拿不出修运河的钱。于是，美国政府成立了运河公司，向公众放开了投资渠道，每一个普通人都可以购买运河公司的股票。结果，不但没有闹出任何乱子，还激发了美国历史上新一轮的股票市场狂潮。

不同的是，隋王朝选择了由帝国政府修筑运河。

商人还是帝国政府，谁来修建京杭大运河都要挖出同样的土方、都要使用同样的人力、都要花费同样的钱财，两者有区别吗？

答：有。

借鉴西方经济学伎俩，我们来做一个假设。假设京杭大运河是纯粹由商人建成的，帝国授予一定时限的特许权，在特许期限内商人可以收过路费，过期则改为免费通航。请不要担心商人不能筹集到足够的钱，只要有足够的利润，投资从来就没有不足的时候。如果民间确实无法积聚足够的资本，那答案要么是投资利润太小，要么是早就知道有人会在修建成后跑来抢钱。

走水路的客商会因此节约一些时间，创造一些利润，当然，也会为此掏上一笔过路费。过路客商会将运费加价到商品上，等商品运到地方，只要愿意买、有钱买，最后修建运河的费用由众多消费者承担。运河修造成本就按照社会成员各自的需求分配，至于劳役，河工自然会按照市场规则得到回报，不会引起任何不公，也不会引起任何暴乱。所有参与修建运河的人都会因此赚钱，也会很欢乐。

现在回到现实，由帝国政府亲自操刀上阵修筑运河，事情就完全不一样了。支撑这些工程的是大隋帝国皇权，劳役是无偿的、税收是无偿的，最弱势的群体将承担了绝大部分成本，不但会降低社会生产效率，社会财富总额在特定的时点上也会下降。

况且，隋炀帝在修建京杭大运河的事情上确实非常不地道。

隋文帝起自关陇贵族，统治重心原本是“长安—洛阳”一线，北方汉人历来视江南为“蛮夷之地”，看不起江南这些“亡国之民”。偏偏隋炀帝起自江南，十年中主要在看江南烟雨，很少与关陇贵族一起喝酒，也没怎么跟这些人联络感情。在争夺储君位置的岁月中，杨广甚至曾做出割据梁陈旧地的准备，这里才是他的龙兴之地、是他的根基、是他的老巢。

隋朝统一全国的时候，中国经济重心已经转移到江南，江南商人要想在江北开辟更大的市场，必须修通这条大运河。大运河通航后的事实也证明了这种判断，“自是天下利于转输，其交、广、荆、益、扬、越等州，运潜商旅，来往不绝”。仅上述地名就可以看出，江南商人从这条运河上获益更多。

一条江南获益更为巨大的运河，隋炀帝却选择完全在沿河两岸征调民夫和粮食，也就是说，这条河的成本基本上全部压在江北黎民身上了。

江北商人势力弱于江南，封建官僚势力却颇为强大。按道理来说，如此损害地域利益的决定，一定会遭到反对。事实是，如此巨大的工程要征发众多民夫、收缴更多粮食、要牵动方的利益，甚至要拆毁村寨、挖毁坟墓……

早就等着这一天了！

《开河记》是成书于唐末的一部小说，讲述了大业四年隋炀帝开凿永通渠的故事，其中有个叫“麻叔谋”的人任开河都护（总监工）。运河河道要经过宁陵县人陶榔儿的祖坟，陶榔儿听说麻叔谋喜欢吃嫩羔羊肉，就送给麻叔谋一碗肉。麻叔谋吃完，觉得这碗肉特别鲜美，十分满意。

吃人家嘴短，麻叔谋就下令让河道绕开陶家坟地。

看起来，麻叔谋还是一个靠谱的人，一碗肉就可以买通，也不是拿了好处不办事的人。其实，这碗肉是用三岁男孩做出来的人肉羹，称得上颇为稀有！其他人得听说陶榔儿所作所为，不但没有愤慨，反而纷纷效仿。宁陵县接连丢失了数百名三四岁的儿童，到处可以听见母亲的哭声。

故事的结局是麻叔谋被人告发，隋炀帝派大将来护儿把他逮捕，以“食人之子、受人之金、遣贼盗宝、擅易河道”等罪名将其腰斩。

故事的情节可能有所夸张，有人利用封建权力搜刮民脂民膏却一定的。为了接近有权力的封建官僚并从这些人身上得利，有人非但可能道德沦丧，甚至牺牲他人生命也在所不惜——所谓“食人之子”也许不是一种夸张的写法。

随着河工推进，大批流民又再次出现在江北诸郡，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封建官僚终于再次过上了“香涂粉壁，玉砌金阶，梁柱以明镜”的好日子。

楼主：天圆地方的困惑 时间：2021-10-16 00:57:12

“白钱”的故事

在《隋书》以及历代评话中，隋炀帝被丑化为一个暴君，似乎他这辈子就没干一件好事。真实的世界中，隋炀帝年间曾经出现过一种货币，叫“白钱”。白钱是中国货币史上最精美的货币之一，按彭信威先生在《中国货币史》中的说法就是“这种钱异常精好，而且只略有厚薄轻重，大小一样，绝不是乱世所铸”。

——随着大运河渐次通航，江南一地需要一种价值较高的货币执行价值尺度，江

都周边郡县公议，开十炉开始铸造“白钱”。白钱以铜、锡、铁合金铸成，是一种币信极高的货币，在当时锡可是一种比黄金还要贵重的金属。很快，“白钱”就扩散到全国，成为一种流通量很大的货币（隋五铢仍然是最主要的货币）。

——江南出现白钱的时候，北方部分郡县隋五铢已经减重 50-60%。也就是说，在北方诸郡，很多隋五铢已经变成重约 1 克的荚钱了。

如果隋炀帝只是一个守城之主，有前朝积累下来的巨额财富，江南一地蒸蒸日上，断不至于国破家亡。很遗憾，隋炀帝是一个有为之主，他深知，如果由着封建官僚折腾，不但北方经济会很快凋敝，关陇贵族势力也会逐步坐大。

隋文帝时代，各地货币并无兑换比例，毕竟重量都差不多，基本为 1:1。白钱的出现打破了这个平衡，江南白钱在北国获得了极高的购买力，与正常隋五铢的兑换比例为 1:5，又大约可以换到 7-8 枚减重后的隋五铢。

隋炀帝看出了其中便宜，推出了一次貌似公平的改革：全国统一以“白钱”缴纳税赋，不再征收隋五铢，至于数量，原来缴纳多少隋五铢现在就缴多少白钱。问题是，江南一带向来都是以货币补偿税款，江北却从来都是缴纳实物。这个要求放到隋文帝时期也许并不过分，当年“阔边直笔五铢钱”也是这么做的。

现在，不一样了。

——隋文帝起自关陇贵族，是关陇贵族领袖，剥夺财富的同时给这些人留下了科举考试的出路，属于“交钱不杀”的政策。

——隋炀帝起自江南，历来“培植南人”，不但虞世基、裴蕴等南陈前朝高官开始主持朝廷中枢，陈宣帝（陈叔宝）的女儿宣华夫人也独占帝宠，南人甚至开始渗入军方势力，江南将领来护儿、麦铁杖成为朝廷禁军最高领导。这摆明了是想撇开关陇贵族单练，属于“要钱又要命”。

况且，隋炀帝同时还推出了一个类似西汉“告缗令”的诏令。西汉“告缗令”要求百姓告发富人匿藏财富，隋炀帝要求江北乡民揭发长官的恶劣行径，“有能纠告者，没贼家产业，以赏纠人”。收到告状信后，隋炀帝又往往不加深究就将被告者“皆斩”或“籍没其家”——本来就想来摆你一刀，这只不过是借口。

结果，告密者往往是无赖之徒，后来这条政策本身甚至成为北方“官人”剪灭异己的重要手段，“大抵被陷者甚众”。

对隋王朝来说，北方经济不若南国，这本不是一个问题，经济不好，慢慢建设就是了。封建官僚虽然聚敛无度，却是支持帝国统治北方的中坚，失去了关陇贵族的支持，大隋帝国的瓢子也就尽了。

隋炀帝的要对付的不是手无寸铁的富人，而是武装到牙齿的封建官僚。隋朝虽然建立了科举制，却仍然是一个典型的分权社会，每个郡县都有“铸钱炉”、朝廷粮仓分散于各地、地方官甚至有权调动军队。因为，隋文帝为了节约钱财根本就没有维持常备军，士兵来自于临时征召农民（“寓兵于农”的府兵制），地方官一声令下就可以下令农民集结作战。

恰恰在此时，隋炀帝遇到了另一件必须决断的事情。

大业九年，在隋炀帝北巡突厥的时候，居然亲自在突厥营帐中发现了高丽国派来的使者。用脚趾头都能猜到，这些人不可能是特意赶来跟隋朝皇帝联欢的，而是要跟突厥建立战略合作性伙伴关系，共谋对付大隋帝国。

此后，便是隋炀帝三征高丽了。

在修筑京杭大运河的时候隋炀帝就已经让广大江北人民作出了重大牺牲，这一次，征讨高丽也主要在江北调集兵力——士兵本来就是农人，说白了又是“损北补南”。北方封建官僚再次放大了这种压力，征发民夫却不给任何补偿。隋朝北方经济以

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为主，一个家庭失去了劳动力，也就失去了最主要的经济来源。

至于三征高丽，隋炀帝实在不应该下一道极为愚蠢的命令：为展示我大隋帝国道德风范，但凡有投降的高丽将领和士兵，一律不需要缴械，仍让其维持原有编制。

结果，高丽兵将一到打败的时候就投降，隋朝军队主力刚一离开就接着开战。

一来二去，高丽战局渐成胶着之势，常年累月的战争也耗尽了北方财富。人们既然活不下去，杀心自起，起义再次爆发了。

说好听点，流民起义是大家仗着人多一起去官府讨个说法，答复不满意就砸烂官衙。说难听点，这种拖家带口的队伍根本就不可能投入战场作战，几万人的起义军经常被几百个官兵追着打。

这一次不一样，造反的人除了流民造反，还有北方关陇贵族。

楼主：天圆地方的困惑 时间：2021-10-16 00:57:12

隋炀帝以北方民力建设各项伟大的工程，虽然给了封建官僚捞钱的机会，也给这些人创造了极高的机会成本，很多官僚因此被灭门。

与其每时每刻生活在恐惧之中，干脆反了吧！

大业九年（613年），炀帝亲征高丽，家中两代宰辅的杨玄感起兵谋反，这是隋朝第一次大规模内战。起兵的时候杨玄感的职责是河都运粮食使，他利用手中的粮食在山东招买流民，首先发难。

朝廷迅速扑灭了叛军，杨玄感的首级也被传递到各郡警示诸官。单纯从这次战争看，隋炀帝是有能力控制局势的。

很遗憾，隋炀帝并未从中吸取教训，大业十年，再次起兵征伐高丽，照样尽发北国之兵（成年男子）。对大隋帝国来说，大业十年又是一个非常不幸的年景：山东诸郡遭遇旱灾，郡县府库中的粮食虽然堆积如山，官吏就是不肯开仓放粮。更有甚者，诸如负责赈济灾民的于仲文等官僚，居然将赈灾用的粮食拿到集市上卖了一个好价钱！

流民开始还能剥树皮为食，然后开始吃树叶，等到皮叶皆尽就只能吃观音土，最后就是“人相食”（是时百姓废业，屯集城堡，无以自给。然所在仓库犹充，吏莫肯拯救，由是益困。初皆剥树皮以食之，渐及于叶，皮叶皆尽，乃煮土或捣蒿为末而食之。其后人乃相食）……

天下大乱，不可遏止的发生了。

隋炀帝三征高丽的同时，李渊、刘武周、罗艺、薛举、李轨、梁师所统治的州郡，也是在修筑大运河和三征高丽中受损最多的郡县，纷纷在自己官长带领下起兵反隋。

关陇贵族利用流民的仇恨点燃了农民战争火焰，拥兵自重的封建官僚则成为的主导，隋末农民大起义也就出现了一种从来没有、也再未发生的特征：叛军全部集中在长江以北，他们各自为战，不同的领袖却有统一的名号——“豪帅”，这些人原本是地方官吏，甚至是郡一级的刺史或主管。

生死存亡之际，隋炀帝又出了一招昏棋。

大业十一年，隋炀帝第三次北征高丽兵败。从雁门突围后，隋炀帝再也不愿意回到关陇贵族的老巢——长安，而是选择了自己的龙兴之地江都。我们可以这样解释，在兵败辽东、身围雁门、烽烟遍地的情况下，隋炀帝不可能寄希望于没有势力基础、自己在位时仅有过数月盘桓的西京长安。无论是狐死首丘，还是图东山再起，心理上、政治上的因素都会促使他选择江都。

很遗憾，现在看来，这是错的。

隋炀帝是大隋帝国的正统，起兵反隋的人兵不是关陇贵族的骨干，叛军领袖绝大多数只不过是低级官僚。即使隋炀帝失败很多次，他也始终是正统皇帝；叛军只需要一次失败，就可能出现全局性崩溃。更重要的是，江南虽然商人势力发达，却不可能为隋炀帝提供强有力的军事力量支撑帝国平叛，隋炀帝手下最强势的“骁果军”本是为讨伐高丽时建立的军队，无论士兵还是将领都来自长江以北。隋炀帝的本意可能是南渡丹阳，效仿东晋保留江南半壁江山，以图东山再起。来自北方的将领和士兵可不这么想：江南虽然花好月圆，士兵的愿望却是回故乡与老母妻儿团聚，将领的理想则是杀回长安为自己拼得功名。

为笼络这些来自北国的士兵和将领，隋炀帝的谋臣为他出了一个馊主意：括江都人女寡妇以配从兵。也就是说，强令军中某个级别以上的军官娶江南女人为妻，这摆明了是想割据江南，永不再回长安。

江北士兵“久客羁旅，见帝无西意，谋欲叛归”也就在所难免了，公元618年，左屯卫将军宇文述对“骁果”造谣：皇帝听说你们想叛乱或者逃回江北，已经给你们准备了毒酒，鸩杀大家后，陛下将与江南人共享此地。随后，隋炀帝被叛军绞杀，南人大臣虞世基、袁充、来护儿、许善心尽皆罹难。中原大地再次陷入混战之中……

楼主：天圆地方的困惑 时间：2021-10-16 00:57:12

呵呵，图书广告一下，本书当当、卓越已经有售，欢迎购买，感谢支持！

楼主：天圆地方的困惑 时间：2021-10-16 00:57:12

隋朝小结：隋之殇

隋朝只存在了短短的三十多年，在五千年中国历史中不过沧海一粟。不知大家是否思考过这一个问题：一个三十年的短命王朝，却与三百年盛唐并称为“隋唐”？因为，大隋帝国是中国历史上最强盛的帝国之一，“科举制”缔造了相对清明的封建官僚制度，帝国在全境范围内再次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国家统一也创造了巨大的市场，隋文帝、隋炀帝坚持执行了重商政策；除了最后几年，隋代国家富强、民众富裕，之前任何一个朝代都不能与之比肩。

隋炀帝这个成长于江南的才子，试图在江南培育商人势力，以此对抗盘踞在“长安-洛阳”一带的关陇贵族。由此，隋炀帝推出了一系列相当不公平的区域政策，无论修建京杭大运河还是征伐高丽，都使江南获益而江北受损。江南商人是关陇贵族最不能接受的一种势力，他们拥有土地、技术、金钱，不但人数众多而且靠创新吃饭，不可能任人宰割，也不可能被人奴役。

掠夺江北利益补贴江南，隋炀帝又必须依靠江北的关陇贵族，隋文帝辛苦压制的封建官僚势力再次渗透到社会每一个角落。关陇贵族放大了隋炀帝政策负面影响，三征高丽之后，“长安-洛阳”江北百姓出现赤贫化。

隋炀帝对这种情况颇为警觉，试图以“白钱”破坏关陇贵族财富基础，进而开始使用“告缗令”一类的极端政策打击关陇贵族。关陇贵族本是隋朝统治的基础，隋炀帝把整个北方都推到了自己的对立面，大隋帝国的瓢子终于烂尽了。

对黎民百姓来说，苦难是具体的，父子携手共入江湖，艰辛历历在目；对黎民百姓来说，仇恨又是抽象的，他们甚至不知道其实关陇贵族才是罪恶之手。关陇贵族利用仇恨而不是正义点燃了隋末农民战争之火，当贫穷变为不容置疑的道德，普通人便会展现出前所未有的暴戾。

帝国危亡之际，隋炀帝错误的退保江南一地，希望能在自己成长的土地上东山再起。他不知道，在创造财富和掠夺财富之间，往往是掠夺财富更有效率，他根本就不具备击溃关陇贵族的经济基础。

中国经济最强盛的王朝——大隋帝国，立国 38 年而亡。

楼主：天圆地方的困惑 时间：2021-10-16 00:57:12

呵呵，图书广告一下，本书当当、卓越已经有售，欢迎购买，感谢支持！

祝大家春节愉快！

楼主：天圆地方的困惑 时间：2021-10-16 00:57:12

无字碑上的轮回

贞观末年，皇九子李治在争夺储位的斗争中成为唐高宗，太子李承乾被判充军、皇四子李泰被圈禁、皇三子李恪被处死。能在如此残酷的搏杀中胜出的人，绝不可能如史家所言“仁弱”，这同样是一位工于心计的帝王，他创造性地把货币改革与削弱关陇士族结合在一起。

高宗即位之初，全国范围内恶钱盛行，物价更是一飞冲天。当然，铸造恶钱的人不可能是无权无势的黎民百姓，而是那些把持着朝廷要害的关陇士族。对皇权来说，关陇士族已经不再是朋友，而是阻挡皇帝唯我独尊的绊脚石。

高宗登基六年，办了两件大事：货币改革、废黜出身关陇士族的王皇后。废黜王皇后与推行货币改革在同一年发生，并非偶然。

先说第一件事，货币改革。永徽六年（655 年），唐高宗下令皇室重新铸行“开元通宝”，各地官府必须以开元通宝收缴旧钱，比例为 1:5。开元通宝的重量实际与隋五铢钱相仿，为 3 克；唐初恶钱大约在 1 克左右。这样的兑换比例，关陇贵族会吃大亏的，不过是皇权掠夺财富的伎俩——以货币改革之名。

再说第二件事，废黜王皇后，扶住武曌登上后位。武曌即武则天，与她卑贱的出身相比，皇后王氏家族可是自高祖起就与李唐皇室联姻的士族高门。所以，徐敬业才在《讨武氏檄文》中说“伪临朝武氏者，性非和顺，地实寒微”。

是不是武则天在幕后策划废黜王皇后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一旦王皇后被废，关陇士族在中枢朝堂上就岌岌可危了——连皇后这样根深蒂固的位置都保不住，何况长孙无忌、褚遂良、上官仪这些出身关陇贵族的臣子？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没收财富只能彻底削弱关陇士族的实力，只有将他们彻底赶出朝堂中枢，才能彻底斩断关陇士族掠夺财富之手。

遗憾的是，历史并没有给唐高宗展露才华的机会，推行货币改革后当年，他经常头晕目眩、目不能视，后来终于发展到不能亲自处理朝政，大权落入武则天手中。

关于武则天，几代史学家对她的评价大相径庭：上世纪五十年代岑仲勉先生著《隋唐史》，言称武氏当政 20 年，毫无建树；六十年代，郭沫若编纂历史剧《武则天》，断言“武后当政时代是唐朝的极盛时代”；七十年代末，关于武则天的评价又完全翻转过来，说她“一贯用两面派手法搞阴谋”；从八十年代冯宝宝版《武则天》到今天的《一代女皇》、《无字碑歌》……，人们对武则天的艺术描写更多出于一种对女性的尊敬，毕竟她是中国历史上数三数四的女皇（武则天不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仅武则天本人的密友陈硕真就于永徽四年在扬州起事，并于同年称帝）。

真实的武则天，究竟是什么样子呢？

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简要回顾汉武帝年间的盛衰循环，因为，武则天当政期间的财富循环，完全是汉武帝政策的 2.0 版。

汉武帝的做法是：第一步，为筹集征伐匈奴的费用，汉武帝先是铸造虚值货币“白金币”；第二步，货币改革失败后汉武帝要求全国富人捐献财富，结果没有人肯

捐献；第三步，盛怒之下，汉武帝颁行“告缗令”，要求百姓告发匿藏财富的人；第四步，“告缗令”断掉了小农最后一丝生路，流民第一次出现在西汉帝国版图之上；第五步，为控制局势，汉武帝迅速拿出铁腕，任用酷吏镇压“豪强”；最后，不可一世的汉武帝下《轮台罪己诏》，忏悔一生所为。

汉武帝 2.0 版的历程是这样的……

第一步，货币改革，类似于汉武帝年间的“白金币”。

乾封元年（666 年），也就是武则天成为皇后当年，她下令铸行“乾封通宝”。乾封通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以年号命名货币，这种货币重仅 7 克，武则天却下令要求当 10 枚开元通宝使用。

至于“乾封通宝”用途，专门用来兑换关陇士族手中的恶钱，持有恶钱者限期到朝廷指定地点兑换。乾封通宝本是典型的虚值货币，即使皇权再强大，又怎么可能强迫每一个人自动捐献自己的所有财物？乾封通宝铸行一年后，市面上只留下最轻、最破的恶钱，物价在一年间暴涨十余倍。这一措施的最大成绩就是“商贾不通”，到了上元年间（674-685 年），六部官员甚至经常半年领不到任何粮食，也就是说，此时，大唐帝国已经无力支付朝廷官员的俸禄了。

这位女强人得到了这样的奏章：数年以来，农人年年歉收，青州、徐州、兖州，山东山西，河南河北，要么遭受着饥荒、要么遭到水旱灾害即将进入饥荒、要么已经在瘟疫折磨下死亡，家中到有四五家流散，饿殍遍野，天下莫不失望……

第二步，既然不能通过货币改革掠夺财富，那就干脆明抢，类似于汉武帝年间的“告缗令”。

垂拱元年（685 年），武则天下诏令李唐皇室贵胄、封建官僚向朝廷捐献财物（规定动作），地方官也可以将当年辖区产量的一半上缴朝廷（自选动作）。

堂堂大唐帝国，倾全国之官仅得钱三千，更是无“官”愿意使劲为女皇挂地皮。想当年，汉武帝要求全国富人捐献财富，也仅有一个朴适捐出了 20 万钱。

封建官僚如何富有，武则天何尝不知？武则天下令，任何人都可以向皇帝本人告发李唐皇族和当地官僚的“不法”行为。但凡有告密者，各地官署不但不能过问，还要为告密者提供马匹，沿途驿站按五品官招待标准供应，即使是农夫、樵夫她也亲自召见，如果告密者所言不属实，告密者无罪。

诏令还有最重要的一句，“实者，部曲、资财、田宅，并没官”。当年，汉武帝也是这样颁发了“告缗令”。

据说，当时有十几个人在长安坊间聚会，有一人借酒吹嘘自己如何有权势、如何富有，其中一人一言未发突然离席而去；酒席未散，禁军飞奔而来，那个胡说八道的人被没收家产并处斩，其余人皆因为未告密被绞杀……

后来，大概告密的人实在太多了，武则天不得不下令告密者不必亲自赴京，各地官署之前置一大缸，专门收集各地告密者的信函。

告密行为极大伤害了李唐官僚的感情，当然，也极大伤害了李唐官僚的财富。李唐皇族和地方官也不会引颈就戮，他们只能先下手为强，让自己的对头或者地痞流氓闭嘴。至于真正的平民百姓，只能选择背井离乡，再次走上逃亡之路。

流民，可怕的流民，再一次出现在大唐帝国的疆域之内！

这种要钱又要命的法子谁也受不了，天授年间（690-692 年）已经是“天下户口，几亡其半”。继徐敬业之后，在恢复李唐王朝号召下，一批流民先后在岭南、山东、河北举势……

楼主：天圆地方的困惑 时间：2021-10-16 00:57:12

第三步，武则天拿出了铁腕对付李唐宗亲和官僚，与汉武帝一样，任用了一批类

似于义纵的酷吏。

来俊臣本是长安城内的一个泼皮无赖，犯事后逃窜到和州，并在和州被捕，论罪当斩。恰在此时，武则天下诏要求天下臣民高密，来俊臣也听说了这件事情。临刑之前，来俊臣在狱中高呼，“我要有密事要启奏皇上”。居住在和州刺史东平王李续（李唐皇室）怕这事成为把柄，给武则天以诛杀他的口实，就允许来俊臣返回长安。

武则天自己也知道所谓“告密”大多都是无稽之谈，重要的是被告发的人是谁，只有牵涉到李唐皇室的告密者才能得到重视。临行之前，东平王李续忧心忡忡的问来俊臣“公勿言和州事”，来俊臣也信誓旦旦保证，自己将揭发长安一件谋逆案，与和州无关。

应该说，来俊臣是一个聪明的人。临行前李续的恐惧表情告诉他，李续一定害怕他提起和州，来俊臣也猜到这位女皇可能喜欢胡乱给李唐皇室加一些罪名。

来俊臣对押解他的差役和召见他的使臣说，自己将揭发长安一起谋逆案，必须要皇帝亲自审问；加之他是死囚告密，武则天亲自接见了来俊臣。

为求得活命，来俊臣对武则天“揭发”的，恰恰就是和州东平王李续私藏兵器、蓄养死士、图谋不轨……。结果，原来是王爷的东平王李续被处斩，本是死囚的来俊臣居然得到了一个司刑评事（相当于皇家监狱典狱长）的职位。

来俊臣的成功激励了无数地痞、流氓以及二混子，大家纷纷投书告密李唐宗室和封建官僚（受封于李唐王室的官僚）谋逆。借着这些机会，这批身处社会最底层的人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封建官僚在帝国的位置。除了来俊臣，较为著名的又有索元礼、万国俊、周兴……

这批酷吏本是一群流氓（皆不事学问，唯求财贿，是以选人冗冗，甚于羊群，吏部喧喧，多于蚁聚），也只有这样的人才无畏，无畏才无所不用其极，至于《唐律疏议》、审判、公正，统统可以不要。天授年间，武则天在称帝后两年就杀掉了8位宰辅、流放了4位宰辅，其后在位15年，居然任用了228位宰相，堪称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奇迹。

对这些酷吏来说，此前，他们的生命从来未被人尊重；此后，他们当然也不会尊重任何人的生命，什么礼义廉耻、仁义道德全都可以不顾，既然当年没有人照顾自己一丝一毫私利，现在，我不但要毁掉富人的财富，还要毁掉富人的生命！

来俊臣最大的嗜好就是抢占人家妻妾，自宰相开始，他列了一个官员名单，实际目标则是这些囚犯的妻妾。这些人发明了闻所未闻的刑罚方式，“定百脉”、“突地吼”、“死猪愁”、“求破家”……。结果只有一个，无论是谁，只要落到这帮酷吏手里，再也别想重见天日了（人是狱者，非死不出）。满朝文武和长安百姓，没有人知道灾难什么时候会降临到自己头上，据说当时的官员上朝都要先拜别家人，没有人知道自己能不能活着回来……

封建官僚本是社会中调动资源能力最强的一个群体，面对这群无知、无畏、无耻的人，如果封建官僚都不能保住自己的首领和财富，何况普通庶民？

李唐宗室、关陇贵族、封建官僚败亡后，他们的财富和佃户确实有了新的主人。不过，这些人并不懂得如何运用财富、生产财富，他们对于财富所有的理解都只停留在纸醉金迷的层面。剥夺从此变得毫无规矩规矩，人们完全不知道这些人会在什么时候进门打秋风，又以什么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禁屠捕而杀人如刘草营，可以人不如物乎）。

很快，武周王朝失去了所有的社会规范，武则天称帝后数年，大唐帝国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证圣到神功年间（695-697年），天下富人几乎全都破亡，不知有多

少普通人不堪忍受虐待，走上了流亡的道路。

——关东、蜀地、江淮地区本是自南朝以来最富庶的地区，此时全部变为饥谨之地；山东之地，阡陌之间已经遍地是流民，良田已经数年不再有产出；河西之地，变为赤地，大地上遍地杂草丛生，父兄转徙、妻子流离；

——蓬、渠、果、合、遂等州人们凭借山川之险，如果官府稍有懈怠，这些人就以火光为号攻击州县，如果官府派兵攻打，这些人又穴居于山中；

——剑南道爆发人数以十万计的农民起义；

——西域的碎叶、庭州及辽西十二州已被突厥和契丹贵族占领，全国统一的局面被破坏，陇右及何北人民惨遭掠夺和屠杀。

载初二年，陈子昂上书武则天：百姓逃亡实因官吏贪暴，普通人就像湖里的鱼儿一样任人捕捞；人们失去谋生之路，自然也就成为盗贼，亡隋之迹经斑斑在目，如果酷政继续下去，不出两年，天下将无可用人、天下将无可食之粮、天下将再无财可敛……

楼主：天圆地方的困惑 时间：2021-10-16 00:57:12

金简除罪

在帝国即将分崩离析的时候，汉武帝曾经下《轮台罪己诏》。现在，武则天也走到了这一步，庆幸的是，历史留给了武则天一定的时间。

1982年5月，河南登封唐庄乡农民在乱石堆里发现了一块非铜非铁的金属板，上面刻着奇怪的字。这些人并不知道，他们手中这块金属就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份以黄金铸造的“罪己诏”。诏书的发布者唐代女皇武则天，诏书的执行者是“三官九府”诸位神仙，这位不可一世的女皇命令诸位神仙免去她对天下犯下的罪过，让帝国恢复昔日强隋的强盛与繁荣。

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武曌除罪金简”，武则天以一种隐晦的形式表达了自己的忏悔，希望余生能力挽狂澜，让百姓修养生息，让帝国财富生产回到正常轨道。武则天可能是羞于情面未公开颁行这份“罪己诏”，而是让自己的贴身宦官悄悄跑到嵩山之巔，扔下这块金简。

此后，武则天的施政方向悄然改变。

大乱之后，往往会有大治。

只有翻天覆地的乱世才能彻底打破原有的利益格局，使得天下财富重新洗牌，大部分人也能获得一个相对公平的起点，这也是历代初年容易出现所谓“盛世”的最主要原因。当然，这种重新分配过程是以绝大多数财富毁灭为代价的，武则天手下的酷吏彻底摧毁了关陇士族的统治基础，而酷吏最后又为皇权所毁灭。

乱世之中，所有财富、所有规则、所有人才都毁于一旦，而社会进步最终必须以财富积累为基础，“乱世-盛世”循环只能在大乱之后满足人类最基本的生存需要，所以民国年间的王亚楠先生这样评述中国历代盛世“这些盛世只停留在故纸堆的想象当中，中国人从来没有经历真正的盛世”。

所以，千万不要以为乱世是盛世之源。

圣历元年（698年）开始，来俊臣、周兴、索元礼等酷吏先后被武则天诛杀，来俊臣被斩首后人们纷纷冲上去“食其肉”，这个曾经不可一世的人顷刻间变为齑粉。圣历二年，武则天大赦自己临朝以来所有的“得罪者”，与李唐皇室关系较为疏远的一批官僚被释放并重新重用，其中就包括近几年来活跃在影视屏幕上的狄仁杰。

在圣历元年的诏书中，武则天开始强调“建国之本，必在于农”：三公九卿有了一个新的使命——各自认领洛阳附近的州县，督促地方官兴修水利、收容流民在洛阳附近就地安家，自愿安家的赐给土地、免除三年徭役。

我确实没有找到武则天“均田”的记录，历代武则天的反对者也借此说所谓武则天晚年“重农”不过是一个谎言。

在来俊臣等一批酷吏的审判案卷中，我找到了答案。

这批酷吏在残酷打击李唐皇室势力的同时，也为自己置办了丰厚的家业。来俊臣被抄家的时候，仅在册的土地就有3万余顷，而这些土地只有一个去处——罚没入官，部曲、奴婢按百亩各安其业！

也许，开革了这些酷吏，女皇已经毋需大规模授田了。

长安元年（701年），全国民户从高宗年间的380万户增加到600多万户很多田地开垦，人们家中开始有了余粮（田畴垦辟，家有余粮）。

这里要说明的，不是武则天如何授田，即使我们找到更多资料，也不过是重复吕后的后尘。武则天最大的功绩并不在农业，而是振兴商业。她的父亲本是一个倒卖木材的商人，也是在这种家庭中，武则天了解了商人最怕的一件事——关津。关津，就是商税。

汉隋相传商税“三十税一”，贩运货物的商人在一地缴纳商税之后，在全国各地的其他关津可以不再缴纳商税。自隋炀帝开始，全国共设66座，到武周天历年间史载为106座。虽然隋炀帝也下诏执行“三十税一”的政策，但是，从那个时候起，各地封建官僚并不服从这个诏令，基本各自为政，关津都要雁过拔毛，例如，从江南贩卖来洛阳的粮食税率在总价的20%左右。

天历元年开始，武则天下诏，明确提出关津最大的作用是为官府养了很多懒人，不致力于劝课农桑（氓俗浇弊，浮惰者多），所以，必须禁绝关津税，使得大雁翱翔时不再被迫停留、小鸟在自己的蜗居不再被侵扰（解其襟带，欲使雁行摩拾，鹑居不扰）。

长安三年（703年），武则天批准了凤阁舍人崔融的《请不税关市疏》，废掉了内地关津税，仅留下了潼关等对外关津，关津基本定位为征收对外贸易关税。

在这篇辞藻华丽的奏疏中，崔融首先说明了商业的用处。商业让人们自己去追求最后一分之利，所以，市场上才会有琳琅满目的商品。

再次，崔融列举了关津之弊：关津原为收缴商人纳税，现在却很多却已开始对过路的行人征收买路钱（不限工商，行人尽税），这是自古就有的路，是天下人的路，焉能为官家所独占（往古之时，淳朴未散，关防讥而不征）？！

然后，崔融对武则天提出了警告。自古以来，所谓“关”是抵御外敌所用，绝不是抢劫国人的利器！关津只是雁过拔毛、羁押行商船只（纳税则检覆，检覆则迟留），我悠悠***，居然沦落敛财至此，悠悠千载，后人读史论事，我们还有何颜面（今若不论商人通取诸色，济济盛朝，自取嗤笑）？！

最终，崔融对女皇提出了警告。如果继续任由关津常年收取商税，那就是因为小利而放弃“无为而治”的圣王之道，最终必然因小失大（况浇风久扇，徒欲禁末游、规小利，岂知失玄默，乱大伦）。市场本是天下人的牟利之地，只有不征税才能给无业游民以牟利之机，对市场征税会令人无处觅财，人们无处牟利必将引致天下大乱（市为聚人之地，税市则人散，税关则暴关，暴兴则起异图，人散则怀不轨）！

崔融是对的，没有了关税、市税，黎民百姓开始为自己寻找每一枚铜钱。武周长安年间，洛阳、长安两市出现了很多奇奇怪怪的富人，他们从事着一些非常奇怪

的产业，比如，掏粪。

罗会本来是京城一个无业游民，后来开始为有钱人家掏厕所。罗会用自身行动证明，只要勤劳，掏粪工人也能致富发家！长安三年武则天免除所有商品关税，所有物品都可以买卖，当然也包括大粪（此前，大粪是不能买卖的）！

自此，罗会得以贩卖大粪出城，将之卖给周边的农人，数年后，罗会从个人掏粪发展到几乎垄断了京城的所有公私厕所！

朋友问他，你现在已经如此富有，何必再干这恶臭之事？

罗会笑着回答：我只懂得掏粪，也只知道如何储藏、运送大粪才不至于散发恶臭，所以，人们才让我掏粪。如果我不去掏粪，也就是一两年，我又将沦为穷人，那是我不是很臭？

连大粪都可以自由贩卖，武周末年终于又有了这样的记载：天津本是天下商品流散之地，现在所有天津聚集的商船遮天蔽日，日夜串流不息（天下诸津，舟航所聚，弘舸巨舰，千轴万艘，交贸往还，昧旦永日）！

神龙元年（705 年）正月，已经 82 岁的武则天溘然长逝，临终前她自去帝号，承认自己的身份仅是李唐王朝的儿媳（皇后）。武则天死后，这位中国历史上浓墨重彩的女皇为后人留下了历代皇陵中唯一的无字碑……

是非功过留与后人评说！

楼主：天圆地方的困惑 时间：2021-10-16 00:57:12

呵呵，图书广告一下，本书已出版《中国是部金融史》，当当、卓越有售，欢迎购买，感谢支持！

楼主：天圆地方的困惑 时间：2021-10-16 00:57:12

官无事，民自富

《贞观政要》是研究唐史的一部重要著作，其作者是生活于开元年间的吴兢。开元初年，史官吴兢因与宰相姚崇意见不合愤然辞职，回到老家后这位史官把自己的理想社会编纂成了一部故事书——《贞观政要》。《贞观政要》基本以开元初年帝国施政措施为基础，也提出了一些自己对皇帝品德的幻想，并把这些品德、言行统统放到唐太宗头上，希望借祖先的伟大形象影响玄宗。与其说《贞观政要》是后世乌托邦式的范本，毋宁说这册书是开元初年唐玄宗点点滴滴的为政记录……

从武则天死后到景云二年（713 年），八年时间，李唐王朝出现了七次政变、四位皇帝，朝堂之上甚至没有一个人能真正统御局势。唐中宗、唐睿宗、韦皇后、安乐公主、太平公主、武三思、武承嗣……，除了笑柄，这些人没在史书上留下任何功勋。愚蠢的封建统治者使用了最为直接的敛财方式——卖官，韦后、安乐公主、太平公主都曾经公开卖官敛财，无论是谁，只要肯出钱就有官当，这些官员在唐史中有一个专有名词叫“封斜官”。

可笑的是，“封斜官”只是一个名号，根本没有实际权力。八年间最高统治者变化的实在太快，根本没有机会任命高级官僚，“科举帮”出身的官员都已经无处容身，何况这些名不正、言不顺的“封斜官”。也正是由于这些统治者无能，大唐帝国才延续了无为而治的政策，韦后、安乐公主、太平公主但凡稍微有点能力，就不会像走马灯一样被人干掉了。

景云二年七月，李隆基成为大唐帝国新的主人——唐玄宗。与历代帝王一样，这

位年仅 28 岁的皇帝必须做出一个选择：国富、民强，那一个更优先？

对这个“鸡生蛋、蛋生鸡”的问题，李隆基在一系列诏书中进行了回答：当然是民强优先！

所有善政，必须让天下黎民先实现温饱，国家富强，必须让所有人都有赚钱的机会；治国之道，先要满足庶民的需求！高明的封建统治者，一定会先培养民间财富，然后再享受。培养财富的方法其实很简单，只要培育富裕的黎民，只要让黎民百姓有谋生之道，圣人在不干涸的泉水中饮水、圣王治国必须紧紧闭上嘴巴，什么都不做就算是积德了。（古之善政，贵于足食；将欲富国，必先利人；为国之道，莫不家给人足；圣人积不涸之泉，王者用无穷之府；清静之政，同归清静，共守玄默）

帝王无为、无事、好静、无欲，庶民自然、自化、自富、自正、自朴，我无事而民自富。治国要之术必须遵循财富之道，财富之道贵在清静，封建官员清静则不会打扰黎民，黎民才能真正安心生产，黎民安心生产才会没人闹事，如此，太平盛世自现（曹参相齐，贵于清静。清静则不扰，不扰则和平，和平则不争，不争则知耻）！

天下财富都属于帝王，皇帝又何必贪恋手臂范围内能触及的钱财？

自皇帝以下所有官员，千万不要自以为是没事就发布什么指示，朝廷六部不得单就某事就对地方官行文，但凡涉及五个州以上的公文、但凡涉及税收的公文，必须经过皇帝御批，否则谁也不准对州县行文！非公务地方官一律不得接待六部官员，有六部官员胆敢没事就流窜到地方连吃带拿，一经查实，立即撤差！

根据上述理论，皇帝不再发布最高指示，官员自然也就无事可做。既然官员无事可做，那就都撤了吧！

第一批倒霉的是中宗、睿宗年间的“封斜官”，开元二年（714 年）1 万多名“封斜官”至少有 8000 多被取消了候选资格——您的钱给韦后、安乐公主了，跟当今皇帝没有一枚铜钱的关系。

中国封建社会，一个朝堂中枢官员代表一片地方势力，一个地方封疆大吏又迁涉到朝堂中枢某部某官，一个政策从制定到执行还不知要牵扯到多少人利益，朝廷的富民政策往往就在这些人的利益博弈中走样。所以，历代史籍往往对李隆基裁撤官僚的举动大书特书，认为这是他励精图治的表现。

实际上，李隆基最狠的杀手锏并不是搞掉这些无职、无权、无实力的土财主，而是裁撤了大部分负责中枢朝廷工程的司、监、署等机构，一千多名实权位置上的同正、试、摄、检、校、判、知被裁撤了（大革奸滥，十去其九）。这些人原来的职责是负责内廷、皇室和官家供奉，也就是说，唐玄宗裁撤了皇家直属企业。

公共选择理论认为，如果一个企业可以获得财政无偿拨款，那么这个企业就不会关心生产，从堂官到胥吏大家只关心自己如何捞钱。久而久之，这样的企业必将损害社会利益。

公共选择理论还认为，如果一个企业依靠朝廷强制力排除任何人染指自己的行业，那么，这个企业就会把掠夺的触角伸向社会每一个角落——这家企业不但会损害社会财富增量，还会侵蚀社会财富存量。如果企业的存在的基础是强制性公权力，那么就是公权力伸向社会财富的触角。

唐玄宗裁撤的这些皇家直属企业就属于公共选择理论极端敌视的这种企业——官手工业。

唐朝初年，唐太宗建立了史无前例的官手工业体系。不但长安、洛阳朝廷有大量这样的官家作坊，就连各级府县也各自建立了自己的手工业工场——官手工业。

一是普通手工业，为皇室宗族和地方官方制造日用品；二是冶铁业，负责制造兵器和铸钱；三是建筑业，负责建造皇室和地方府县工程。

反正，只要有赚钱的机会，这些封建官僚绝不放过。

问题是，官手工业以赋税的方式征集民间财富作为原材料，又以徭役的方式征调民间艺人进行生产。不但如此，“官手工业”一旦出现就会垄断某个行业，民间匠人再进行生产就是犯法、就要砍头，比如，冶铁、陶瓷、煮盐、山川水泽之利……正常情况下，如果一个行业有利润，会有无数人涌入其中，大家可以靠一门手艺谋生、手艺创新也可以独占一方之利。在市场的互相拼杀中，弱者会被淘汰，最后行业技术会逐步更新，生产财富的能力会越来越强。

现在，只有官手工业可以经营这种产品，无论定价如何离谱、无论质量多么差，庶民买也得买、不买也得买。说白了，官手工业作坊更类似于一个无赖，自己不做任何努力，全靠硬抢！

这种财富剥夺方式确实不是最为刺目的税收，却同样会断掉很多人的生路。民间一个作坊就能养活数名甚至数十、数百名工匠，这些工匠又能养活多少家人？

唐玄宗明白，少府、军器监、将作监这些人从来不干正经事，却一个个搂的脑满肠肥。皇室每得到一批物品，就有一批人发家致富；当然，有更多的人失去了谋生手段。武周年间宰相狄仁杰曾就此评论：财富不会从天上掉下来，最后都要加在靠手艺吃饭的匠人身上，他们本是贫困之人，皇家生产的一钉一锤还不知让多少人家吃不上饭（物不天来，终须地出，不损百姓，将何以求）？！

睿宗年间，太平公主亲自负责内廷供奉，抓着官手工业的少府、将作等机构。太平公主被赐死后，《旧唐书》这样描述抄家的场景：太平公主的财货和宝物连皇帝的御府也不能相比，仅仅清点马牧、羊牧、田园、质库的名册居然就花费了数年时间！

与太平公主相比，西汉年间董贤两年搂一亿枚铜钱又能算什么？

只有更黑，没有最黑！

楼主：天圆地方的困惑 时间：2021-10-16 00:57:12

图书广告一下，本书已出版《中国是部金融史》，当当、卓越有售，欢迎购买，感谢支持！

楼主：天圆地方的困惑 时间：2021-10-16 00:57:12

既然如此，留你何用？

开元二年，唐玄宗宣布皇家放弃所有的山川林泽独占之权，放开盐、铁、茶、酒专营，解散了绝大部分特供皇室的官手工业作坊。留存的内廷珠玉、锦绣、服玩，一律当着百官之面在朝堂上焚毁，乘舆服饰、金银器玩由兵部作价在市场上出售，得钱留作军用。此后，内廷谁再敢采购象征富贵与地位的织锦等奢侈品，廷杖一百——基本等于死刑（自今天下更毋得采珠玉，织锦绣等物，违者杖一百）……在唐史中，裁撤官手工业是武后减税后的又一决定性举措，为大唐强盛的手工业缔造了坚实的基础。此后两三年，大唐帝国手工业、商业发展进入了中国历史上的又一个巅峰时期。

——《太平广记》卷二百四十三《何明远》记载，名义上，何明远只是驿站一个小吏；其实，此人还是当地一个巨富，他家中居然有绫织机五百台，按照童书业先生的考证，这是南宋鼎盛时期绫锦院的规模。

——长安柳氏是一个天性聪慧的女子，她发明了丝绸彩染技术。此后数年，多色织锦成为丝绸之路上最抢手的货物，柳家也借此成为巨富之家。今天，在甘肃、新疆一带的唐朝墓葬中，经常可以出土鸳鸯花束纹纱，就是柳氏家族的代表作。

——蜀地盛产一种叫做“轻容”的织纱，李贺曾在诗中描述“蜀烟飞重锦，峡雨侧轻容”，可见当时蜀地纺织业之盛。

大家可能注意到，在开元初年的记述中，我们暂时没有提到其他行业，单纯强调了纺织业。并不是我不去寻找其他行业的资料，而是开元初年最鼎盛的行业确实只有纺织业。

这不是偶然。

在人类社会前进的过程中，只有巨大的市场才能刺激重大创新，也只有重大创新才能在人类本就低下的生产能力中创造市场。“温饱”只是一个词，却包含两层意思：吃饱、穿暖，这是人类最基本的两项生存需求，吃饱饭要靠农业，穿暖衣就一定要靠纺织业——这是人类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的最大契机。一千多年后，英国工业革命恰恰就是发轫于纺织业；开元初年，中国纺织业已现此中端倪。

开元初年，大唐帝国商业繁荣几追盛隋。最明显的例证，朝廷废黜了实物俸禄，从此，当官的不必在朝廷领取俸米，而是直接领薪水了。

楼主：天圆地方的困惑 时间：2021-10-16 00:57:12

图书广告一下，本书已出版《中国是部金融史》，当当、卓越有售，欢迎购买，感谢支持！

楼主：天圆地方的困惑 时间：2021-10-16 00:57:12

第11章 开元全盛日

（唐玄宗开元四年-天宝十四年）

钱味甘，大热有毒

宋璟罢相之后，唐玄宗任用张说为相。张说，出身卑微，由科举进入仕途，玄宗帝师，是当时文坛的领袖人物。

中国货币学说史中，能完美结合金融学、伦理学与政治学的文章当属南朝《钱神论》，但《钱神论》作者存在争议，很多人认为这篇文章是几代人集体智慧结晶。能与《钱神论》媲美的古文金融学论著，只有《钱本草》，而《钱本草》的作者毫无争议，是张说。

在这篇同样传神的《钱本草》中，张说这样描写金钱：钱的味道甘甜，性热、有毒，既能有利于邦国，也能让贤达堕落；如果天下人钱财平均则太平盛世，如果天下人钱财不均则是乱世之源（钱，味甘，大热，有毒；能利邦国，亏贤达，畏清廉；以均平为良；如不均平，则冷热相激，令人霍乱）。

估计张说写这篇文章的原意是警示世人，结果，他自己以身试法成了警示后人的生动案例。

名义上，张说提拔干部的标准是文采，但凡有文采的官员，即使恶行昭著（向他行贿）也不深究。实际上，有文采只是必要条件，更重要的是标准是谁是他一手提拔的嫡系弟子（这样一起干坏事更方便）。如果不具备这个条件，就是文采盖世，也一律不予考虑。

张说绝对是体面人，体面人抢夺财富不一定靠暴力，甚至不一定是贪污受贿。除了这些，还有市场……

开元四年，一个名叫卢从愿的寒门子弟在科举考试中脱颖而出，这位青年才俊拜张说为师后，几年间就官至工部侍郎（副部级）。有了这样的关键位置，卢从愿经常借河工之名授意下官征调农人去服徭役，因为农人手中有卢从愿看中的土地。

我们说过，封建时代的农人本就“站在齐颈深的水中，一阵细小的波浪就能将其湮灭”，当时的徭役一去就是几年，又没有任何报酬。在这几年间，一旦有农人遇到“一阵细小的波浪”，卢从愿便会从而降，要求购买破落农人的土地，帮助农人度过劫难。于是，卢从愿这位青年才俊，很快就有了一个可以望文生义的绰号——“多田翁”。

开元初年，在以张说为首封建官僚轮番炒作之下，大唐帝国土地价格开始了一轮螺旋式飙升，即使贫瘠土地的价格也是武后年间沃壤价格的数倍。一批封建官僚却获得了“多田翁”、“地癖”一类的绰号……

大家应该还记得，大唐帝国立国之初，太宗李世民曾经按官职分配土地。在这个制度下，封建官僚本来就较普通人占有更多土地。现在，土地价格飙升，有能力购买土地的人只剩下强势阶层，普通人已经买不起土地。这段话的另外一个意思是，随着土地价格飙升，普通人多少年、多少代辛苦积攒的财富在瞬间化为乌有，终年辛苦劳作却始终不能得到安定，眼睁睁看着财富与自己无缘，最后只得或举家逃亡、沦为部曲……

所谓“西方经济学”如此解释这个过程：在市场中，价格判定优劣，没有能力购买的人自然会被淘汰。

这种说法，看起来似乎是合理的。因为，“西方经济学”告诉我们，市场是最有效率的制度，只有放开价格，才能实现资源最优配置、才能让最有能力的人得到土地、才能真正增加社会财富……

所以，地价飙升是合理的，是市场选择的结果。这种解释其实也可以换一种说法，：

“吊丝”买不起房子那只能怨自己没本事，只有有本事的人才能成为“高富帅”！

真的是这样吗？

现在，我告诉大家：不是所有的竞争都一定提高生产效率、不是所有的竞争一定都会提高社会公众福利、更不是所有市场选择的结果一定都是好的！在这个世界上，除了“竞争”（compete）还有“竞次”（race to the bottom），“竞争”是比谁更优秀，“竞次”是比谁更下贱、谁脸皮更厚、谁心更黑！

“竞争”和“竞次”也是有相同点的，那就是，两者都把市场作为工具，都通过市场实现利益分配和再分配。所有社会都存在市场，市场也都有“竞次”特征，只不过封建社会的表现更为突出。马克思在描述万恶资本主义社会的时候提出，资本家对劳动力的剥削是有底线的：维持劳动力再生产、工人工资要足以维持自身和家庭生存。封建社会不存在这个底线，失去土地的流民只能压低自身劳动力价格、甚至是被迫损害生命，结果还是不能获得维持自身和家庭生存的资源。人们竞相降低自己劳动力的价格、竞相出卖自己，微薄的收入最后一定会突破了马克思所谓的“剥削底线”，不要说购买土地，就连自己和家人生存都难以为继；最后，人们只能卖身为奴，把自己从封建社会直接倒退回奴隶社会；所以，我们才在史籍中一次次见到“父子携手，共入江湖”的描写。

故曰“竞次”！

自汉武帝起，“竞次”就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无为而治”放开市场，强者就会掠夺弱者生存资源。文景之治、光武中兴、太康之治、元嘉之治无不是无为而治，也无不遇到了这个死结。财富一旦集中于极少数人手中，绝大多数农人也就只能成为流民，一旦流民聚而不散，便是乱世之源……

现在轮到唐玄宗，土地价格飙升——强势群体的财富呈级数增长，弱势群体彻底丧失积累财富的能力。朝堂之上玄宗自己坦言：现在封建官僚疯狂掠夺土地，天

下贫人层出不穷，流民年复一年增加（猾吏侵渔，权豪并夺，故贫窶日遭，通逃岁增），如果不能解决土地兼并问题，流民将再次冲击中原大地，开元盛世的局面将不复存在。

《剑桥中国隋唐史》这样评价这段历史，“大地产的数量大量增加，其中许多为出身较低的官员所有，他们需要地产以稳定他们的经济地位”。

楼主：天圆地方的困惑 时间：2021-10-16 00:57:12

开元限购令

关键时刻，终于有人对张说放任土地兼并说“不”。

说起来可笑，这个看不惯当朝宰相的人居然只是一个正八品的监察御史，也就是说，这个人只是一个主任科员。他就是被《旧唐书》列入奸臣转的“开元第一聚斂之臣”——宇文融。

开元九年正月，面对天下黎民“既穷乃诈，犯禁相仍”的危局，宇文融上书玄宗要求改革。这封奏疏上奏之后，宇文融力排众议，开始推行史上最为严厉、最为彻底的限购令：自此之后，禁止一切土地买卖，无论有无户籍均不得再买卖土地！——对已经顶风作案买了农人土地的，无论什么价格，只要占田超出朝廷标准（太宗按官授田的标准）立即无条件没收！

——与限购令配合，宇文融宣布赦免天下农人逃亡之罪。允许逃亡人口就地入籍，按唐初“均田令”重新向当地官衙领取土地，每丁授田五十亩、宅田五亩。逃亡的农人只要主动向官府出首，以六年为限免除所有税收、徭役。

——至于分配土地来源，则是从封建官僚、大地主手中抠出来的“籍外占田”，自此，封建官员不得占用任何“官职田”外的土地。

这项土地限购政策在唐史中被称为“检田括户”，是一剂完全违反玄宗“无为而治”治国之策的猛药，唐玄宗希望以皇权铁腕确保帝国在“耕者有其田”的轨道上运行。

如此生猛的限购政策，是一定会往死里得罪封建官僚的。

不过，这里要说，宇文融确实是一个很圆融的人，在这场规模宏大的土地改革之初，他找到了自己坚定的同盟军：皇族、关陇贵族和农民。

——皇族和世家大族原有土地不在改革范围之内，皇族和关陇贵族没有理由会反对这场名正言顺的改革。

——宇文融撇开了朝廷六部和地方府县的封建官僚，自行拉起了一个“劝农使”的队伍。宇文融出身北周皇室贵胄，他手下的“劝农使”也清一色出自皇族和世家大族，这些人世代富贵，是科举新贵的死敌。

——获得土地的农人，既是改革最直接的受益者，也是改革最坚定的支持者。原本飙升的地价使生活完全变成灰色，辛劳一生也无望获得一小片赖以养家糊口的土地，终其一生始终都是居无定所。现在，宇文融重新授予了他们的土地，生活终于可以继续下去了。《龟册元府》记载，宇文融所到之处必定召集父老宣布皇上的敕令，人们非常感动，有人甚至称宇文融为再生父母（融之所至，必招集老幼宣上恩命，百姓感其心，至有流泪称父母者）。

有了皇族、关陇贵族和农人的支持，封建官僚的反抗便显得相当软弱无力了。开元十年，御史台（宇文融编制所在部门）给了宇文融“上下”的年终考核结果，“上下”说白了也就是“优秀”的下等。那一年，吏部正好是“多田翁”卢从愿主持年终考核，宇文融这个“上下”的考核结果遭到了吏部坚决反对，卢从愿以堂堂朝廷二品大员之尊居然亲自粉墨登场难为一个主任科员，愣是扣住“上下”的评语不肯下发（抑不与之）。

开元十二年，“检户括田”基本结束，大唐帝国在四年间重新授予了 80 多万户流民土地，也为朝廷增收“百万缗”。对这场历时四年“检户括田”的改革来说，宇文融得不到一个“上下”的考评结果又能怎样？

开元十三年，盛世达到了前期巅峰，唐玄宗登泰山举行“封禅”大典，这是中国古代太平盛世最具标志意义的大典。

最后，说一下宰相张说和“最牛主任科员”宇文融的结局。

对张说这样的封建官僚来说，失去了土地兼并，封禅大典居然成为绝好的捞钱机会。在开元十三年那场流传千古的封禅大典中，张说任命了数以千计的新官员——也就必然得罪了数以万计未被任命的官员。封禅大典后，宇文融利用封建官僚集团对张说的愤恨，指使自己的学生李林甫攻击张说受贿、滥用职权以及靠“邪术”谋求官位。

开元十四年，张说罢相。

同是开元十四年，宇文融试图对皇族推行“检户括田”，结果，宇文融立刻就在唐太宗曾孙李祎攻击下被外放汝州刺史。

虽然离开了玄宗身边、离开了朝廷中枢，对一个主任科员来说，汝州刺史的位置也算是给了个级别、安排了。

宇文融离京后，玄宗试图再次推行“检户括田”，满朝官员却没有一个人愿意出头。在一次朝会上，玄宗无限感慨地说：“你们非常讨厌宇文融，现在我已经把他打发走了，但是，国家财政又有谁能为我分忧呢？”（公等暴融恶，朕既罪之矣，国用不足，将奈何？）言下之意，唐玄宗想让宇文融复出。

这句话引起了皇族和封建官僚的高度警惕，一旦宇文融复出，他们又将沦入万劫不复之地。开元十五年，宇文融被流放岭南，病死于发配途中。

此时，宇文融的学生李林甫已因门荫入仕，张说的学生张九龄也已经进入朝堂中枢，斗争远没有结束……

楼主：天圆地方的困惑 时间：2021-10-16 00:57:12

图书广告一下，本书已出版《中国是部金融史》，当当、卓越有售，欢迎购买，感谢支持！

楼主：天圆地方的困惑 时间：2021-10-16 00:57:12

《中国是部金融史》于今日在当当主编推荐推首，上周《中国是部金融史》已在新华书店销售系统排入财政金融类销量前十！继续努力，感谢大家支持！

楼主：天圆地方的困惑 时间：2021-10-16 00:57:12

增发货币的两种方法

唐玄宗在位 45 年，先后任命了 26 位宰相，其中，李林甫一人就在相位上呆了 19 年。这 19 年是大唐帝国的全盛时期，杜甫在一首《忆昔》的诗中有这样的描述：

……

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
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廩俱丰实；
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
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

……

鉴于当时不太可能有石膏美容过的大米、鉴于当时已经没有人需要通过犯罪维持生存、鉴于当时村村都有“万钱户”，可以说大唐帝国已经进入全盛时期。然而，

就是这位盛世宰相李林甫，居然跟他的老师宇文融一样，被治史者看成一个奸臣。

《资治通鉴》对李林甫有这样的描述：他善于迎合皇帝，也能很好与宦官、宫女相处；他嫉贤妒能、闭塞言路，他屡兴大狱逮捕亲贵，甚至连太子都敢诬陷（媚事左右，迎合上意，以固其宠，杜绝言路，掩蔽聪明，以成其奸，妒贤嫉能，排抑胜己，以保其位；屡起大狱，诛逐贵臣，以张其势）

总之，李林甫，是一个坏的掉渣的坏人，张九龄、杨慎矜等一批廉洁的官员在李林甫陷害下一个个丢掉了相位，最后，李林甫培植出了一个叛徒安禄山，养痍为患毁掉了开元盛世……

真的是这样吗？

开元限购令实实在在减缓了封建官僚蚕食农人土地的速度，十年来随着社会财富增加，“钱重物轻”的问题出现了。“钱重物轻”还有一个学名字，叫“通货紧缩”、

“检户括田”之后，大唐帝国物价持续下跌，到开元二十年（732年）一斗米的价格仅为十三个铜钱（所以，我们才说贞观之治所谓“斗米三钱”绝不可信）、一匹绢的价格也仅为二百钱。

通俗的讲，“通货膨胀”、“通货紧缩”都是财富再分配手段。通货膨胀，富人手里的债务会越来越不值钱，穷人手里的钱只能买到更少的东西。

所以，通货膨胀对富人有利。

看到这些，大家千万不要以为“通货紧缩”就一定对穷人有利，穷人手里的货币确实增值了，实际上，富人控制的货币更多。而且，通货紧缩会提高所有人的赚钱难度，直接降低所有人的生产积极性，毕竟现在赚钱少了——虽然只是名义上的。

所以，无论涨价、跌价，都有利于富人、不利于穷人——规则永远是强者的规则。

关于治理通货膨胀的政策，以后我们会详细谈，现在先说通货紧缩。

现代财政学有个名词叫做“转移支付”，就是国家把征收上来的税款重新分配给社会各个阶层，是现代国家调节贫富差距的重要手段。增发货币也是一种调节贫富差距的方法，力度远比“转移支付”更狠：“转移支付”还得先收税，然后才能转移，增发货币却可以直接改变一个阶层的贫富状态。

现代增发货币的方法很多，在现代有“央行再贷款”、“发行央行专项票据”、“降低存款准备金”、“放松信贷”、“降息”……。跟封建社会比，这些名称虽然令人眼花缭乱，其实本质从来没有变——增加流通中的货币。

所有的货币手段都是中性的，关键是，增加的货币究竟给谁？

第一个方向，把新增货币集中发放给强势阶层，也就是封建官僚。无论是把新铸造的铜钱直接拨给封建官僚，还是以朝廷的名义借钱给这些人，其实结果都是一样的。很遗憾，对这些人增发货币并不能刺激经济，反而会造成经济停滞、物价上涨，原因很简单，货币不掌握在创造财富的人手里。

第二个方向，把新增货币集中发放给弱势阶层，就是原本穷困的黎民百姓。也许没有理由直接给现钱、也许编造一个名头然后再给钱、也许拿钱随便买点穷人的东什么西……，只有这样的货币增发才能真正刺激内需、启动经济复苏之源，因为，普通人需要购买的东西太多了！

所谓货币增发，其实万变不离其中。

楼主：天圆地方的困惑 时间：2021-10-16 00:57:12

图书广告一下，本书已出版《中国是部金融史》，当当、卓越有售，欢迎购买，感谢支持！

楼主：天圆地方的困惑 时间：2021-10-16 00:57:12

面对“钱重物轻”的局面，一品大员、宰相张九龄提出了一个听起来非常好的方法——废黜官铸货币、彻底放开私铸。

张九龄，一代文坛领袖，被史籍誉为“匡国济民”、“忠贞廉洁”、“犯颜直谏”……现在，我来揭一下张九龄的老底，此人是张说的嫡传弟子，小吏之家出身，是标准的“科举帮”，在开元十一年“检田括户”中曾因占田超秩被罢官。开元二十一年，张九龄因文采出众、长相俊美被玄宗任命为宰相。半年来，这位新任宰相对关陇贵族出身的官僚尽极攻击之事，李林甫、张守珪、牛仙客等人都因张九龄的攻击推迟入相。

就是这样一位宰相，在开元二十二年向唐玄宗上书，要求彻底废除官铸货币。在本书中，我们一直对官铸货币颇有微词，毕竟官铸货币是把封建统治者的意志强加于货币之上，只有民间私铸货币才是一种货币自然演进历程，才能从根本上促进商品流通。但是，张九龄提出的私铸货币建议，无论如何我也不能接受。张九龄上疏禁绝官铸后，唐玄宗让朝廷大臣对这个建议进行公开辩论，这就是中国货币学说史上著名的《敕议放私铸钱》。

关于这个命题，张九龄提出：废止官铸、仅存私铸，货币铸造量就一定会增加。为此，张九龄还提出了四点理由：一是古往今来，货币都是天然形成的，不是某一个帝王赐予天下臣民的，所以，应该彻底放弃官铸货币（古之为钱，将以通货，币盖人所作，非夫实生）；二是官铸货币耗费铜材，没有多少收入，所以，应该彻底放弃官铸货币（顷虽官铸，所入无几）；三是钱币本是用铜磨出来的物品，实际没有任何用处，却要以此来交换耕织品，所以，官家应该彻底放弃铸币（磨铸之物，却以少而致贵）；四是如果不放开货币私铸，就不能充分供给货币，所以，应该彻底放开私铸（公私之何，给用不贍）。

平心而论，张九龄这四条理由条条站得住脚，也确实符合现代货币流通理论。但是，反对张九龄只需要一条理由：张九龄采用了第一个法子，将增发货币集中于强势阶层。所谓“禁止官铸、放开私铸”，只有皇族和封建官僚才有能力私铸货币，一旦这些人手中的货币增加……

对《敕议放私铸钱》，最坚定的反对者就是当时的御史中丞李林甫。李林甫没有给他老师宇文融丢人，当时他只是正五品，一个司局级干部却敢于公开对抗当朝宰相。这位在“检田括户”中摸爬滚打出来的皇族后裔对利益分配有着极其敏锐的嗅觉，他知道，一旦废弃官方铸币，把铸币权完全交在封建官僚手中，事情只能变的更糟。

朝堂之上李林甫毫不客气的提出：铸币是国之权柄，历代以来禁绝私铸是为了确立货币信誉；现在一旦放开私铸、废弃官铸，就等于为“小人”打开了逐利之门，滥钱恶钱便会充斥门庭，到时想欲禁不能，会更损害农人利益（钱者通货，有国之权，是以历代禁之，以绝奸滥。今若一启此门，但恐小人弃农逐利，而滥恶更甚，于事不便）。

解决“钱重物轻”当然必须增发货币，为此，李林甫建议官炉增加铸币，货币发放途径主要有三条。这三条路径，条条都能把钱直接交到黎民百姓手中。也就是说，李林甫选择了第二种方法，定向对社会底层增发货币。

第一条途径，和籴。朝廷每年按高于市价的价格收购农人手中的粮食，当然，会按农户土地面积给农户一个比例——占地越少的农户得到的和籴份额越高。说白了，这是对贫困农户的直接补贴。《陈宣公集》卷十八记载：这道敕令极大取悦

了农人，农人竞相向官家出售粮食以谋取厚利，而不怕生产运输途中的劳苦（此令初行，人皆悦慕，争趋厚利，不惮作劳）。

第二条途径，和雇，也就是废黜徭役。按唐朝税制，丁男每年要向朝廷服 20 天的徭役，包括河工、官粮运输等等，当然这，些徭役是免费的。现在，李林甫废黜了相当一部分徭役项目，此后，河工、官粮运输等等，都要按市价付农人工资。

第三条途径最为重要，废黜“府兵制”、改行“募兵制”。这一条对玄宗年间的政局产生了深刻影响，后世史官也是为此对李林甫尽极攻击之能。

天宝之前，大唐帝国没有常备军，所有农人均有“放下锄头、拿起刀枪”的义务，但是，兵役是没有任何报酬的，这种寓兵于农的方法被称为“府兵制”。

“募兵制”之下同样还是穷人当兵，只不过当兵就有钱赚。所谓“募兵制”就是军队职业化，给军队士兵定期发粮、发饷，成本确实较“府兵制”高很多，而当兵的却都是穷人，或者也可以这样说，不是穷人谁会去当兵？

这里要说，大唐帝国实在是一个很幸运的王朝，立朝百年来边境最强大的游牧民族始终是突厥。突厥没有明确的汗位继承制度，一任可汗死后，不但他的子孙后代，就连他的兄弟都要参与汗位角逐。长此以往，突厥不但不能对大唐帝国形成威胁，民族人口也在日复一日的内耗中急剧下降。“府兵制”下的农民兵战斗力虽然不强，对付这些突厥内乱分子还算绰绰有余。

天宝之后，回纥、契丹、吐蕃等民族已经逐步兴起，甚至“其地万余里”的大食也经常陈兵边境。“府兵制”在对付回纥、契丹这些新兴游牧民族的时候屡战屡败，因为，等您集结完军队，人家早就抢完、分光、溜之大吉了。只有职业军人才可能抵抗这些强悍的游牧民族，“募兵制”确实在节度使兵权方面造成了隐患，如果没有“募兵制”大唐帝国可能早就不复存在了。“募兵制”推行后，内地州郡有了个安定的局面，人们不再有征发兵役之苦，不必担心自己会放下锄头拿起刀枪到边境拼命了（人赖其利，中外获安。是后，州郡之间永无征发之役矣）。

为配合“募兵制”，在李林甫主持下，大唐帝国对封建官僚开始了一项更为激进的改革——《长行旨》。

开元年间，大唐帝国是典型的封建中央集权制，中枢朝廷也对各地支配的钱财进行了严格控制。每年户部（类似于今天的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都要重新估算各地花费，细化到劳役、工程、征兵等各个细项——只有如此，出身寒门的各位封建官僚才能“倍儿有面子”……

这种财政方式对地方州县尤其是边境产生了极大的干扰，坐在长安宫殿里的一帮刀笔吏怎么可能预见一年后的边事？而且，这项工作本身就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仅纸张一项户部度支司每年就要用掉 50 万张，何况各道、府、县来长安沟通、运作、让朝堂胥吏们“倍儿有面子”的成本。

开元二十四年，在李林甫主持下，大唐帝国颁布了著名的《长行旨》。自此，每年帝国中枢朝廷只对道、府、县核定一个税收总数、上缴总数，具体征税方法和地方留存的使用细节，中央朝廷不再过问。用《剑桥隋唐史》的评价，“这是一个巨大的创新，因为政府悄悄地放弃了要求税率和劳役以及财政管理实施细则全国统一的总原则”。

楼主：天圆地方的困惑 时间：2021-10-16 00:57:12

图书广告一下，本书已出版《中国是部金融史》，当当、卓越有售，欢迎购买，感谢支持！

楼主：天圆地方的困惑 时间：2021-10-16 00:57:12

除了稳定货币，我们还要提到李林甫的一项不朽功勋，那就是整理、制定了完备的大唐法令。开元二十二年，李林甫终于入主中枢为相，他所做的第一件事是着手整理、增补大唐帝国的法律——把封建官僚的权力关进笼子。三年后，李林甫共增补了 7026 条法律，修订了 2180 条法律、删除了 1324 条法律。这是中国辛亥革命前最重要的一次法律修订（请注意，没有之一），主要法律条文的一直沿用到清末，《大明律》、《大清律》都直接抄袭了本次修订的法律条文。

其中，最重要的一部法律是长达三十卷的《唐六典》，所谓“六典”专门针对“吏、户、礼、兵、刑、工”六部，也就是说，《唐六典》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步“行政管理法”。李林甫想让封建官僚知道，办事情原是要有点规矩的。

问题是，封建官僚办事，从来是不讲规矩的。

张九龄反对李林甫，更反对这些所谓的“法律”，双方矛盾终于在“杨万顷谋杀案”上爆发了，张九龄借此对李林甫发起了总攻。

我们先简单介绍一下“杨万顷谋杀案”的案情。

杨万顷是李林甫手下的一个监察御史，这是一个铁腕检察官，在他主持下，嵩州都督张审素因贪污被处斩。这个案子其实是个铁案，张审素不但贪污腐败，事发后还雇佣黑社会威胁杨万顷，确实是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

案子的结果却颇为离奇，张审素被处斩后，张审素的两个儿子又把杨万顷给杀了，还扬言自己是为父报仇。

现在，已经无法考证张九龄和张审素的关系，我们只是知道，张九龄为力保张审素两个儿子不死曾经在唐玄宗面前咆哮。他提出了一条匪夷所思的理由：根据儒家“孝”的定义，张审素的儿子杀掉杨万顷是为父尽孝，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所以，这两个孩子无罪。

一起再平常不过的反贪污案，由此成为张九龄和李林甫角力的爆发点——都按《唐六典》来办事，那还来的“倍儿有面子”？对这个案件，唐玄宗亲自做出了判决：国家设立法律的本意是制止杀戮，孝子之情诚然可敬，但无故杀人决不可赦。最后，在唐玄宗亲自督办下，河南府才对杀人犯行杖杀之刑，张九龄的相位开始岌岌可危。

《唐六典》成书当年，也就是开元二十五年，张九龄的学生严挺之贪污案发，把自己的恩师也牵扯其中，张九龄很不光彩的丢掉了相位。

楼主：天圆地方的困惑 时间：2021-10-16 00:57:12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圣历元年（698 年），伟大的女皇武则天在泰山之巅悄悄扔下除罪金简。自此，大唐帝国有了个甲子的太平岁月，数代人积累终于缔造了“开元盛世”。公元 742 年，唐玄宗改元“天宝”，取意“绿波清浪，物华天宝，驾重洛阳”之意。

“天宝”年号共计使用了十四年，十四年间大唐帝国从大治转向大乱。

天宝十四年安禄山在边境起兵，开元盛世毁于一旦。

真的是这样吗？

乱不生于乱，而常生于治之时；危不起于危，而常起于安之日。开元盛世当然不是毁于安史之乱的兵灾，一个强盛的帝国根本就不可能被一个异族野心家忽发奇想式的叛乱毁灭。

《唐鉴》不太精确地总结了天宝年间唐玄宗所作所为：好谀、好兵、好色，无所不至！之所以说《唐鉴》不太精确，是因为所谓“好兵”、“好谀”、“好色”不过都是催化剂，玄宗登基以来，宇文融从来不曾触碰皇权，李林甫编纂的那些《开

元律》也是给封建官僚看的。中国封建社会，相权只是枝叶、皇权才是根本，既然树根已经朽坏了，纵然相权枝叶茂盛，树倒枝存，又有何用？

天宝之祸，最大的祸根在于唐玄宗自己丧失了道德操守，再也无力维持“开元限购令”。天宝年间，土地兼并的规模甚至已经超过了汉成帝、汉哀帝年间，亡秦之迹已然昭昭在目！

我们还是从《唐鉴》的总结说起。

先说好谀。天宝年间，唐玄宗下令，把自己的生日改为大唐帝国的“千秋节”。每年这一天，全国臣民都要尽情庆祝。为了彰显自己的千秋功业、为了让自己有别于包括祖宗在内的所有皇帝，唐玄宗先后六次给自己加官进爵，最牛的一次居然自封为“开元天地大宝圣文武证道孝德皇帝”。一般情况下，这种称号只有死去的皇帝才能从中节选一个字，也只能节选一个字作为谥号。

再说好兵。玄宗早就不把自己当人了，他认为自己是神，所以，要“明皇蔽于吞灭四夷，欲求一切之功”！天宝年间，玄宗一改汉族挨打受气的局面，不停对游牧民族用兵，为赢得胜利甚至更改了“边镇不久任”的规矩，也为安史之乱埋下了祸根。为取悦这位志得意满的皇帝，边镇将领往往是损失万人却只报一人、斩敌一人却报万人（将欲荡灭奚、契丹，剪除蛮、吐蕃，丧师者失万而言一胜我者获一而言万）——反正大唐帝国有的是钱！

最后，解释好色，《唐鉴》所谓“好色”当指杨玉环。天宝四年，唐玄宗即纳自己的儿媳杨玉环为妃，自此，三千宠爱在一身，也演绎了大唐帝国一幕幕丑剧。据说，玄宗与贵妃每次进餐都多达数千盘菜肴，一盘能值十数中等人家家产；杨贵妃去华清池洗浴，随从以金、玉、翠装饰坐车，装饰品价值不下数十万钱，车上的黄金如此之重，以至于牛已经拉不动了……

说白了，所谓“好谀”、“好兵”、“好色”，都是好钱。开元盛世之所以被铭记史册是因为这是一个“财富在民”的时代，所以，对玄宗来说，要安享晚年、要有钱享受、要有钱炫耀边功，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搞钱”

第一个为唐玄宗敛财的人，叫做杨慎矜。

杨慎矜，隋炀帝的三世嫡孙，家族累世为官。开元末年，杨慎矜任太府寺卿，也就是为朝廷验收各地上缴的税收。唐玄宗觉得，杨慎矜似乎在理财方面有着特殊的才能，自从此人开始为帝国掌管财富，自己手头似乎宽裕了很多。

——开元、天宝年间的赋税还是“租、庸”制，所谓“租”就要老百姓向朝廷纳粮、所谓“庸”就是老百姓要向朝廷缴纳一些锦帛。据说各道、府、县上缴的“租、庸”，杨慎矜大人只要看一眼就大概能估出粮食成色、锦帛是否有水渍伤破。但凡敢以伪劣残次来充数的，杨慎矜一律退回，或者要求以官铸货币不足差额。

——天宝年间，杨慎矜转任诸道铸钱使，司职管理天下铸钱炉。为满足当时玄宗日益浩繁的边用和宫廷用度，杨慎矜下令各道在铸币中掺入更多的铅，这样既可以增加官铸货币的数量，也将多出来的铸币单独列出一部分作为皇帝用度。

据《旧唐书》解释，杨慎矜正是因为这两种本领才深得玄宗赏识与厚爱。

从常识来看，锦帛有无水渍、陈粮和新粮，只要验货的人不是白痴，肯定一眼就能看出来。杨慎矜之所以能深得玄宗赏识，是因为履行了自己的本职，不允许任各道、府、县以次充好、随便忽悠皇帝，所以，他在任期间太府每年能多出几百万缗钱的收入。在封建社会，当履行职责成为功绩、当最基本的道德成为美德、当所有人失去了正确的价值判断，这个社会距离崩溃也就去日无多了。

至于官铸货币掺铅这种行为，在铸币史上并不少见。何况，当时官私货币混杂，官铸货币所含铜材远高于私铸货币，杨慎矜铸币掺铅不但没有引发通胀，反而使

得官铸货币更易流行——人们不再以官铸货币作为财富窖藏。

然而，杨慎矜的发迹却引发了李林甫的嫉恨。天宝朝的权力结构已经与开元年间迥然相异，以张说、张九龄为首的文官集团虽然自己经常贪污受贿，却自以为掌握着道德制高点，对玄宗经常指手画脚，所以，玄宗并不能为所欲为。张九龄罢相后牛仙客为右相（在李林甫之下），牛仙客虽然目不识丁，却至死身兼陇右、河西两镇节度使，始终掌握着帝国久历沙场的军队，总量在帝国总军力的 60%。牛仙客死后，相权再不可能对玄宗构成任何威胁，李林甫完全沦为唐玄宗的附庸。

《唐鉴》上说“上之所好者，下之所兢也”，一旦玄宗“好谀、好兵、好色”，“荒念政事，穷天下之欲不足为其乐”，所谓宰辅之才的李林甫，要想保住自己的位置，不但要去适应皇帝，还必须消灭一切自己的竞争者。

在皇帝面前，杨慎矜就是李林甫最大的竞争者。

天宝六年，李林甫密告杨慎矜与术士往来、图谋恢复隋朝帝业（慎矜乃隋炀帝之玄孙也，与凶人往来，家有讖书，谋复祖业）。最后，杨慎矜在牢狱中死于酷刑，杨氏家族被灭族。

楼主：天圆地方的困惑 时间：2021-10-16 00:57:12

接替杨慎矜的人叫做王鉷，是李林甫一手栽培起来的副相，他成为第二个为唐玄宗敛财的人。

杨慎矜治下，虽然也能为唐玄宗提供一些钱，但皇帝用度终究要从太府（国库）支取，也要履行相应的手续，唐玄宗绝无可能由着性子花钱，更不可能任意给杨贵妃及其家族赏赐。

当然，唐玄宗认为这样很麻烦。

新任理财专家王鉷很是明白事理，办事也很干脆。他直接从各地上缴的税收中截留了一部分，建立了“大盈库”——专供唐玄宗挥霍之用。每当唐玄宗追问“大盈库”钱财来源时，王鉷都对玄宗说：“请陛下放心使用，这些都不是来自国家税赋”！

“大盈库”收入确实没有减少太府收入，太府收入早就另有进项。太府就是国库，王鉷扣住了国库收入，当然要对国库有所交代。从此，李林甫一手创立的“和籴”、“和雇”就变成害民于水火的恶政，也成为后世攻击李林甫的靶子。

——“和籴”是帝国政府以高于市价的价格收购黎民百姓的粮食，王鉷居然将收购价格压到低于市价的三分之一强行收购农户存粮。

——至于“和雇”就更是离谱，本来“和雇”制度废黜了徭役、但凡修建为朝廷工程的人都能得到一份工资。天宝年间，朝廷开始向普通农人征收“脚钱”，用途是确保支付“和雇”的银子，等于从贫苦人手中拿钱再分给贫苦的人，至于这笔钱是不是真的能回到穷人手中就只有天知道了。

——不仅如此，还要求各地补偿运输过程中因受潮等原因造成损坏的粮食和锦帛，由当地官衙向属地百姓征收。

——“大盈库”还有一些非正常敛财渠道，比如，罚没。当时，帝国首都所在地是长安县和万年县，两县县尉（贾季邻和薛荣光）都是王鉷任用的私人，在王鉷指使下，两位县尉最重要的日常工作是替富裕商人清点财产，有钱的商人会被加上“谋反”的罪名，最后实施抄家——罚没所得全部归属“大盈库”。

安史之乱爆发后，唐玄宗逃离长安，逃跑之前杨国忠曾建议毁掉“大盈库”中的数百亿铜钱，“大盈库”之丰可见一斑。

王鉷的下场倒是跟他的前任杨慎矜一样。在李林甫与杨国忠的斗争中，杨国忠成功把王鉷牵入一场“谋逆”案，王氏家族同样被灭族。有关部门（“有司”）在抄

查家产的时候，发现这位“聚敛之臣”在全国广置田宅，仅清点土地名册就用去了几天时间；在王鉷家中有一孔金玉砌成的水井，只要有人声到来，联通的水井的喷泉就会自动喷出雨雾。

跟杨慎矜相比，王鉷的敛财手段已经拿不上台面，几乎相当于大白天当街抢劫。不过，跟他的后任相比，这些敛财手段实在还是在理性范围之内……

天宝十一年，李林甫这位“朝野侧目”二十年的宰相病死，大唐帝国也失去了最后一位能总揽全局的铁腕人物，杨国忠成为第三个为唐玄宗敛财的人，此后的局面便彻底失控。

杨国忠，自幼不学无行，但是相貌俊美，杨贵妃进宫后与杨玉环二姐通奸，由此攀龙附凤。不过，此人也有两手绝技，就是计算钱财能丝毫不出错，据说在“大盈库”盘点中能按市价以“枚”为单位报出每个库房存货的折价。李林甫死后，杨国忠成为宰相，并兼任度支郎中等四十余个差事。

这位寒门宰相很有抱负：我出身寒微，只不过因为攀上了女人的关系才飞黄腾达，毕竟不是有功于帝国的名臣宿将，所以，我有生之年不会去求取一个好名声，我只求富贵、奢华，我只要及时行乐！（看起来，杨国忠还有几分自知之明）

如此“日暮途远，故倒行而逆施之”的宰相，根本没有统摄百官的强霸气度，专以聚敛为己任。杨国忠利用手中的权力，把手伸向了帝国每一个角落，甚至对外贸易（安禄山就是这么被逼反的，后文详述）。杨玉环入宫后两年，杨国忠自称家产三千万匹锦缎，把锦缎折合成 2012 年的人民币，大约为七十亿元。

……

杨国忠作为一个封建官僚的后起之秀，要维持现有地位、扩大自己的财富，放开土地买卖是一种最符合个人理性的选择。在杨国忠主持下，天宝十一年，也就是李林甫刚刚去世，大唐帝国就下发了一道诏令——《禁官夺百姓口分永业田诏》。从字面意思来理解，这道诏令的意思是禁止封建官僚强夺百姓土地。

千万别被忽悠，诏令名字不过是一个文字游戏，诏书的本质是承认土地私有买卖，即放弃“开元限购令”。

在这道诏书中朝廷首先承认，天宝以来“王公百官及富豪之家”即使在限购政策下仍旧千方百计兼并土地、违法买卖百姓赖以谋生的口分田，目前的状况已经是百姓“无处安置”。其后，诏令笔锋一转，提出了解决措施：贫富分化情有可原，所有已经完成的土地买卖，只要是用现钱购买来的土地就是市场化行为，就应该是公平的、公正的，所以，以现钱购买的土地可以不遵守“开元限购令”、不需要罚没入官，只需要“更从宽典，务使弘通”；至于不是用现钱买来的土地，如果有人来索要官家为其赎回“永业田”，如果没有人来索要就算了……

说到底，封建王朝所有的财富聚敛手段都是为了与黎民百姓争夺财富控制权。通常情况下，封建当权者抢劫财富有增加税收、铜钱减重等若干手段，今天我们将其称为“收税调节”、“财政政策”或“货币政策”。

如果让我来评价，那么，增加税收是最蠢的政策，谁都知道自己兜里的钱少了，最多也就是个“手中有招、心中无招”的境界；增发货币虽然是狠招，大家一时不会觉得钱少，但时间一长也就很难再糊弄人，不过也就是“手中无招、心中有招”的境界。唯独杨国忠这个不学无术的无赖，一出手搞出来的《禁官夺百姓口分永业田诏》就到了抢劫的最高境界——土地兼并，颇有“手中无招、心中也无招”的风范。

在农耕社会，土地是每一个人赖以谋生的生产资料，而这种生产资料价格暴涨，

会迅速扫尽社会底层几代人的财富积累。显然，玄宗在开元初年就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开元限购令”才否认所有土地买卖的合法性，以极其强硬的方式稳定了小农从帝国政府手中获得的土地。

现在，财富分配规则变了，一切也就都变了；流民、可怕的流民，再一次出现在大唐帝国的疆域之内。

有赖于开元盛世的基础，天宝年间流民没有立即沦落到家破人亡的境地，人们往往会选择给皇族、封建官僚或大地主做“庄客”。《太平广记》中有大量这样的记载，某人为某官“庄客”，不过，“庄客”是一群既没有固定财产的人。《通鉴》记载，天宝十四年，大唐帝国中共有 891.47 户农人，其中 356.55 万户已经丧失了土地，沦为“庄客”，也就是说全国 40%以上的人已经彻底失去了自己的土地。杜甫“朱门酒肉臭，野有冻死骨”的诗篇，就是写于天宝十四年。

天宝十四年，一次社会大动乱的一切条件都已经齐备了，我似乎看见一场悲剧正在上演……

楼主：天圆地方的困惑 时间：2021-10-16 00:57:12

图书广告一下，本书已出版《中国是部金融史》，当当、卓越有售，欢迎购买，感谢支持！

楼主：天圆地方的困惑 时间：2021-10-16 00:57:12

《李娃传》中的金融故事

每个时代的文学作品都是那个时代的精神写照，也只有小说才会详细描述普通人的衣食住行，我也只能借助小说描写为您还原当时普通人的金融业务。唐代有一部小说叫做《李娃传》，作者白行简，是白居易的弟弟。这部书取材于民间词话“一枝花话”，记述了玄宗年间一对男女的爱情故事。

《李娃传》的女主人公李娃是一位沦落风尘的妓女，男主人公则是出身刺史之家的书生郑元和。故事的大意是郑公子在进京赶考途中路遇妓女李娃，终于为李娃美色所惑，放弃了曾经热衷的科举事业。此后，郑公子搬进了李娃的住所长达一年之久，千金散尽之后郑公子流落街头。

这位贵公子的麻烦从此开始，他不得不开始典当自己随身贵重之物，最后身染重病，被放置于凶肆等死。所谓“凶肆”是专为人办丧事的地方，郑公子在凶肆之中得到了很好的照顾，病情逐渐好转起来。于是，郑公子开始为凶肆里的人写葬礼上的哀歌。这里要说，科举练出来的本领真是非比寻常，当年长安城哀歌大赛上，这位官宦之后一曲独唱让所有对手动容，最后所有选手都自动放弃比赛，郑公子一举成为长安城（京都）最著名的哀歌写手，也获得了大笔钱财。

郑公子的名声惊动了长安城的人，也惊动了他的父亲常州刺史。当时，这位父亲正在京城公干，目睹自己儿子高唱哀歌之后气愤之极，把郑公子打成重伤后扬长而去。就在郑公子即将重伤不治的时刻，李娃再次出现在郑公子面前，她自己向鸨母赎身，以自身存款奉养郑公子。数年后郑公子重回科场，并金榜题名，故事的结局是郑公子与父亲和解，并娶李娃为妻，李娃也被封为“汧国夫人”，并生了四个子女。

借助这个开元年间的故事，我为您梳理与普通人有关的金融业务。

第一，玄宗年间，大唐帝国已经有了当铺，《李娃传》中郑公子落难的时候就以自身携带物品在当铺里典当求得赖以生存的铜钱。

第二，玄宗年间，大唐帝国已经有了第一代存款机构——柜坊，也就是旅店。郑公子进京赶考，父亲为他准备了足供两年的钱财，以大车运进京城，这些财物均保存在柜坊之内。唐朝以前，商人做生意必然带着现钱，通常这些现钱会锁在客

栈房间或者寄存于亲友家。不过，在客栈中或者亲友家，总有丢钱的时候。最初，可能是柜坊向商人提供柜子，商人自备锁头。逐渐的，商人把钱直接放在柜坊，柜坊出具书贴，取款也不用本人到场，凭书贴即可。

第三，玄宗年间，大唐帝国已经有了中国第一代汇兑业务——便换，也就是后来的飞钱。来自各道的商人在京城赚钱之后，就把钱交给本道在京的“进奏院”（驻京办），进奏院会给商人一张凭证，商人拿着这张凭证就可以回到本道支取现金。之所以“便换”后来更名为飞钱，是因为在唐宪宗年间朝廷下令户部经营“便换”，并将之定名为“飞钱”。郑公子的父亲进京公干，身上应该就带着这种“便换”。第四，玄宗年间，大唐帝国有人在使用黄金。至于用途，从金银在史籍出现的次数来看，从多到少依次应该是贿赂、纳税、赌博和悬赏。加藤森曾著《唐宋时代金银之研究》中，礼品馈赠也被列第一主要用途。至于金银用来购买日常生活用品，则全部出现在战乱年代，比如唐末扬州战乱中曾有记录，一斤金子只能换得米五升。

最后，我来解释一下《李娃传》不朽的真正原因。所谓中国古典文学中的“才子佳人”，千篇一律是一位饱读诗书的青年男子落难，为一位富家小姐所救，两人一见钟情；然而，爱情总是有波折的，关键时刻富家小姐的父亲总会挺身而出、棒打鸳鸯；青年男子愤然赴京赶考，状元及第，回来迎娶（或者抛弃）那位富家小姐……

现在，我来告诉大家，所有的“才子佳人”小说均属腐儒梦呓式的意淫。中国自唐朝科举开始“点状元”以来，一千三百多年中只产生了 504 名状元，很多状元是年过花甲六十老人，正做青春梦的富家小姐无论如何不可能对这种人一见钟情。更重要的，这 504 名状元清一色出身巨富之家，富家小姐根本不可能有机会“美救英雄”。

《李娃传》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揭示了一个盛世必备的重要特征：贫贱者可因奋斗而富贵，富贵者亦可为浪荡而贫贱，整个社会阶层上下之间是可以自由流动的。《李娃传》不过只是记述了一个“高富帅”变成“吊丝”、“吊丝”又变回“高富帅”、一个“女吊丝”也变成“白富美”的故事——只要努力、品行卓尔不群，社会终究会承认你！

郑公子第一次落难就是因为流连灯红酒绿之地一年，最终为鸨母所害，从一个“高富帅”成为“吊丝”。贫病交加中的郑公子，却因为一手写哀歌的本领在凶肆中拿到“钱两万”的年薪——这可是当时一位宰相的年薪，再度变回“高富帅”！郑公子第二次落难之后为李娃所救，当时他已经与自己的父亲断绝了关系，却仍然能凭着苦读诗书成为“成部府参军”，甚至“三公以下都是他的朋友”（三世以降皆其友也），再次完成了从“吊丝”到“高富帅”的嬗变。

至于女主人公李娃只是一个妓女，正牌“女吊丝”。故事中，李娃却因为甘心奉养落难的郑公子，其义举和德行感动了郑公子那位食古不化的刺史老爹，他亲自挽留自己这位儿媳，并“命媒氏通两姓之好，备六礼以迎之”。最后，李娃的事迹被唐玄宗耳闻，加封她为“汧国夫人”，正牌“女吊丝”从此变为正牌“白富美”。

也许，《李娃传》将永远是一个传奇，正因为是传奇，所以开元盛世才将永远不朽。

楼主：天圆地方的困惑 时间：2021-10-16 00:57:12

补前一章一段

钱上美人痕

唐玄宗废黜了官手工业，顺便把负责铸币的少府也给废黜了，只留下了几个铸钱的官炉。皇室再一次对天下人正式放开货币铸造——只要你铸造的钱能花出去！放开私铸提供了大量货币，极大刺激了当时的商业，开元初年的繁荣很大程度上来自于民间充足的货币供给。当然，放任货币私铸也有弊端，那就是恶钱泛滥、物价暴涨。

当时，民间私铸货币只是鹅眼钱、铁钱、钱环等等，大概钱币重量约为开元通宝的三分之一。同样是斗米的价格，以恶钱衡量当然比官钱衡量要贵很多——官钱本来就比恶钱重。所以，大家大可不必为玄宗初年的通胀惊讶，

玄宗的第一任宰相叫做姚崇，这位“救时宰相”采取了务实的货币政策，对恶钱的态度也很宽容。开元元年，姚崇下令规定重二铢钱以上的私铸货币才准许流通，低于二铢的恶钱，官府按实际重量在长安、洛阳市面上以官钱收兑。这些措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开元五年之前，民间所铸之钱制形也相当工整，绝不是乱世官家抢劫财富用的小钱。民间交易往往是官铸、私铸混杂，比例约为3:7。

既然对天下人开放，私铸货币就不是谁的独家买卖，没有人能强迫交易者使用自己的私铸货币。大家又不是很熟，都是西方经济学所谓的“理性人”，谁也不会自愿当傻帽。

实际情况是，交易者在接受恶钱的时候，会在价格上打上一个折扣，一般情况下，一千文“恶钱”如果能重达六斤以上，就可以当三百文官铸开元通宝（百姓情愿出恶钱一千文，计杆满六斤，即官以好钱三百文博取）。开元年间恶钱一直存在，也基本是这个兑换比例。

开元六年，姚崇去世，继任者是一位嫉恶如仇的宰相——宋璟。

——中宗年间，权倾天下的武三思让宋璟巡视并州，督促收取租赋。巡视过程中，宋璟看到并州遭遇水灾，于是当面顶撞武三思，然后拒不执行命令。结果，从吏部侍郎变成了并州长史。

——睿宗年间，宋璟当面讥讽太平公主干政，那可是一个连皇帝都敢杀的女人。结果，宋璟从吏部尚书混成了楚州刺史。

由此，《旧唐书》这样评价这位宰相，“耿介有大节”。这句话，我来翻译一下：宋璟为人，凡事非黑即白，善就是善、恶就是恶，所以，他做事丝毫不留余地。说白了，这人就是一个有正义感的愣头青。

开元初年，谏议大夫杨虚受就上疏要求“罢恶钱”，他指出，市井所用之钱质量实在太差，铸造者在钱里加铁铅，这有损朝廷威名，京城尚且如此，外省如何就可想而知了。但是，这道奏疏被姚崇搁置不报。

对宋璟这个愣头青来说，私铸就是恶钱、恶钱就会造成“物价翔踊”。这种情况根本就是无需再忍的，废了私铸货币就是。

在宋璟主持下，朝廷开始对私铸恶钱进行强力收缴。

开元六年，宋璟下令禁止私铸货币，现存恶钱一律上缴；再有铸造恶钱者，斩首；如果继续持有恶钱，甚至以恶钱交易，立即逮捕。最狠的是，但凡因持有恶钱被逮捕的人，官府一律不得接受当事人的诉状与上访，直到家人交出所有恶钱才予释放！

萧隐之是宋璟手下的一个御史，开元六年被派往江淮地区查办铸造私铸的商人、包庇私铸的官僚。关于萧隐之，《旧唐书》、《新唐书》中的记载很少，他最大的事迹就是淮河流域采取暴力手段没收商人手中的私铸货币，每到一地都先统计当

地富户、商人，然后派人直接冲入家中搜查、没收。最可恨的是，抢钱之后这位萧御史还要把人抓起来，强迫犯人举报铸造恶钱、匿藏恶钱的地点，当然，搞一些刑讯逼供、“撞墙死”、“喝水死”之类的把戏可能也是存在的。

萧御史的成果是很突出的，江淮之地立竿见影陷入了萧条。《册府元龟》记载，无论官民都对这位朝廷特派员都是骂不绝口，萧御史所到之处，官员纷纷挂冠而去、普通人纷纷举家逃亡、当地物价一飞冲天、所有商人都停止了交易、监狱里更是人满为患……

开元七年、开元八年，大唐帝国北方再次遇到了大旱灾。由于缺少私商贩运粮食，长安和东都洛阳同时面临前所未有的考验，李隆基即使想学隋文帝东迁“逐粮”也已经不可能了，因为，所有的商人都因为缺乏货币而罢工了。

中国古代但凡遇到旱灾，民间和皇宫都会举行“打旱魃”的仪式，向上天祈求降下甘霖。所谓“旱魃”据说就是旱灾中作怪的妖精，一般来说是从地狱里偷偷跑出来的冤魂。人们在仪式上把旱魃的扮演者赶走，祈求上天降下甘霖。

开元八年的某一天，唐玄宗在皇宫中看戏，正剧间歇中两个演员走上舞台，一个扮演神仙、一个扮演旱魃。这只是一个很普通的祈福仪式，通常情况下，神仙会义正辞严斥责旱魃，然后命令马仔把旱魃重新打入地狱。其实，这种演出其实就为讨个彩头，让皇帝看着高兴。可是这一次，两位演员的演出有点离谱了。

神仙问：你为什么要从地狱里跑出来害人？

旱魃答：是宋相公让我出来的。

神仙问：胡说，宋相公怎么会让你出来为害人间？

旱魃答：现在人间的监狱已经人满为患，却都是冤屈的人，宋相公不让这些冤枉的人上访、也不让人向官府申诉冤屈，连地狱里都已经冤气冲天。所以，我必须出来警示世人、警示皇帝。

旱魃口中的“宋相公”就指宋璟，宋璟和萧隐之等一千人在各地“禁恶钱”，搞的鸡飞狗跳，“抓人、不准官府接诉装”的诏令还是他亲手下发的。现在，恶钱没能禁止，却搞得北方大旱，旱魃横行……

当年，宋璟罢相（唐玄宗为宋璟保留了最高品秩）。

包括《资治通鉴》在内的很多史书都确信，开元初年恶钱泛滥，宰相宋璟以大无畏的精神收缴恶钱。结果，刚直不阿的宰相得罪了当朝权贵——那些铸造私钱的人，在某些权奸安排下，开元八年的这次“旱魃”表演让唐玄宗下决心罢免宋璟，这位仕林领袖终为奸人所害，此生再也没能回到相位。

“恶钱”，说白了就是假币，就是在市场最发达的英美等国也不可能由着人们甩开膀子印刷美元或英镑。这样看起来，禁绝恶钱是一件理所应当的事情。

不是这样的。

所谓货币，也就是一种价值的符号。交换过程中，人们最初觉得贝壳、金、银、铜这些玩意价值高、易于分割，这些东西也就成为货币。所谓“货币天生是金银”，是因为金银矿产储藏量小、价值高，在没有电解铝技术的时代，西方世界一样把铝作为更贵重的一种货币。

可以说，货币的出现，完全是商业自然演进的结果，从来就没有什么官府意志。国家出现以后，货币铸造成为一种权力的象征，也成为敛财的工具。在西方，罗马帝国经常铸行不足值货币，克劳狄、安敦尼王朝都曾因此灭亡。罗马帝国衰亡后，脱离贵族庄园的商人开始在城镇中铸造银条——这是西欧第一代真正意义上的金属货币，完全属于私铸。在中国，自春秋时期，刀币、贝币、布币也是由商人自己铸造，只有不可一世的秦始皇、汉武帝才号称要统一全国货币，实际上这

个目标也从未实现。

至于当时的大唐帝国，从武德四年大唐帝国铸行“开元通宝”开始计算，到玄宗统治的三十年，就算每年都能行十五万贯新钱，官府铸币早就不能适应帝国庞大的商业需要了。

据统计，开元年间私铸货币已经占到货币流通量的 70%。现在，宋璟要禁绝私铸，禁绝私铸就等于断绝货币供给，断绝货币供给就等于天下都没钱了。

天下都没钱了，咱这买卖还干不干了？

所以，禁绝私铸货币的想法基本等于异想天开。禁止私铸这事，就是秦始皇当年都没办成，何况您宋璟。

宋璟之后，开元、天宝年间，玄宗及历任宰相始终对私铸采取宽容态度，并极力增加官铸。大约从开元十年起，唐玄宗新设了七十多个官家铸钱炉，开元立十五年恢复少府并设置“铸钱使”。

由此，开元通宝的铸造就分为两个时期，宋璟罢相则是划分这两个时期的标志。

楼主：天圆地方的困惑 时间：2021-10-16 00:57:12

第 12 章 国在铜钱破

（唐肃宗-唐宪宗）

货币战争之安史之乱

历代史籍对安禄山尽极辱骂之事，说此人不过是一个肥胖、矮小、目不识丁的野蛮人（胡人），通过小丑伎俩取得了杨贵妃信任，又通过杨贵妃迷惑了唐玄宗，然后杜秉军权。结果，野心勃勃的安禄山骗过了无能的杨国忠，天宝十四年安禄山谋反，一举击溃了大唐帝国……

以上说法，纯属虚构，如有雷同，史籍杜撰！

安禄山确实肥胖，却能以极快的速度跳出优美的舞姿，据说当时整个长安城在安禄山影响下甚至兴起了“胡潮”；安禄山确实矮小，却能准确把握唐玄宗、杨贵妃、李林甫等人的心思，据说玄宗、李林甫在最闷闷不乐的时候只要见安禄山一面都能笑逐颜开；安禄山确实目不识丁，却能以地道的口音说出波斯、突厥、大食、吐蕃、回纥、汉语（陕北话）六种语言……

安禄山从来就没压制过杨国忠，相反，他曾经像侍奉唐玄宗、李林甫一样侍奉杨国忠，无论春夏秋冬，但凡行贿都以上百车计算，那是相当殷勤。

杨国忠的底子实在不够光彩，既无治国才能、又无过人的资历、甚至没有“科举帮”口头上的道德力量，他所有的本事都是来自于拉人“一起分赃”，根本没有驾驭群臣的能力，更无控制边镇的本事。

杨国忠要继续享受这种生活，唯一的选择就是打击所有有能力超越他的人。满朝文武，安禄山是第一号有资格“出将入相”的人，也是杨国忠始最大的敌人。所以，无论安禄山如何行贿，都是不好使的。

李林甫活着的时候，杨国忠不能为所欲为；李林甫死后，杨国忠无能而又贪婪的本性暴露无遗，他不断采用愚蠢之极的方式刺激安禄山，试图以此堵死安禄山“出将入相”的路子。

——天宝十二年（752 年），安禄山推荐自己的群牧副使吉温来京担任兵部侍郎，在杨国忠栽赃陷害下，成功将吉温潜入一起贪污案。尽管安禄山百般斡旋，甚至亲自向唐玄宗求情，杨国忠还是将吉温处死。

——天宝十三年，杨国忠为了取得所谓安禄山“谋反”的证据，强迫京兆尹出兵袭击安禄山在长安的府邸，然后对捕获人员严刑逼供，获得证词之后又将他们立

即处死。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安禄山仍然抱着一线希望来到长安为唐玄宗拜年，当然目的是为自己洗刷嫌疑。之前，杨国忠信誓旦旦说安禄山“反迹已露”，绝不会再入长安朝见唐玄宗。

——天宝十四年，杨国忠又以贪污罪处死了安禄山在朝为官的儿子。

安禄山再不造反，那就是个赤佬！

对大唐帝国来说，天宝十四年真是一个不幸的年景。

那一年，安禄山在范阳镇起兵造反，率 30 万铁骑南下；

那一年，唐玄宗仓皇出逃长安，京师文武百官星散；

那一年，追随唐玄宗的军队在马嵬坡哗变，处死了万死不辞其咎的杨国忠和三千宠爱在一身的杨玉环；

那一年，留守关中的太子李亨未经李隆基批准，就擅自做主尊唐玄宗为太上皇、在关中自称皇帝，史称唐肃宗。

那一年，大唐帝国在唐肃宗带领下开始了艰难的平叛历程……

平叛是要钱的！

在这个世界上，志存高远的人当然是存在的，不过，对绝大部分人来说，民族大义、忠君爱国、救民水火不过是书生慷慨激昂的说辞罢了，在开战的一瞬，要凝聚人心，只有财富才能换来强盛的军力！

否则，士兵又靠什么相信自己喋血沙场后身后有托？

以开元、天宝年间强盛的国力，大唐帝国并非没有能力对抗安禄山。只不过，混蛋透顶的杨国忠，在长安即将陷落的时候还派人去太原筹集粮饷，既不肯使用、也不转移长安、洛阳两京钱物，结果“两京陷落，民物耗弊，天下萧然”。

唐肃宗登基称帝的时候，大唐帝国已经丢掉了长安、洛阳以及河北、山东各地的粮仓和府库，这个曾经辉煌的帝国已经穷到一文不名的地步了。安史之乱初年，关辅、朔方、河陇等四十余郡的勤王之师约在百万之众，很快，唐肃宗能控制的钱粮告罄，到了“无轻货人散矣”的地步。

危亡之际，一个胥吏出身的官员挺身而出，为唐肃宗谋划钱粮，这个人有个很奇怪的名字叫做“第五琦”。第五琦，官拜御史中丞，是又一个被《新唐书》列入奸臣行列的“聚敛之臣”。

第五琦拿出的第一个方法，铸行“大钱”，即封建统治者惯用的货币伎俩——货币减重。

肃宗乾元元年（公元 758 年）七月，在第五琦主持下，大唐帝国开始铸造了一批“乾元重宝”，乾元重宝与开元通宝制形类似、重量也类似，只不过，一枚乾元重宝要当十枚开元通宝来用；次年三月，第五琦又铸造了一批新的“重轮乾元重宝”，即这种铜钱有两道钱轮，故称“重轮”，也称“重棱钱”，只不过重轮钱要当 50 枚开元通宝来用。

财富的力量是无穷的——即使只是名义上的财富，持有这种货币的人会在瞬间觉得自己成为了富人，这在经济学上叫做“货币幻觉”。虽然幻觉终究是要破灭的，幻觉没破灭之前，感觉还是很好的。据说，大唐将士们得到了乾元通宝、重棱钱后非常高兴，经常有什么斩首叛军十万级、横尸三十里的记录。

拿不值钱的钱来骗人，还骗的我大败而回，安禄山、史思明非常愤怒，愤怒之下就开始动歪脑筋。

你不是以一当十、以一当五十吗？我就以一当一百、以一当三百！

看谁狠！

楼主：天圆地方的困惑 时间：2021-10-16 00:57:12

为应对唐肃宗的货币贬值，安禄山开始在东都洛阳发行一种更狠的虚值货币“得一元宝”：在安禄山的辖区，一枚“得一元宝”可以当一百枚当年的开元通宝、三枚乾元重宝、两枚重棱钱。

史籍没有记载这场货币战争的胜负，却明确记载了这场货币战争的结果：物价暴涨、恶钱盛行。

自武后年间起，大唐帝国就始终对私铸货币持开放态度，官铸开元通宝和私铸货币始终同时存在。没出大乱子的原因，是因为开元通宝始终没有减重，官铸货币和私铸货币的比价始终由民间交易自发形成——既然是在无数次博弈中形成的价格，当然剥削也就无从谈起。

“乾元通宝”、“重棱钱”和“得一元宝”却不是这个样子，这三种钱的重量都与开元通宝类似，却要当十枚、五十枚、一百枚开元通宝，是典型的虚值货币，也是典型的抢劫。无论叛军还是大唐帝国，这三种货币最初的获得者和使用者都是职业军人，三种货币都有着异常的强制执行力。

更离谱的是，大唐帝国长期以来已经有了私铸货币的传统。既然铸行虚值货币有几十、上百倍的利润，私铸者当然不甘示弱，三种货币刚刚铸行，假币就充斥了各个全国各地。人们纷纷毁开元钱、改铸大钱，甚至连寺庙中的铜像、钟磬等也被熔毁铸钱。

至于物价，当然是一飞冲天，诗人杜甫因买米的钱不够气愤地写下了“岂闻斗米直万钱”的诗篇！至德二年（757年）南阳被围的时候米价也只是斗米四五十百钱，到了乾元二年邺城被围的时候斗米七千钱。通胀最严重的时刻，一位叫做田神功的朝臣一宴就花掉了一亿铜钱，当然是以重棱钱计价的。

后来，这种货币实在流通不下去，唐肃宗只得承认“开元通宝”与“乾元通宝”等值，“重棱钱”可当十枚开元通宝（乾元通宝）；唐代宗宝应元年（762年）四月，又下诏“重轮钱”改为一当三；后元载为相，各种大小钱等价流通。

至此，双方铸币敛财术全部完败。

楼主：天圆地方的困惑 时间：2021-10-16 00:57:12

盐铁专营的轮回

第五琦敛财的第二个方法，是重行盐铁专卖。

《新唐书·第五琦传》记载，第五琦在拜见了唐肃宗时阐述了一个真理：兵事强弱、战场胜负，其实只在钱多钱少。对此，第五琦也提出了解决方法：只要给臣一个职务，洛阳、长安之日可定，我能让粮饷即刻飞往战场（若假臣一职，飞响函、洛）；而且，这是一种百利而无一害的税收，不用盘剥百姓也能国富民强（人不益税而国用以饶）。

这个职位，叫做“盐铁使”。

至于具体方法，不过是把桑弘羊的盐铁专卖重新拿了出来，彻底结束了大唐帝国对盐铁“皇家不赋百三十载”的美好生活。

应该说，第五琦还是看到了盐铁官营的弊端，也尽最大努力想消除这些弊端。在第五琦的盐铁改革中，最大限度的保存了私人盐铁的生产体系，只是将收购、运输、销售收归中央朝廷所有。也就是说，盐铁由私人生产，但收购、出售价格完全由官府自定，其中的利差就是官府的利润。

仅仅一个购销差价，麻烦已经很多了。

因为，这个购销差价实在是太离谱了，天宝、至德年间盐每斗十钱，实行盐铁专卖之后，每斗为钱三百七十（斗为钱三百七十）。如果考虑当时通货膨胀的因素，以下记载则更符合实际：“以谷一斗易盐一升”。

食盐、铁器不是什么奢侈品，是每一个家庭乃至每一个人生产生活的必需品——朝廷直接控制社会生活的必需品，最直接的结果就是恶化了广大唐朝人民的物质生活。既然是必需品，那么，所有人都不得不任由封建朝廷剥削、不得不交出

自己的财富，结果是“百姓贫家，食盐至少，或有淡食，动经旬月”。对朝廷封建官僚而言，终于找到了一个发财的好机会。历朝历代，所谓“官营盐铁”朝廷得利不过十之其一，更多的还是为执行朝廷敕令的“官商”所得。

第五琦开始推行盐法时，为减少封建官吏中饱私囊和舞弊发生，管理朝廷盐政的衙门叫做“置巡院”，只是户部下面一个处级单位。后来，第五琦被贬官，“置巡院”被分设并升格为两个副部级单位，并在所有州、道、府、县都设置了朝廷直属的垂直管理机构，这些机构垄断了盐铁生产、销售的所有环节。

只要能混进“置巡院”，即使是一个胥吏，一年就能“资累巨万”，就可以买豪宅、开名车，过上王侯一般的生活（且凡为度支胥吏，不一岁，资累巨万，僮马第宅越于王公）。盐铁专卖是个很有前途的职业，从业者有的是钱赚，可以穿金戴银、可以锦衣玉食、可以珠环翠绕……

大把的铜钱、迷人的珠宝、花不完的金银，多么幸福美好的生活！美女香车，不仅封建官僚喜欢，普通百姓乃至犯罪分子也很喜欢。

“盐铁专卖”是一种非正常的敛财途径，会刺痛所有人的眼睛，这些人也包括无法无天的歹徒。朝廷能推行盐铁专营，说到底还是靠国家机器的暴力管理，既然封建官僚的暴力可以牟利，歹徒的暴力一样可以，刀头舔血的暴徒还不是为了钱？！自此，贩卖私盐成了晚唐年间一道无法抹去的伤痕。私盐贩子或者放火烧掉盐仓、或者抢劫运盐商队，然后借助壕沟、篱笆、山林、黑暗（壕篱外面，山林掩映，村栅相次）对抗官军，再把抢劫来的私盐低价贩卖到全国各地。在利益驱使下，私盐贩卖者不但抢劫官府盐队、贩卖私盐，甚至对普通百姓下手，有店铺或者普通人因惧怕而不敢买私盐的时候，也会被屠杀、灭门（是时江、吴郡盗，以所剽物易茶盐，不受者焚其室庐）。

私盐买卖是一种“暴力”与“暴利”相结合的犯罪活动，对帝国正常秩序的破坏性远高于普通流民。无形的利润之手无处不在，每一个苦难的黎民百姓人都会成为潜在的反叛者，但有星星之火，必成燎原之势，最终发动唐末农民大起义的首领黄巢就是靠贩卖私盐起家……

楼主：天圆地方的困惑 时间：2021-10-16 00:57:12

唐肃宗终其一生也未能目睹山河一统，继位的唐代宗更是已经丧失了禁军指挥权，只得依靠一批节度使打倒另一批节度使。当然，只要节度使军队离开自己境内，帝国政府就必须为之支付“出境钱”。此时，帝国已经不能直接控制土地，当然也就无法直接控制百姓，第五琦所创盐税成为帝国最大的进项，占到帝国收入的80%以上。

然而，盐税的弊端实在是太大，天下府县布满了朝廷的直属机构“盐铁使”，没有人知道这些人究竟在干什么，也没有人知道这些人究竟把多少钱搂紧了自己的腰包。

就在“民物耗弊，天下用度不足”之际，大唐帝国终于又出现了一位治世能臣——刘晏。

刘晏官拜度支郎中、兼领租庸事，是玄、肃、代、德四朝老臣，先后执掌大唐帝国财政二十多年，是唐史中唯一可以和宇文融比肩的“聚敛之臣”。

刘晏的刀，砍向了盐税，这是一次有限的市场化改革。

其实，改革措施并不复杂，只是对民间放开了盐铁的运输和二级销售渠道，把盐铁专卖的范围缩小到当初第五琦的设计。也就是说，官家除了在批发环节以定价确保帝国税收以外，刘晏裁撤了盐铁的运销和销售衙门，把这些就业、赚钱机会让渡给了真正的商人。

官府给定一个批发价，至于批发之后卖多少钱，商人自己看着办。而且，刘晏并未提高盐铁批发价，以盐价为例，刘晏官定为每斗一百一十钱，远低于改革之前。在这里，我们给出一个数字，足以让人惊讶这项改革成果之丰：广德二年（764年）刘晏刚刚上任时太府每年入不过40万缗，广德三年，朝廷盐税收入居然高达800多万缗。

现在，我们算一个简单的减法： $800-40=760$ 。

那么，剩余的760万缗钱去那里了呢？

答：可能有盐铁使在官衙装了一个很贵的琉璃吊灯，也可能有盐铁使“我为朝廷喝剑南春”（见广告词：唐时宫廷酒，盛世剑南春），更可能被盐铁使通过某种“合理合法”的方式搂进了自己的腰包。

大历十四年（779年），刘晏主持财政十五年后，朝廷的岁入从四十万缗上升到一千二百万缗。然而，一千二百万缗钱对朝廷是远远不够的，为讨伐“父业子承”的节度使，大历十四年朝廷的用度已经上升到三千万缗……

楼主：天圆地方的困惑 时间：2021-10-16 00:57:12

向富人征税

西汉以来历代帝王都不遗余力地推行“均田制”，安史之乱后，经过以杨国忠为首的封建官僚疯狂掠夺，天下土地已尽在其彀中，难怪乎杜甫仰天长叹“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

在“皇权-封建官僚-小农”的社会框架中，皇权需要向千千万万小农收税才能生存。现在，土地不再属于每一个黎民百姓，而是属于大大小小的封建官僚……

唐代宗大历十四年（779年），就在中枢朝廷捉襟见肘之际，又有一个人挺身而出力图挽救危亡，这个人就是杨炎。

杨炎，生于开元盛世，完整经历了大唐帝国由盛转衰的历程。虽然杨炎早年的仕途并不顺利，但他的文采却早就享誉整个朝堂。弥留之际，唐代宗任命杨炎为银青光禄大夫、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希望这位帝国的才子能力挽狂澜。

大历十四年（779年）八月，刚刚上任的杨炎就上疏病入膏肓的唐代宗，以一封极为简单的奏疏阐明了自己的改革思路：既然“耕者有其田”已经绝无可能，那么，就应当彻底免除所有穷人一切税收、徭役（租庸调），帝国税收就该为“唯以资产为宗”、“按财计税”——谁拥有更多土地，那就向谁收取更多税收！由于杨炎安排在每年6月、11月向土地所有者收税，这次改革也被称为“两税法”。

两税法所谓“唯以资产为宗”、“按财计税”，说白了就是向富人收税。

从当代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富人有能力承担更多社会运行成本，“向富人征税”是一件理所应当的事情。更重要的是，只有向富人征税重税，才有可能实现社会财富重新分配，使贫者不丧失公平的起点。毕竟，只有富人的世界是不存在的，穷人实在太穷了，富人的游戏也是玩不下去的。

所以，我们当代有社会责任的富豪才能从内心深处发出这样的呐喊：请向我征税！无论从哪个角度，大唐帝国向富人收税都已经迫在眉睫了：帝国政府要想继续存在，就必须有固定的进项；封建官僚要想继续盘剥百姓，也总要先有了帝国的统治框架；百姓要想结束这种军阀混战的日子，也必须有一个强有力的朝廷……所有这些，都是要钱的！

建中元年（780年）正月，刚刚即位的唐德宗批准了“两税法”：无论您的土地来自朝廷授田、开垦荒地还是贪污受贿，也无论户籍是否在耕地所在地，只要您占有土地，就要按占有数量向朝廷纳税（户无主、客，以见居为簿，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除了土地税，朝廷中枢和地方官对民户“概不再取”。

“向富人征税”本是一件好事，但是，这件好事必须有一个前提，那就是财富来路必须光明正大，富人要通过公平、公正、公开的市场竞争赚钱。换句话说或许更明白，财富不能来自于封建官僚垄断的盐铁行业，更不能来自于封建官僚的权位。否则，封建官僚本就不靠市场获得财富，他们才不会管自己是否太富、极端的贫富差异是否破坏帝国的统治根基。

很不幸，杨炎面对的恰恰就是这样一帮富人、这样一帮封建官僚，整个大唐帝国，只有他们才是真正的富人，才是真正的土地拥有者。他们只知盘剥，不晓付出，更不知社会责任为何物；恰恰又是这些守财奴负责整个帝国的税收，他们怎么可能有动力维护社会公平，又怎么可能向自己征税？

楼主：天圆地方的困惑 时间：2021-10-16 00:57:12

“两税法”刚刚实施，宰相陆贽就上疏唐德宗，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其中弊端：天下之大，真正的有钱的人必定是坐在府县衙门里的人，他们的钱财来路不明，也就会把钱藏在自己的怀里、箱囊之中，虽然非常有钱，外人根本不可能知晓；资产和土地是一件很难说清楚的事情，从土地名册根本不可能看出端倪，没有人知道封建官僚究竟有多少土地，又把土地放在了谁的名下；乡间勤劳者靠数代积蓄添置几顷地，就被县官说成是有钱人，就急急去索要租税，只能使得民间财货一空，使得贫困的人更加贫困、小康之家也没有了余粮。

在成书于德宗年间的笔记小说中，我们找到了一个故事，完整诠释了宰相陆贽的判断，这样的故事在当时应该不是个案。

长安有一个叫做索相女的商人，酒后不慎让马匹脱缰而去，撞死了一个朋友，论罪当斩（酒后驾车自古贻害无穷）。索家的人以十几顷地买通了京兆尹手下的一个胥吏，在这个胥吏斡旋下，索相女被判流放五年。

五年后，索相女回到了故乡长安，发现衙门居然年年派人到家中为这十几顷地索要税收。因为，在这宗行贿案中，根本就没有人知道受贿人收了他的土地，也没有到衙门办理“过户”手续。

索相女是一个商人，在他眼里，也许行贿买命根本就是一单生意：我用十几顷土地换回自己的性命，此后钱货两清、概不赊欠。现在，我把土地已经送给了你，你怎么能还让我承担着十几顷地的税收？

于是，索相女向京兆尹衙门递交诉状，要求衙门为他办理过户手续，承认这十几顷土地已经不姓“索”了。当然，这出卖了那个曾经救他一命的胥吏，索相女也因此再次获罪，后被流放。尽管笔记小说没有记载那位胥吏的下场，但有一件事是确定的，那十几顷地依然在索相女名下，官府不可能公开承认这种灰色交易。索相女不过是当时社会的一个缩影，更多则是，封建官僚把税收直接加在境内自耕农、佃农甚至部曲身上。最后，所有的税钱都是来自于普通人日常的生活用度，而广具庐舍的封建官僚，虽然手中地价以亿钱计算，却丝毫不用承担国家用度（有流通蓄息之货，数虽寡而计日收赢；有庐舍器用之资，价虽高而终岁无利）。

岂能指望这样的一批封建官僚真的为朝廷尽心尽力？

这样的两税法又岂能真的为朝廷增加财富？

本来，两税法规定除了正税，任何人不得再征收其他杂税。仅到建中三年（782

年)，淮南道节度使就奏请在本道两税之外，每千钱加收二百钱，朝廷不但批准，还命其他各道照此办理；此后，剑南道观察使再请加征百分之二十，朝廷照样照准。至于州县小吏，也都粉墨登场，税收花样不断翻：新竹木茶漆要交“什一税”、买卖成交要交“除陌钱”、住房要交“间架税”、甚至连出门走路、人口死亡、瓜果成熟都要交税……

最后，提一下杨炎的下场。

“两税法”改革的目标是增加税收，方法则是剥夺封建官僚阶层部分财富，所谓“资产少者则其税少，资产多者则其税多”。这么干，杨炎无疑把所有封建官僚都推向了己方的对立面，包括那位治世能臣刘晏。

为打击反对势力，建中元年，杨炎亲自在德宗面前做假证，将刘晏牵涉进一场谋逆案，指责刘晏“摇动社稷，凶谋果矣”，最终刘晏被流放忠州，不久被唐德宗赐死、籍没家产、家属流放岭南。

杨炎是一个很好的文人，政治素质却明显不过硬。刘晏被处死后，天下人都认为这是一场冤案，为给自己开脱，杨炎居然把责任推卸给唐德宗，逢人便说“刘晏今天的下场，是因为皇帝早就讨厌他了，不是我的过错”。

黑锅是不能让领导来背的！

很快，杨炎的话就传到了德宗耳朵里，德宗愤怒的说“杨炎这是把杀刘晏的责任推给我，一定要找机会诛杀这个奸臣！”。

刘晏死后仅一年多，杨炎自不量力跟淮西节度使李希烈、泾原节度使段秀实叫板——刘晏不过是一个刀笔吏，李希烈、段秀实可是真正手握重兵的地方实力派。李希烈、段秀实开始搜罗杨炎的罪状——那实在怨不得别人，杨炎底子太不干净了：开元年间，杨炎刚在江南为官，就强占了一块很好的风水宝地；建元年间，杨炎又以宰相之威，强令京兆尹购买了他家的土地，当然，价格那是高的实在离谱（抑吏市私第，贵取其值）。

在李希烈、段秀实等人指使下，另一位宰相卢杞以这两条罪状弹劾杨炎。最终，杨炎被贬崖州，不出京城百里即被赐死。唐德宗在赐死的诏书中历数了杨炎之罪：不思为国尽忠，但知朋党为奸，败坏法度、罔上行私、纵恣诈欺、贪污受贿……

楼主：天圆地方的困惑 时间：2021-10-16 00:57:12

钱去那里了：唐末钱荒

两税法对大唐帝国货币演进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两税法规定，此后收税不收礼（粮食、锦帛）、只收现金。此后，从唐德宗贞元年间（785-805）开始，大唐帝国经历了一场足以与萧齐年间媲美的大通缩，前后时间约在 70 年左右，一直延续到唐武宗年间。当时的人就将这场通货紧缩称为“钱荒”（公私上下，并苦乏钱，百货不通，人情窘迫，谓之钱荒），史籍记载，数十年间每匹绢从四千文跌倒了八百文，粮食则从二百文跌倒了二十文，最后甚至跌倒了数文。

两税法的实施跟这场通货紧缩接踵而至，所以，很多人认为贞元大通缩最直接的成因就是杨炎推行的两税法：两税法实施以后，帝国政府税收只收货币，这极大减少了流通中的铸币数量，于是，中晚唐出现了这场长达半个多世纪的钱荒。

真的是这样吗？

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贞元钱荒发生的历史背景。就在钱荒发生前一年，大唐帝国又发生了一件不次于“安史之乱”的叛变——“泾原兵变”。建元三年，淮西节度使李希烈反叛，泾原节度使姚令言率 5000 士兵勤王，结果，

士兵到达长安的时候唐德宗居然不给士兵吃饱饭。士兵当然很愤怒，大家扬言：我们即将战死沙场，现在仍旧不能吃饱饭，怎么能以这样的羸弱之躯抗拒叛将白刃？皇帝的大盈库财宝堆积如山，既然皇帝不给，不如我们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吧！

兵变在即，唐德宗也确实得到了线报。只是应急预案却非常愚蠢：赏赐中层以上将领每人两匹粗布，让姚令言率领这些将领，空口白牙去游说士兵不要造反！

士兵造反就是为了钱，这些中层将领也一样，人家在地方上随便捞点怕也比两匹粗布多吧？

结果，唯一真心劝说士兵的泾原节度使姚令言无法约束手下，泾原勤王之师在长安兵变，杀朝廷抚慰使，士兵首领朱泚率军攻入长安并自立为帝。次年，仓皇出逃的唐德宗下罪己诏，即《奉天罪己诏》，唐德宗成为中国历史上公开颁布罪己诏的第二位皇帝。

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认为，如果一个领袖能公开承认自己的错误，并改过自新，不但不会贬损自己声誉，反而会增加领袖魅力。韦伯给出的例证就是中国汉武大帝的《轮台罪己诏》，尽管刘彻一生出过很多昏招，但晚年所作所为力挽狂澜，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仍不失为一代明君。

与《轮台罪己诏》一样，唐德宗在《奉天罪己诏》中承认现在社会秩序已经完全崩溃（万品失序，九庙震惊），自己上对不起列祖列宗、下有负天下黎庶（上辱於祖宗，下负于黎庶），由于自己的错误激起了兵变。所以，叛乱者只要放下刀枪就可得到赦免，只要重得天下太平，皇帝将从我做起，停用高级车马、停建奢华的宫殿，不再无故靡费臣民财力（自非供宗庙军国之用，一切并停）……

与韦伯的预见一样，《奉天罪己诏》取得了立竿见影的效果，叛军见到诏书后，“虽武夫悍卒，无不挥涕感激”，大部分将领自去伪号，首领朱泚逃亡吐蕃后被杀。

唐德宗以最小的成本平定了“泾原兵变”，但是，重新进入长安的唐德宗却未能像《奉天罪己诏》中说的那样励精图治，所作所为也没有真正惠及天下黎民百姓。所以，才有了中晚唐这场史无前例的“钱荒”。

所谓“贞元钱荒”，并不是所有人都手里没钱，而是绝大多数人手里没钱、一小部分人手里的货币又多的不可胜数。

中晚唐年间，长安、洛阳各地大商人、高利贷者比比皆是，甚至有人专门为大官僚放债，这种新业务有个专有名词叫做“京债”。这些人专门对在京新选任的官吏放贷款，作为朝廷新贵买官的运作费用，待他们到任后再还钱。

齐州有一个叫刘十郎的人，他获得了全州醋的专卖权（德宗年间，醋、糖也均被列为专营的榷品），不过数年，刘十郎家财就已经积攒到十万缗——相当于当时帝国一年的铸币量。以此为基础，刘十郎在京专门贷款给即将当选节度使的人，待他们上任后再归还贷款。

——可以放高利贷给人运作方镇节度使，无论本金还是利息，所涉及的金钱岂能是小数字（皆以倍息贷于富室，动辄亿万，然后得之）？在某一个固定的时点，货币总量必然是一定的，有人积蓄多达帝国一年的铸币量，就必然有更多的人为一文钱游离于生死之间。

——贷款买官的封建官僚，到任之后，所得到的利益又岂能是几千、几万缗铜钱？淮西节度使李德裕、淄青节度使李师道兵败后，所积铜钱都达到数百万缗，相当于国家十几年的铸币量！甚至有人“铸铜为瓦，涂金于上”来装饰自己的府邸，在这座府邸照耀山谷的背后，又究竟毁掉了多少枚铜钱呢？

楼主：天圆地方的困惑 时间：2021-10-16 00:57:12

图书广告一下，本书已出版《中国是部金融史》，当当、卓越有售，欢迎购买，感谢支持！

楼主：天圆地方的困惑 时间：2021-10-16 00:57:12

重读《黔之驴》：小人物的救赎

柳宗元有篇寓言叫做《黔之驴》，意思是黔地（贵州）从来没有驴，有无聊的人把一头驴运到了黔地；开始，驴只要一叫唤，当地的老虎就很害怕，以为驴要吃自己；后来，老虎发现，驴只会用蹄子踢几下；最后，老虎很高兴，认为驴“技止此耳”，就把驴吃掉了。这篇《黔之驴》的寓言流传了上千年，还出现了一个“黔驴技穷”的成语，意思是貌似强大的东西并不可怕，只要坚持斗争，假以时日必定会不攻自破。

其实，驴倔强而又无畏，并不是一定是贬义词，美国民主党的党徽就是一头驴。在这里讲《黔之驴》的故事，不是为争论寓言之后究竟还有什么高深的暗示，只是希望能借作者柳宗元的生平为大家解读当时的金融财经故事。

或许我们能看到，柳宗元和他的战友才是那头倔强的黔之驴。

永贞元年（805年）志大才疏的唐德宗病死，太子李诵即位，是为唐顺宗。

唐顺宗的能力如何，还真无法评价；唐顺宗身体如何，我却知道一点，此人刚刚登基就中风了，此后一直躺在病床上，从来就没有真正处理国事。比较奇怪，接替唐顺宗处理朝政的，既不是太后、皇后、宦官，而是陪他读书的两个书童：王伾、王叔文。

王伾、王叔文均是寒门出身，既无科举功名，也非豪门大族，在唐顺宗登基之前二人甚至没有过多机会接触政务。唐德宗是一个猜忌心很强的人，在李诵朝不保夕的太子岁月中，王伾、王叔文与这位未来的皇帝结下了良好的情谊。唐顺宗即位后，马上身患重病，不能接见百官，所有奏疏由王伾、王叔文代为传递，实际上也是由二人做出决断，二人甚至一度掌握了任免宰相的权力。

关于王伾、王叔文秉政，史籍上赋予这个团伙一个专有名词：“二王八司马”。“二王”当然指代王伾、王叔文，“八司马”则是文官集团中与二王走的最近的八位高官，其中一位就是写出《黔之驴》的柳宗元（其他七位分别是刘禹锡、韩晔、韩泰、陈谏、凌准、程异和韦执谊）。

在“二王八司马”领导下，大唐帝国进行了一次治标不治本的革新，史称“永贞革新”。“永贞革新”虽然只有八个月，却是晚唐昏暗政局中最为靓丽的一笔。此前“二王”只是太子的书童，一个偶然的机会让两个小人物成为帝国中枢的决策者。如此人生际遇，对“没吃过、没见过”的人来说，更有可能的是在骤然出现的利益面前丧失自我、在众多封建官僚的吹捧下得意忘形，最终成为遗臭万年的奸佞之臣，例如，此前唐朝杨国忠、此后明朝王振。然而，“二王”没有这么做，他们试图以自己的道德良心撑起这个破败的帝国，虽然这已经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如果“二王八司马”是黔之驴的话，他们的第一声嘶鸣是拿皇室开刀——反正皇帝已经病入膏肓，不能享受了。

唐德宗当了25年皇帝，皇帝的小金库——大盈库，早就禁不起毫无节制的靡费了，于是，唐德宗发明了很多小儿科式的捞钱新方法。

第一种方法，宫市。白居易曾经写过一首叙事诗《卖炭翁》，故事大意是两个宦官（黄衣使者白衫儿）拿着皇帝的敕令，强行以半匹红菱换走（半匹红绡一丈绡）

了卖炭翁的一车炭。

《卖炭翁》的故事，记述的就是典型的“宫市”。

为了满足日益浩繁的宫中用度，经常有宫里的内侍拿着一些不值钱的东西在京城市场上跟商人强行做交易，有时拿走数千钱的东西却只给人几百钱。开始的时候，每隔一段时间皇宫会发布一个采购物品名单，要求商人参与宫市，并规定宫市价格必须足以偿付商人的本钱。后来，皇宫的采购名单不见了，偿付本金也成为不可能的事情。至于那些所谓“敕令”是不是真的，那就只有老天才知道。

白居易的《卖炭翁》还是笔下的那些“黄衣使者白衫儿”已经很仁慈了，起码是给了卖炭翁一点补偿，也没直接把卖炭翁的牛牵走。现实中，“黄衣使者白衫儿”更加野蛮。

我们以当时一个著名的治安案件说明。

这是一起以少胜多的群殴，打人者是一个与卖炭翁类似的卖柴翁，被打者是一群“黄衣使者白衫儿”。卖柴翁遇到了心黑手毒的“黄衣使者白衫儿”，不但没给他那可怜的“半匹红绡一丈绫”，反而要把卖柴翁的驴车也拉走（需得尔驴）。

卖柴翁对“黄衣使者白衫儿”哭诉：我有父母妻儿，一大家子人都靠着这头驴吃饭，现在，我已经把自己辛苦砍来的柴薪白白送给你，你还执意要断我生路，那我只有以死相拼了。

拼命的人一定是有气力的，拼了命的卖柴翁居然一个人打好几十个，把来抢钱的宦官都给打了。事后，负责治安的小吏（街吏）不但擅自放掉了这位卖柴翁，还从内侍身上搜出十几匹绢赏赐给了这位卖柴翁。

这件事引起轩然大波，朝廷对卖柴翁和街吏的处理意见一直很不统一。最后，这起治安案件居然闹到了唐德宗面前。不能说唐德宗不知道“宫市”的坏处，他最终没有惩罚“卖柴翁”，也没有责罚那个小吏，反而贬黜了那几个宦官——毕竟为小喽啰犯众怒是不合算的。

处理结果是各方都能接受的，但是，天下又有几个买柴翁能得到能真的得到德宗垂青？终德宗一朝，宫市都没有废黜，结果，开元年间辉煌的长安市场门可罗雀，人们只要听说有“黄衣使者白衫儿”，就连卖鸡蛋灌饼的都赶紧收摊走人（每敕使出，虽估浆、卖饼者皆撤业闭门）

楼主：天圆地方的困惑 时间：2021-10-16 00:57:12

图书广告一下，本书已出版《中国是部金融史》，当当、卓越有售，欢迎购买，感谢支持！

楼主：天圆地方的困惑 时间：2021-10-16 00:57:12

第二种方法，五坊小儿。所谓“五坊”就是给唐德宗养宠物的地方，雕坊、鹞坊、鹤坊、鹰坊、狗坊，这些地方的小官小吏自然是没有任何真正的权力可言。但是绝对不能低估皂隶的无耻与创造力。

有权力，我们要用权力去抢夺；没有权力，我们就创造权力去抢夺！

——这些人经常把一张大网罩在人家门口，不允许人出入，因为我这张网是为皇帝捕鸟用的，你敢惊吓皇帝的鸟吗？

——这些人在村落的水井上罩上一个大网，不让全村人来汲水，因为，这张网也是为皇帝捕鸟用的，你敢惊吓皇帝的鸟吗？

——这些人在酒肆吃喝之后不给钱，临走时还给人放下一个鸡蛋，说这是一个“皇帝的鸟蛋”，现在必须在酒肆里孵化。酒肆主人只得任由这批人在这里白吃白喝，皇帝的鸟蛋可是不能随便碰的……

德宗年间，“宫市”、“五坊小儿”诸如此类的事情还很多。二王八司马秉政后，以最快的速度废黜了“宫市”、“五坊小儿”，遣散大批宫女。当然，在二王八司马第一声大叫中受损的只是封建官僚集团中的最底层，也只有这些人才把掠夺之手伸向赤贫的农人。虽然这些人并不比朝堂里的封疆大吏做的更过分，只不过皂隶剥夺的对象是赤贫者，所以，更加刺目罢了。

“二王八司马”“踢之”的对象则是封建官制。结果，暴露了黔之驴的本来面目，“二王”败亡、“八司马”均被流放。

封建官僚之所以能为所欲为，说白了不过是靠封建帝国掌握着财政资源，能以此豢养一批为自己卖命的人。王叔文没白在太子面前混了十多年，唐顺宗刚刚登基，他就把盐铁、度支使换成了自己的人，并亲自兼任户部侍郎、盐铁、度支副使（原来位置实在是太低，没法任正职、实职）。

公平的说，“二王八司马”确实找到了正确的切入点，他们动手的第一个对象是京兆尹李实。当时，京兆尹是最没势力的地方大员——总不能在皇帝眼皮子底下训练军队。而且，李实是一个罪恶罄竹难书的人。

——德宗年间，李实任盐铁转运使，居然将告发他贪污受贿的江南盐商崔善贞活埋！

——任京兆尹期间，为了讨好唐德宗，在贞元二十年的大旱灾中依然要所有农人纳税，不少小户人家为此拆房子卖地，当然，李实在这一年以极便宜的价格弄到了不少田地。

——长安有个叫成辅端的说书先生，他编了几个段子讥讽李实巧取豪夺，说“秦地城池二百年，何期如此贱田园？一顷麦苗五硕米，三间堂屋二个钱”。事后，李实把成辅端抓了起来，以“诽谤国政”的罪名乱棍打杀。其实，唐德宗对这件事的批示是：这人不过是以调侃的口吻说了点建议，算了吧（言者以为托诙谐讽谏，不可加罪）。

收拾这样一个既没真正实力而又人神共愤的京兆尹，“二王八司马”当然不会有太大阻力。在“二王八司马”弹劾下，李实被贬为通州（四川达县）长吏后，京师内外“人人相贺”。

此后的事情，“二王八司马”却露出了“黔之驴”的本性。

“二王八司马”的势力范围只在长安附近，地方节度使是否买他们的帐，完全要靠各方力量相互博弈的最后结果。遗憾的是，这几位理想主义的书生，在没有任何外援的情况下就轻易对军权下手了。

放逐京兆尹李实后，“二王八司马”任用老将范希朝总领神策军。神策军早就成为高级宦官的禁脔，各人在神策军中都有不同的势力范围，大家都在神策军中派驻低级宦官充任“中尉”，直接统领神策军。“二王”此举等于把所有高级宦官和整个神策军都推到对立面。于是，高级宦官指示神策军中的“中尉”不听范希朝调度。

范希朝本是退休的边镇将领，个人影响力完全在边陲，至于神策军，没一起喝过酒、没给士兵发过钱、没给士兵施过任何恩惠，又怎么能听从这位老将军指挥？恰在此时，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也看出了“二王八司马”的窘境，便派亲信刘闢与王叔文相商，希望王叔文支持他吞并剑南三川。

刚见面，刘闢开门见山让地说：皇上身体不好，若有一天驾崩，您危矣；不过，若您能提出让我家主人韦皋领三川节度使，一旦朝中有事，剑南三川当以死相助；如果您不愿意，那么韦皋自当也有所“报答”（太尉使阁致微诚於公，若与某三

川，当以死相助；若不与，亦当有以相酬）。

这是赤裸裸的威胁！

韦皋图谋剑南三川已经很长时间了，他需要的其实只是一个来自朝廷中枢的借口。无论王叔文是否答应，韦皋怕是都要总领剑南三川。现在，不过是让王叔文为韦皋来背这个骂名，却能换得外藩强援。

按照西方经济学所谓“经济理性”，这确实是一票合算的交易！

在这个世界上，除了“经济理性”，我巍巍大唐还有气节，很多事是不能用来做交易的。王叔文很有骨气，他当面斥责韦皋的使者刘闢：韦皋手握强藩，本就有图谋不轨之迹，我王叔文岂能以江山社稷与这样的人做交易！

当然，这把西川节度使韦皋得罪到家了。韦皋很快就给“二王八司马”送来了回报：永贞元年八月，韦皋逼唐顺宗退位称太上皇，拥太子李淳称帝，是为唐宪宗。唐宪宗称帝当年，王伾被贬开州司马，很快就病死了；王叔文被贬渝州司户，次年被赐死；柳宗元、刘禹锡等八司马先后被贬，开始了“一身去国六千里，万死投荒十二年”的流放生涯。

永贞革新虽然仅历时“十四旬有六日”，却给寒冬中的大唐帝国带来一丝回春之意。此后十五年，唐宪宗为宦官毒杀，大唐帝国中枢彻底失去了合法性，帝国的崩溃已经只是时间问题了。

楼主：天圆地方的困惑 时间：2021-10-16 00:57:12

背乡井，弃世业，掷百器，远离亲戚姻娅，转徙东西南北而无定居，寄食于异乡异域！一去而不复返，此岂人之情也哉！是有不得已焉耳矣

楼主：天圆地方的困惑 时间：2021-10-16 00:57:12

图书广告一下，本书已出版《中国是部金融史》，当当、卓越有售，欢迎购买，感谢支持！

楼主：天圆地方的困惑 时间：2021-10-16 00:57:12

小结：魔道相争胜者谁

与西汉帝国一样，大唐帝国也采用了“皇权-封建官僚-小农”的社会组织框架。在这个框架中，皇权是小农最后的庇护，也是“耕者有其田”最坚定的推动者，只有出现万千“耕织结合”的小农家庭，帝国才能拥有最坚实的统治基础。

问题的成因就在于“皇权”与“小农”的中间环节。西汉以来的所有王朝都证明了一个道理：一旦皇权放松对封建官僚的控制，封建官僚便会寻找一切机会兼并土地，在瞬间吸干帝国财富。

盗亦有道，封建官僚抢钱必然有一定之规。除了胡人入主中原的元朝、清朝，最有权势的封建官僚都不可能在光天化日之下无故抢夺别人的财富。要想抢夺财富，封建官僚就必须找到一种合法的方式。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先澄清一个认知上的误区：人们往往认为，“小农经济”是一种自给自足的生产状态，老死不相往来。“你耕田来我织布、你挑水来我浇园”的生产生活，能缔造一个鲁滨逊式的世外桃源吗？

答：绝无可能。

衡量一个经济体能否自给自足最关键的标志，是经济体内的生产和消费的产品数量是否一致。耕、织即使能满足小农的衣食需要，那么，盐、铁呢？

只要经济体内有货币存在，就绝无可能出现真正自我封闭的经济循环，真正的小农经济体根本无法孕育如此丰富的货币制度，更不要说西汉的“子钱家”、唐朝的高利贷。中原大地自古就是一块市场经济最发达的土地，甚至远比中世纪的西欧要发达的多。

然而，市场有很多种，有“好的市场”，也有“坏的市场”。

——在“好的市场”中，所有市场参与者都受到统一规则的制约，因而人们对市场交易结果有稳定的预期，市场运行没有什么隐性的成本。这种情况下，市场参与者不再依靠个人声誉进行交易（impersonal transaction），经济运行中的最强势者（通常是国家）为所有交易提供了最后的执行保障，买卖双方甚至不一定识对方。比如，你把一大笔钱存入银行的时候可能转眼就会忘记刚才银行员工的长相，这在农耕社会是根本不可想象的。新制度经济学的创始人诺斯和奥尔森都把英国崛起的成因归结于此，英法战争之前，光荣革命使得英国王室逐渐退出商业领域，在金融市场上建立了良好的声誉，同时代的法国王室却没有作到这点。在后来的英法战争中，英国王室通过发行国债征集大量军费，投资者却根本不相信法国王室，因为它的权力弗远无界，可以忽视一切许诺。

——在“坏的市场”中，必然存在一个强势群体，这个群体有可能掌握绝大多数社会资源，也有可能具备调动绝大多数社会资源的潜能，正是因为如此，强势群体可以忽略一切必要的规则，也可以在交易中不遵守任何承诺。既然其他社会成员既无法避免与强势群体交易（资源大多在强势群体手中），就一定会在交易中被剥夺，从而整个市场变得缺乏效率。这个“坏的市场”是上世纪初期美国的托拉斯，也是包括汉唐帝国在内的中国封建社会。

与周朝、晋朝、三国、南北朝相比，西汉、唐朝都建立了高度集权的封建社会，帝国调动资源的能力是之前其他朝代无可比拟的。正是利用这种调度资源的能力，封建官僚才获得了社会经济生活的支配权，在这种权力之下，天下无不可为之事、天下无不可夺之财，权力大的有大财富，权力小的有小财富。

真正的财富生产者——小农，没有财富。

在农耕社会，土地无疑是最重要的生产资料，也是最有效的财富象征。正是看到了这一点，唐玄宗才颁布了史上最为严厉的限土地购令：无论何种原因，任何人不准买卖天下土地！只有禁绝了土地交易，才能彻底斩断封建官僚蚕食农人财富的根基。

这道土地买卖禁令奠定了帝国未来几十年的繁荣基础，在强势皇权面前，封建官僚即使再有势力，也无法明目张胆通过土地兼并蚕食民间财富。然而，在“皇权-封建官僚-小农”的社会框架之内，监督之制是一条单行线，皇帝一人又怎可能看住天下封建官僚？

晚年，这位天纵英才的唐玄宗陶醉于自己缔造的盛世，也逐渐放松了对封建官僚的警惕。秉政二十多年的铁腕宰相李林甫更是给了唐玄宗一种幻觉，实际上，并不是每一位宰相都能像李林甫一样出身于贵族世家，更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像李林甫一样能在所有政治势力之间纵横捭阖。

李林甫死后，杨国忠这个寒门出身的宰相终于找到了机会，他毫不犹豫的放开了“开元限购令”，在土地市场上重新拿到了财富分配的利刃。从放开“开元限购令”那一刻开始，情况便失控了：不足十年的时间里，帝国全境内居然有 40% 的人变成了毫无土地的“流民”。

数代大唐帝王的积累毁于一旦！

杨国忠聚敛了财富，却无法收敛自己的贪婪之心。为了保住自己的相位，他不断以弱智的手法打击、挑衅、诬陷边镇节度使，尤其是安禄山。最终，安禄山率领着帝国最精锐的部队反叛，说到底，安史之乱不过是封建官僚的财富之争变成兵戎相见。

安史之乱使帝国彻底丧失了权威，“均田制”的皇权基础也就随之破灭了。

为挽救帝国于危亡之间，杨炎开始推行“两税法”，试图向大土地所有者收税，进而实现均贫富的梦想。然而，大土地所有者本身就是封建官僚，他们的财富本就不是来自于公平竞争的市场，又怎么可能依靠这些人自己剥夺自己的财富？杨炎的改革根本就不具备最基本的社会条件。

封建官僚的疯狂掠夺最终使社会失去了最基本的秩序，唐僖宗乾符二年（875年），王仙芝、黄巢发动了唐末农民大起义，904年唐昭宗为宣武节度使朱温所杀，907年唐哀帝禅位给朱全忠（朱温后被赐名“全忠”，真是一个天大的讽刺）。大唐帝国，一个历时三百年的王朝崩溃了。

巍巍而立的大唐帝国终究还是未能破解西汉帝国留下的魔咒：帝国生产财富的基础是“耕者有其田”的均田制，封建帝王又必须依靠封建官僚才能实现对万千小农的统治；然而，封建官僚本身就是一个强势分利集团，他们对财富的掠夺最终将成为帝国无可治愈的沉疴。显然，大唐帝国最后在这个魔咒的缠绕下灰飞烟灭，此后，无论多么伟大的帝国都未能逃脱大唐帝国谱写的命运……

楼主：天圆地方的困惑 时间：2021-10-16 00:57:12

图书广告一下，本书已出版《中国是部金融史》，当当、卓越有售，欢迎购买，感谢支持！

楼主：天圆地方的困惑 时间：2021-10-16 00:57:12

跟大家解释一下，第一册内容到此结束，不过，我会在这里贴出第二册草稿的一部分内容。但是，这只是第二册草稿，与终稿差距可能很大。多谢支持！

楼主：天圆地方的困惑 时间：2021-10-16 00:57:12

第13章 东京梦华

（宋太祖）

杯酒能释兵权吗

五代十国，六十年间中原大地走马灯一样换了八姓十四君。其实，这段时间很多皇帝并不能真正统御天下，割据一方的节度使在自己地盘上才是真正的统治者。不排除个别节度使能与民生息，但绝大多数还是不求明天、只求今日的土匪：有人用泥土做成货币、有人因杨柳吐絮而征税、有人甚至把稻草当做茶叶强行卖给可怜的黎庶……

后周显德七年（960年）正月初四，殿前督检点（相当于京城最高军事长官）赵匡胤在石守信、王审琦等“义社十兄弟”拥立下称帝，给自己披上了黄袍，这就是大宋王朝的开始——陈桥兵变。

赵匡胤摸爬滚打于刀剑锋镝之中，深刻明白当时那句民谣“天子者，兵强马壮者为之，宁有种乎”。前朝往事昭昭在目，他一定认真思考过如何稳固自己的大宋王朝，毕竟母亲杜太后在陈桥兵变之时就曾经提醒他：皇帝是一条不归路，一旦失败，即使想回头做普通百姓亦不可得！

在一次闲谈中，宰相赵普为赵匡胤总结了前朝教训：五代十国灭亡也没有别的原因，就是方镇节度使权力太重了，干弱枝强。接着，这位极不厚道的宰相又提醒皇帝，大宋王朝要想避免亡国之祸，就必须剥夺将领的权力、禁止他们在地方收取钱粮、上收他们的兵权，只有这样才能杜绝一切后患，才能让天下安定（此非他故，方镇权重，君弱臣强而已。今所以治之，亦无他奇巧，惟稍夺其权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则天下自安矣）……

赵匡胤听了赵普的话怫然不悦，只是说：我知道了，你别说了。

赵匡胤当然会竭尽全力让大宋王朝走的更远，只不过，赵普的权谋之术并非答案，朝代兴替的症结更不是方镇强权。

五代以来“兵骄而逐帅，帅强而叛上”，这是一个弱肉强食的丛林社会，人类已经退回到生存竞争的动物层次。如果所有人认同的服从方式不是妥协而只有暴力，这样社会根本就不会有道德底线，劫掠既是每一个人的手段，金钱必然是社会唯一的信仰。

有人称赞很多帝王的雄才伟略，他们杀掉储君的生母、他们杀掉功勋卓著的大臣、他们甚至杀掉储君以外的其他儿子，就是为了为新君免留后患！

无论多么伟大的目标，能这么做的人，还有人性吗？

把天下交给这样的人，天下人都会没有最基本的道德，整个中原大地都不会有人知道什么是羞耻，所有人都会跟他一样！如此，迟早会有叛臣贼子！

要保住大宋王朝不复亡秦之迹，最有效的办法不是剥夺武将军权，而是改变这种恶劣的社会信仰。或者说，只有所有人都认同劳动才是创造财富的唯一手段，才能避免玉石俱焚的社会大骚乱。

显然，赵匡胤认识到了这一点。

我们很少有人知道，北宋开国之君赵匡胤为后代留下一块誓碑——太祖勒石，这块誓碑锁在太庙之中，新任皇帝登基后才有资格入内跪拜：

第一，保全后周皇室子孙，纵然犯下谋逆之罪也只能令其自尽，不得拉到大街上去砍头，更不得连坐家属。

第二，不得杀读书人，也不得杀劝谏皇帝之人。

第三，汉初三十税一，此为大宋王朝永制，不得增加农田之赋。

凡我子孙，有违此誓，天诛地灭。

这就是赵匡胤为大宋王朝历代君王树立的治国理念——容忍敌人、容忍异端。只有一个容忍异端的世界，才可能为创新提供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普通人才能有更多被宽容的余地，士农工商才可能获得更多财富。如果社会风气非此即彼、如果每个人都要无敌于天下、如果每个人都要消灭一切反对者（竞争），焉能为创新留下一丝一毫空间？

赵匡胤也要对付手下那帮骄兵悍将的，结果也一定是“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但是，实现这个目标不一定要全靠阴损的权谋。只要天下人都鄙薄这些，以至于掌握这些人自己都鄙薄自己，那事情就算办成了！毕竟社会动乱最终只能带来破坏、灾难、死亡，只有大家在许可的范围内相互妥协，才有可能让所有人都继续活下去。

赵匡胤的第一个契机是铸币。

我们先交代一下事件的历史背景。第一，宋太祖不是唐太宗，终其一世也没有把自己的年号刻在铜钱上。不过，宋初铸币量不足，市场上的货币仍旧以五代货币为主，很多钱文上有旧时的年号。第二，登基之初，赵匡胤曾淳淳叮嘱宰相赵普，一定不能以前朝年号为新朝年号。

乾德年间的某一天，赵匡胤突然发现了一枚旧时铜钱^①上面印着“乾德”的字样。这不是大宋王朝的年号吗？

查证之下，原来自己的“乾德”年号是后蜀年号之一。愤怒之下的赵匡胤说出了一句预谋已久的话：宰相当用读书人！

唐朝以来，武将为历代君王倚重，武人地位颇高，“出将入相”更是所有武将的梦想。现在不一样了，天下只有读书人能治之！

自此，赵匡胤开始推行彻底的以文治武政策，武将出身的人，即使在军队里也不得做一把手，必须在文官出身官僚管理之下。在这种思想的主导下，武将也很快失去了昔日的风采，有将领甚至慨叹：即使我能击溃契丹、收回燕云十六州，也不若状元点甲之荣！

如果暴力不为所有社会层面所接受，当然也就不会有人靠暴力抢夺天下！

楼主：天圆地方的困惑 时间：2021-10-16 00:57:12

@贫道贫得很 @面肉牛吃牛肉面

多谢提醒，这只是草稿，后面一定提起注意，集中火力！

时间：2013-03-25 23:25:01

楼主：天圆地方的困惑 时间：2021-10-16 00:57:12

赵匡胤的第二个契机据说是一顿酒席，

《续资治通鉴》这样记载了这个故事，今天史籍称呼其为“杯酒释兵权”。某天，赵匡胤请义社兄弟吃饭，耳酣面热之后大家似乎又回到了后周时代，纷纷拍着赵匡胤肩膀，来跟皇帝称兄道弟。

面对一群醉汉，赵匡胤说：没有你们这些兄弟，我肯定当不上皇帝，每当想到兄弟们的功劳，我都睡不着觉啊。但是，皇帝也是一个很难干的差事，我常常为此睡不着觉。这把椅子，谁不想做？（我非尔曹之力，不得至此，念尔曹之德，无有穷尽。然天子亦大艰难，殊不若为节度使之乐，吾终夕未尝敢安枕而卧也）

义社兄弟虽然喝的面红耳赤，但也都觉得这个命题匪夷所思，纷纷跟当年的大哥、今天的皇帝表决心。石守信说：陛下何出此言，现在天命已定，谁又会有异心呢？

（陛下何为出此言，今天命已定，谁敢复有异心）

赵匡胤叹了口气，眼睛中透出无限的空洞与狠毒：不是这样啊，兄弟们虽然没有这个心思，你们手下的兄弟如果有人贪图富贵，再把黄袍批到你们身上，就算你们想不做皇帝，还有可能吗？（不然，汝曹虽无疑心，其如麾下之人欲富贵者，一旦以黄袍加汝之身，汝虽欲不为，其可得乎）

皇帝的话不言自明，几句话让义社兄弟的酒全醒了。于是，大家纷纷拜倒，石守信带头哭着说：还是领导最英明、我们这些做臣子都愚不可及，还望陛下垂怜，给我们一条生路（臣等愚不可及此，惟陛下哀矜，指示可生之途）。

在中国史籍中，皇帝的形象在任何时候都将是伟大、光辉、正确的。面对这群可怜虫，赵匡胤大度地说：人生苦短，所谓富贵不过是钱多就可以，不但可以自己幸福一生也能留给子孙，兄弟们何不自去兵权，出镇方镇，多弄点钱财（人生如白驹之过隙，所为好富贵者，不过欲多积金钱，厚自娱乐，使子孙无贫乏尔，尔曹何不释去兵权，出守大藩，择便好田宅市之）？

关于这段故事，最早的记录出自宋真宗年间丁谓所撰《谈录》，不过，《谈录》只是记载了义社兄弟在大宋王朝刚建立的年代经常一起吃酒，没有对话；成书于宋徽宗年间的《长编》开始出现上述君臣对答，不过《长编》作者李焘在自注中已经说明这段对话的真实性存在疑问，因为这些内容在起居注、实录、会要、国史中均无记载。

后来，经一批流传广泛的史籍传诵，这个故事居然成为人们深信不疑的正史。在这个故事中，赵匡胤和义社兄弟的对答简直一副流氓无赖模样，所有人物的台词就注释了一句话：当官就是为钱。

钱确实很重要，但是，如果一个人只有钱眼里的胸怀，焉能成为君主的肱股之臣，又焉能缔造一代盛世？“杯酒释兵权”不过是后世腐儒对帝王心术的蹩脚揣测，

是史籍写手不负责任地杜撰！

以文治武的治国方略只能解决方向性问题，要真正降服这些骄兵悍将，也是一定要拿出些真武艺来的。真实的历史中，赵匡胤很快就做到了“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让这些刀头舔血的暴徒不惜冒着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风险，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问：究竟是什么赋予了赵匡胤这种神奇的力量呢？

答：钱。只要让别人的钱变成自己的钱，让自己的钱生出更多的钱，就一定可以不战而屈人之兵。

先说如何让别人的钱变成自己的钱。让别人心甘情愿交出自己的钱，这是非常难办的一件事情。

唐末以来，各地节度使的方镇就是一个独立王国，除了过年过节的时候给皇帝送上一笔供奉（学名“余羨”），其他事情根本不用听命于皇帝，他们自己收税、任命官员、训练军队，所以才能干出把泥土烧成货币的事情。大宋王朝刚刚建立的时候，这些节度使丝毫不见收敛，长此以往，五代十国的命运也许马上要在新朝重演。

符彦卿原是后周骁将，当年辽国入侵中原的时候，他曾把万贯家财散给乡人，号召大家奋起抗击辽国入侵；后来，符彦卿累功出任天雄节度使；赵匡胤称帝后，符彦卿照样当他的节度使，而且位列大宋王朝三公，是地位最高的节度使之一。

《宋朝事实》记载，大宋王朝建立后，符彦卿经常亲自过问、清点税收情况，想用多少钱、就从民间征多少税，最后甚至发展到连宋太祖的余羨都克扣。至于辖内的治安或者法令，是不要指望这位节度使的，对他来说，只要有钱就可以赎罪，甚至可以用犬、马、鹰、豹赎罪（因为他喜欢名犬、名马）。

对付这样一个贪婪的节度使，赵匡胤居然丝毫没有加罪。

乾德元年（963年）正月，符彦卿入朝拜见皇帝，赵匡胤赐袈衣、玉带和十二美人、名马，又按唐赐功臣字之制赐“崇、仁、昭、德、宣、忠、保、正”八字。在符彦卿看来，新任皇帝还是很靠谱的，自己不过是换了个皇帝送“余羨”而已，幸福的日子不会有太多变化。赵匡胤不但没有谋求自己地盘的意思，还不断给自己拨款兴修水利——条件是现在北宋已经宣布废黜了徭役，所有工程不得自民间征调民夫，要由自己手下的厢军完成①。

就在符彦卿为境内工程做准备的时候，皇帝又下了一道命令，要求派厢军中的精壮者（史称“精兵”）去外地从事建筑工程——全国都在兴修水利，一些大的工程确实需要各节度使派兵协作完成。

听起来厢军是一种军队，实际上，厢军是从民户中抽出来的壮丁，大部分士兵拖家带口，就为混口饭吃。厢军中战斗力最强的士兵主要是一些体格健壮、没有家室的“城中少年”，恰恰就是这些人，不但经常在军队里闹事，还经常搞一些抢劫之类的娱乐活动，是乡里一害。

这一次很巧，体格健壮、没有家室都是朝廷选“精兵”的标准。

楼主：天圆地方的困惑 时间：2021-10-16 00:57:12

对体格健壮、没有家室的人来说，离开故乡去京城工作并无多大害处，反正到哪里都从事抢劫；对符彦卿来说，这也不是什么离谱的事情，反正这段时间自己不用支付军饷跟粮草，乐得耳根子清净。

接下来的事情，符彦卿却觉得不太靠谱了。

乾德元年二月，刚刚从赵匡胤哪里领赏回来，这位皇帝就下诏斥责他执行力太差，不但自己是不法之徒，治下郡县也未能大治（专咨不法，属邑不治）。

解决的方法就是，皇帝亲自给符彦卿派来一批知县。离谱的是，皇帝派来的这批知县并不是七品芝麻官，而是一批朝堂上的实权派：右赞大夫（政府口秘书长级）、大理正（司法口副部级）、屯田员外郎（工程口正局级）、监察御史（虽为从八品，却有权参劾宰相）……。

可怜符彦卿，以前见皇帝的时候就得对这些人点头哈腰，现在一下子全出现在自己地盘上。尽管名义上他们是自己手下的知县，但这些人都是皇帝钦点，跟天雄节度使可没什么关系。

几位高官下车伊始就开始指手画脚，还从京城调来一批同样级别很高的“场务监官”负责本县税收——以前这活儿是由节度使手下的牙兵牙将干。不过，收上来的钱从此就于节度使无缘了。

右赞大夫周谓（皇帝的秘书长）奉命出知永济县，符彦卿身为节度使也不得不出郊相迎，周谓在马上见了符彦卿，只是作了个揖，连马都没下（略不降屈）。这位丁谓秘书长刚到任就开始重审当地案件，据说也杀掉了许多罪犯。至于符彦卿，根本就不知道审理过程，丁谓连个招呼都没打就把当年给符彦卿送钱、送名马、送名犬的人都给咔嚓了。

在古代，司法、税收权本是区域治权的象征，现在，堂堂天雄节度使、管内观察使、大名尹、领大名府事的符彦卿，直接被几个知县给架空了。

符彦卿忽然发现自己被赵匡胤忽悠了——此时，他的厢军已经被调去修河堤了，精锐也送给皇帝充实禁军了，他根本没有反抗的实力了！

没有了钱、没有了权、没有了军队，看你怎么跟我斗！

开宝二年（969年），有人揭发符彦卿谋反（没兵、没权如何谋反），符彦卿被贬为凤翔节度使。宋太祖马上又以“彦卿患疾”为名要求他不必到凤翔就任，来洛阳居住就可以了。可怜符彦卿，曾经“全军十万拥雄师”，从此只得忘情山水，不再过问政务。

符彦卿坐拥十万雄兵况且坐以待毙，其他节度使只能任由赵匡胤“收其精兵”、“稍夺其权”。此后，大宋王朝军权统一于中央禁军，地方厢军成为纯粹的工程兵；方镇节度使不能擅自任命县尉，州县治权也再次回到中枢朝堂。

可以用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的话说明这段历史：“每一时代的社会经济结构形成现实基础，每一个历史时期由法律设施和政治设施以及宗教的、哲学的和其他的观点所构成的全部上层建筑，归根到底都是应由这个基础来说明的”^①。

楼主：天圆地方的困惑 时间：2021-10-16 00:57:12

争利者于市

赵匡胤已经把别人的钱变成了自己的钱，下一个任务是如何让自己的钱生出更多的钱。

一千年前那场震烁古今的盐铁论战中，西汉贤良文学曾经一针见血的指出，普通人把财富藏在自己的院子里，而皇帝的院落是整个天下，只有民富才会有真正的国强！皇帝要让自己的钱生出更多的钱，最有效的途径就是让自己的国民变得富足起来。

这个道理说起来很简单，却是世界上最难办的事情，即使英明若秦皇汉武也未能参透其中玄机。

关于这一点，宋太祖基本做到了。

宋代是中国古代经济最为辉煌的时期，请注意，这里没有之一。唐朝在三百年间产出了 590 亿斤粮食，宋代首尾三百年共生产粮食 1280 亿斤，比大唐帝国的一倍还多。另外，我想提醒大家，大宋王朝的面积即使在鼎盛时期也不足唐朝一半。

《宋史》这样记载太祖、太宗年间当时的情况：天下之人都涌向京城，汴京的百姓比盛唐时富足十倍，即使有水旱灾害的年景，水利设施也足以保证丰收；水路之上，舳舻蔽日，天下已经没有财货匮乏之虞（悉集七亡国之士民于辇下，比汉唐京邑，民庶十倍。旬服时有水旱不至艰歉者，有惠民、金水、五丈、汴水等四渠，派引脉分，咸会天邑，舳舻相接，赡给公私，所以无康乏）。

北宋有一副画叫《清明上河图》，这幅长达 5 米的画卷穿越了千年时空，为我们展示了一个画中汴梁。明代诗人吴宽曾这样形容《清明上河图》：刚刚打开画卷，就恍然感觉自己置身汴京，在游龙般穿梭的汴河之上，又绝无尘土铺面之感（予始获展阅，恍然如入沛京，置身流水游龙间，但少尘土扑面耳）。

仅仅是文字和图画就已经让人心驰神往，如果我们能置身于繁华的东京汴梁，又能一窥什么样的景色呢？

要明晰一个朝代的财富源流，就必须明白财富的根基，毕竟货币只是财富的代表而非本质。宋代之前，中国最值钱也是最保值的东西是土地，然而，土地又是官家豪强的囊中之物，只有成为最大的官僚才能成为最大的地主，然后才是最大的商人。包括汉灵帝、唐僖宗在内的昏君都不遗余力地禁止土地兼并，然而，所有禁止土地兼并的努力都以失败而告终，一代代强盛的帝国都走向了衰亡。

北宋是第一个不抑制土地兼并的朝代，赵匡胤也是第一个不实行“均田制”的开国之君。结果，北宋王朝不但逃脱了西汉、大唐帝国留下的魔咒，还开创了一代前所未有的经济的巅峰！

问：为什么？

答：如果土地是最值钱的东西，就一定要抑制兼并，因为，兼并土地就等于抢劫财富，抑制兼并就等于抑制官家豪强抢夺财富。这个问题也可以反过来说，如果土地只是财富代表之一，甚至不是值钱的东西，抑制土地兼并就失去了作用。

楼主：天圆地方的困惑 时间：2021-10-16 00:57:12

问：土地不值钱，那什么最值钱？

答：创新，创新技术、创新产品、创新行业，这才是最值钱的！

北宋所谓“贫富无定势，田宅无定主，有钱则卖，无钱则买”才是一种正常的社会阶层流动机制，只有一个具备创新能力的社会，才可能产生这种大规模的财富流动——财富的根基是每一个人的才能。钱财、金银都可以靠抢劫得来，但是，估计天下没有一个歹徒能靠抢劫获得才能。

关于这段历史，让我们首先回顾一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论述。在马列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里，资本主义产生的必要条件是劳动力成为商品，劳动力要成为商品必须具备两个先决条件：第一，劳动者必须有人身自由；第二，货币资本高度集中。

现在，我来用当代经济学语言复述这两个条件，这样久不熟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人看起来会比较顺眼：第一，社会生产体系中不存在一个强制性主体，所有人力资本可以自由流动；第二，生产资料自由流动，向最有效率的生产者手中集中。盛唐年间，为地主耕种的人被称为“部曲”，他们是流离失所的农人，在地主家吃饭、穿衣，主人将之视为牲畜；这些人的婚姻也由主人指定、随主人姓氏、没有户籍（自幼无归，投身衣饭，其主义奴畜之，及其成长，因娶妻，此等之人，

随主属贯又别无户籍。若此之类，名为部曲）。

这不是封建制，这是奴隶制！

北宋初年中原大地的劳动力不是奴隶制，也不是封建制，而是马克思经济学中所谓的“自由劳动力”。

终北宋一朝，全国民户分为“主户”、“客户”，所谓“主户”就是有土地的人，“客户”就是没有土地的佃户。无论主户还是客户都是“齐民”，大家身份平等（主户之于客户皆齐民乎），客户只是主户雇佣的劳动者。客户另有发财的路子可以“起移”（辞职），不需要取得土地所有者发给“凭由”（干部介绍信），每年收获之后就可以告诉地主去留意向，地主不得故意“冲勒”（卡主档案就是不放）。以前不敢走，是因为走了就没饭吃。土地兼并使天下人丧失了财富，“竞次”变得极其惨烈，人们只有留在土地上当奴隶才能苟延残喘。

现在不愿留，是因为有的是发财的路子。北宋王朝几乎放开了所有行业的准入资格，只要你愿意，想干什么干什么，终北宋一朝都没听说所谓“抑商”，尤其是对小摊小贩，朝廷才没工夫去收那点子可怜的税（其贩夫贩妇，细碎交易，并不得收其算）。

我想告诉大家，要看清楚一个经济体是否有活力，不是去看这个经济体有多少大企业、大公司，更不是看有多少世界五百强。一百年前，今天的世界五百强绝大多数还没有生出来，英德尔、微软、思科可都是一两个人起家的小作坊！

要看清一个经济体是否强盛，最精典的数据是有多少中小企业在竞争中成长、胜出直至成为全球性的跨国公司！也正是这个道理，今天我们的经济政策才反复强调“支持中小企业”、“支持小微企业”，他们创造了近一半的就业、八成税收和几乎所有创新。只要对小企业放开所有的行业准入、留下有足够的创新空间，每一个普通人就能寻找机会、赚取金钱，在无数次试错中，优秀者一定脱颖而出，也一定能撑起明天！

楼主：天圆地方的困惑 时间：2021-10-16 00:57:12

相信很多人都听说过中国明代小说《金瓶梅》，这个故事就发生于北宋年间，其主角西门庆恰恰就是一个小商小贩。借助这群市井人群的成长，我们为大家解析北宋王朝的财富逻辑——只有每一个市井之人有了发财的机会，才有可能最终国富民强！在此之前，想先说句题外话，大概很少有人愿意相信，西门庆这样下流胚子居然还有一个非常艺术的化身——贾宝玉①。

金瓶故事的开始，西门庆跟武大郎一样，不过是个地摊商贩，估计当时也被宋朝城管追着满街跑。与武大郎不同，摆地摊的同时西门庆开始贩盐，并拿到了自己的第一桶金——五百两白银。

先请注意第一个问题，我说西门庆开始贩盐，不是说他贩卖私盐。

西汉相传，历代王朝总是控制盐、铁、茶、烟、酒、香药等多种产品的生产与销售，唐末朝廷 90% 的收入都来自于这些专卖行业。北宋王朝虽然同样也把触角伸及很多盐、铁等很多行业，但是，大部分时间并没有真正控制这些专营产品的生产和销售，最严厉的时候也只是向生产者发放“折中”（类似于今天的配额），生产和销售两极始终控制在私商手里。宋太祖一朝，京城、江南和河北路一带甚至完全放开了盐、铁、酒、茶，帝国只是将其作为普通商品征税。

西门庆拿着自己的第一桶金，转手在湖州、松江和河北路之间做起了绸缎贸易。古语相传“百里不贩樵，千里不贩炭”，除了贸易极盛的汉文帝、隋文帝等几个时代，通常情况下我们的祖先很少从事千里以外的长途贩运。盛唐时期贸易不可谓不发达，但京城长安与山东、江南一带的粮食只有官府漕运，民间商人极少涉

及。以江南为例，粮食贩运需经过砥柱、三门峡等险要地段，在砥柱经常是“岁漕经砥柱，覆者几半”，过三门峡更是“十存一二”，只有靠武力征调民夫才能保证漕运。

与大唐帝国不同，北宋王朝定都开封，京杭大运河无此险要的关口，南北贸易彻底突破了旱路瓶颈（东西向有黄河、长江）。

更为重要的是，宋太祖登基当年，即建隆元年（960），赵匡胤马上颁布了世界上第一部税法——《商税则例》。

《商税则例》规定，对任何客商只一次性征收千分之二十的商税（行者责货，谓之过税，每千钱算二十）。在当时，粮食、锦帛两种贸易是数量最大、利润最高的贸易品种，税收额也将最大。即使如此，《商税则例》不但明确规定粮食、锦帛等大宗物资运输免征商税，而且强调各地不得将任何行政费用加在这两个品种贸易之上（谷帛之税，多变而征钱。钱既非民之所出，不得不逐一切之利以应官司所需）。

现在，我们来注意第二个问题，西门庆手中用的是白银，不是铜钱。

在下一章我们会提到，北宋其实是一个货币五花八门的时代，全国分为不同的几个大区，不同区域有不同货币。各地货币并不统一，如此长途贩运，那种货币才被认可呢？

答：没有各地统一认可的货币，除原后蜀地区外，异地贸易一律以贵金属为货币——黄金、白银，其中，最主要的是白银。

商人一旦脱离了自己的货币区域，就要把商品换为当地货币，然后再换为白银才能带回本地。后来，商人为了省去这种麻烦发明了“回货”，即用当地货币买到当地货物再贩卖回去。

开宝四年（971年）朝廷下诏严惩伪造金银之罪，可见当时金银交易之盛。

宋太祖年间，白银第一次成为民间交易的媒介之一，真正登上了中国货币历史舞台。在这个意义上，北宋货币最终价值必须要以白银衡量，也正是这个原因，讨论北宋货币是否官铸、重量是否足值实际是没有意义的——白银是所有货币的最终本位。

金瓶故事的结局，西门庆成为当地富户，产业涉及医药（中药铺）、纺织（绸缎庄）、酒店（酒馆）、金融（当铺）等多个行业，唯独有一个领域没有涉及——土地，这也是金瓶故事中所有富人未曾涉及的行业。1987年，卢兴基先生在《中国社会科学》上以“金瓶故事”为题慨叹西门庆，认为北宋年间人们已经开始用新的商业思想价值考虑问题，这预示着一个“天崩地裂”的新时代即将到来。

最后，让我们用《宋史》中的一句话作为这一节的结尾：各地的财富，大部分都分散在各家各户，并不在官（一邑之财十五、六入于私家）。

楼主：天圆地方的困惑 时间：2021-10-16 00:57:12

争名者于朝

北宋王朝和西汉帝国、大隋帝国、大唐帝国一样，都采用了“皇权-封建官僚-小农”的社会框架。在前朝演绎的财富流转中，封建官僚是一种无可治愈的绝症，他们会把所有的压力以级数扩大到社会最底层、又屏蔽住皇权所有的惠民政策。宋太祖赵匡胤又是如何幸免于难的呢？

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来讨论一个史学界的说法，自北宋以来，人们都认为北宋王朝“积贫积弱”。

问：北宋王朝经济不是极端强盛吗，怎么又变成了贫穷、弱小，怎么又变成了“积

贫积弱”呢？

答：与前朝有权倾朝野的大臣不同，终北宋一朝，封建官僚的势力都非常弱小；与前朝富可敌国的封建官僚相比，终北宋一朝，封建官僚也都非常贫穷。

弱与贫，皆为封建官僚，这就是所谓的“积贫积弱”！

赵匡胤为了防止武将反叛，弄出来一个“兵不知将、将不识兵”的军事体制，武将手中多没有实权。其实，北宋备受尊敬的文官同样没什么权力，只能在朝廷另一份干饷。只让你有个待遇，根本不给你实权！

北宋年间，唯一有事可做的中央机构是二府和三司，二府是掌管全国行政的中书省（称为“政府”）、掌管全国军事的枢密院（称为“枢府”），三司是掌管全国财政的度支、盐铁、户部。即使二府三司的第一行政长官也都是临时指派的。

其余衙门还有三省六部二十四司，但是，这些衙门的人日常事务其实只有一件事——领薪水（虽有正官，非别救不治本司事），其他职责（学名“差遣”）都被临时指派，与自己的官职毫无关系。

至于地方官则更可笑，北宋初年分为州、县二级，后改为路、州、县三级，无论两级还是三级，地方官员一律由中央官员兼摄，保证任何一级衙门在任何时候都找不到正主儿。用今天的语言来描述，就是央行行长不能过问央行的事，需要教育部派一个副部长临时履行央行行长职责，而这个临时行长随时有可能被罢免。总之，务必让所有官员都找不到北、都不知道自己是否有权、到底有什么权！

在古代，一个封建官员的成长不仅意味着职务的升迁，重要的是有多少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调和真金白银的冲突，就必然有真金白银的诱惑，这要求官员洞悉人性的弱点，才能平衡各种利益，最终解决矛盾。问题是，一旦有了这种历练、有了过人的胆识封建官僚，往往就把才能用到捞钱的路子上去了——这些人吃过见过，无论好人、坏人、能人、庸人都能摆平，最后把手中的权力运用到无所不用其极，所谓监督之制根本就是一句空话。

所以，封建官员的成长一定是一把双刃剑，既为封建帝王管理了天下，又蛀空了帝国的财富根基。

在赵匡胤看来，这根本就不是问题，既然如此，干脆就不要成长好了。另外告诉所有官僚：虽然你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但有一件事肯定不能去做——经商（含手工业）。

在北宋律令中有一条非常奇怪的罪名叫做“经商罪”，大宋王朝所有官员不得经商盈利，也不得让别人替代自己倒买倒卖（臣僚自今不得因乘传出入，齐轻货，邀厚利，并不得令人于诸处回图）。官吏之幸，在于可以动用公共资源为己所用，必可谋天下之利，动用公产、私用公船、免费用人、偷税漏税，人生之乐事莫过于当官却经商（吏之幸，资之以县官公余之法，负之以县官之徙，载之以县官之舟，关防不讥，津涂不呵，然则为吏而商，诚可乐也）。

总之，俸禄之外的钱，都是不该拿的！

对大宋王朝来说，赵普有定江山社稷之功，也是北宋王朝第一位宰相，不仅是“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的首倡者，也曾经半部论语治天下，为北宋王朝立下过汗马功劳。另外，赵匡胤与赵普私交非常好，即使在称帝后还经常独自去赵普家，这位皇帝称呼赵普的妻子为“嫂嫂”，喜欢吃嫂嫂亲手做出来的烤羊肉……

君臣际遇、圣眷之隆，莫过于此！

开宝六年的某一天，北宋王朝有一位贬官非常郁闷，他就是右监门卫将军赵玘。

唐宋相传，京城有十六卫军，是帝国最精锐的部队，右监门卫就是十六卫的一卫。右监门卫将军虽然只是三把手，换算到今天起码也是副部级了，这个级别的干部，儿子怎么说也是真正的高干子弟。

就是这位赵玘，他儿子居然在汴京大街上开了个副食店，卖个瓜子、饼干、猪头肉什么的。以前朝的眼光看，如此高官的儿子居然混到在大街上开门脸，此情此景已经把封建官僚的脸给丢光了。

丢人，并不是问题。

问题是，赵匡胤知道了这一切，然后把赵玘一撸到底，让他在家好好反省反省。对此，被罢官的赵玘很是不服气，于是，他想到了一个办法发泄心中情绪。某一天清晨，在上朝的时候他“偶遇”了宰相赵普。

赵玘只是一个副部级干部，他遇到当朝宰相的时候却没有丝毫避让。不但如此，居然还拦住了马车，毫无惧色地把宰相拖下车。

好戏就此开锣，在百官上朝的路上赵玘开始大声痛斥这位宰相，揭开了他一些不干净的老底儿。

赵玘：我听说（请注意“听说”二字）你身为宰相，却去做木材生意？

赵普：……（无语）；

赵玘：你从秦州（甘肃天水）、陇州（陕西陇县）运来高大的木材在京城贩卖，有这事吗？

赵普：……（继续无语）；

在赵玘的喝骂声中，赵普慌忙登上了马车，逃跑了。

这个故事的时间是上朝之前、地点是上朝的路上、人物是赵玘、当朝宰相和众多朝官——这是摆明了是告宰相赵普黑状，让皇帝知道，不止我一个人做生意，你的首辅之臣在做更大的生意。

赵玘的行为果然取到了效果，还没等群臣在朝堂上商议政事，事情就传到了皇帝赵匡胤的耳朵里。作为故交，赵匡胤当然知道赵普的秉性——他确实手脚不太干净，曾收受别人十几瓶金瓜子，在赵匡胤去他家串门的时候人赃并获。

这一次，赵匡胤准备再给自己的手下再上一课——以宰相赵普作为生动的例子。朝会开始的时候，人们发现，宫殿里突然站满了閤门（宫廷卫兵），赵匡胤没等大臣们开口就直接下令閤门把赵普赶出朝堂。閤门就要冲向赵普的时候，太子太傅王溥站出来向皇帝求情：臣不求陛下宽恕赵普，但因为小吏一句话就开革宰相未免不合法度，臣请彻查此事再据实定罪。

结果，这件事由王溥负责查办，他给出的答案是：赵普前段时间买了块地，现在正在盖房子，在这个过程中，当朝宰相没有倒卖木材，只是在秦州、陇州买了点建材，然后做了很多大木筏，用木筏把建材运到京城。

最后的处理结果是：赵玘为发泄心中不满，恶意中伤朝中重臣，贬职汝州；至于赵普，无罪。

大家千万不要以为是王溥救了赵普，根本不是这么回事。

王溥原来是后周的宰相，赵普现在的位置原本是他的。陈桥兵变的时候，赵匡胤进入汴京，也是王溥率先拜倒称臣，在降服后周旧臣的过程中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今天他只是一个有位无权的太子太傅——总之，此人也不是善类。听到传闻后，皇帝当时的表现有点过激，王溥断定赵匡胤在借题发挥，想借此处置赵普，也给满朝重臣一个警示。然而，为几根木头就罢免一个宰相，怎么着也是不可能的事情，要想真的让赵普不能翻身，这个理由肯定不行。得找一个更狠的理由，给皇帝递上一把更锋利的刀子，才能一下放到赵普，才能不给自己留下

后患。

于是，王溥在案卷中又附带了点私货，对赵普的房子进行了一下说明：盖房子的地皮不是赵普的，而是一个皇家的菜园子，赵普居然用远郊的一块空地糊弄到了这块好地皮；不仅如此，赵普还在这块地段上盖了一个旅店——邸店，也就是北宋的高利贷机构。

这就足够了！

赵玘被发配之后，堂堂大宋开国宰相赵普被交御史台问罪，最终因经营邸店被罢相、贬去阳河（今河南商孟）。

楼主：天圆地方的困惑 时间：2021-10-16 00:57:12

@面肉牛吃牛肉面

@孙晗欣

为二位仁兄加更，其中隐情还望谅解！

毕竟书稿不成熟，不是最终稿！

楼主：天圆地方的困惑 时间：2021-10-16 00:57:12

赵匡胤一朝，赵普是因经商被贬斥的级别最高的干部，其余因经商被杀的高官共二十九人。每逢大赦，经商之官遇赦不赦——让你再跟黎庶抢钱！

问：当官不能做事，又不能去经商，那么这些人靠什么吃饭？

答：虽然农业税很轻、商税也很轻，但是，基数远胜于唐朝，最终的岁入也远胜盛唐，足以养得起科举入仕的聪明人——给你足够的银子，研究文学去吧。

北宋的官吏俸禄非常复杂，我只能告诉大家，无实职者只领工资，干活的时候再另给奖金，另外还有服装费、午餐费、仆人费各种福利。以正七品的俸禄来看，月薪 30 两白银，按宋代米价折合到今天约为 10 万人民币。

即，县令年薪百万！

皇帝猜忌，又有如此丰厚的俸禄。上至中书令、侍中、尚书，下至给事、郡县小吏，大家不问朝政、一起旷工（令不预朝政，不领省职，谏议无言责、起居不记注、中书常缺舍人、门下罕除常侍），都以被闲置为乐事，一碰到事情就说自己不能胜任，一口气上六楼楞说自己要吃“高钙片”（以罢闲为乐，不竭智力、不尽谋策，乃称才不称任；饮食加多、筋力完壮，少亏谓病不任事）。

问：这么多官、拿这么多钱，不为黎庶干活，他们在干什么呢？

答：这些人的事业非常具有挑战性和创新性——文化产业，既然不能在朝堂之上建功立业，那就追求文名传世吧！

——欧阳修（1007 年）、李靓（1009 年）、邵雍（1015 年）、周敦颐（1017 年）、司马光（1019 年）、张载（1020 年）、王安石（1021 年）、沈括（1031 年）、程颢（1032 年）、程颐（1033 年）……，都是不世出的巨匠（排名不分先后，按年代排序，并请参考他们的生日间隔），然而，这里仅列出了不足 40 年。

——莫道朱程误中华，理学诞生的北宋王朝才是世界古代科学技术的巅峰。除造纸术外，四大发明其三诞生于北宋；历法方面，北宋统天历与今天的格里哥利历完全一致；数学方面，秦九韶等一批数学家定义了高次多元联立方程、高阶等差级数求和等……

——在西欧尚处于黑暗中世纪的时候，宋初便有了四大书院：岳麓书院、白鹿洞书院、石鼓书院、应天府书院……

这是继西周之后的又一代中华文化盛世！

当然，随着文化业兴盛的还有印刷业，因为，赵匡胤放开了私印图书。印刷业又

是一个与文化如影相随的产业，当时大规模的印坊已有十万左右的印板，印量足以媲美今日一家资产千万左右的印刷厂，动力则是水磨——马克思将之称为“一切生产机器的原素形态”。

乱世之源，表为流民、实为官吏。这些人本是最聪明的一群人，只要能封建官僚能不与民争利，您就搞搞创作去吧！

官无事，民自富，在那副传承已过千年的《清明上河图》中，所有一切都出现了不可遏止的商品化，人们终于找到了真正的财富，那根本就不再是土地。

——纺织业：东京开封丝绸业集中了来自全国各地的能工巧匠，四百多张织机、一千多工匠的工场只是中等规模；

——造船业：北宋初年所造海船长达十余丈，载重量达二百吨以上，所贮粮食可供水手一年，甚至还可酿酒、养猪，现代分舱隔水工艺就是源自于此；

——餐饮业：当时汴京有正店七十二家，相当于今天的七星酒店，大批茶坊和食店则散布于街头巷尾；

——娱乐业：瓦肆勾栏是当时的剧院、小剧场，大的剧场可以容纳上千人，说书、小唱、杂剧、讲史、小说、舞蹈以及杂技等等，令人“终日居此，不觉抵暮”。马克思曾经说过：城市工业本身，一旦和农业分离，它的产品一开始就是商品”①。这不是资本主义萌芽，而是资本主义兴起！所以，陈寅恪先生才对宋朝有一句中肯的评价：华夏民族文化，历数千年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

然而，北宋也必须面对游牧民族的挑战，就在一片蒸蒸日上的时候，北方却孕育这一场更大的危机……

楼主：天圆地方的困惑 时间：2021-10-16 00:57:12

就如我师父告诉我，对万事万物都要有一份敬，来保持自己的善良，又要对万事万物有一份畏，来约束自己的行为。

楼主：天圆地方的困惑 时间：2021-10-16 00:57:12

第14章 宣战，以货币之名

（宋太宗——宋仁宗）

交子前传：蜀地铁钱

北宋货币是中国古代货币的巅峰之作，钱文、制作工艺都称得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但是，北宋货币又极为特殊，西汉帝国、大隋帝国、大唐帝国，每一代鼎盛封建王朝都出现了统一的货币，可是，北宋王朝却从来就没统一货币。

北宋年间，全国货币分为典型的几个区域，开封府、两浙路、广南东西两路等经济富庶的地方用铜钱，成都府等地用铁钱，陕府西路则铜铁兼用，不但如此，最后还搞出来一个交子——即人类第一代纸币。

交子的起源，就在于蜀地铁钱。

蜀道难，难于上青天。

蜀地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地理境，正是因为蜀道之难才使其免遭战乱。一甲子乱世中，中原大族和大批百姓入蜀定居，天府蜀地得保独善其身，始终是一派承平气象。

陈桥兵变时代的蜀后主孟昶是一个才华横溢的人，诗词歌赋、文墨工笔样样精通，喜欢打球（蹴鞠）、马术，还是对联的发明者。

对普通人来说，“才华横溢”绝对是溢美之词，对皇帝来说就完全不一样了。说白了，所谓“才华横溢”的人只是浪荡才子，根本不知人间冷暖，他们的艺术才

华只能把繁琐的世务变得更加迷离，比如，这位“才华横溢”的孟昶就任命了一批“才华横溢”的大臣：宰相欧阳炯擅长吹笛、知枢密使事（最高军事长官）王昭远只擅填词……

承平时节，这些人或许可以用来装点门面；多事之秋，这些人窃据朝堂是一定会捅娄子的！

后蜀广政十八年（后周显德二年，955 年）蜀地世外桃源式的生活结束了，当年，后周攻取了后蜀的秦、凤等州。面对强大的周世宗，孟昶上表请和，但是，最后的署名却是“大蜀皇帝”。

《宋书》这样告诉我们，孟昶这个自称皇帝的署名激怒了周世宗柴荣，他一怒之下没有给孟昶回信，于是孟昶非常害怕，就开始在剑门、白帝囤兵积极备战。

从《宋书》给出的事实来看，周世宗应该没有生气，起码不是很生气。如果柴进真的很生气，应该直接派兵扫灭后蜀——实际上后周已经有了这个实力。但是，显德三年，后周就开始对南唐用兵，把后蜀晾到一边去了。

唯天有设险，剑门天下壮；一夫怒临关，百万未可傍。

历朝历代总有人能在蜀地割据，就是因为蜀道天堑，此地易守难攻。不过，以蜀道作为防守屏障是有前提条件的——防守方必须出蜀，把战场引到蜀道之上，后蜀布防重兵的剑门（四川剑阁县北）、白帝（重庆凤翔县东）就这样的地方。

把军队、物资运到这些地方，后蜀同样要翻越猿猴难攀的崇山峻岭——那得耗费多少粮食！

你不是防守吗？只需做出猛虎在山之势就能把你拖到筋疲力尽，等把你耗费的差不多了，再慢慢收拾你！

周世宗好心计！

从那个时候起，为了供养兵需，后蜀就已经开始铸行铁钱了。与皇帝的诗人气质一样，后蜀铁钱堪称中国古代货币中的一朵奇葩，这些铁钱制造精美，官府也没有任意增发铁钱或以铁钱收缴铜钱，只是规定铜、铁钱兑换比率为 4：10。当时的后蜀，除了铜钱还有锦帛、银两，有这些东西做参照物，铜铁两者货币比价基本合理。

有了周世宗的基础，加上这位“才华横溢”的皇帝，为赵匡胤扫平后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乾德二年，宋太祖赵匡胤派兵攻取后蜀，整个战事只用了 66 天。然后，孟昶就被弄到汴梁成了个秦国公，实际上是阶下囚。这个时候，诗人皇帝才想到一个问题：以丰衣美食养兵四十年，无一人为我向东发一箭？

孟昶投降了，蜀地却重陷战争。

降宋之前，蜀地富庶程度直追江南扬州，也正因为蜀地富庶，主将王全斌才放纵部下抢夺财货，甚至出现了当街强抢人妻的恶性案件。至于王全斌本人，除了经常随意克扣降兵降将的军饷，连后蜀士兵原有的随身财物也不放过，甚至数以万计的杀降。

王全斌所作所为终于激起了众怒，乾德三年二月，原后蜀文州刺史全师雄率领数万后蜀降兵反叛，一路围攻成都。《宋史》这样记载当时的情形：王全斌专杀降兵，擅自取走官库里的钱财，夺人妻女，搞得怨声载道，最终激起了兵变（专杀降兵，擅开公努，豪夺妇女，广纳财货，敛万民之怨嗟，致群盗之充斥）。

蜀人为这场叛乱付出了十余万条生命，叛乱也在宋人和蜀人之间种下了仇恨的种子，从此，蜀人不再信任宋朝官员，蜀地叛乱不断。

问：怎样才能让蜀人不继续造反呢？

答：让蜀人的钱花不出去，没钱就不造反了！赵匡胤统一全国后，不惜耗费国库中的铜材收兑南唐等地原来的恶钱和铁钱，唯独在蜀地，大规模发行铁钱、极小规模发行铜钱，运铜钱入境者死罪。

问：蜀地谁在用铜钱？

答：大宋王朝派来的高级官员，除了这些人，所有铜材一律只能出、不能进。

问：谁在用铁钱？

答：除了这些高级官员以外的所有人都必须用铁钱。缴税则一律用锦帛、粮食、白银或者实物，衙门才不收铁钱！

宋军入蜀前，这里本来是铜、铁并行，由于货币私铸，铜钱、铁钱并无多大区别，在千万次交易中自然能形成合理的比价。现在，官府给出的铜铁兑换价格是一比五（铁钱十乃直铜钱二），实际上二者兑换价格则超过了 1:100（铁虽百无得一铜）。

现在，蜀人名义财富立刻贬值百倍。但是，蜀人还是很富有的，大不了不跟其他地方做生意就是了。

楼主：天圆地方的困惑 时间：2021-10-16 00:57:12

开宝九年，赵匡胤在“烛影斧声”的传说中驾崩，新任皇帝赵匡义又想到一个更好的法子劫掠蜀地。

太平兴国四年（979 年），宋太宗赵匡义提出，益州是大宋王朝的一部分，全国货币终究还是要统一的。当然，这是一个重大的政策，要先试点、后推开，不搞一刀切。就以十年为限，逐年增加蜀地铜钱流通比例，蜀地每年 10% 货币改为发行铜钱，直至十年后完全取代当地铁钱。

听起来，这个政策还是蛮不错的，为货币统一指明了方向；实际上，根本不是这么回事！赵匡义统一货币的唯一手段（请注意“唯一”二字）只是要求蜀地开始以铜钱缴纳税收，按铜钱投放量每年递增 10% 计算，每年税收中也要递增 10% 的铜钱。

至于投放 10% 的铜钱，根本没那么会事，依旧是私运铜钱入境者死、蜀地铜钱一律出蜀，蜀人无法依靠正常途径获得铜钱。平时铜铁比例已经高达 1:100，现在每个人的赋税都要收 10% 的铜钱，还要年年递增。

朝廷的命令又不得不执行，否则一样要吃官司。那么，黎庶去那里弄这么多铜钱呢？

答：以更贱的价格向朝廷出售自己的财富，太平兴国五年，蜀地铜、铁比价居然达到了 1:400，蜀地财富遭到一次真正的空前大洗劫。在这场赵匡义精心下的这盘大棋中，蜀地百姓完全处于被动挨打地位，连还手的机会都没给。

蜀地物价腾贵，人们的日子一天不如一天，只有偷偷融化佛像、毁掉古铜器甚至去盗掘古墓，也只能交到 40-50% 的税赋，很多人因此获刑入狱（铁钱甚贱，物腾民困，……，益苦之，或剑剔佛像，毁器用，盗发古家，才得铜钱四五，坐罪者甚众）。

还用十年？三年就把蜀地的财富抢差不多了。

宋真宗淳化四年，青城县茶商王小波、李顺聚众百余人起事，义军横扫了整个川蜀，北宋王朝被迫放弃了这种“剃头式”的抢劫，蜀地元气逐步恢复。